

R U S S I A N S T U D I E S

俄羅斯研究

ELUOSI YANJIU ИЗУЧЕНИЕ РОССИИ

2023年 第3期

华东地区优秀期刊

中国期刊方阵双效期刊

《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收录期刊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CSSCI) 来源期刊



俄罗斯研究

汪道涵 题

目 录

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 3 张宇燕 / 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关于当前的国际形势与全球治理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十周年

- 24 赵可金, 史 艳 / 中和共发论: “一带一路”的全球政治经济学
48 朱杰进, 何 越 / 走向多边: 上海合作组织的政治起源

俄乌冲突的多重影响

- 68 李自国, 尚 月, 孙 超, 万青松 / 俄乌冲突与国际局势: 回顾与展望(之二)
98 李冠杰 / 俄乌冲突背景下英国对俄罗斯的外交政策新变化
130 宋黎磊 / 俄乌冲突背景下波兰对俄外交战略溯源——“雅盖隆思想”的复兴与波兰东方政策

俄罗斯的国家构建

- 152 费海汀 / 转型中的俄罗斯国家能力: 政治制度与精英体制的分析(上)
176 李 旭 / 俄罗斯国家认同建构的理论、效果与反思



全国中文核心期刊
中国期刊方阵双效期刊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期刊

主管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主办单位:

华东师范大学

出版单位: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

编辑:《俄罗斯研究》编辑部

主 编: 刘 军

副 主 编: 陈大维(常务)

编辑部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华东师范大学理科大楼 A403
电话:021-62233816;62238113
Email: russiastudies@163.net

邮政编码: 200062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 31-1843/D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

ISSN 1009-721X

印刷: 上海华教印务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2023 年 6 月 28 日

俄羅斯研究

ИЗУЧЕНИЕ РОССИИ

2023 年第 3 期 (双月刊)

Оглавление

Чжан Юйянь

На перекрёстке истории: О текущей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 ситуации и глобальном управлении..... (3)

Чжао Кэцзинь, Ши Янь

Теория нейтралитета и совместного развития: глобальная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экономия инициативы «Один пояс, один путь» (24)

Чжу Цзецзинь, Хэ Юе

Движение к многосторонности: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истоки Шанхайской организации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48)

Ли Цзыго, Шан Юе, Сунь Чао, Ван Цинсун

Российско-украинский конфликт 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ситуация: обзор и перспективы (часть 2)..... (68)

Ли Гуаньцзе

Новые изменения во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е Великобритании в отношении России в контексте российско-украинского конфликта (98)

Сун Лилэй

Источник 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ой стратегии Польши в отношении России в контексте российско-украинского конфликта: Возрождение «ягеллонской мысли» и восточная политика Польши (130)

Фэй Хайтин

Возможности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в переходный период: анализ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системы и системы элит (часть 1) (152)

Ли Сюй

Теория, эффект и отражение конструирования русской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идентичности..... (176)

俄羅斯研究

RUSSIAN STUDIES
2023 年第 3 期 (双月刊)

Contents

Zhang Yuyan

Standing at the Crossroads of History: On Current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and Global Governance..... (3)

Zhao Kejin, Shi Yan

Theory of Zhonghe and Co-development: Global Political Economics of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24)

Zhu Jiejun, He Yue

Going Multilateral: Political Origins of 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48)

Li Ziguo, Shang Yue, Sun Chao, Wan Qingsong

Russia-Ukraine Conflict and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Review and Outlook (II)..... (68)

Li Guanjie

New Changes of the UK’s Russia Policy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Russia-Ukraine Conflict..... (98)

Song Lilei

Origins of Poland’s Diplomatic Strategy towards Russia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Russia-Ukraine Conflict: Revival of the “Jagiellonian Idea” and Poland’s Eastern Policy(130)

Fei Haiting

Russia’s State Capacity in Transition: Political System and Meritocracy (I) (152)

Li Xu

Construction of Russian National Identity: Theories, Effects and Reflections (176)

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 ——关于当前的国际形势与全球治理*

张宇燕**

【内容提要】法国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将历史分为长、中、短三个时段，每个时段可以观察到的影响历史走向的核心变量各有不同。借助这一划分方式可以发现，长时段的气候变化，中时段的产出水平、技术进步和人口结构的变化，以及作为短时段标志性事件的乌克兰危机同时出现，使当今时代面临三个时段叠加共振的“巨变”状态，表现为当今世界“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的加重。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也指出，“世界又一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何去何从，取决于各国人民的选择”。要有效应对全球治理赤字，制度建设至关重要。通过国际协调建章立制，加强建设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才能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正确方向改善，从而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作出正确的选择。

【关键词】气候变化 人口问题 技术进步 乌克兰危机 全球治理

【中图分类号】D815**【文章标识】**A**【文章编号】**1009-721X(2023)03-0003(21)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人类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世界又一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何去何从取决于各国人民的抉择”^①。在2018年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把握国际形势要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大局

* 本文根据张宇燕所长2022年11月在华东师范大学的演讲整理而成，经作者同意由《俄罗斯研究》杂志发表。

** 张宇燕，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

①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60页。

观、角色观”^①。其中，历史的分析对理解国际形势非常重要。大局观强调的是抓主要矛盾以及矛盾的主要方面。角色观则一定要将自身与当今国际形势相联系，理解所处的国际环境和国际形势。

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研究了人类历史上的 21 个文明。在不同地区出现过的众多文明中，有的出现较早，有的出现较晚，其中很多文明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消亡了。在研究文明的起源、发展和衰败之后，汤因比提出了“挑战—应战”模型。^②基本结论是，文明总是遇到挑战，如果成功应对挑战并在应对挑战过程中有创新和发展，这个文明就能繁荣昌盛；如果被外敌入侵、自然灾害等挑战击垮，这个文明就会衰亡。还有的文明将全部能量用于应对挑战，虽然没有被击垮，但是同时它已经没有额外的力量去发展自己，文明因此而停滞。以中华文明为例，为什么会在黄河流域而不是长江流域发展起来？因为长江流域自然条件要比黄河流域好很多，在那里，人类的生存要比在黄河流域容易，不会遭遇强烈的挑战。而要想在黄河流域生存，则必须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因此中华文明才在那里发展兴盛起来。

修昔底德认为，历史的意义主要是揭示人性。事物易变，但人性是不变的。^③目前，虽然人类经历的事情，享受的物质财富以及生活水平与几千年以前完全不同，但是人性并没有发生变化。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将历史分为长、中、短三个时段。^④首先，长时段跨度大概几百年甚至上千年，长时

① 习近平：《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 年，第 538 页。

② 参见[英]阿诺德·汤因比著：《历史研究》，刘北成、郭小凌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年，第 37 页。

③ [古希腊]修昔底德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徐岩松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年，第 45-48 页。

④ 参见[法]费尔南·布罗代尔著：《资本主义论丛》，顾良、张慧君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 年，第 173-204 页。布罗代尔夫人在《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的中译序中也有相关论述：“非常缓慢的、几乎世代不变的历史，以几乎不变的地理景观和某些文明的传承强加于所有人类集团——这就是布罗代尔经常称作‘长时段史’的东西；变化较为迅速、尽管还是节奏缓慢的历史，以几个十年的长周期，40 年、50 年，改变着有时是动荡着国家、社会和精神生活的循环的历史；最后，是飞快变化的历史，每天充满多变的事件，可以说是我们在每天的报纸上看到的历史，在西米昂之后，布罗代尔将这传统的历史称为‘事件’史。”[法]费尔南·布罗代尔著：《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唐家龙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年，第 8 页。

段中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要素包括地理、气候、生态环境、社会组织、思想传统。这些一经形成，几百年都不易改变。就人类个体来讲，对长时段要素可以发挥或实施影响的主动性很小，一些学派或教派将其归于“宿命”。这个时段尺度下的要素变化缓慢，对历史进程则产生深刻影响。其次，中时段涉及的时间跨度从几十年到一百多年不等，影响历史的变量包括人口、产出、工资水平、价格、技术、制度等，一般是几十年中会表现出变化。最后，短时段指的是影响的时间跨度比中时段更小的时间序列上的事件，包括革命、条约、地震等。人们在经历它时，觉得轰轰烈烈、影响很大，但是从历史学家的大尺度或超大尺度去回溯，大多数事件的影响转瞬即逝。

当今时代面临三个时间尺度中关键因素的叠加。长时段的气候变化已经变成十分紧迫的问题。中时段的产出水平、技术革新和人口结构变化产生的影响很大。短时段的标志性事件是乌克兰危机以及美国和西方国家对此的反应。三个时段中的关键变量集中在一起同时发生，推动人类站到了历史的十字路口。

一、长时段的气候变化问题

在长时段尺度下，当前人类经历的最重要的变化在气候方面。托比·奥德在《危崖：生存性风险与人类的未来》一书中指出，以前人类的作用只是加速或者延缓某段历史进程，但是 1945 年人类有了核武器，便拥有了自我毁灭的能力。而今天，除了核武器之外，人类面临着非常大的挑战，其中之一是气候变化。另外一个工程化病原体，即人工制造病原体，再则是人工智能的出现。人工智能并不是机器人，而是一个系统，它隐藏在世界各地的计算机中自我学习，掌控人类的资源、隐私，最后可能获得支配性权力。奥德指出，这些风险的叠加，导致在未来一百年中人类可能会自我毁灭的概率达到了六分之一。^①在这几个风险中，气候变化问题至关重要且紧要。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2021 年 8 月发布了《气候变化(2021)：

^① 参见[澳]托比·奥德著：《危崖：生存性风险与人类的未来》，韦斯琳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21 年，第 115 页，第 122-128 页，第 140-142 页，第 164-165 页。

自然科学基础》。^①这份报告用自然科学的大量数据论证了气候变化的影响。报告指出，随着全球变暖，2021 年出现的各种极端气候如酷热、洪水、山火等，将成为未来 30 年的常态。2022 年 9 月，联合国秘书长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洪水、干旱、热浪、极端风暴和山洪等情况变得越来越糟，并以惊人的速度打破纪录。问题的关键是，这些灾难不是天然的灾难，它们与人类活动息息相关。即使人类马上采取行动，大幅度减排，未来 30 年全球总升温也有可能达到 1.5 摄氏度。而根据原有的推断，21 世纪内全球总升温是不大可能达到 1.5 摄氏度这一指标的。

2021 年，1.4 万名科学家在美国《生物科学》月刊上联署发表文章，讨论了地球的过度开发问题。这些科学家设立了 31 项“生命体征”来“诊断”地球的“健康”程度，里面涉及森林砍伐、温室气体排放等。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在 31 项指标里面，有 18 项已经突破了“红线”，这表明地球岌岌可危。^②2022 年 10 月 13 日，世界自然基金会发布的《地球生命力报告 2022》也显示，1970 年以来，全球受监测的野生动物种群数量减少了 69%，这对生态多样性的影响非常大。^③

2022 年 9 月 20 日，国际能源署和国际可再生能源署联合发布了《2022 年突破性议程报告》。^④这份报告指出，在当下全球能源危机的背景下，净零目标的实现可能要推迟数十年。目前的情况非常危急，要想做到把全球升温幅度控制在 1.5 摄氏度越来越难。除了大幅度减排，减少化石燃料使用，还有很多事情需要去做，其中之一便是粮食浪费问题。据统计，食物浪费占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比重的 11%，几乎与汽车尾气二氧化碳排放的 12% 一样。因此，节约粮食不仅仅是节约支出问题，而且还关乎二氧化碳排放的问题。

如何才能解决这些问题？这涉及统计指标问题。目前，大家依旧将人类

① See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Climate Change 2021 – The Physical Science Basis”, *Chemistry International*, 2021, Vol.43, No.4, pp.22-23.

② See William J. Ripple, Christopher Wolf, Thomas M. Newsome, Jillian W. Gregg, Timothy M. Lenton, Ignacio Palomo, Jasper A. J. Eikelboom, Beverly E. Law, Saleemul Huq, Philip B. Duffy, Johan Rockström, “World Scientists’ Warning of a Climate Emergency 2021”, *BioScience*, 2021, Vol.71, No.9, pp.894-898.

③ See “Living Planet Report 2022”, <https://livingplanet.panda.org/en-GB/>

④ See “Breakthrough Agenda Report 2022”, <https://www.iea.org/reports/breakthrough-agenda-report-2022>

生存品质与人均收入增长和 GDP 增长相关联。但事实上，这个指标是存在问题的。十几年以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就发现这个指标会阻碍碳排放目标的实现，为此，成立了一个包括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肯尼斯·阿罗在内的、由众多经济学家组成的团队，负责制定新的经济指标体系，即包容性财富指数（IWI）。这个指数和 GDP 有很大区别。首先，GDP 是流量概念，指人类在一年时间内新创造的财富，包括商品和服务的增量。然而 GDP 衡量的是商品和服务的数量而不是质量。IWI 则更加关注存量，通过综合分析一国的福祉和发展的可持续性来衡量国家财富。其次，IWI 的内容更加丰富，主要包括人力资本、生产资本、自然资本三个方面。^①在人力资本方面，既涉及人的数量，又涉及人的质量。人的质量不仅与受教育水平有关，还与人的健康状况有关。健康等人力资本的质量指标非常重要。眼镜的发明曾经被评为对人类影响最大的事件之一，主要是因为如果没有发明眼镜时，老师傅视力的下降会影响其制作仪器的精密程度，导致真正有效工作的时间缩短，急剧降低了劳动效率。但是有了眼镜以后，熟练师傅的工作时间会大大延长，从而优化了人力资本。与一个受过教育但有效服务时间只有 20 年的人相比，更健康的人的有效服务时间可以达到 30 年甚至 40 年，后者构成的人力资本水平明显提升。这些与人力资本相关的内容，在 GDP 里面是难以充分反映出来的。

在生产资本中，除了机器设备、厂房，IWI 还包括基础设施，这部分非常关键。环境、水的质量、空气的质量、地表生态和地底资源等自然资本也是 GDP 基本没有涉及的。虽然 IWI 很难计算，但是在 2014 年和 2018 年上述团队发表了两份报告。总之，IWI 指标更加契合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大报告里强调的环境保护、绿色发展、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特别是自然资本已经将绿水青山因素考虑在内了。一旦大家接受了这个指标，就不会一味追求 GDP 的增长了。而根据现行主流统计标准，造军械、炮弹、导弹、原子弹等都计入了 GDP，但这部分 GDP 实际上发挥作用时，其功能是毁灭其他一部分 GDP。

^① 参见张宇燕、方建春：“GDP 与 IWI：核算体系与人类福祉”，《经济学动态》，2020 年第 9 期，第 15-29 页。

二、中时段的人口问题和技术进步

在中时段的主要变量中，首先是人口问题。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人口也在发生重大变化，包括人口的年龄结构、族群结构等。人口年龄结构的主要影响因素之一是生育率。据统计，日本 2021 年总和生育率是 1.28，欧盟是 1.5，韩国则是 0.8。对于一个国家而言，2.1 的总和生育率是临界值，即当平均每个妇女一生生育不低于 2.1 个孩子时，整个群体的人口规模才不会缩小。中国 2021 年的人口总和生育率是 1.18，估计 2022 年会低于 1。与此相对，也有一些国家和地区出现了人口爆炸。例如非洲。非洲现在是全球生育率最高的地区，像尼日尔的总和生育率是 7.46，马里是 7.42，索马里为 6.76。中东地区的生育率也特别高。目前全球人口结构呈现出人口爆炸和人口老龄化并行的趋势。在人口爆炸的国家或地区，人口中位年龄非常年轻。例如，中东地区的埃及 24.1 岁，叙利亚 23.5 岁，伊拉克 21.2 岁。非洲一些国家中位年龄更低，喀麦隆和索马里 18.5 岁，苏丹 18.3 岁，赞比亚 16.9 岁，安哥拉 15.9 岁，全球最低的是尼日尔，只有 14.8 岁。亚洲一些国家中位年龄也较低，如菲律宾 24.1 岁，巴基斯坦 22 岁。而中国、日本等国的中位年龄就偏高。中国是 38.4 岁。日本是 48.6 岁，仅次于摩纳哥的 55.4 岁而居全球第二。^①

年龄结构的老龄化趋势已经是许多国家面临的挑战。一方面，人口老龄化涉及劳动力减少的问题。构成人力资本的人口减少，将带来经济潜在增长率的下降，同时社保、医保等相关财政支出还会上升，这将加大财政赤字的压力。不仅如此，老龄化对国家政治行为也有系统性影响。老年人的创新能力和消费能力虽不如青年人，但是政治参与度明显高于青年人。例如，统计显示，日本 2021 年 10 月举行的第 49 届众议院选举中，20—29 岁青年人投票率为 36.5%，60—69 岁老人投票率为 71.4%，后者几乎是前者的两倍。^②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加上老年人更有时间关心自己的福利，这一群体更容

① See “Average Age by Country 2023”, <https://worldpopulationreview.com/country-rankings/median-age>

② 総務省：衆議院議員総選挙における年代別投票率の推移，https://www.soumu.go.jp/enkyo/senkyo_s/news/sonota/nendaibetu/

易影响选举结果。在 1970 年的英国，只需根据一个人所处的社会阶层和收入，就可大致判断出他会投票给哪个党，这个规律在现在已经失效了。目前，主要是根据年龄判断其所支持的政党。1946 年后出生的人口大量进入老龄化阶段，他们不断推动法律保障自己的老年福利，取得的成果是英国在 2010 年出台了养老金“三重锁定政策”，即保证英国国家养老金增长率提升至通胀水平、工资上涨速度、2.5% 这三个数值中的最高值。老年福利成为政党讨好选民获取政权的重要政策选项。

另一方面，老龄化人口结构导致一些国家被迫考虑通过放开移民限制来补充青年人口。然而，扩大移民也可能带来大量新的社会问题。默克尔执政期间遭人非议的问题之一就是“门户开放”的难民政策。德国所接纳的百余万难民对政府财政、社会治安等造成了很大影响。意大利兄弟党的主要政见就是反对非法移民，这也是其获得大量支持的原因之一。近年来，对移民政策一直颇为保守的日本开始放开移民，这也与日本老龄化问题非常严重有关。根据日本总务省 2022 年 9 月发布的人口估算数据，该国 65 岁以上老年人占总人口的比例为 29.1%。2020 年，日本经济新闻的调查显示，70% 的日本人认为接纳更多外国人对日本的发展是一件好事。

族群结构也是人口问题中非常重要的变量。在俄罗斯，2015 年穆斯林人口是 2000 多万，占比 15%。据估计，到 2050—2060 年，这一比例将达到 33%。照此趋势发展下去，俄罗斯很可能最终变成以穆斯林人口为主的国家。美国也面临类似情况。1970 年，美国的穆斯林只有 10 万人，现在已经达到 1000 多万人。2018 年，美国新生儿有一半以上不是白人，而到 2024 年，2 岁以下的不是白人的美国人将超过一半。根据预测，到 2050 年，全球人口的三分之一是穆斯林，三分之一是基督徒，这个变化对政治、经济都将产生重大的影响。当今世界出现的与民族主义思潮兴起有关的变化，与年龄结构、族群结构的演变趋势密切相关。

其次是技术问题。党的二十大报告十分重视科学和技术问题，提出科技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之一。^①目前，数字

^① 参见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年，第 33 页。

技术、数字经济等也成为国内外广泛关注的热点问题。然而，数字技术的发展到底如何影响经济？这需要放在理论框架中加以探讨。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指出，经济学最核心的问题便是经济的增长。其中，增长的本质是人均收入的增长。这意味着，平均来看每个人能够创造更多的财富，其原因在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技术进步是导致劳动生产率提高的重要原因。当有现实需求时，人类就会想办法发明创造来满足需要，并在这个过程中推动技术不断进步。此外，交换或贸易也能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如果每个国家都生产自身所需的全部产品（比如粮食和衣服）而不发生交易，其他条件不变时，劳动生产率不会发生变化。每个国家或者每个企业都有自己的相对优势。如果一国单位时间生产粮食更多，另一国单位时间生产衣服更多，就可以由粮食劳动生产率高的国家专门负责生产粮食，另一国专门负责生产衣服，然后双方进行交易，两国生产出来的粮食和衣服数量总额会比没有国际分工和贸易时更多。这意味着，即使没有发生技术进步，仅仅通过开放贸易也能带来单位时间产出水平的提高。这就是自由贸易的基础。随之而来的是，分工和专业化还可能进一步促成生产过程中的技术进步，推动社会生产力进一步提高。

更深层的问题是，是什么因素决定了分工和专业化？亚当·斯密给出的答案是市场规模。如果一个村只有 3 户人家，则这 3 户人家都必须各自包揽各种生产生活事务，包括但不限于种粮食、种棉花、织布、制造和修理农具等。如果该村有 300 户人家，那么就会出现专业化分工，发展出铁匠、木匠、开餐馆的、修理农具的、卖肥料的……随着各项营生收入的提升，财富的积累便出现了。亚当·斯密的基本结论是，经济增长主要表现为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劳工生产率的提高取决于分工和专业化。市场越大，参与的人越多，分工就越细；分工越细，劳动生产率就越高，技术会在有需求时进步，进而继续推动增长。简言之，就是增长取决于市场规模，这就是所谓的斯密定理。

古典经济学家多崇尚自由贸易，自由贸易离不开执行契约和保护产权。一个主体如果从事专业化生产，比如专门负责生产粮食，而粮食的产出有时间周期，从春耕到秋收需要数月甚至半年时间，要保证粮食供需方面的稳定，就需要签订契约。一般来说，签订的契约必须得到遵守，无成本或低成本破

坏契约的现象如果普遍存在就会扰乱市场预期。契约的签订、执行都需要强制性权力的保障，有机构确保契约的强制性执行才可能实现分工专业化。而交换也需要在明确界定产权、尊重契约的基础上，才能够实现。界定产权和执行契约正是政府的职责所在。

在 2022 年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李强同志的主旨演讲提到了“完善产权保护”和“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①。“保护产权”十分关键，契约遵守也很重要。冷战时期，苏联的粮食生产不能满足国内的需求，便和美国签订了购买小麦的合同，而且是长期协议。^②苏联出兵阿富汗时，整个西方对苏联实施全面制裁。即便如此，美国还是保证了对苏粮食贸易协定的执行，部分原因也是考虑到粮食和人道主义是联系在一起的。现在，俄罗斯变成了小麦等农产品的主要出口国。在人口和土地都大致没变的情况下，从粮食进口国转变成出口国，这说明体制机制很重要。

根据亚当·斯密的理论框架，数字技术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体现在哪些方面呢？事实上，数字技术无形中扩大了市场。在数字技术发展起来之前，一些资源处于闲置状态，根本不可能进入市场，无法形成供给。得益于数字技术，这些资源的潜能被快速、全面地调动起来了。例如，以前出差往往会选择入住当地有名气的大型酒店，但是在数字技术的加持下，现在出差可以选择入住家庭旅馆或其他有自己特色的小规模酒店，较低的搜寻成本，将它们具备的价格、安全、服务和位置优势更充分地呈现了出来，这也使得越来越多原本闲置的社会资源投入到酒店业之中。数字技术把以前可能根本进不了市场的资源调动起来，扩大了市场规模，随之而来的是分工更加专业化。如果没有数字旅店平台，可能需要对大型酒店为主体的旅店业投资 1 万亿美元。而现在，这 1 万亿美元中的相当部分可以用到其他方面，产生更高的配置效应，整个行业也会变得更加绿色环保。

此外，数字技术还能增加普惠性。在一些行业，以前只有大公司才有钱

^① “李强出席第五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人民日报》，2022 年 11 月 5 日第 1 版。

^② 1972 年，苏联与美国在莫斯科签订《苏美粮食贸易协定》，协议规定三年内美国将向苏联出售价值 7.5 亿美元的粮食，同时向苏联提供 7.5 亿美元信贷用于粮食购买。粮食贸易的构成在不同时期有所不同。

做广告并在市场中存活下来，小商小贩、小家庭作坊的产品无法进入市场。例如香水行业，主流产品都是大品牌香水，而且价格非常高。因为香水是一个广告密集型产品，广告费占整个销售价格的 45% 左右，小品牌负担不起广告成本，所以只有大品牌才能生存下去。服装业此前与香水行业类似，大品牌赢者通吃的现象比较明显。即使是非奢侈品女装也具有较强品牌效应，比如 Zara 等就是被市场认可的畅销品牌之一。近年，中国南京有几个青年人创立了一个跨境电商平台“Shein”，主要经营女装。其专门针对海外市场每天推出几十款女装，品类多、更新快、质量优、价格低，受到国外年轻人的欢迎，直接挑战了 Zara 的门店业务。这就是数字技术产生的可及性和普惠性效应。

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也出现了数字鸿沟问题。在网络和数字经济领域，不同的行为体利益诉求不同。比如，国家关心的是安全，平台企业关心的是利润，产品或服务提供者关心的是便利度，民众或消费者关心的是个人隐私。不同集团的诉求可能会阻碍统一规则的达成。目前，数字领域最大的问题就是缺乏统一的规则。没有规则，贸易和投资都会受到影响。

三、短时期大国力量对比的变化和对俄制裁的影响

当前短时期的变量主要是大国力量对比，特别是中美力量和关系的变化以及乌克兰危机的影响。首先，必须重视中美关系。根据《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记述，雅典的崛起引起了斯巴达的恐慌。这里面存在两个变量，一个是崛起，一个是恐慌。目前国际形势中包括乌克兰危机在内的许多重要事件，背后都是大国博弈。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兴起的经济全球化，主要是各国在追求效率、利润的全球化，而当前各国考虑的因素则更多、更复杂。国家的战略目标可能不仅是自身福利的改进，还包括打压竞争对手的一面。2004 年，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发表在《经济学展望》杂志的文章便以中国和美国为例分析了这种变化。这篇文章的发表标志着经济学界抛弃或者否定了纯粹的李嘉图模型的核心论点，即贸易促进双方福利的改进。一旦考虑到技术进步因素，开放的结果有可能导致一些国家受益，而另一些国家则受到持久

的损害。^①

就中美关系而言，很大程度是 GDP 规模的相对变化引起了美国的焦虑。虽然 GDP 这个指标并不完美，但是与其他指标相比，还是最能够系统、综合、可比地反映一国力量的长期变化态势的指标。1980 年中国 GDP 与美国 GDP 之比不到 7%，到 2010 年变成了 40%，2015 年上升至 60%，2020 年进一步上升至 70%，2021 年更是达到了 77% 左右，这个变化非常大。从人均 GDP 来看，1980 年代，中国人均 GDP 不到 300 美元，美国是 1 万美元左右。现在，中国人均 GDP 是 1 万美元左右，美国是 6.8 万美元。双方的人均 GDP 原来相差 1 万美元，现在相差将近 6 万美元，绝对差距越来越大，但从中国占美国比重来看仍然显著提升。美国忌惮中国经济增长持续积累的体量。

除了力量对比接近的压力以外，美国焦虑更深层的逻辑还在于资源占有或分配的压力。大约 30 年前，位于华盛顿的世界观察研究所发表了一篇题为“谁来养活中国”的文章，对中国赶超美国的后果进行了估算，一个结论是，如果中国人平均物质消费水平达到美国的 1/2，当时条件下，至少需要 2—2.5 个地球的资源才能满足中国的需求。^②在一次采访中，中国记者向德国前总理施密特提问：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对西方意味着什么？施密特思考片刻后说，这意味着西方人生活水平的下降。他认为地球的资源是有限的，所有中国人如果想要达到西方的生活水平，就意味着要消耗更多资源，结果要么是西方减少消费，要么是以更高的价格水平消费。美国前总统奥巴马也谈到过类似的问题。他在 2010 年的电视访谈中说：“你知道，如果你与中国领导人交谈，我认为他们会立即承认，如果超过 10 亿的中国公民拥有与澳大利亚人和美国人现在一样的生活模式，那么我们所有人都将面临一个非常悲惨的时期，地球无法承受这种情况，所以他们明白自己必须做出一个关于新模式的决定，这种模式更具有可持续性，这将使他们能够追求他们正在追求的经济增长，同时，处理这些环境后果。”^③这里面流露了他对中国的

① See Paul Samuelson, “Where Ricardo and Mill rebut and confirm arguments of mainstream economists supporting globalization”,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004, Vol.18, No.3, p.142.

② See Lester Brown, “Who will feed China”, *The Futurist*, 1994, Vol.30, No.1, p.14.

③ 采访记录参见 <http://www.carstenburmeister.com/blog-president-obama-on-the-seven-reports.aspx>

发展会威胁整个西方福利的担忧。丹麦前国务秘书、外交部官员约恩·厄尔斯特伦·默勒在美国《国家利益》发表了一篇研究中国和西方矛盾冲突的文章，提及了中西方社会、政治体制的不同。但他认为，冲突的真正原因是西方为了争夺日益稀缺的资源，“北京不是北约成员国的安全威胁，而是威胁到了一种观点，即西方有权控制全球财富，随心所欲地使用资源，无视他人的需求并且持续肆无忌惮地制造污染”，“中国现在之所以受到攻击，是因为它要求获得更大份额的全球蛋糕，也是因为北京拒绝大方接受西方分配给它的角色”。^①中美大国博弈看上去是在国际规则确立的问题上讨价还价，但底层逻辑还是对资源的争夺。

另一项重要的短期事件是乌克兰危机，特别是与之相关的国际制裁。国际制裁是由特定行为体，通过让其他行为体遭受损失来迫使他们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为而采取的主动行动。这些行动是非暴力的、非合作的、惩罚性的、警示性的。一是使目标国服从、按照制裁国的偏好行动；二是颠覆、实现罢免目标国领导人或者推翻其政权的目的。美国制裁俄罗斯的目标至今依旧不明确。基辛格提醒美国需要明确相应的目标，是让俄罗斯服从还是要颠覆俄罗斯政权？美国前中央情报局官员曾公开表示，美国的目标就是推翻普京的统治。除此之外，美国的制裁可能还有警示的作用，即在国际上发出信号，警告其他国家自我约束。不仅如此，制裁俄罗斯还有想要实现的国内目标，即服务于国内的党派之争。拜登政府制裁俄罗斯的目标之一，是为了帮助民主党在中期选举中获胜。

制裁种类可以按声誉、价格、数量、人员、金融、规则、网络和盟友等不同方式分为八种。一是从名制裁，即制裁方以违反规范为由对被制裁方发起制裁。从名制裁的依据与标准是令被制裁方遭受声誉歧视和惩罚，制裁的手段和工具是制裁方运用规范性权力令被制裁方声誉受损并由此承受经济或政治损失，包括点名和羞辱（name and shame）、在指标体系中降低排名、污名化、列入“黑名单”等等。

二是从价制裁，即制裁方通过提高或降低商品、服务或货币的相对价格，

^① Joergen Oerstroem Moeller, “Climate Change and Resource Scarcities are Reshaping the World Order”, November 13, 2021,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climate-change-and-resource-scarcities-are-reshaping-world-order-196128>

使被制裁方遭受损失。从价制裁的依据与标准是令被制裁方遭受价格歧视和惩罚，制裁的手段和工具是制裁方运用器物性或制度性权力使价格变得不利于被制裁方，包括提高关税、汇率操纵、倾销和反倾销、取消最惠国待遇等。

三是从量制裁，即制裁方通过数量上完全禁止或部分限制，使被制裁方受损。从量制裁的依据和标准是令被制裁方遭受数量歧视和惩罚，制裁的手段和工具是制裁方运用器物性或制度性权力使数量变得不利于被制裁方，包括禁运、抵制进口、减少或取消配额、拒绝发放许可证、减少或取消援助或贷款等。

四是从员制裁，即制裁方对被制裁方的特定人员或群体发起制裁。从员制裁的依据和标准是令被制裁方的特定人员或群体遭受歧视和惩罚，制裁的工具和手段是制裁方综合运用规范、金融、网络等权力进行甄别和追查并实施精准打击。从员制裁通常指向被制裁方的政权成员和其支持集团，目的是使核心人员的经济地位遭受重创，进而迫使其服从制裁方诉求。^①具体举措包括驱逐外交官、召回大使、冻结个人资产、禁止金融服务、限制或取消签证、旅行限制等。

五是从金制裁，即制裁方对被制裁方的资产、账户或资金流动发起制裁。从金制裁的依据和标准是令被制裁方遭受金融歧视和惩罚，制裁的手段和工具是制裁方利用金融性权力限制或禁止被制裁方的货币流动和交易，包括冻结被制裁方的资产和账户、没收或强行出售资产、限制或拒绝进入清算体系、禁止第三方金融机构与被制裁方进行金融交易、禁止融资等。

六是从规制裁，即制裁方通过确定和执行规则来限制或改变被制裁方的对外政策和行为。^②从规制裁的依据和标准是令被制裁方遭受规则歧视和惩罚，制裁的工具和手段是制裁方运用制度性权力来规锁和遏制被制裁方，包括实施国内法外延和长臂管辖、区域非中性规则、多边非中性规则等。

^① 在朝核问题上，美国财政部冻结了朝鲜领导人的美元资产。2014年乌克兰危机后，美国冻结了普京核心领导层成员的资产。See Judd Polk, "Freezing Dollars Against the Axis", *Foreign Affairs*, 1941, Vol.20, No.1, pp.113-30; Karin Lissakers, "Money and Manipulation", *Foreign Policy*, 1981, No.44, pp.107-26; Robert Carswell, "Economic Sanctions and the Iran Experience", *Foreign Affairs*, 1981, Vol.60, No.2, pp.247-265; F. W. Neate ed., "The Carter Freeze", *International Business Lawyer*, 1981, Vol.9, No.3, pp.93-114.

^② See Michael Barnett, Raymond Duvall, "Power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2005, Vol.59, No.1, p.51.

七是从网制裁，即限制或切断互联网接入、逐出网络支付系统。从网制裁的依据和标准是令被制裁方遭受网络歧视和惩罚，制裁的工具和手段是制裁方运用网络性权力来管辖被制裁方，主要包括断网、关停 GPS 导航系统、拒绝提供即时信息通信服务、踢出 SWIFT 国际结算体系等。

八是从盟制裁，即制裁方拉拢、说服或威慑第三方以形成统一的制裁联盟。从盟制裁的依据和标准是令被制裁方遭受系统性排斥和惩罚，制裁的手段和工具是通过规范性、制度性、金融性和器物性权力将被制裁方踢出圈子，具体包括确立全面的排他性平行体系、在特定领域或部门确立有选择的排他性平行体系等。

2022 年 9 月，俄罗斯称西方国家已对其实施了约 1.1 万项各种限制，本来预计这些制裁可能对俄罗斯经济产生严重影响，但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22 年 10 月发布的报告显示，俄经济 2022 年第二季度按年化率计算萎缩了 21.8%，而 2022 年全年预计仅萎缩 3.4%，比预期的要低。^①其 2023 年 1 月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进一步将俄罗斯 2022 年经济萎缩的预计幅度下调至 2.2%，甚至预计其 2023 年将由上次预计的萎缩 2.3% 转为 0.3% 的增长。^②根据俄罗斯联邦国家统计局 2023 年 2 月的数据，2022 年俄罗斯经济实际萎缩 2.1%。^③美国对俄制裁效果低于预期有两个原因：一是俄罗斯国有部门的产出占整个 GDP 的 60% 以上，政府的抗压能力较强；二是俄罗斯在能源和粮食领域的全球影响力较强。

现阶段，粮食危机、粮食安全也已经成为影响世界的比较重要的短期“事件”。从生产角度来讲，全球粮食整体上并不存在不足或短缺问题。二战后，农产品生产的增长率一直高于人口的增长率。问题主要出在结构或分配上。例如，乌克兰是世界主要小麦出口国，一些国家高度依赖自乌克兰的小麦进口，但乌克兰危机使这部分粮食贸易受到了影响。再如，全球三分之一的粮

① IMF: *World Economic Outlook Report: Countering the Cost-of-Living Crisis*, October 2022, <https://www.imf.org/en/Publications/WEO/Issues/2022/10/11/world-economic-outlook-october-2022>

② IMF: *World Economic Outlook Update: Inflation Peaking amid Low Growth*, January 2023, <https://www.imf.org/en/Publications/WEO/Issues/2023/01/31/world-economic-outlook-update-january-2023>

③ 参见“俄罗斯经济 2022 年萎缩 2.1%”，2023 年 2 月 21 日，http://www.news.cn/fortune/2023-02/21/c_1129383129.htm

食被用于非食用工业领域，如生产酒精、燃料、饲料等，这些领域对粮食用地及生产的过度占用，可能在某些条件下影响粮食安全。此外，美国 ADM、美国邦基（Bunge）、美国嘉吉（Cargill）以及法国路易达孚（Louis Dreyfus）等所谓“ABCD”四大粮商控制着全球 70% 的粮食市场交易，它们炒作粮食价格从中牟利的行为也对全球粮食安全造成了威胁。

四、全球治理赤字的解决与公正合理国际秩序的要义

上述不同时段变量对当今世界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正如党的二十大报告所指出的，当今世界面临“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加重”的严峻局面。而上述提到的长时段最重要的气候变化，属于典型的“治理赤字”问题，这就涉及全球治理，因而有必要对全球治理展开深入分析。

全球治理的对象主要是全球问题。什么是全球问题？只要满足以下这两个条件就是全球问题：第一，它的影响范围是全球性的；第二，这个问题的解决必须经过世界各国的共同努力，不能单靠一两个国家。

气候变化是典型的全球问题，只靠中国等少数国家努力而其他国家置身事外是不可能解决的。必须各国协调共同解决。解决这一问题还必须考虑到国际问题与国内问题存在的本质区别。

什么是“国”呢？从“国”字的繁体写法“國”可以看出，其外面是一个方块，里面包括一个“戈”字，指武器，还有一个“口”，这个口代表人口。外面的方块“口”不是汉字“口”，而是一个古汉字，读“wéi”，基本含义是城墙。城墙里面既有人口，又有武器（代表军政部门），体现了国家的三个最重要的因素，也即《孟子》论及的国君之三宝：土地、人民和政事。^①在英文中，表示国家的也有三个词：Country、Nation、State。其中，Country 主要指土地，Nation 涉及人和民族，State 主要指政府。

拥有土地、人民和政府等要素之外，要想成为国家还需要满足的条件是获得其他国家或政府的承认，只靠自我标榜还不行。确实发生过这样的事。

^① 《孟子·尽心下》，孟子曰：“诸侯之宝三：人民、土地、政事。宝珠玉者，殃必及身。”《孟子》，方勇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297页。

美国有一家四口在网上宣布他们在自己拥有的土地上成立独立国家，还发布了其所拥有的农场的精确的经度纬度，并宣称由丈夫担任总统兼国防部长，妻子任总理兼内政部长。看上去他们所建之“国”满足了土地、人口和政治的基本条件，但是最后夫妇二人因为不交税而被抓走。这家人的行为并没有获得美国或其他任何国家政府的承认。

世界上第一个国家是怎么成立的？这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理论问题，涉及到国家的基本定义和功能。首先，如前所述，一个国家需要有一个统一的政府（包括法律、军队），有自己的国民，以及确定的被其他国家承认的边界。其次，国家还有两个最重要的职能，即强制征税和垄断暴力。其他行为体不具备行使上述职能的合法性或能力。例如，联合国没有征税权，也不可能垄断暴力，最多要求或授权相关主权国家派出军队或警力去开展维和行动。这就引发了一个难题，即没有世界政府能够通过强制征税、垄断暴力所支撑的法律让各国共同应对全球问题。那么应该如何解决全球问题呢？只能通过全球治理。

统治和治理之间是有区别的。统治主要由政府来实施。政府的统治具有强制性，如果拒绝或违背，政府会依法采取针对性的措施予以惩处纠正。治理相当多是发生在公司里。公司治理主要是指公司所有者或股东们共同商量出一套规则，再按照规则实施管理。每个股东，不论大小，都享有投票的权力，但是制定规则的实际权力要依据占有股权的份额及公司治理规则来确定。全球治理也是如此。在全球治理中，需要不同国家共同商量出一套规则，而接受这个规则本身就是一条自我约束的规则。

经济学家张五常在他的著作里面讲过一个故事：他年少时，在江边看到有几十上百人在拉纤，而船头专门坐着一个监工，如果有人偷懒了，这个监工会毫不留情地挥鞭而下。而奇怪的是，他却从母亲口中得知，这个监工竟然是这群纤夫自己出钱雇的。^①在这个故事中，监工的作用实际上是纤夫们

① 参见张五常：《童年的回忆》，北京：中信出版社，2021年，第37-42页；张五常：《新卖桔者言》，北京：中信出版社，2010年，第280-281页。早在1983年发表的“公司的合约本质”一文中，张五常就提到纤夫们雇佣一个监督者来鞭打他们自己这件事。Steven. N. Cheung, “The Contractual Nature of the Firm”,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1983, Vol.26, No.1, p.8.

的自我约束。在集体行动中，个体通常不会注意到别人有没有全力以赴，但这又是一个集体产品，只能通过共同努力才能得到收益。为了避免有人偷懒，这些纤夫达成了一条规则，就是专门找个人来监督他们，鞭打他们中的偷懒者，这符合他们的利益。但是应注意，监督是需要支付成本的。因为产品是集体产品，所以成本需要由所有人共同承担。这个例子可能不太贴切，但是能够让大家快速地明白什么是全球治理的基本逻辑。本来，如果有一个“老板”制定规则，这些纤夫不需要自己花钱请监工。正因为没有这样一个超然在上的“老板”，每个纤夫都是平等的，所以他们只能自己商量出一套规则，并接受这条规则的约束，这就解决了纤夫里滥竽充数的问题。

在全球治理中，制度建设非常关键。全球治理需要提供的公共产品，涉及较多的集体行动问题。公共产品是大家共享的，但共享的公共产品是有成本的。当大家均摊成本并共享成果时，行为体（全球治理中主要是国家）就会认识到，只要够努力就会得到相应的好处，每个行为体就得到了有效的激励。但是，如果不能有效界定成本并准确分摊到每个行为体名下，同时对拒绝承担成本的行为体施加足够大的惩处，那么理性的行为体就会采取“搭便车”的机会主义策略，尽量让其他行为体去承担成本，自己只享受公共产品。当出现太多想要搭便车者，其他原本愿意承担成本的行为体可能更有动机也采取卸责（shirking）或“搭便车”的策略。全球治理就是要找到一个拿“鞭子”的行为体或机制，防止“搭便车”以致合作最终崩溃的出现。但是要在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众多的世界上达成有“鞭子”的协议非常难，因此在很多领域都出现了“治理赤字”。

解决全球治理赤字的前提条件是在理念上、理论上要把全球治理赤字解释清楚，形成真正的共识和自我实现的约束。正如党的二十大报告所指出的，要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而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需要“大家的事，要商量着办”。具体来说，需要满足五个原则。前两个原则对应着“公正”条件，后三个原则对应着“合理”条件。

一是同意或自愿原则。由于在国家之上不存在权威，约束性的国际规则必须征得被约束国的同意，这里面涉及主权的至高无上性。规则需要约束力，但承担约束功能的“执鞭者”或监督人也必须所有被约束者都同意才能履职，

这个过程中不能出现强迫，必须是基于自由意志的自愿选择。

二是平等原则。国家之间是平等的，约束他国的国际规则也必须同时约束自己。这两个原则源自康德的思想。康德在《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中专门谈到公正的两个特点：第一个是自由，第二个是平等。^①自由或自愿是指约束我的规则必须征得我的同意，平等就是约束我的规则也必须约束你自己。

三是权利与义务匹配和统筹原则。一方面，一个国家所享有的权利必须和所承担的义务相匹配，才可能合理。另一方面，统筹意味着考虑多方面的情况。以气候变化为例，现在西方对中国施加很大的压力，总觉得中国比西方国家晚十年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不行的，而且认为中国的排放量占全世界的 1/3，中国现代化进程是造成气候变化、温室效应等负面影响的最大威胁。从增量角度看，最近这两三十年，伴随着经济高速发展，中国确实排放了地球温室气体增量中的相当部分。然而，如果从存量来看，温室气体不是最近这些年才开始排放的。以汽车排放为例，中国汽车的快速增长也就十几年时间，但西方国家的汽车使用时间已经近百年。据统计，美国在过去两百年排放的温室气体达 5000 多亿吨，中国这两百多年全部加起来才排放了 2800 多亿吨。欧洲排放时间比美国还早，排放规模存量和美国差不多。西方国家在存量里占据了较大份额，中国则是在增量里占比较高，西方国家用增量为唯一条件或标准来约束中国，不满足“包容性条件”，因而并不合理。权利与义务应当对等分配，增量公平和存量公平应该统筹考虑。

四是效率原则。满足效率原则，需要全球治理的参与方能够明确有待解决的全球问题，并且找到解决这些问题的有效途径或者有效办法，换言之，全球治理在解决全球问题时要管用。

五是补偿原则。有些全球问题的外部性太强，无法完全以“内部化”的方式来解决。比如 31% 的亚马逊雨林，或者受到了破坏，或者改成了农田、牧场。亚马逊雨林是地球的“肺”，它的面积缩小，不光影响巴西，还会严重影响整个人类的未来。虽然亚马逊雨林位于巴西境内，但是其外部性太强了。为了同时满足全球福利和巴西诉求，主权不可侵犯原则可能就需要在补偿原则下被放松。当然，补偿原则不能与前面的同意或自愿原则相抵触，补

^① 参见[德]康德著：《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年。

偿的内容和形式都需要是基于自由意志的自愿选择。

一般情况下，达成并保持公正合理的国际规则很难。美国的霸权主义就不符合公正合理原则。但是，美国霸权也有其自身存在的逻辑。提供全球公共产品是要付出成本的。国家作为理性行为体，需要权衡成本和收益再作出是否以及以何种方式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的决定。通常国家会在确保至少长期来看利大于弊时，才愿意提供全球公共产品，从而有动机把规则制定得对自身更有利。由此，各国按这套规则行事时，规则制定方能够享受更多的利益，表现为国际规则的非中性或者国际治理的非中性。所谓中性规则，即规则的效果不会“因人而异”，这样的规则往往符合公正合理原则。比如交通规则。政府在制定交通规则时，需要决定行人和车辆靠左行还是靠右行。对行人和车辆来说，目标是提高通行效率，至于靠左还是靠右并不影响目标的实现，左行或右行的规则就是典型的中性规则。然而，大多数规则都是非中性的，换言之，大家都遵守同样的规则，但是对于不同行为体意味着不同后果或成本。霸权主义是一种偏袒或强化霸权的非中性规则。

总之，规则十分重要，规则决定成败。按照现行规则，非专业短跑运动员很难在和短跑世界冠军的角逐中获胜。如果稍微改变一下规则，比如跑到50米处停下解两道数学题，答对以后才能继续跑后面的50米，也许一些非短跑专业人士就有较大机会跑赢百米世界冠军。这个极端例子说明，某种意义上是规则决定结果。如果没有规则，实力、天赋、训练和准备可能会因为不能有的放矢而难以充分发挥作用。正是因为规则的重要性，而现存的霸权主义规则又是不公正的，所以在面对全球治理赤字问题时，更需要加强建设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才能实现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所说的，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Abstract】 French historian Fernand Braudel divided history into three periods: long, medium, and short terms. The core variable, observed in each period which affects the direction of history, is different. According to this tripartite system, it could be found that climate change in the long term, output level, technological progress and demographic changes in the medium term, and

the Ukraine crisis as a symbolic event in the short term occur simultaneously, making the current era face the “great change” due to superposition and resonance of these three periods. It is manifested in the aggravation of current global “peace deficit, development deficit, security deficit and governance deficit”. The report to the 20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lso points out that “the world is once again standing at the crossroads of history, and where to go depends on the choices of people of all countries”. To effectively deal with global governance deficit, institution building is crucial. Only by establishing rules and systems through international coordination and strengthe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 fair and reasonable international order can global governance be improved in the right direction so that correct choices could be made at “the crossroads of history”.

【 Key Words 】 Climate Change, Population Issue, Technological Advancement, Ukraine Crisis, Global Governance

【 Аннотация 】 Французский историк Фернан Бродель разделил историю на три периода: длинный, средний и короткий. Основные переменные, влияющие на направление истории в каждом периоде, различны. С помощью данного метода деления можно обнаружить, что изменение климата в долгосрочной перспективе, изменение уровня производства, технического прогресса и демографические изменения в среднесрочной перспективе и украинский кризис как символическое событие в краткосрочной перспективе происходят одновременно, что привело к тому, что нынешняя эпоха сталкивается с состоянием «великих перемен», которые пересекаются и резонируют в трёх периодах, проявляющихся в усугублении «дефицита мира, дефицита развития, дефицита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и дефицита управления»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м мире. В отчёте Двадцатого съезда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Китая также указывалось, что «мир вновь стоит на перекрёстке истории, и куда идти зависит от выбора народов всех стран». Институциональное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о

имеет решающее значение для эффективного преодоления дефицита глобального управления. Только путём установления правил посредством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 координации и укрепления построения справедливого и разумного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порядка можно содействовать совершенствованию глобального управления в правильном направлении, таким образом делая правильный выбор на «перекрёстке истории».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Изменение климата, проблемы народонаселения, технологические достижения, кризис в Украине, глобальное управление

(责任编辑 宋羽竹)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十周年

中和共发论：“一带一路”的全球政治经济学

赵可金 史艳*

【内容提要】推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是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关于国际发展的倡议，在世界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这一倡议聚焦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实现全球共同发展，其理论基础是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中和共发论，基本逻辑是打破西方制度主义迷信，弘扬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在充分尊重世界各地多样性的基础上，坚持开放、绿色、廉洁理念，努力实现高标准、惠民生、可持续目标，推动构建全球互联互通伙伴关系，走出一条国际共同发展的康庄大道。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的十年实践证明，中和共发论突破了欧美国家倡导的发展经济学框架，开创了开放创新共享的全球政治经济学，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一带一路”倡议 中和共发论 发展经济学 全球政治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D815**【文章标识】**A**【文章编号】**1009-721X(2023)03-0024(24)

一、问题的提出

推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是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关于国际发展的重要倡议，在世界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2023年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周年，截至2023年1月6日，中国已经同151个国家和32个国际组织签署了200余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①十年里，该倡议“拉动近万

* 赵可金，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副院长、教授；史艳（通讯作者），北京外国语大学西班牙语葡萄牙语学院博士后。

① 参见“已同中国签订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的国家一览”，中国一带一路网，2022年8月15日，<https://www.yidaiyilu.gov.cn/xwzx/roll/77298.htm>

亿美元投资规模，形成 3000 多个合作项目，为沿线国家创造 42 万个工作岗位，让将近 4000 万人摆脱贫困”^①。商务部数据显示，2013—2022 年，中国企业在沿线国家建设的境外经贸合作区累计投资达 571.3 亿美元。中国与沿线国家货物贸易额从 1.04 万亿美元扩大到 2.07 万亿美元，年均增长 8%。中国在沿线国家承包工程新签合同额、完成营业额累计分别超过 1.2 万亿美元和 8000 亿美元。^②2022 年，我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 1410.5 亿元人民币，较上年增长 7.7%；对外承包工程方面，我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新签对外承包工程项目合同 5514 份，新签合同额 8718.4 亿元人民币。^③十年硕果表明，在共建各方的努力下，“一带一路”倡议打开了国际共同发展的新图景。

世界银行的相关研究指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因基础设施落后、发展政策缺失，致使其贸易表现低于潜力 30%、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低于潜力 70%。^④“一带一路”倡议合作项目能够显著缩短交通运输时间，从而促进了贸易与投资。据估计，经济走廊沿线国家交通运输时间最多可缩短 12%，世界其他地区的交通运输时间将平均缩短 3%，意味着非“一带一路”国家也将从中受益。提升互联互通将帮助低收入国家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有望大幅增加 7.6%；“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增幅将在 2.8%至 9.7%之间，世界贸易增幅将在 1.7%至 6.2%之间；有助于 760 万人摆脱极端贫困，3200 万人口摆脱中度贫穷。^⑤沿线国家通过同步有利的配套政策，将有效提高贸易便

① 秦刚：“‘一带一路’倡议十年，铺就共同发展的康庄大道”，2023 年 3 月 7 日，http://bbs.fmprc.gov.cn/ziliao_674904/zt_674979/dnzt_674981/qttz/wjbzqjzgwjzchdwgxhdzjztw/yd_133158/202303/t20230307_11036924.shtml

② 参见“共建‘一带一路’：新起点 新机遇”，《国际商报》，2023 年 3 月 20 日第 1 版。

③ “2022 年我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合作情况”，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2023 年 2 月 13 日，<http://hzs.mofcom.gov.cn/article/date/202302/20230203384453.shtml>

④ 基础设施缺口加剧了政策缺口，跨区域一体化基本上不存在。低绩效国家的边境延误是绩效最佳国家的 40 多倍。运输时间每缩短一天可使“一带一路”国家的贸易增加 5.2%。参见 World Bank, “Belt and Road Economics: Opportunities and Risks of Transport Corridors”, June 18, 2019, <https://www.worldbank.org/en/topic/regional-integration/publication/belt-and-road-economics-opportunities-and-risks-of-transport-corridors>

⑤ 根据世界银行标准，极端贫困为日均收入低于 1.9 美元的人口，中度贫穷为日均收入低于 3.2 美元的人口。

利度、减少贸易限制，平均实际收入增幅可达 3.4%，对于内陆型国家来说，基础设施配套措施的完善将可能使收入增幅达到 9%。^①

西方主流政策界对“一带一路”倡议的看法经历了一个变化的过程。^②在初期着重于了解倡议的基本内容，对倡议的认知偏重战略层面，将其看作是中国版的“马歇尔计划”，致力于提升中国对沿线国家的战略影响力。2015 年，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表示，中国在国际发展上加大投入对全球来说是一个积极信号，与美国所做的努力相辅相成，无论是俄罗斯主导的欧亚经济联盟，还是中国主导的丝绸之路经济带，互联互通的世界在更大程度上对所有人都有利。^③至 2018 年前后，随着中美战略竞争程度的上升和中美摩擦的加剧，以美国为主导的西方国家对“一带一路”倡议取得的初步成果提出诸多质疑。一方面，从经济的角度，认为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借贷机制是不可持续的，并有可能使接受国陷入新的“债务陷阱”；^④另一方面，从政治的角度，试图对“一带一路”参与国进行武断的类型化分析，给中国主导的新发展模式贴意识形态标签。^⑤显然，美国等少数国家始终戴着有色眼镜观察和理解“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始终无法走出冷战对抗的思维框架。

然而，在“一带一路”倡议不断推进下，共建国家所取得的突破性进展让片面主观的指控越来越站不住脚，西方学界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新近研究也表现出更加客观的立场和多元的视角，充分认可了“一带一路”倡议的包容性宗旨，通过对倡议框架下参与主体的能动性的考察，发展出了更为细致的研究。“一带一路”倡议的内涵不是某项单一议程主导，而是试图发展

① World Bank, “Belt and Road Economics: Opportunities and Risks of Transport Corridors”, June 18, 2019, <https://www.worldbank.org/en/topic/regional-integration/publication/belt-and-road-economics-opportunities-and-risks-of-transport-corridors>

② See Ceyla Pazarbasioglu, “Since it was announced by President Xi Jinping in 2013, China’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BRI) has been marked by both optimism and anxiety”, 2009.

③ See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China’s ‘One Belt, One Road’”, August 6, 2015, <https://crsreports.congress.gov/product/pdf/IF/IF10273>

④ See John Hurley, Scott Morris, Gailyn Portelanc, “Examining the Debt Implications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from a Policy Perspective”, 2018, <https://www.cgdev.org/sites/default/files/examining-debt-implications-belt-and-road-initiative-policy-perspective.pdf>

⑤ See Christopher Balding, “Why Democracies Are Turning Against Belt and Road: Corruption, Debt, and Backlash”, *Foreign Affairs*, October 24, 2018,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china/2018-10-24/why-democracies-are-turning-against-belt-and-road?gad=1&gclid=EAIaIqobChMIzoyk-4fo_gIVmy-tBh3SbQRyEAMYASAAEgIREfD_BwE

多元化的合作模式。对于各参与方原有的政策框架而言，“一带一路”倡议更多是加强和扩展了政策效用而非挑战了其所在的体系，因此在不同地区取得的实际成果的差别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地参与主体的能动性。^①近年来，美欧等发达国家也不断推出类似的全球基础设施建设计划，试图对冲和抑制“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的进程。

为什么最初不被西方看好和招致误解的“一带一路”倡议取得了如此显赫的成就？在新冠肺炎疫情、俄乌冲突和中美竞争日益严峻的压力下，“一带一路”国际合作仍然取得了重大进展。^②总结“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的十年经验并深入探讨该倡议背后的理论基础和基本逻辑，是十分重要的理论课题和战略课题。

二、文献综述

关于如何实现国际共同发展的问題，国内外学界已有大量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现代化理论和依附理论两大解释框架。现代化理论遵循的是线性逻辑，认为发展是一个允许后来居上的过程；依附理论遵循的是平行线逻辑，认为发展的过程中发达与欠发达是并行的，这种以欠发达经济体为代价的国际发展模式也被描述为中心-边缘式的不对等结构。两者的共同点均以西方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为模板，存在严重的西方制度主义迷信。

现代化理论是用来解释社会内部现代化过程的理论。线性逻辑下的现代化过程，是指从前现代或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逐步过渡的模式，而实现此过程需要具备一系列有助于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变量。现代化理论的路径一

^① See Florian Schneide, “Actors and Agency in China’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n Introduction”, in Florian Schneider ed., *Global Perspectives on China’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sserting Agency through Regional Connectivity*, Amsterdam: 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 2021, p.11.

^② 根据中国海关总署数据，2021—2022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年度贸易额从1.8万亿美元扩大到2.1万亿美元，增长16.7%。中国商务部数据显示，2022年，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1410.5亿元人民币，比2021年增长7.7%。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等重大展会的举行，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商品扩大出口创造了条件。参见“共建‘一带一路’十年取得丰硕成果”，《国际商报》，2023年3月31日第2版。

方面致力于找到有效变量，另一方面着力解释变量发挥作用的过程。然而，不同的国家进入现代化进程的时机不同，所呈现出的现代化道路也不同，宏观上形成了一元多线的发展图景。^①其中，共同的核心是追求生产关系的优化和经济水平的提高。在现代化理论的众多侧面中，理性主义范式是一个根本性的假设，认为追求理性或者说追求合理最大化是当代生活决定性的驱动力，^②而现代化的核心动力是经济发展。在理性主义范式下，发展被理解为一个社会不断追求更高经济水平的过程。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看国际发展问题，认可发展是一个线性的量变过程，一个社会将逐渐从低水平发展至高水平；认为先发国家的成功经验能够帮助后发国家革新落后的生产关系，来破除其内部的发展障碍，建立更理性更有效率的经济增长模式。显然，现代化理论存在着根深蒂固的、以西方中心主义为指导的制度迷信，强调在成功经验的诸多要素中，非西方国家向西方发达国家制度的转型是必由之路。

依附理论是拉丁美洲学者提出的发展经济学理论，认为后发国家的发展阻碍更多来自外部。相对于现代化理论主张的内部改革和调整，依附论主张处于边缘地位的发展中国家应致力于脱离中心国家建立的不平等的依附关系结构。依附理论提供了一种结构化地看待经济不发达的方式，其经济学的基础是针对贸易条件的普雷维什-辛格假说（Prebisch-Singer hypothesis）。该假说指出，从长远来看，初级商品相对于工业制成品的价格下降，将导致以初级产品出口为主要收入来源的经济体面临贸易条件的持续恶化。^③从依附理论的视角看国际发展，在国际市场上通常由欠发达国家提供廉价的原材料和初级产品，发达国家买入后处理成工业制成品再高价卖回给欠发达国家，形成恶性循环，使得二者间的经济收入和工业化水平的差距不断扩大。即使相对温和的依附论学者也认为，在这个中心-边缘结构内仍有可能实现某种程度的突破和发展，而更为激进的依附论学者则主张，摆脱依赖的唯一

① 罗荣渠：“论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历史研究》，1989年第1期，第3-20页。

② 参见[英]安东尼·吉登斯著：《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对马克思、涂尔干和韦伯著作的分析》，郭忠华、潘华凌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年，第64-88页，第226-248页。

③ David I. Harvey, Neil M. Kellard, Jakob B. Madsen, Mark E. Wohar, “The Prebisch-Singer hypothesis: four centuries of evidence”,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2010, Vol.92, No.2, pp.367-377.

途径是建立非资本主义的经济体系。^①在依附论的指导下，拉丁美洲国家在 20 世纪 60 至 70 年代实行了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试图通过限制技术和设备的进口促进国内的工业化进程。然而，依附理论无法解决发展中国家与整个世界经济的外部联系问题，对现实的指导意义有限。

现代化理论和依附理论反映了解释发展问题的理论分歧，而实践层面最大的分歧在于国家在经济调控中的作用。20 世纪 80 年代，在拉美国家爆发的债务危机宣告了国家主导的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的失败，冷战的结束又进一步加强了市场经济的正当性，此时兴起的新自由主义学说，代表了正统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思想的回归，主张国家在经济调控中发挥最小作用。新自由主义学说指导下的政策主张认为，后发国家在难以克服自身结构性缺陷的现实面前，需要通过接受发达国家有条件的经济援助，同时开展多项重塑市场纪律的经济改革，才能重新获得增长的动力。降低财政赤字、扩大税收基础、市场化的利率调控、放宽外资准入限制、国有企业私有化改革、取消限制产业竞争的保护性政策等一系列新自由主义改革内容，被概括为“华盛顿共识”。^②债务危机下的拉美国家接受了国际多边机构的贷款，并在其监督下开展政治和经济的双重改革，成为新自由主义学说指导下“华盛顿共识”的试验场。^③

相对于新自由主义学说，发展型国家理论以东亚国家为例解释了国家干预经济的成功经验。发展型国家的概念由美国政治学家查默斯·约翰逊（Chalmers Johnson）提出，他基于对战后日本经济发展的观察，看到了国家适度干预经济的显著成效，中央政府在专注于经济发展目标时所采取的各种必要的政策措施，更有助于实现这些目标而不是低估市场的作用。^④发展型国家的优势在于，中央政府能将关键的资本调用到最有前途的工业部门，

① See Andre Gunder Frank, *Capitalism and Under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 Historical Studies of Chile and Brazil*,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67.

② See John Williamson, “What Washington Means by Policy Reform”, in *Latin America Adjustment: How Much Has Happened?* Washington D.C.: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990, pp.7-20.

③ See Francisco Gonzales, *Dual Transition from Authoritarian Rule: Institutionalized Regimes in Chile and Mexico, 1970-2020*, Washington D.C.: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10.

④ See Chalmers Johnson, “The developmental state: Odyssey of a concept”, in Meredith Woo-Cumings ed., *The developmental state*, Cornell 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9.

以此来对社会产生最大的溢出效应。受到更广泛关注的是亚洲四小龙的崛起和东盟其他国家的相继效仿，进一步加强了发展型国家理论的解释力。^①该理论体系产生的动机，部分地来源于在美苏两大模式之间取中的意图，着眼于资本主义体系内部运行的差异性，从而丰富对发展模式的研究。

无论是现代化理论和依附理论的理论之争，还是新自由主义改革和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的政策之争，都一定程度上存在非黑即白的判断和矫枉过正的倾向。随着各国发展实践的不断丰富、全球互联互通水平的提高、国际共同发展需求的增长，对发展问题的研究不断走向新的认知。“一带一路”作为一项综合的国际发展倡议、多领域的国际合作平台，自提出后，也引发了学者对于其理论基础的热烈讨论，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一）新结构经济学视角

新结构经济学是国际经济学界为了帮助广大发展中国家找到一条长期可持续的包容性经济增长途径，运用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比如要素禀赋和比较优势，在分析二战后发展中国家发展道路和发展状况的基础上，研究和探索经济发展过程中经济结构及其变迁的本质和决定因素、市场和政府的各自作用及其协同关系等问题而提出的一个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分析框架。^②在国内学界的主要代表是林毅夫教授。新结构经济学理论体系与国际发展密切相关的内容是关于“后发劣势”和“后发优势”的争论，^③前者认为后发国家难以在自身基础上模仿发达国家的制度，内部阻碍太强，以至于需要推行“休克疗法”来全面建立新的理想制度，才能有效克服“后发劣势”；新结构经济学的观点则倾向认为后发国家具备发展优势，^④“后发优势”是基于对渐进双轨制改革模式的判断，认为有效的竞争性市场的建立并非一蹴而就，后发国家正是可以利用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所形成的时间差来加速经

① See Vogel E. F., *The Four Little Dragons: The Spread of Industrialization in East Asia*, New York: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② 参见戴长征、张中宁：“新结构经济学——经济发展理论的再创新”，《江淮论坛》，2014年第2期，第29-36页。

③ 参见赵秋运、王勇：“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溯源与进展——庆祝林毅夫教授回国从教30周年”，《财经研究》，2018年第9期，第4-40页；林毅夫：“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与杨小凯教授商榷”，《经济学季刊》，2003年第4期，第989-1004页。

④ 参见王勇、徐扬帆、吴紫薇：“新结构经济学在宏观经济学领域的研究综述”，《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期，第48-56页。

济发展，既要开放部分准入，又要保留适当扭曲，在渐进双轨的模式中集中力量发展有助于弯道超车的产业，同时不断创造条件，审时度势地推进制度改革，发挥出“后发优势”。

旧有的国际援助模式更多着眼于“后发劣势”，在对发展中国家输出技术的同时也试图输出制度，造成的低效乃至失效使援助项目饱受质疑。“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为国际共同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从结构经济学的角度看“一带一路”，其立足点正是抓住了“后发优势”的规律，在尊重原有体系和制度的前提下以能源升级、基础设施建设和服务为抓手促进国际产能合作，帮助沿线共建国家谋求自身发展的最好机会。同时，对中国来说，“一带一路”项目为国内生产制造增加需求和市场，与沿线国家加强产能合作能够有效发展区域价值链，促使中国双向嵌入全球价值链，在实践中打磨出多区域多元化合作的平台。^①而从境外经贸合作区的具体落地形式来看，政府推动和引导、政策优惠、园区选址和产业定位等规划因素共同确保了良好的共建环境，并在实践中不断总结园区发展经验和创新园区类型。^②

（二）国际政治经济学视角

国际政治经济学作为一个学科的诞生有其时代背景。二战后，世界主要发达经济体之间的力量对比发生变化、两次石油危机给世界经济造成冲击等现实形势的复杂发展，促使国际关系学者不再局限于战争与和平问题的讨论，而是将政治与经济结合起来思考国际关系。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各国深度嵌入国际体系，国际政治经济学越来越成为国际问题分析的重要视角。中国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起步相对较晚，随着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改变、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深刻调整，中国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面对着新的重大课题，比如如何在国际政治经济体系变革中重新定位国家与市场关系，在逆全球化的潮流中如何坚持高水平的对外开放等。^③“一带一路”倡议及其发展实践，

① 参见倪红福、向迪、王文斌：“共建‘一带一路’对构建新发展格局的作用”，《全球化》，2022年第4期，第31-40页。

② 刘洪愧：“‘一带一路’境外经贸合作区赋能新发展格局的逻辑与思路”，《改革》，2022年第2期，第48-60页。

③ 参见徐秀军：“新时代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一项研究议程”，《世界经济与政治》，2020年第7期，第4-34页。

为适应现实的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提供了最好的案例研究对象。

在国际政治经济学看来，选择重点产业和重点国家是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两个关键环节。在产业选择方面，目前“一带一路”沿线少有产业门类齐全的国家，因此中国与沿线国家开展产能合作具有显然的经济理性。从产品周期角度看，一个产品总体上呈现出从国内竞争、出口、在海外生产到从海外再进口的产品演进趋势；^①从投资发展路径看，一国对外直接投资相较于吸收外部投资的净额的增长，意味着国际竞争力的提高；^②从“雁行模式”^③的范本看，跨国转移的产业技术含量由低向高过渡，从单个国家引领到产生集群效应。然而，尽管相关理论充分支持，建立中国特色的“创造性转移”机制需要理论和政策同步推进，理性思考产业转移可能引发的风险，从具体产品到产业升级到集群发展做出长期性的战略安排。实现向沿线国家的“创造性转移”，重视发挥共建国家的“后发优势”，分别反映了需要规避西方发达国家在历史上对发展中地区产业转移过程中出现的两大问题，即国内的产业空洞化和东道国的经济殖民地化。^④因此，“一带一路”倡议自提出起即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对促进国际共同发展有重要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意义。

在建设“一带一路”过程中选择关键国家则更多受到地缘经济学的关注。地缘经济学强调关联利益，将地缘作为国家之间的能动变量考察，将“一带一路”倡议阐释为中国与沿线国家基于特定地缘空间环境开展的功能性合作，通过加强沿线区域地理板块的互联互通，发展更为平衡的贸易往来。^⑤从地缘学的角度看国际分工，“一带一路”倡议体现了中国介入“地理-经济”过程的创新方式，凭借对空间矛盾的精准定位和有效修正，团结海陆国家以

① See Raymond Vernon,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in the Product Cycl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66, Vol.80, No.2, pp.255-268.

② See John H. Dunning, “Explaining the International Direct Investment Position of Countries: Towards a Dynamic or Development Approach”, *Weltwirtschaftliches Archiv*, 1981, Vol.119, pp.30-64.

③ See Terutomo Ozawa, *The Rise of Asia: The ‘Flying-Geese’ Theory of Tandem Growth and Regional Agglomeration*,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2009.

④ 参见钟飞腾：“‘一带一路’产能合作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山东社会科学》，2015年第8期，第40-49页。

⑤ 吴泽林：“‘一带一路’倡议的功能性逻辑——基于地缘经济学视角的阐释”，《世界经济与政治》，2018年第9期，第128-153页。

创造新的地理基础，是一项超越以往国际区域合作的、推动国际分工创新的雄心计划。^①更为平衡的多边贸易将反过来加强区域联通，更加优化的国际分工也将反过来促进生产地理优化，通过形成地缘因素与国际经济要素的多重良性循环，来巩固“一带一路”建设的历史性成果。同时不可否认的是，共建项目对海外特定地理空间的开发可能造成该地区既有地缘利益结构发生变化，加上大国间的战略竞争、海权与陆权力量的斗争、地理敏感地带引发的博弈等因素，都可能引发不同程度、不同类型的地缘政治风险，其背后是更深层次的地缘政治观念、思想之争，提升地理安全意识，客观评估并制定防范和管控地缘政治风险的有效策略，是“一带一路”建设面临的现实课题。^②

（三）文化经济学视角

文化经济学关注的核心是文化产品和文化产业的正向外溢性，包括文化产业自身伴随的积极经济活动，互补性商品和服务的发展，不断增强的社区内有益品供给，文化创新与保护所积累的代际影响。从文化经济学的角度解读“一带一路”倡议，加强商品贸易、产业转移的过程将有利于中国对外文化交流与合作，从公共部门和非公共部门同时促进国际文化经济发展。^③“一带一路”倡议共建的项目、提供的产品不仅在经济上加强了沿线国家的联系，更从文化和价值观念层面发挥了影响，“一带一路”倡议本身亦构成代表创新的国际公共产品，围绕其形成的文化效应则提升了中国的软实力。^④已有实证研究表明，“一带一路”建设与中国国家形象显著正相关，“一带一路”的经济社会发展效应会显著提升共建国对中国的正面评价和对中国的认同，而“一带一路”的合作性叙事会显著弱化共建国对中国的负面推理以及与中

① 黄凤志、谭桂照：“传统地缘政治理论批判与‘一带一路’的地缘政治经济蕴意”，《东北亚论坛》，2021年第6期，第59-78页。

② 张晓通、许子豪：“‘一带一路’海外重大项目的地缘政治风险与应对——概念与理论构建”，《国际展望》，2020年第3期，第80-96页。

③ 赵磊：“开放发展，合作共赢——‘一带一路’的文化经济学视角”，《党政研究》，2016年第2期，第10-17页。

④ 胡键：“‘一带一路’的国际公共产品功能与中国软实力的提升”，《国外社会科学》，2020年第3期，第4-18页。

国的身份和情感对立。^①

对“一带一路”倡议不同角度的研究和阐释各有侧重，新结构经济学在古典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的基础上回应了后发国家的发展难题。国际政治经济学则更多聚焦“一带一路”产能合作引发的国家间政治经济关系的变化。地缘经济学关注地缘变量的重新赋能。最后，从文化的视角看“一带一路”对国际社会的正向效应还体现了在文化、观念、价值层面的影响。迄今为止，中外学界对“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的解释还局限于某一学科的视角，在哲学方法论上尚存在着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问题，无论是强调经济因素、国际政治因素，还是文化文明因素的某一方面，均未触及“一带一路”的哲学方法论，尚未将政治、经济、文化因素结合起来作为一个整体来理解“一带一路”国际合作之所以可能的理论基础。

三、中和共发论：“一带一路”的哲学基础

事实上，作为一项全球发展合作倡议，“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是针对近代以来欧洲以殖民主义为核心理论框架的国家发展理论、美国以霸权主义为核心框架的对外援助理论存在的弊端而提出的。所有这些理论框架都强调以西方发达国家的制度为模板，在提供发展援助时附加了一系列政治条件，要求参与国际发展合作的其他国家必须在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上与欧美发达国家的模式看齐，对于发展合作是否真正促进了受援助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并不被优先看重，而是更看重其在制度上是否更接近了西方发达国家的模式。^②二战结束以来，在亚洲、非洲、拉美和冷战后的东欧、中亚等地区的无数实践充分表明，^③来自欧美发达国家的此种以附加

① 参见王金波：“‘一带一路’能否提升中国国家形象”，《世界经济与政治》，2022年第2期，第4-31页。

② 参见张传红、李小云：“西方发展援助评价的意义建构”，《现代国际关系》，2020年第5期，第40-48页。

③ 张丽娟、朱培香：“美国对非洲援助的政策与效应评价”，《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年第1期，第51-58页；邵育群：“美国对巴基斯坦发展援助新战略评估”，《南亚研究》，2011年第1期，第110-122页；王石山、韩召颖：“美国为何援助国际危机中的盟国（1946—2006年）”，《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年第8期，第107-134页。

种种政治条件为前提的援助项目，非但没有给发展中国家带来发展，反而在一些地方引发了更严重的混乱。^①美国的“民主输出”和“华盛顿共识”在中亚、中东、非洲、拉美等地的实践引发了复杂的政治经济后果。

为了汲取发达国家的教训，中国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其哲学基础是中和共发理论。这一理论积极挖掘中国古典智慧中的中和哲学，将其转化为指导全球共同发展实践的理论，其基本逻辑是打破制度主义迷信，弘扬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在充分尊重世界各地多样性的基础上，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坚持开放、绿色、廉洁理念，努力实现高标准、惠民生、可持续目标，推动构建全球互联互通伙伴关系，走出一条全球共同发展的康庄大道。具体来说，中和共发论主要包括三个要点。

（一）中和哲学

中和哲学是中华文明的文化基因，是“中”的世界观与“和”的方法论的有机统一。“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②。其中，“中”是指中国人的世界观，无论是做人还是做事，中华文化均强调持中守正，不偏不倚，不走极端，一切必须符合原则，既反对冒进过头，也反对保守不及。“和”是指中国人认识世界的方法论，强调无论处理自身内部关系的事务，还是处理与外部关系的事务，均强调求同存异，美美与共，和合共生，既反对无原则地追求一致，也反对片面地采取排斥态度。简言之，“中和”哲学就是强调凡事应有一个适当的“度”，超过这个“度”，就是“过”，没有达到一定的“度”，就是“不及”，强调物我相与，相互成全。几千年来，这一中和哲学逐渐沉淀为一套成熟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和方法论，指导着中华文明绵延不绝、历久弥新，在数千年的历史进程中也深刻影响了丝绸之路精神。

^① 参见邹佳怡、莫小龙：“从世界银行政策变化看全球化的矛盾和发展援助的职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2年第1期，第36-41页；王慧英：“试论战后初期美国发展援助政策的实质”，《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2期，第134-138页；简·克莱格尔、李黎力、李佳佳，“华盛顿共识脱魅”，《拉丁美洲研究》，2011年第3期，第60-67页。

^② 王国轩译注：《中庸》，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第56页。

中和哲学是“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的理论基础。在处理对外关系时，中和哲学坚持以中道为基本原则，主张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追求“天下一家”、“万物咸若”的理想社会。在中和哲学看来，不同国家在地理上虽有远近，关系亦有亲疏，但处理彼此关系时所适用的原则是一致的，均恪守中和原则，追求“无偏无党、王道荡荡”^①的理想境界。“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很多人尤其是一些西方国家搞不清楚，主要原因是“一带一路”并不是某种明确的制度框架，也不是一种稳定的合作模式，而是一个共商共建共享的国际合作平台，是一个有关参与方逐渐汇集需求、不断塑造共识的中和过程。各利益攸关方由于具体情况千差万别，合作需求迥然不同，无论是合作内容还是合作形式都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中和哲学讲究过犹不及，中国与每一个国家在“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的合作尽管均遵循着共商共建共享的中和原则，但具体合作却很难找到完全相同的模式，目前已经签署的超过 200 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彼此就存在很大的差异。显然，尽管在追求建立最完美制度的自由主义哲学看来，此种合作哲学在逻辑上是很难理解的，但“一带一路”倡议所取得的成果确实是毋庸置疑的，它在没有遵循西方自由主义哲学和保守主义哲学所强调的制度变革前提下产生了巨大的发展收益，这是一种发展哲学上的创新，是一个强调中和过程导向的合作框架，标志着中和哲学在发展理论上实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二）共同发展

共同发展是“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的前进方向，是共同价值、共同利益和共同治理的统一。“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坚持开放、绿色、廉洁理念，努力实现高标准、惠民生、可持续目标，是一个不断汇聚共识、积累信任的过程。“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兼顾各方利益，包容不同要求，不搞强买强卖的霸道逻辑，致力于追求实现参与方的共同发展，是一个各方合作共赢、机会共享的过程。“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不搞封闭排他的小圈子，不排斥任何一方，充分调动有关各方参与治理的积极性，充分尊重各自的规则多样性和治理舒适度，是一个不断寻求规则包容、治理协同的过程。

^① 顾迁译注：《尚书》，北京：中华书局，2016 年，第 145 页。

“一带一路”倡议本质上是中国提供的国际公共产品和国际合作平台。千百年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直崇尚“中国人民不仅要自己过上好日子，还追求天下大同”^①。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体现的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和合共生”、互利共赢的思想，和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理念契合，致力于推动国际社会各成员共同发展，成为造福各方的国际公共产品和开放包容的国际合作平台。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给各国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带来严重威胁，对世界经济造成严重冲击，一些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面临严重困难。面对挑战，中国一直致力于维护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夯实全球共同发展的合作框架。2020年6月18日，“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级别视频会议在北京举行，习近平在向会议发表的书面致辞中强调，“无论是应对疫情，还是恢复经济，都要走团结合作之路，都应坚持多边主义。……我们愿同合作伙伴一道，把‘一带一路’打造成团结应对挑战的合作之路、维护人民健康安全的健康之路、促进经济社会恢复的复苏之路、释放发展潜力的增长之路”^②。新冠肺炎疫情基本结束后，中国加大了宏观政策协调力度，在扩大内需的同时，坚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积极筹备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致力于建设一个和平稳定、开放多元、合作共赢的“后疫情世界”，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三）互联互通

互联互通是“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的方法路径，是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的统一，是基础设施“硬联通”、规则标准“软联通”、国家人民“心联通”的统一。如果将“一带一路”比喻为两只翅膀，那么互联互通就是两只翅膀的血脉经络。基础设施是互联互通的基石，也是许多国家发展面临的瓶颈。习近平主席指出，“我们要建设的互联互通，不仅是修路架桥，不光是平面化和单线条的联通，……这是全方位、立体化、网络状的大联通，是生机勃勃、群策群力的开放系统”^③。与西方国家强调

① “习近平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人民日报》，2019年4月27日第2版。

② “习近平向‘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级别视频会议发表书面致辞”，《人民日报》，2020年6月19日第1版。

③ 习近平：“联通引领发展 伙伴聚焦合作”，《人民日报》，2014年11月9日第2版。

推动制度转型不同，“一带一路”倡议致力于实现不进行制度转型的发展合作，通过聚焦互联互通，深化务实合作，构建全球互联互通伙伴关系，携手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风险挑战，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共同繁荣，最终目的是通过全方位互联互通，更好地融入全球供应链、产业链和价值链，为联动发展和经济增长提供强劲动力和广阔空间。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关键在于加强互联互通。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年来，有关各方以“五通”为抓手，全面提升国际合作水平。深入推进发展战略对接和政策沟通，凝聚各方共识，促进协同联动发展。大力推进“六廊六路多国多港”主骨架建设，以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建设为抓手，促进各方深度合作。不断提升经贸投资合作水平，统筹做好国际产能合作，谈判自由贸易协定，增添共同发展新动力。有效改善金融合作，创新金融合作平台，充分发挥好各类金融机构作用，提高金融服务“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水平。持续深化人文交流，加强科学、教育、文化、卫生等领域合作，筑牢“一带一路”建设的民心基础。十年来，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间的合作不断深入，不仅推动了各国间的互利合作和共同发展，也切实加强了同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深度对接，打造造福各方的国际公共产品和开放包容的国际合作平台，为推动世界经济强劲、可持续、平衡、包容增长做出贡献，实现各国高质量发展和共同繁荣，把“一带一路”建设成为和平之路、繁荣之路、开放之路、绿色之路、创新之路、文明之路。

四、全球政治经济学：“一带一路”的知识框架

迄今为止，理解全球共同发展的主流知识框架是国际政治经济学，从政治与经济互动、国际与国内联动的角度来探求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和发展问题。尽管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缘起可以追溯到亚当·斯密（Adam Smith）和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等一批早期的古典主义思想家，但作为一门学科发展出的知识体系则是 20 世纪 70 至 80 年代以来的事情。苏珊·斯特兰奇（Susan Strange）、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Keohane）、海伦·米尔纳（Helen Milner）、莉萨·马丁（Lisa Martin）、

戴维·莱克（David Lake）、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罗伯特·考克斯（Robert Cox）、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等一大批立场不一的学者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确立了利益与制度互动、国内与国际关联的分析框架，推动了国际政治经济学学科的成长。

然而，所有这些国际政治经济学对全球共同发展的分析框架和研究路径存在着一个根深蒂固的缺陷，那就是在方法论上被先入为主地置于西方主导的资本主义体系范式，将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道路、社会主义国家冷战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片面理解为是以西方政治经济体系为模板的发展，西方发达国家被认为是完成了发展的发达经济体，不被纳入发展研究的范畴之中。直到进入 21 世纪，在联合国相关机构的推动下，才勉强接受可持续发展和人类发展等理念，即便如此，在思想上和行动上对发展概念的革新都是步履缓慢的。

从哲学上来说，发展是旧事物的消亡和新事物的诞生，贯穿于自然、社会和思维的全过程，整个世界都是一个发展中的活跃有机体，始终处于不停发展变化的自然历史进程之中。事实上，发展是一个涉及全人类的共同问题，发展对于所有人来说一直存在。不仅发展中国家面临着发展问题，发达国家也仍然面临发展问题。因此，“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打破了已有国际政治经济学中的狭隘发展观，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确立全球共同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将全球共同发展界定为自然发展、社会发展、人的发展以及思维和精神发展的统一体，是人与自然关系、人与社会关系以及人与精神关系的统一，是探求全球共同价值、共同利益和共同治理是如何可能的问题，开辟了全球共同发展理论研究的新境界。“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年来的实践证明，中和共发论突破了欧美国家倡导的发展经济学框架，开创了开放创新共享的全球政治经济学，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开放政治经济学

在亚当·斯密创立古典经济学之初，经济学与政治学的界限是模糊的。斯密认为政治经济学是研究“国民财富的产生和分配”的科学，尽管斯密强调市场“看不见的手”发挥自动调节的功能，鼓励资源配置的自由竞争，但是将政府职能的重点限定在维护自由竞争的秩序，这表明斯密将经济学局限

于国家的经济学，尤其是服务于经济实力强的国家。^①在剑桥大学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通过均衡价格理论将经济学数理化和创建了微观经济学后，政治学与经济学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清晰，经济学聚焦国内经济分析的偏好也越来越明确。在马歇尔的学生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创立了以“总量分析”为主要内容的宏观经济学之后，国家在经济学中的角色日益突出。^②一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针对发达国家普遍面临的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的难题，以及面临的越南战争、水门事件和石油危机等一系列国际、国内因素的巨大冲击，新古典经济学和国际政治经济学应运而生，一直延续到冷战结束后、美国学界开拓的开放条件下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经济之间互动的“开放经济政治学”（Open Economy Politics, OEP）框架，^③甚至被认为是“一统天下”的科学。作为一种问题解决型理论，开放经济政治学先入为主地将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制度和自由民主制度作为全世界的样板，致力于推动非西方国家和地区结构转型和制度转变，这实际上是对非西方文明不开放的“开放经济政治学”。无论是美国在冷战结束后推动的“华盛顿共识”政策方案，还是在世界各地推行的“演化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④根本意图是用西方的制度模式和发展经验来改变非西方国家，是对西方发达国家开放的经济学，而非对世界上所有国家开放的经济学，本质上是一种维护和巩固西方霸权和优势地位的地缘政治学和地缘经济学。

与开放经济政治学不同，“一带一路”开辟了开放政治经济学的新空间。

① 参见[英]亚当·斯密：《国富论》，郭大力、王亚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下卷，第4-262页。

② 参见[英]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经济学原理》，朱志泰、陈良璧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年；胡代光：《凯恩斯主义的发展和演变》，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张德霖：“总量分析、结构分析、制度分析的探索与争鸣”，《经济学动态》，1990年第6期，第30-35页。

③ 参见李巍、刘玮：“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第三波？”《国际政治研究》，2016年第1期，第97-124页。

④ 参见贾根良：“理解演化经济学”，《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2期，第33-41页；杨虎涛、陈国涛：“赖纳特的演化发展经济学：理论、政策与中国意义”，《社会科学辑刊》，2010年第5期，第113-117页；杨虎涛：“治标经济学与华盛顿共识的变形——发展经济学家埃里克·赖纳特的警示”，《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2010年第1期，第117-120页。

“一带一路”倡议不是地缘政治学、也不是地缘经济学，而是开放政治的经济学，它不要求以某一国家的社会制度和发展经验为核心，不追求改变其他国家的制度而强求一致，在经济合作中强调不附加政治条件，是一场不改变社会制度的“经济革命”和“社会革命”。开放是“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的基础，互联互通是“一带一路”的路径，其特征是尊重制度的多样性，包容社会的多样性，在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上的态度是开放的，各建设方之间的合作建立在完全的基础上，通过公平公正的平等协商达成国际合作，反对强买强卖和以大欺小、恃强凌弱的不平等协议。十年来的实践证明，“一带一路”建设是促进国际合作的新型平台，其核心内容是，在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基础上，各国之间促进基础设施建设和互联互通，对接各国政策和发展战略，深化务实合作，促进协调联动发展，实现共同繁荣。因此，“一带一路”的开放是全面的开放，致力于推动建设合作共赢的开放体系和开放型世界经济。它以亚欧大陆为重点，向所有志同道合的朋友开放，不排除、也不针对任何一方，各国都是平等的参与者、贡献者和受益者，是一种真正全面开放的政治经济学。

（二）创新政治经济学

近代以来，西方经济学的理论核心是资源配置，强调对有限资源进行有效配置，无论是微观经济学还是宏观经济学，均认为资源配置合理与否对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成败有着决定性的影响。经济学说到底就是研究资源如何优化配置以取得更好经济效益的学问。然而，西方古典经济学主要关心对已有存量资源的配置，普遍漠视增量资源对经济增长的意义。直到1912年，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在《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首先提出了创新的基本概念和思想，并在《经济周期》、《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等著作中不断完善创新理论，^①形成了以创新理论为基础的独特创新经济学理论体系，开启了以技术变革和技术推广为对象的技术创新经济学，比如莫尔顿·卡曼（Morton Kamien）和南赛·施瓦茨（Nancy L.Schwartz）的技术创新理论以及克里斯托夫·弗里曼（Christophe Freeman）

^① 参见[美]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对利润、资本、信贷、利息和经济周期的探究》，叶华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美]约瑟夫·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吴克峰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7年。

的国家创新理论，此外还有以制度变革和制度形成为对象的制度创新经济学，比如美国经济学家兰斯·戴维斯（Lance Davis）和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North）的制度创新理论。然而，长期以来，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学的创新理论更多强调国内发展领域的创新，忽视国际发展合作中的创新研究。直到 1986 年，以保罗·罗默（Paul M. Romer）为代表的一批新增长理论家提出了四要素增长理论，即在新古典经济学中的资本要素和非技术劳动要素之外，又加上了强调创新的人力资本和新思想要素，提出了“内生经济增长理论”^①，引发了学界对创新经济学的重视。但这一创新理论对发达国家有很强的解释力，对发展中国家的解释力有限，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创新鸿沟制约了发展中国家发展的内在动力，这也是世界银行和西方发达国家推进国际发展合作反复陷入困境的一个根源。

与西方经济学中的创新经济学理论不同，“一带一路”倡议拓展了创新政治经济学的新视野。“一带一路”倡议的重点不是经济领域的创新，也不是制度领域的创新，而是注重发展战略和政策领域的创新。它充分尊重历史、国情、制度、文明和意识形态的多样性，倡导发展战略对接和宏观政策协调，是存量创新和增量创新的统一。从存量创新方面来说，“一带一路”倡议强调各国之间发展战略对接，遵循求同存异和聚同化异的原则，优化资源配置，释放更大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实现不改变制度的包容性增长。从增量创新方面来说，“一带一路”倡议不断推动理念创新、内容创新、模式创新和机制创新，提出了正确义利观、第三方合作、数字伙伴关系等新理念和新措施，鼓励各国之间商谈水平不一的合作协议，签署形式多样的自由贸易协议，推动建立新的合作组织、合作机制、合作框架，搭建国际合作新平台，最大限度地释放增量创新的发展潜力。“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年来，中国推动设立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丝路基金等新机制，所有这些机制化平台并不是另起炉灶和推倒重来，而是对现有国际机制的有益补充和发展完善，大大深化了国际合作进程。习近平指出，“要稳步拓展合作新领域。要稳妥开展健康、绿色、数字、创新等新领域合作，培育合作新

^① 参见[美]菲利普·阿吉翁、彼得·霍依特：《内生增长理论》，陶然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7-34页，第78-101页。

增长点”^①。自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遭遇了新的挑战。面对新形势和新挑战，中国积极推动开拓健康、数字、创新等新合作领域，创新合作模式，不断拓展“一带一路”新的合作增长点，取得了新的突破。总之，“一带一路”倡议的经济学不仅仅是内生性增长的创新经济学，更是内生性增长和外生性增长共同创新的经济学，它不挑战既有的社会制度和体制机制，也不推翻既有的国际合作框架，而是既重视现有国际合作框架内的存量挖潜，也重视现有合作框架外的增量创新，是一种内外结合的创新经济学，开辟了创新驱动发展的新赛道，致力于塑造国际合作的新优势。

（三）共享政治经济学

长期以来，发展经济学框架中的一个薄弱领域是分配经济学。20世纪20年代英国经济学家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和阿瑟·庇古(Arthur Pigou)创立的福利经济学着力解决发达国家面临的分配问题，通过倡导国民收入均等化建立了效用基数论，认为分配越均等，社会福利就越大，^②由此创立了福利国家理论。然而，福利经济学对于解决发展中国家的分配问题意义不大，因为发展中国家首先需要解决发展问题，然后才能有条件解决分配问题。迄今为止，发展中国家遭遇的挑战是其发展成果只能局限于某一部分群体中，不能惠及绝大多数的人群，陷入了两极分化的“中等收入陷阱”问题。^③比如拉丁美洲的墨西哥、巴西、智利、阿根廷，东南亚的菲律宾、泰国等，在步入中等收入经济体后，长期无法进入高收入经济体的行列，这些国家的发展收益无法为更大范围的民众所共享。

与西方经济学中的福利经济学理论不同，“一带一路”倡议开辟了共享政治经济学的新平台。共建“一带一路”要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努力实现高标准、可持续、惠民生的目标，不仅致力于“把蛋糕做大”，而且致力于“把蛋糕分好”，本质上是一种共享政治经济学。事实上，“共享经济”

① “习近平出席第三次‘一带一路’建设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2021年11月19日，https://www.gov.cn/xinwen/2021-11/19/content_5652067.htm?jump=true

② 参见[英]阿瑟·庇古：《福利经济学》，朱泱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99-109页，第139-142页。

③ 参见[美]印德尔米特·吉尔、霍米·卡拉斯：《东亚复兴：关于经济增长的观点》，黄志强、余江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08年，第18-19页，第45-80页。

的概念最早是由美国德克萨斯州立大学社会学教授马科斯·费尔逊 (Marcus Felson) 和伊利诺伊大学社会学教授琼·斯潘思 (Joel Spaeth) 于 1978 年提出的,其核心思想是,借助一个由第三方创建的、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市场平台,个体可以分享自己的知识、经验,或者向企业、某个创新项目筹集资金,从而供给方与需求方通过共享经济平台的连接进行交易。^①近年来,随着必虎 WiFi、Uber 和滴滴打车、Airbnb、VaShare、Steam、AUV、AAwork、Prosper、Eatwith 等共享平台的迅速崛起,共享经济引起了更多重视。2013 年 3 月 9 日,《经济学家》杂志刊登的封面文章第一次详细描述了“共享经济”,^②关于共享经济的研究迅速在学界引起高度关注。与依赖互联网平台的共享经济学不同,“一带一路”是一种在更大范围内共享发展资源、要素的国际合作平台,在这个平台上,政府、市场和社会网络均可以参与合作过程,共享资源和要素,是一种共商共建共享的平台经济学,其创新之处在于,突破壁垒分明的国家边界和制度界限,降低了国际合作的门槛,一切资源和要素均获得了优化配置的机会,所有组织和个人都获得了平等竞争的机会,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是技术共享、经济共享和社会共享的统一体,是致力于共同发展和共同富裕的政治经济学,是对福利经济学的超越和创新。

五、结论

“一带一路”倡议是在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提出的国际发展合作方案,是针对近代以来西方国家发展合作方案陷入困境后提出的“中国方案”。这一倡议聚焦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实现国际共同发展,理论基础是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中和共发论,其基本逻辑是打破西方中心主义的制度迷信,弘扬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在充分尊重世界各地多样性的基础上,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坚持开放、绿色、廉洁理念,努力实现高标准、惠民生和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一带一

① Felson M., Spaeth J. L., “Community structure and collaborative consumption: A routine activity approach”,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1978, Vol.21, No.4, pp.614-624.

② “The rise of the sharing economy”, *The Economist*, March 9, 2013, <https://www.economist.com/leaders/2013/03/09/the-rise-of-the-sharing-economy>

路”推动构建全球互联互通伙伴关系，走出了一条国际共同发展的康庄大道。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年来的实践证明，中和共发论突破了欧美国家倡导的发展经济学框架，开创了开放创新共享的全球政治经济学，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这一全球政治经济学不同于西方经济学提出的开放经济政治学，是一种不以改变制度为代价、不附加政治条件的开放政治经济学；它不同于西方经济学强调技术和知识创新的创新经济学，是一种融存量创新和增量创新于一体的创新政治经济学；它也不同于西方经济学中的片面强调分配的福利经济学和过于突出技术平台的共享经济学，是一种强调各方面共商共建共享的共享政治经济学。

总之，“一带一路”倡议，顺应了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潮流，聚焦全球共同发展的时代使命，回应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共同发展的时代难题，开拓了全球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在世界发展史上具有重要里程碑意义，做出了历史性贡献。展望未来，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必须总结“一带一路”的实践经验，坚持中和哲学的理论基础，不断完善全球政治经济学的知识体系，为推动全球共同发展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开辟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这不仅是中国对全球共同发展的重大贡献，也是推动人类文明历史进步的必由之路。

【Abstract】 Promoting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through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s a development model proposed by President Xi Jinping, which is a milestone for the history of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This initiative focuses on how to achieve global common development. Its theoretical basis is to uphold the ideas of Zhonghe and Co-development Theory based on effective consultation, joint contribution and shared benefits. The basic logic is to break the superstition of Western institutionalism and to promote the Silk Road spirit of peaceful cooperation, openness and inclusiveness, mutual learning and mutual benefit, and win-win results. On the basis of fully respecting diversity around the world, we adhere to concepts of openness, greenness and integrity, and embark on a broad path of international common development, striving to achieve high

standards, benefiting people's livelihood, gaining sustainable goals and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 global connectivity partnership. The decade-long practice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has proved that the Theory of Zhonghe and Co-development has transcended the framework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advocated by Western countries, and has inspired the global political economics of openness, innovation and inclusiveness, which is of grea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Key Word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Theory of Zhonghe and Co-development, Development Economics, Global Political Economics

【Аннотация】 Содействие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му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у в рамках «Один пояс, один путь» – это инициатива в област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развития, выдвинутая Председателем Си Цзиньпином, которая является важной вехой в истории мирового развития. Основной вопрос, на котором сосредоточена эта инициатива, заключается в том, как достичь глобального общего развития. Её теоретическая основа состоит в придерживании теории нейтралитета и совместного развития, основанного на обширных консультациях, совместном вкладе и общих выгодах. Основная логика состоит в том, чтобы разрушить суеверие западного институционализма и способствовать мирному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у, открытости, инклюзивности, взаимному обучению и взаимовыгоде в духе Шёлкового пути. Основываясь на полном уважении разнообразия во всём мире придерживаться концепции открытости, экологичности и добросовестности, стремиться к достижению устойчивых стандартов, высокого уровня жизни и устойчивых целей, способствовать установлению глобальных партнёрских связей и выйти на широкий путь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совместного развития. Десятилетняя практика совместного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а инициативы «Один пояс, один путь» доказала, что теория нейтралитета и совместного развития прорвала рамки экономики развития, отстаиваемой европейскими и американскими странами, и создала глобальную политэкономия

открытого обмена инновациями, что имеет очень важное теоретическое и практическое значение.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Инициатива «Один пояс, один путь», теория нейтралитета и совместного развития, экономика развития, глобальная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экономия

(责任编辑 宋羽竹)

走向多边：上海合作组织的政治起源

朱杰进 何越*

【内容提要】作为一个传统上偏好双边外交的国家，为什么中国在中亚地区通过建立上合组织采取了多边主义的地区治理形式？本文认为，冷战结束后，中亚地区经历了权力转移进程，中国是地区性崛起国，俄罗斯是地区性主导国，上合组织是管理地区权力转移进程的产物。其中，地区性崛起国的多边合作需求和地区性主导国的否决权力是影响地区性国际组织创建的两大关键因素。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中国在处理边界谈判和军事互信问题上具有较强的多边合作需求，而俄罗斯否决中国多边倡议的权力遭到一定程度的削弱，这为中国推动建立“上海五国机制”创造了条件。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中国在打击“三股势力”和促进西部地区发展问题上对多边合作的需求变得更为迫切，而俄罗斯否决中国多边倡议的权力遭到进一步削弱，上合组织由此诞生。

【关键词】多边合作需求 主导国的否决权力 地区治理形式 上海五国机制 上海合作组织

【中图分类号】D82**【文章标识】**A**【文章编号】**1009-721X(2023)03-0048(20)

一、引言

冷战结束后，中国的多边外交首先在中亚地区展开。从作为多边论坛的上海五国机制，到作为地区性国际组织的上海合作组织（简称上合组织），中国在中亚地区采用了多边主义的外交路径，并且不断深化地区多边治理的

* 朱杰进，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何越，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硕士研究生。感谢匿名审稿人的修改建议！

进程。^①作为一个传统上偏好双边外交的国家，为什么中国在中亚地区通过建立上合组织采取了多边主义的地区治理形式？

从大国权力互动的视角来看，上合组织起源于冷战结束后中亚地区的权力转移。^②在权力转移的过程中，中国是地区性崛起国，俄罗斯是地区性主导国。一方面，从中国的角度看，在冷战时代，中国处于中亚地区既有权力结构之外；冷战后，随着国家发展速度的加快，中国对中亚地区产生了广泛的多边合作需求。为了更好地促进地区国际合作与维护国家自身利益，中国以地区性崛起国的角色积极发起建立地区性国际组织的倡议，从而介入后苏联空间。^③另一方面，从俄罗斯的角度看，俄罗斯担心中国介入其传统意义上的“战略后院”，会降低自己对中亚国家的“控制力”，因此，俄罗斯也试图通过地区性国际组织来“管控”中国在中亚地区影响力上升的速度。^④

可以看出，上合组织的诞生既离不开中国的多边合作需求，也不能忽视俄罗斯否决中国多边倡议权力下降的条件。在此基础上，本文借助地区性崛起国的多边合作需求和地区性主导国的否决权力两个关键因素，构建了一个解释地区性国际组织创建的理论分析框架，并用来解释上合组织的政治起源。

探讨上合组织起源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在理论方面，既有的国际组织理论在探讨上合组织的起源时，主要聚焦于中国对多边合作的需求，而未能关注中国的多边合作倡议转化为地区性国际组织的政治条件，特别是忽视了地区内大国权力互动对地区性国际组织创建的影响。在现实意义上，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推动世界贸易组织、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机制更好

① 参见孙壮志：“上海合作组织与新时代中国多边外交”，《世界经济与政治》，2021年第2期，第4-18页。

② 参见杨成：“形成中的中亚地区格局：尚存的单极残余、不稳定多极和其他选择”，《俄罗斯研究》，2009年第6期，第14-42页；Alexander Libman, Evgeny Vinokurov, “Holding-Together Regionalism: Twenty Years of Post-Soviet Integration”, *Euro-Asian Studies Serie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2, p.112.

③ 参见顾炜：“地区等级体系与崛起国的介入战略——以中国介入后苏联空间为例”，《外交评论》，2015年第4期，第20-44页。

④ 事实上，俄罗斯同样具有较强的多边合作需求。由于其他大国介入中亚地区在一定程度上会削弱俄罗斯在中亚地区的影响力，因此，俄罗斯也希望通过地区性国际组织的形式，在其他大国与中亚国家交往时保持“在场”的状态，以此确保其他大国介入中亚的行为更加透明和可控。

发挥作用，扩大金砖国家、上合组织等合作机制的影响力，切实增加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①。因此，厘清上合组织的政治起源，对于如何扩大上合组织机制的影响力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本文结构安排如下：第一部分提出研究问题；第二部分介绍既有的研究及其不足；第三部分提出理论分析框架，说明地区性崛起国的多边合作需求与地区性主导国的否决权力是影响地区性国际组织创建的两大关键因素；第四和第五部分以上海五国机制和上合组织为案例，分析中国的多边合作需求与俄罗斯的否决权力发生的变化及其产生的影响；第六部分总结全文。

二、既有研究及其不足

作为首个由中国倡议并以中国城市命名的地区性国际组织，上合组织在创建之初便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既有研究主要从以下三个视角解释上合组织的起源。

一是关注上合组织的制度形式选择。此类研究将上合组织视为能够发挥独立作用的政治行为体，重点考察上合组织在制度形式、规则制定和议程设置上的偏好。我国学者曾向红强调，后果性逻辑和适当性逻辑是上合组织的制度形式起源，上合组织的建立调和了这两种制度逻辑间的矛盾与分歧。^②王树春和万青松提出，地区多边合作制度的竞争与合作决定了上合组织的制度形式起源，上合组织的建立实现了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欧亚经济共同体等既有组织在制度设计上的相互协调。^③尹继武和田野指出，中亚地区国际合作中交易成本最小化的逻辑决定了上合组织的形式选择，^④上合组织的建立回

①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年，第 62 页。

② 参见曾向红、李孝天：“上海合作组织的安全合作及发展前景——以反恐合作为中心的考察”，《外交评论》，2018 年第 1 期，第 66-94 页。

③ 参见王树春、万青松：“上海合作组织与欧亚经济共同体的关系探析”，《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 年第 3 期，第 20-38 页。

④ 参见尹继武、田野：“上海合作组织的制度形式选择：一种交易成本分析”，《国际政治研究》，2007 年第 2 期，第 135-149 页。

应了中亚地区在资产专用性较强、不确定性较大的议题领域开展合作的需求。

二是关注上合组织创建时中亚地区的共同利益。此类研究将上合组织的起源视为实现中亚地区共同利益的工具。思拉舍·马克托斯（Thrassy Marketos）提出，中亚地区共同利益的存在是上合组织得以创建的根本原因，其中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极端主义”（简称“三股势力”）、维持中亚地区稳定和应对西方势力渗透，是催生上合组织的直接原因。^①赵华胜认为，中亚地区在安全领域的共同利益是上合组织得以创建的基础，正是因为中国、俄罗斯与中亚国家在地区和平与稳定上具有广泛的共同利益，催生了上合组织。^②

三是关注上合组织创建时中国的多边合作需求。此类研究关注中国对中亚地区的多边合作需求。邢广程、孙壮志认为，中国对自身国家利益的追求推动了上合组织的建立，上合组织在战略定位上是中国总体外交战略的一部分，承担着维护中国国家安全、维持边疆稳定和促进经济与贸易发展的重要使命。^③宋卫清强调，中国重新发现中亚是上合组织得以创建的决定性因素，中国在中亚地区有着划清边界、保障能源安全、打击分裂势力、维护边疆稳定、促进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和拓展自身影响力等多重利益需求。^④

综上所述，针对上合组织的起源，既有研究给出了一定的解释，但也存在着不足之处。在分析视角上，既有研究偏重于中国的多边合作需求一侧，未能从供给的角度来探讨多边主义合作得以产生和落实的政治条件。实际上，从地区性崛起国的多边合作需求到地区性国际组织的创建还需要其他条件，其中，地区性崛起国与地区性主导国之间的权力互动至关重要。

为了更好地分析地区大国权力互动与地区性国际组织之间的关系，本文将利用地区性崛起国的多边合作需求以及地区性主导国的否决权力两个因

① See Thrassy Marketos, *China's Energy Geopolitics: 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and Central Asia*, New York: Routledge, 2009, p.33.

② 参见赵华胜：《上海合作组织：评析和展望》，北京：时事出版社，2012年，第115页。

③ 参见邢广程、孙壮志：《上海合作组织研究》，长春：长春出版社，2007年，第149-150页。

④ See Song Weiqing, *China's Approach to the Central Asia: 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New York: Routledge, 2016, pp.49-68.

素，构建一个解释地区性国际组织创建的理论分析框架，用来解释上合组织的政治起源。

三、多边合作需求、主导国否决权力与地区性国际组织创建

在地区大国权力互动中，地区性崛起国普遍希望借助多边制度安排，将自身不断上升的权力制度化，并通过建立多边国际组织，推动地区大国权力协调，管控权力转移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①然而，当地区性崛起国主动发起建立多边组织的倡议时，地区性主导国会保持着天然的警惕。在这一情况下，只有当地区性主导国否决权力下降时，地区性崛起国的多边合作倡议才更有可能得到落实。因此，本文认为，地区性崛起国的多边合作需求和地区性主导国的否决权力是两个关键因素，共同决定了地区性国际组织的创建。

（一）地区性崛起国的多边合作需求

按照奥根斯基的权力转移理论（power transition theory），在地区权力互动中，地区性崛起国与地区性主导国之间的权力分配与协调尤为关键。由于地区性崛起国的权力在短时期内快速上升，而既有制度安排通常难以及时准确地反映实际权力结构的变化，^②这就导致权力分配与利益分配之间的脱节。随着既有权力分配与利益分配之间的差距不断拉大，地区性崛起国的利益持续无法得到满足，继续被动接受既有制度安排的成本会不断上升，其快速崛起的实力也无法得到制度化的认可，这将导致地区性崛起国越来越不满既有的制度安排。

当地区性崛起国对现状的不满达到临界水平时，它倾向于将自身多边合作需求转化为创建新的地区性国际组织。^③从权力互动的视角来看，当地区性崛起国对地区的权力结构进行重塑时，实际上是将权力结构“从地区性主

① See David Lake, “Regional hierarchy: Authority and local international order”,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2009, Vol.35, No.1, pp.35-38.

② See Phillip Lipsky, “Explaining Institutional Change: Policy Areas, Outside Options, and the Bretton Woods Institution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015, Vol.59, No.2, pp.341-356.

③ See Douglas Lemke, Suzanne Werner, “Power Parity, Commitment to Change, and War”,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1996, Vol.40, No.2, pp.235-260.

导国占优的均衡状态推动到崛起国占优的均衡状态”。^①在这一权力再平衡的过程中，为了管控权力转移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挑战，地区性崛起国倾向于发起多边合作倡议，并推动倡议转化为多边国际组织，以期将其不断上升的权力制度化。

然而，作为既有权力结构的最大获益者，地区性主导国对地区性崛起国发起的多边倡议，将保持着天然的警惕。通过维持自身相对的实力优势并加强对地区的控制力，地区性主导国会尽力阻碍权力转移的进程，以延缓地区性崛起国权力上升的速度。因此，地区性主导国的否决权力大小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地区性崛起国多边合作需求能否得到落实。

（二）地区性主导国的否决权力

在地区性国际组织的创建过程中，不仅要考虑地区性崛起国的多边合作需求，还要重视地区性主导国的否决权力。地区性主导国的否决权力是指地区性主导国在某一地区内否决地区性崛起国多边合作倡议的能力。^②具体而言，当地区性主导国通过采取制度内和制度外的多种方式，能够阻止地区性崛起国多边合作倡议的实施，那就说明，地区性主导国在该地区内拥有较大的否决权力。

但否决权力是一个相对模糊的概念，如何测量否决权力的大小是国际关系研究的重要难题之一。有鉴于此，本文将借助国际关系中的社会网络理论，从网络性权力（network power）的视角来测量地区性主导国的否决权力。^③艾米莉·哈芬那-伯顿（Emilie Hafner-Burton）、迈尔斯·卡勒（Miles Kahler）和亚历山大·蒙哥马利（Alexander Montgomery）指出，行为体的权力不仅来源于行为体的个体特征，如国家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等，也与行为体互动所处社会网络的特征有关。其中，网络性权力包括准入权（access）和中介权（brokerage）两种。

首先，准入权是一种不涉及第三方的双边性权力。在地区权力结构的网

^① Flor Avelino, Jan Rotmans, “Power in Transition: Framework to Study Power in Relation to Structural Change”,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Theory*, 2009, Vol.12, No.4, pp.543-569.

^② See Mark Granovetter, “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the Problem of Embeddednes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85, Vol.91, No. 3, pp.481-510.

^③ See Emilie Hafner-Burton, Miles Kahler, Alexander Montgomery, “Network Analysis fo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2009, Vol.63, No.3, pp.559-592.

络中，准入权是指地区性主导国相对于地区性崛起国的一种双边权力优势。若地区性主导国与崛起国之间的实力差距悬殊，地区性主导国的实力远在地区性崛起国之上，那么地区性主导国否决地区性崛起国多边合作倡议的能力较强。

其次，中介权是一种涉及第三方的体系性权力。在地区权力结构的网络中，中介权是指地区性主导国通过控制地区内其他国家而享有的相对于地区性崛起国的一种多边权力优势。地区性主导国通过垄断其他节点难以联结到的边缘节点，达成对整张社会网络的控制力，从而获得最大化的中介权。

最后，准入权和中介权共同反映了地区性主导国否决权力的大小。其中准入权衡量了地区性主导国与地区性崛起国的相对实力对比，中介权则刻画了地区性主导国对地区内其他国家的控制力。若地区性主导国的相对实力远在地区性崛起国之上，并且地区性主导国对地区内其他国家保持着较高的控制力时，地区性主导国的否决权力较大；若地区性主导国已经不具有相对的实力优势，并且难以控制地区内其他国家的行为时，地区性主导国的否决权力较小。

（三）地区性国际组织的创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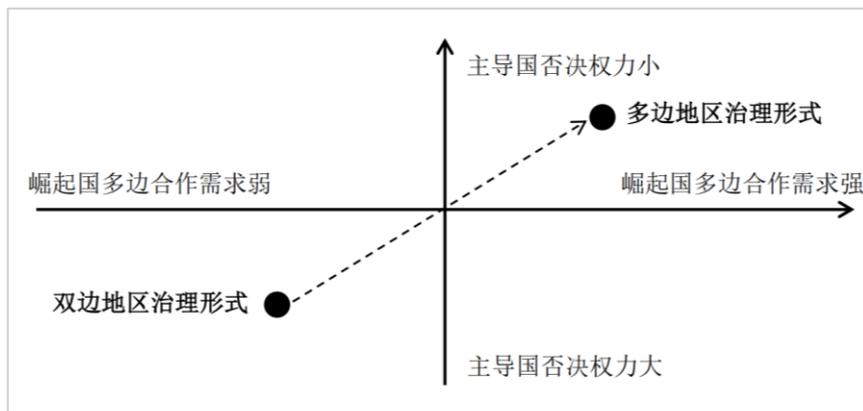


图 1 地区治理形式选择示意图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综上所述，地区性崛起国的多边合作需求和地区性主导国的否决权力是

影响地区性国际组织创建的两大关键因素。其中，多边合作需求刻画了地区性崛起国的内在需求，塑造了其多边介入地区事务的动机。而地区性主导国的否决权力反映了地区内大国的权力互动，塑造了地区性崛起国的多边合作倡议能否转化为地区性国际组织的政治条件。

通常来说，地区治理形式的选择主要分为双边和多边两种形式，多边形式通常表现为创建地区性国际组织。当地区性崛起国的多边合作需求较弱，地区性主导国的否决权力较大时，该地区更有可能采取双边的地区治理形式；当地区性崛起国的多边合作需求较强，地区性主导国的否决权力较小时，该地区更有可能采取多边国际组织的地区治理形式。

接下来，本文将以中亚地区先后出现的上海五国机制和上合组织为案例，检验该分析框架的解释力。

四、上海五国机制

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后，中国先后与俄罗斯、中亚国家建立了双边外交关系。此后，随着中国与俄罗斯以及中亚国家的边界谈判和重塑军事互信进程的不断加深，中国从议题领域性质出发，逐渐意识到相较于多轮的双边沟通，采用多边外交的形式解决边界问题、培育军事互信更有效率，由此产生了对中亚地区的多边合作需求。与此同时，中俄的相对实力对比在苏联解体后朝着“中强俄弱”的趋势发展，而且中国与中亚国家间的联系在不断增强，这使得俄罗斯的否决权力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削弱。客观来说，俄罗斯否决权力的下降，使得中国将自身需求转化为多边外交行动的政治条件制约减少，中国由此选择突破常态化的双边外交关系，通过与俄罗斯、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四国联合代表团以“五国两方”的形式展开“类多边”谈判，^①为上海五国机制的诞生做了前期铺垫。

^① 虽然采取了类似多边的谈判形式，但谈判的最终成果仍然是中国分别与俄罗斯和中亚国家签署双边边界协定书，因此仅是“类多边”的形式。塞巴斯蒂安·佩鲁斯认为，中亚国家在与中国进行边界谈判时，没能体现出任何后苏联时期的地区团结。参见 Sebastian Peyrouse, “China and Central Asia”, in *The New Great Game: China and South and Central Asia in the Era of Reform*, Thomas Fingar (e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pp.216-239.

（一）中国的多边合作需求

冷战结束初期，中国对中亚地区，特别是在边界谈判问题和军事互信问题上，具有较强的多边合作需求。^①

在边界谈判问题上，中国具有较强的多边谈判需求。中国在中亚地区的边界遗留问题起源于 1989 年 11 月开始的中苏边界谈判。中国和原苏联拥有长达 7600 多公里的边界线，其中东段约 4320 公里，西段约 3300 公里，并且大部分存在争议。苏联解体后，中国与俄罗斯在第一时间本着平等协商、互谅互让和相互妥协的精神，签署了《关于划定中俄边界线东段的议定书》，基本划定了东段的边界线，^②其中争议较大的中俄边界东段黑瞎子岛和阿巴盖图洲渚（Abagaitu Islet）的边界线划定暂时被搁置，中俄边界中的西段边界也未能达成最后协议。^③1992 年，随着中亚国家纷纷独立，原中苏西部边界分别成为中国与俄罗斯、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以及塔吉克斯坦四国的边界，中苏谈判遗留下的边界问题亟待解决。

面对原属于同一国家的一众新独立国家，想要一揽子地解决遗留的边界争议问题，中国便不能继续采用既有的中苏谈判的双边形式，而亟须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在中苏原有双边谈判基础上，以“类多边”的形式就边界问题进行重新谈判。

在军事互信问题上，中国具有较强的重塑地区多边互信的需求。中国与中亚国家的“交往历史悠久，友谊源远流长”^④，双方的友好关系最早可以追溯到“丝绸之路”的开通。然而，自 20 世纪 60 年代起，中国与苏联长期处于政治和军事对抗状态，双方在边境的重兵集结，严重损害了中亚地区的政治和军事互信。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末，中苏关系开始“解冻”，但双边关系正常化的苗头刚刚显现就被苏联的骤然崩溃所打断。由于苏联解体，且

① 参见邢广程：“中亚的利益取向和上海合作组织的发展”，《俄罗斯研究》，2009 年第 6 期，第 3-6 页。

② See Richard Hu, “China and Central Asia: The Role of 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SCO)”, *The Mongol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2013, No.11, pp.129-151.

③ 参见姜毅：“中俄边界问题的由来及其解决的重大意义”，《欧洲研究》，2006 年第 2 期，第 94-107 页。

④ 王毅：“中国-中亚关系：三十而立，砥砺前行”，《人民日报》，2021 年 12 月 30 日第 6 版。

新独立的中亚国家能力有限，导致中亚地区一时间陷入权力真空期，成为“世界主要大国和地区大国利益复杂交织的中心”。^①为维护边疆地区稳定，尽快构建与中亚国家的合作框架，中国亟须与中亚国家在达成双边建交的基础上，走出“信任赤字”的泥潭，通过培育多边军事互信，为开展多边军事行动关系和维护边疆地区稳定打下良好基础。

（二）俄罗斯的否决权力

除了中国在边界谈判问题和军事互信问题上具有较强的多边合作需求外，俄罗斯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否决权力的下降同样重要。

一方面，俄罗斯的准入权下降。在冷战结束后，中俄相对实力大体上呈现出“中强俄弱”的发展态势。事实上，中俄相对实力发展态势的分岔点正是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当时中俄两国均处于经济转型的关键阶段，两国从经济体制到经济结构都发生了重大转变。然而，相较于中国政府主导下逐步工业化和市场化的成功转型，俄罗斯的经济转型出现重大挫折。在 1992 年到 1996 年期间，俄罗斯以连续五年实际 GDP 负增长为代价完成向市场经济的转型，经济的严重衰退不仅导致市场体制混乱和社会结构分裂，还“形成了资源依赖型经济结构和权威主义政治文化”。^②从中长期来看，这一去现代化的经济结构和威权主义的政治文化阻碍了俄罗斯经济可持续发展，进一步限制了俄罗斯否决中国以多边的形式介入中亚地区的能力。

另一方面，俄罗斯的中介权下降。苏联解体是俄罗斯、中国和中亚三方互动历史上的一个分水岭。在此之后，俄罗斯对中亚国家的控制力逐步下降，而中国与中亚国家之间的联系逐步建立，这体现在边界谈判和经贸联系等多个维度。

在边界谈判方面，中亚各国受俄罗斯直接控制的程度逐渐降低。具体而言，原属于苏联与中国双边的边界划线问题在中亚国家独立后变得更为复杂，由两国边界历史遗留问题谈判转变为多边边界划定谈判。作为独立国家的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在边界谈判中拥有自身国家利益的

^① Наби Зиядуллаев. Центральная Азия: конкуренция и партнерство. 2 июля 2007 г. https://www.ng.ru/courier/2007-07-02/13_asia.html

^② 徐坡岭：“俄罗斯政治制度转型的全球化约束与政治传统张力——俄罗斯政治制度重构的主导因素”，《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 年第 8 期，第 19-24 页。

考量，开始作为独立行为体参与多边谈判。俄罗斯对独立后的中亚国家虽仍具有较大程度的控制力，但相较苏联时期已经大为下降。事实上，俄罗斯在冷战结束后的地缘政治环境重大转变中长期处于孤立状态，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俄罗斯的控制力。

与此同时，中国与中亚国家间在双边问题上的联系愈发密切。在 1992 年至 1993 年间，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的领导人先后到访中国。其中哈萨克斯坦总统努尔苏丹·纳扎尔巴耶夫在访问北京期间，积极拓展了中哈在边界问题上的双边沟通渠道，就 11 个边界争议区中的 9 个达成了协议，双方签署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友好关系基础的联合声明》，并正式签署了中国与中亚国家间的第一份双边边界协定。此后，时任中国国务院总理李鹏和国家主席江泽民先后于 1994 年和 1996 年率代表团访问中亚。^①在此期间，中国本着友好、互利和协商的原则，先后与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就边界问题进行了协商，为后续边界谈判的顺利进行奠定了良好的双边基础。

在经贸联系方面，中亚各国与俄罗斯原有的经贸联系越来越朝着弱化的方向演化。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报告，在冷战刚刚结束的一段时间内，俄罗斯 GDP 增速每下降 1 个百分点，中亚国家的家庭存款流量就会相应减少 1%。^②但自 1995 年开始，中亚国家的经济逐渐摆脱俄罗斯经济衰退的桎梏，“经济发展逐渐转稳，并且在 1990 年下半年普遍开始恢复和增长”。^③

与此同时，中国与中亚国家间的经贸联系日益密切，尤其是边境地区的经贸联系不断增加，廉价的中国商品涌入需求旺盛的中亚市场。在众多中国商品中，中亚国家的消费者对原苏联市场上没有的中国家用电器和塑料制品兴趣浓厚。自 20 世纪 90 年代初，吉尔吉斯斯坦和哈萨克斯坦的诸多农贸市场被改造成转售从新疆运来的中国商品的地方。紧密的经贸供需关系催生了

① 参见“李鹏总理同阿卡耶夫总统会谈”，《人民日报》，1994 年 4 月 24 日第 1 版；邢广程、孙壮志：《上海合作组织研究》，长春：长春出版社，2007 年，第 4 页。

② See Alberto Behar, “Links and Levers: How the Caucasus and Central Asia Are Tied to Russia”, August 1, 2014, <https://www.imf.org/en/Blogs/Articles/2014/08/01/links-and-levers-how-the-caucasus-and-central-asia-are-tied-to-russia>

③ 赵华胜：“中国中亚外交的理论和实践”，《国际问题研究》，2007 年第 4 期，第 19-25 页。

更为密集的人员流动，中亚维吾尔族通过与新疆地区维吾尔族之间的民族联系，成为早期从事中国商品跨境流通的职业商人。这一系列密集的人员流动进一步带动了边境地区的经济发展，使得中国与中亚国家间的联系愈发密切。

简言之，20世纪90年代初期，中俄相对实力对比呈现出“中强俄弱”的发展趋势，导致俄罗斯在中亚地区的准入权下降；与此同时，在边界谈判、经贸联系等一系列问题上，俄罗斯对中亚国家的控制力下降，而中国与中亚国家的联系逐步增强，这就导致俄罗斯在中亚地区的中介权也在下降。

（三）“上海五国”机制的建立

在1990年代初期，中国在边界谈判问题和军事互信问题上较强的多边合作需求，以及俄罗斯在否决中国多边倡议的准入权和中介权同时下降，共同催生了“上海五国”机制。

中国积极推动地区多边治理的努力体现在1996年的上海峰会中。中俄哈吉塔五国元首于1996年4月26日在上海举行峰会，正式签署了《关于在边境地区军事领域建立信任的协定》，并于1997年4月24日在莫斯科签署了《关于在边境地区相互裁减军事力量的协定》。从这两项协议的内容上看，中国主要聚焦于边疆地区的稳定和安全问题，与俄罗斯和中亚国家一道集中解决了边界谈判中的历史遗留问题，重塑了地区军事战略互信，为“今后地区安全合作以及其他领域合作的开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①1997年，中国推动将上海五国机制确立为监督边境裁军执行情况的定期首脑峰会机制。^②随着这一新多边机制的建立，中国减少了对边疆地区稳定的担忧，为中国进一步深化与中亚国家的多边关系扫清了障碍。^③

五、上海合作组织

1990年代中后期，“三股势力”已经成为中亚地区普遍存在的现实威

^① 邢广程、孙壮志：《上海合作组织研究》，长春：长春出版社，2007年，第74页。

^② 参见阎英华：“携手合作共同迈向新世纪——上海五国机制的回顾与展望”，《当代世界》，2000年第8期，第9-11页。

^③ See Eugene Rumer, Huasheng Zhao, Dmitri Trenin, *Central Asia: Views from Washington, Moscow, and Beijing*,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8, pp.137-150.

胁，并肆意蔓延至中国的西部地区，严重影响了中国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基于此，中国对中亚地区的多边合作需求变得更为强烈，逐渐扩溢出上海五国机制最初的设计。^①与此同时，中国在改革开放原则的指导下进入经济快速发展阶段，中俄的相对实力差距进一步扩大，中国与中亚国家间的政治和经贸联系迅速加强，致使俄罗斯的否决权力在更大程度上被削弱，为“上海五国”机制升级为“上合组织”创造了条件。

（一）中国的多边合作需求

在这一时期，中国对中亚地区，特别是在打击“三股势力”和促进西部地区发展问题上具有较强的多边合作需求。

在打击“三股势力”问题上，中国具有较强的多边军事合作需求。苏联解体后，由于新独立的中亚国家能力有限，俄罗斯忙于国内政治与经济改革，中亚地区“暂时陷入了权力真空的震荡期”。^②与此同时，中亚地区本就错综复杂的地缘文化结构与差异，为极端主义思想向中亚地区渗透留下了缝隙。在这一背景下，原苏联地区长期受压制的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逐渐失控，中亚地区的“三股势力”日益活跃起来，“并于 20 世纪 90 年代后半期在中亚地区以及中国的新疆地区达到活动的顶峰”。^③以“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为首的恐怖分子勾结基地组织，“以宗教原教旨主义作为意识形态，煽动宗教恐怖分子的狂热和痴迷，进而鼓动其使用自杀式的恐怖袭击”，^④在中亚地区先后制造了 1992 年塔什干爆炸案、1998 年劫持日本地质学者案、2000 年劫持美国登山者案、2002 年比什凯克爆炸案和 2003 年奥什爆炸案等重大恐怖袭击事件。^⑤

① 参见胡键：“论上海合作组织的发展动力”，《社会科学》，2005 年第 6 期，第 45-50 页。

② Наби Зиядуллаев. Центральная Азия: конкуренция и партнерство. 2 июля 2007 г. https://www.ng.ru/courier/2007-07-02/13_asia.html

③ 苏畅：“中亚伊斯兰极端主义的由来及应对”，《现代国际关系》，2016 年第 1 期，第 56-62 页。

④ 曾向红：“全球化、逆全球化与恐怖主义新浪潮”，《外交评论》，2017 年第 3 期，第 135-136 页。

⑤ 联合国安理会 QDe.010 决议。可参见 *QDe.010, Islamic Movement of Uzbekistan*, April 7, 2011, https://www.un.org/securitycouncil/zh/sanctions/1267/aq_sanctions_list/summaries/entity/islamic-movement-of-uzbekistan

与此同时，“三股势力”还有极强的外溢性，使得中亚地区内一国的安全问题迅速成为整个地区的安全问题^①。一些宗教恐怖主义分子以中亚地区为“战术走廊”，不仅威胁中亚国家的和平稳定，还利用其与中国西部地区的地理、民族和宗教联系，持续煽动“东突”等分裂势力在中国的西部地区策划、组织了一系列爆炸、暗杀、纵火、投毒、袭击等恐怖暴力事件。^②在这段时间里，“此类分裂恐怖主义事件在中国境内共发生了 200 多起，共造成 160 人死亡，440 人受伤”，^③严重威胁了中国的国家安全利益。基于上述地区安全形势的变化，中国对中亚地区多边合作的需求发生了变化，即从解决“边界谈判问题”上升为“打击三股势力问题”^④。因此，中国亟须与俄罗斯及中亚国家达成地区多边军事合作，在相互尊重国家主权的前提下实现军事信息交流、军事行动协调和开展反恐军事联合演习，共同打击“三股势力”。

在促进中国西部地区发展问题上，中国也具有较强的多边合作需求。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东部地区因地理位置和资源禀赋的优势，在改革开放之初便取得了较快的发展，东西部之间的经济差距逐渐扩大。“到 1995 年，东西部之间的相对经济差距为 56.9%，较 1990 年上升了 10.3 个百分点”。^⑤为了防范地区经济差距过大可能带来的政治和社会负面影响，进一步促进各民族、各地区的共同发展和富裕，中国愈发重视加快西部地区的发展，^⑥并正式提出了“西部大开发”战略。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西部地区与中亚国家在地理位置上相邻、在资源禀赋上相似、在贸易上互惠、在经济结构上互补，从而二者的经济发展存在

① 参见曾向红、庞卫华：“美国对华竞争加剧背景下中亚国家外交政策的新变化”，《国际展望》，2023 年第 3 期，第 128 页。

② “国务院新闻办专文：‘东突’恐怖势力难脱罪责”，2002 年 1 月 21 日，<https://www.chinanews.com.cn/2002-01-21/26/156158.html>

③ Zhao Huasheng, “China’s View of and Expectations from 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Asian Survey*, 2013, Vol.53, No.3, pp.436-460.

④ 参见潘志平：《中亚的民族关系：历史、现状与前景》，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3 年，第 106-107 页。

⑤ 重庆市统计局：“西部经济快速增长，区域发展更趋协调”，2019 年 5 月 29 日，http://tjj.cq.gov.cn/zwgk_233/fdzdgknr/tjxx/sjjd_55469/202002/t20200219_5273655.html

⑥ 参见柳丰华：“中国在中亚：政策的演变”，《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7 年第 6 期，第 63-72 页。

着极强的相关性。然而，中亚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并不乐观，严重限制了中国西部地区对外拓展市场的空间。苏联解体后，中亚国家普遍存在产业规模较小、产业结构单一、生产能力相对低下的“通病”。与此同时，中亚国家对地区跨国界基础设施建设投入明显不足，导致贸易便利化水平始终处于低位，这严重阻碍了地区规模经济的发展和投资外溢的效应，并使中国难以与中亚市场开展更加深入的经贸活动。^①

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在打击“三股势力”和促进西部地区发展问题上均产生了较强的多边合作需求。

（二）俄罗斯的否决权力

面对中国较为强烈的多边合作需求，俄罗斯的否决权力尤为关键。相较于 1990 年代初期，此时俄罗斯的否决权力进一步下降。

一方面，俄罗斯的准入权进一步下降，中俄相对实力对比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中强俄弱”的态势更加明显。从全球经贸格局上看，“全球经济和贸易重心在世纪之交正迅速向亚太地区转移，而这一趋势的关键引擎就是经济蓬勃发展的中国”。^②应该说，经过此前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外商逐步建立起对中国经营环境的信心，外国直接投资（FDI）在这一段时间内大幅上升。^③与此同时，中国对外开放的政策导向越来越明晰，中共中央、国务院于 1992 年决定将对外开放优惠政策推广至 5 个长江沿岸城市、东北、西南和西北地区 13 个边境市、县，以及绝大多数内陆地区省会城市。在这样的政策刺激下，中国自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开始，连年维持着 10% 以上的 GDP 增速。到了 20 世纪 90 年代末，“中国的科技进步以更快的速度向前推进，经济实力进一步增强”。^④

然而，相较于中国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的经济腾飞，俄罗斯国内

① 参见苗华寿：“适时的议事日程——加强中国与中亚国家和地区经济关系及区域合作”，《国际贸易》，2003 年第 11 期，第 26-28 页。

② Anastasia Solomentseva, “The ‘Rise’ of China in the Eyes of Russia: A Source of Threats or New Opportunities?” *Connections*, 2014, Vol.14, No.1, pp.3-40.

③ 参见刘建丽：“新中国利用外资 70 年：历程、效应与主要经验”，《管理世界》，2019 年第 11 期，第 24 页。

④ “中国经济（1980—1999 年）的迅速发展波动”，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bg/200207/20020700032580.shtml>

经济改革遭受了严重挫折。^①由于俄罗斯在独立后背负着大规模的原苏联外债，长期的经常账户赤字再加上“休克疗法”等宏观经济政策的失败，导致俄罗斯接连爆发了三次金融风波。从1997年到1998年间，金融风波之间的间隔越来越短，规模越来越大，程度越来越深，导致政府的金融信用遭到国内外投资者的质疑，进而在金融领域出现外资抽逃、国内资产流失、主权货币卢布骤然贬值和银行遭挤兑而破产的恶性循环，并最终酿成主权债务危机，引发了长期的经济生产瘫痪和社会动乱。这一旷日持久的金融危机造成俄罗斯经济陷入严重衰退，主权信用评级连续三次下调。

另一方面，俄罗斯的中介权也进一步下降。因俄罗斯深陷金融危机泥潭，中亚国家开始着力推行“去俄罗斯化政策”。与此同时，中国的综合实力快速上升，对中亚国家的吸引力逐渐增强。这一变化具体体现在了经贸互动和安全理念扩散等维度之中。

在经贸互动方面，形成于苏联时期的俄罗斯和中亚国家之间既有的贸易分工，受到俄罗斯金融危机的冲击而逐渐遭到削弱，中亚国家开始奉行独立自主的经济发展战略。随着俄罗斯金融危机带来的负面影响以及卢布的大幅贬值，中亚各国纷纷采取独立自主的宏观政策来遏制资本外逃，并努力调节货物进出口流量，试图改变长期以来与俄罗斯之间不对称的贸易关系。这一举动提升了中亚各国主权货币的独立性，导致俄罗斯对中亚国家的经贸控制力逐渐下降。^②

与此同时，中国与中亚国家间的经贸联系迅猛发展。从1995年到2000年间，中国与中亚国家的贸易额增长至20亿美元，较1992年增长了近4倍。除此之外，中国与中亚国家在经济技术合作上也取得了重大进展，中国企业在能源、公路建设、电信、制造、轻工和纺织等多个领域与中亚国家的企业开展了广泛的技术交流与建设合作。^③

在安全理念扩散方面，中亚国家对俄罗斯在这一地区长期奉行的安全政

① 参见冯绍雷：“俄罗斯体制转型的发生、路径及其走向”，《俄罗斯研究》，2001年第3期，第2-7页。

② See Gonzalo Pastor, Tatiana Damjanovic, “The Russian Financial Crisis and its Consequences for Central Asia”, *IMF Working Paper*, 2001, pp.3-19.

③ 参见孙秀文：“三十年，中国与中亚国家命运与共”，《光明日报》，2022年1月24日第2版。

策愈发不信任。^①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两极对抗在中亚地区留下了深刻的痕迹，“冷战思维”中的“零和博弈”理念在中亚地区日益遭到摒弃。与此同时，中国提出的以“互信、互利、平等、合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对中亚国家的吸引力日益上升。^②在这一新理念的指导下，中国在 1998 年“上海五国”第三次首脑会晤和 1999 年第四次首脑会晤时，推动达成了《阿拉木图声明》和《比什凯克声明》，首次明确了地区多边安全合作的基本原则，建立了五国安全主管部门常态化的沟通机制。在中国的推动下，“上海五国”元首在第五次首脑会议上表达了联合打击对地区安全、稳定和发展构成威胁的“三股势力”的决心，同意制定联合打击“三股势力”的行动计划。

简言之，1990 年代中后期，中俄实力对比发生了转折性变化，俄罗斯的准入权进一步下降。与此同时，俄罗斯在经贸互动与安全理念等方面对中亚国家的控制力下降，而中国对中亚国家的吸引力逐步上升，导致俄罗斯的中介权随之下降。

（三）上合组织的诞生

综合来看，在 1990 年代中后期，中国对中亚地区打击“三股势力”和促进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方面均产生了较为迫切的多边合作需求。而俄罗斯在中亚地区的准入权和中介权均大幅下降，使得俄罗斯否决中国多边合作倡议的能力遭到削弱，这就为上合组织的诞生创造了政治条件。

中国积极创建地区性国际组织的努力体现在 2000 年的杜尚别峰会和 2001 年的上海峰会上。2000 年 7 月 5 日，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五国元首在杜尚别峰会上共同签署了《杜尚别宣言》，各方承诺进一步充实和完善“上海五国机制”，逐步将五国首脑会晤机制发展成为五国多层次、全方位的合作机制，以便更加有效地打击“三股势力”，深化在政治、安全、经贸以及其他领域的合作。^③

2001 年 6 月 15 日，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

① See Pavel Baev, “Assessing Russia’s Cards: Three Petty Games in Central Asia”, *Cambridg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2004, Vol.17, No.2, p.279.

② 参见许涛：“中国新安全观与上合组织二十年安全实践”，《和平与发展》，2021 年第 3 期，第 1-13 页。

③ 参见《上海合作组织二十周年杜尚别宣言》，《人民日报》，2021 年 9 月 18 日第 2 版。

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六国元首在上海峰会上签署了《“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宣言》，标志着上合组织的诞生，也意味着中国在中亚地区的多边合作需求正式转化成了地区性国际组织。时任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指出，从上海开始的“上海五国”进程“翻开了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五国关系史上崭新的一页。……‘上海合作组织’的成立，必将为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六国在新世纪的长期睦邻友好合作，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①。

六、结论

本文从冷战后中亚地区权力转移的角度探讨了上合组织的政治起源，提出地区性崛起国的多边合作需求和地区性主导国的否决权力，是影响地区性国际组织创建的两大关键因素。在 1990 年代初期，中国在处理边界谈判和军事互信问题上具有较强的多边合作需求，而俄罗斯否决中国多边倡议的权力遭到一定程度的削弱，这为中国推动建立“上海五国”机制创造了条件。在 1990 年代中后期，中国在打击“三股势力”和促进西部地区发展问题上对多边合作的需求变得更为强烈，而俄罗斯否决中国多边倡议的权力遭到进一步削弱，上合组织由此诞生。

本文的理论框架主要是用于解释上合组织的创建，同时对于理解当前上合组织的发展趋势也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目前，中国与中亚国家之间的共同利益深度融合，多边合作需求正在向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方向拓展，上合组织的制度化建设在这一过程中趋于完善。与此同时，俄罗斯为提振在中亚的影响力，也在不断加强以自身为中心的地区性国际组织的建设和发展，包括欧亚经济联盟、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等。在这一背景下，加强上合组织与欧亚经济联盟、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的国际组织间协调，对于提高上合组织的影响力正变得更加重要。

^① 江泽民：“在‘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大会上的开幕词”，《人民日报》，2001年6月16日第1版。

【Abstract】 As a country which has traditionally preferred to bilateral diplomacy, why has China adopted a multilateral form of regional governance in Central Asia through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SCO?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after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Central Asia has undergone a process of power transfer, with China as a regional rising power, Russia as a regional dominate state, and the SCO as the product of managing the process of regional power transfer. Among them, the demand for multilateral cooperation by rising regional countries and the veto power of dominate states are the two key factors affecting the creation of regional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In the early 1990s, China had strong demands for multilateral cooperation in handling border negotiations and military mutual trust, while Russia's right to veto China's multilateral initiatives was weakened to a certain extent, which created conditions for China to promote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Shanghai Five Mechanism". In the middle and late 1990s, China's demands for multilateral cooperation in combating the "three forces" and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western region became more urgent, and Russia's right to veto China's multilateral initiatives was further weakened, and the SCO was born.

【Key Words】 Demand for Multilateral Cooperation, The Veto Power of Dominate State, Forms of Regional Governance, the Shanghai Five Mechanism, 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Аннотация】 Почему Китай, как страна, традиционно отдающая предпочтение двусторонней дипломатии, принял многостороннюю форму регионального управления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посредством создания Шанхайской организации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В данной статье утверждается, что после окончания холодной войны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Азиатском регионе произошёл процесс передачи власти: Китай – восходящая держава региона, Россия – региональное доминирующее государство, а Шанхайская организация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 продукт процесса управления передачей мощности. Потребности в многостороннем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е восходящих

региональных держав и право вето региональных доминирующих государств являются двумя ключевыми факторами, влияющими на создание региональных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организаций. В начале 1990-х годов у Китая была острая потребность в многостороннем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е в решении вопросов пограничных переговоров и военного взаимного доверия, в то время как право России налагать вето на многосторонние инициативы Китая было в определённой степени ослаблено, что дало Китаю толчок к созданию «Шанхайской пятёрки». В середине-конце 1990-х годов потребность Китая в многостороннем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е в борьбе с «тремя злами» и содействии развитию западного региона стала более насущной, в то время как право России налагать вето на многосторонние инициативы Китая ещё больше ослабло, что создало условия для зарождения Шанхайской организации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Необходимость многостороннего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право вето доминирующе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форма регионального управления, Шанхайская пятёрка, Шанхайская организация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责任编辑 宋羽竹)

俄乌冲突的多重影响

俄乌冲突与国际局势：回顾与展望（之二）

李自国 尚月 孙超 万青松

【内容提要】俄乌冲突持续，给欧亚地区和整个世界秩序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和深远的影响。俄乌双方在冲突爆发后进行了六轮谈判，在技术性问题上有所收获，但没有取得实质性突破。国际上越来越多的国家劝和促谈，但美国希望通过这场冲突纾解内部矛盾，强化同盟体系，这是这场冲突发生与持续的重要原因。国际秩序进入动荡变革期，俄罗斯认为主权至关重要，自身在这一时期扮演重要角色，并且尝试在这一时期塑造新的国际格局分野，以形成有独特自我意识的文明与“俄罗斯世界”。俄罗斯的这些国际秩序观在一定程度上塑造着俄乌冲突之下的国际秩序。这场冲突还引发了大国能源博弈，对能源安全、粮食安全、全球经济复苏、国际金融体系稳定构成巨大冲击，也对能源转型、绿色议程产生消极影响。作为全球能源出口大国的俄罗斯在评估全球能源变局的现实与潜在影响的基础上，主动采取了一系列内外应对举措：在欧洲方向，继续维持对欧能源供应；在中东方向，重点拓展与能源大国的多样化合作；在亚洲方向，巩固能源出口的亚太传统市场，大力开辟新市场；在欧亚方面，布局构建统一的欧亚能源空间，重点强化欧亚大陆东端、北部方向的能源合作与开发。

【关键词】俄乌冲突 俄乌谈判 国际秩序观 欧亚地区秩序 能源格局

【中图分类号】D815**【文章标识】**A**【文章编号】**1009-721X(2023)03-0068(30)

俄乌谈判：回顾与前瞻

李自国*

俄乌冲突持续一年有余，给世界带来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冲突爆发以来，俄乌双方举行了六轮正式谈判，一度出现曙光，但最终有花无果。危机解决不外乎两条路：政治谈判或战场完胜。现战事胶着，表明战场上双方都难以彻底战胜对方。谈判是解决危机的唯一正确道路。

一、俄乌谈判进程和阶段性成果

俄乌冲突爆发后，双方共进行了六轮谈判，前三次在白俄罗斯境内举行，后三次主要在土耳其斡旋下举行，之后进入隔空喊话阶段。谈判虽无实质性突破，但在技术性问题上有所收获。

（一）谈判进程

在白俄罗斯境内的谈判始于2022年2月28日，3月7日结束，共举行了三次。2月24日，俄对乌发起特别军事行动。25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表视频讲话称希望与俄罗斯举行谈判。当时乌军战场压力大，高层对欧美援助的态度和力度心存疑虑，希望通过谈判争取时间。俄方当即做出回应，称将派国防部和外交部组成的代表团与乌方谈判，地点为明斯克。但乌方反对在白俄罗斯举行会谈，原因是认为俄部分军事行动自白发起，明斯克不适合充当调停地，并提出在华沙等地举行谈判。期间，泽连斯基还请求以色列斡旋与俄罗斯的谈判。匈牙利外长也表示，愿促成双方在布达佩斯举行会谈。

由于战场吃紧，乌方的会谈愿望更迫切，最终同意在白境内会谈。2022年2月28日，双方在白俄罗斯戈梅利州的河边举行了首次谈判。乌方诉求明确：立即停火并撤军。俄方要求包括：乌克兰不加入北约、承认克里米亚归属俄、乌克兰“非军事化”等。谈判持续了5小时，双方听取了对方的“要价”。俄方谈判代表团包括总统助理梅金斯基及国防部、外交部官员，乌方

* 李自国，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亚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代表团级别更高，包括乌克兰人民公仆党议会党团主席阿拉哈米亚、国防部长列兹尼科夫、总统办公室顾问波多利亚克。第二、三轮谈判分别于 3 月 3 日和 7 日在白俄罗斯的别洛韦日森林举行，从俄乌代表会前会后的讲话可以看出，双方基本诉求没变，但有妥协迹象：俄方要求乌将不加入任何联盟写入宪法；乌方表示在领土和主权问题上绝不让步，但愿意考虑“不加入北约”。

第四轮谈判在土耳其的安纳托利亚举行。2022 年 3 月 10 日，两国外长首次举行直接对话。乌方要求立即停火、改善人道主义状况和撤军。据乌媒透露，俄方提出六点要求：一是乌放弃加入北约，保持中立地位；二是取消所有针对俄语的限制，并赋予其第二官方语言地位；三是承认顿涅茨克和卢甘茨克独立；四是承认俄对克里米亚的主权；五是“去纳粹化”，禁止极端民族主义和新纳粹党派和组织的活动，废除美化纳粹的法律；六是乌克兰“非军事化”，放弃进攻性武器。双方的第五轮会谈以视频形式举行，3 月 15 日开始，持续了大约 10 天。期间，针对俄方的“六个条件”，泽连斯基进行了回应，提出“六个优先”，包括立即停火和撤出俄罗斯军队；保障乌的主权；恢复领土完整；可靠可信的安全承诺等。泽连斯基表示，已做好与普京会谈的准备，但所有妥协都需要全民公决。

第六轮谈判于 3 月 29 日在伊斯坦布尔举行。会后三方都称谈判具有建设性。俄方代表团团长梅金斯基表示，乌方首次展现出准备满足一些重要条件，与俄建立正常睦邻关系的意愿。从双方透露出的信息可以猜测可能达成以下妥协：乌方中立，不再谋求加入北约，但需要公投；俄承诺减少对基辅等地的军事行动；签署向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的国际多边协议；暂时搁置克里米亚问题等。4 月 2 日，双方称正起草相关法律文件，为两国总统会面并签署做准备。但这场有建设性成果的会谈最终却不了了之。梅金斯基指出，乌克兰在与美国商讨后推翻所有谈判成果。俄方由此得出两个结论：一是乌意在通过谈判拖延时间；二是乌克兰当局不具独立性，一切由美国决定。

隔空喊话，重在战场博弈。第六轮谈判结束后未再有新的会谈，双方虽不时放风称准备对话，但实际上军事对抗的烈度不时升级，两国都将在战场上打败对手视为优先任务。随着乌东四地“公投入俄”，谈判空间再度收窄。2022 年 10 月 4 日，泽连斯基批准“关于不可能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谈判

的决定”；11月15日，乌总统在G20峰会上提出“和平十条”，包括俄立即无条件撤军、恢复乌克兰领土完整、惩治罪犯、赔偿战争损失等。

（二）技术性谈判成果

虽然历次会谈未取得实质性成果，但也并非一无所获，主要在三个技术性问题取得了进展。一是建立人道主义走廊。双方多次开启“静默状态”，为平民撤离开通人道主义走廊，减少了人员伤亡。二是交换战俘。双方进行了数十次战俘交换，合计近2000人。在2022年9月21日的换俘中，俄方释放了215名乌方战俘，乌方释放了被捕的反对派领导人梅德韦丘克和55名俄方战俘。在沙特的斡旋下，俄方还释放了10名外国雇佣兵。三是在联合国和土耳其的斡旋下，达成了黑海粮食运输协议，附带效应是黑海军事对抗烈度下降，协议被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称为“希望的灯塔”。2022年7月22日，俄、乌、土耳其及联合国代表签署粮食运输协议，有效期120天。乌克兰恢复经黑海港口出口粮食，任何一方不得袭击运粮船只，乌方船只不得带回武器，并在土耳其接受检查；俄罗斯化肥和农产品不受阻碍地进入全球市场；在伊斯坦布尔成立四方联合协调中心，负责检查和协调。10月底，俄方指责乌军袭击俄运粮船护送船只，称要暂停协议，但经多方努力，协议两次延期。协议增加了全球粮食供给，自实施以来，乌克兰已出口粮食及食品超过2500万吨。^①同时，为避免误伤，俄乌降低了黑海地区的军事对抗烈度。但俄罗斯认为，西方对俄金融、保险、物流等领域的制裁间接限制了俄罗斯的粮食和化肥出口，俄罗斯未同等受益。

二、谈判的前景展望

战场仍在激战，烈度有增无减，双方各有优劣势。俄对乌有明显的军事优势，但对“集体西方”处于劣势，美欧不断通过提高对乌军援的数量和质量对冲俄的优势。美国是谈判的实际操盘手，是决定战与和的关键因素。因此可以说，美俄达成“都无法取胜”共识之时，就是谈判重启之日。

^① “黑海谷物倡议再次延长”，联合国，2022年3月18日，<https://news.un.org/zh/story/2023/03/1116292>

促谈不是美国的选项。美国没有放弃以乌克兰消耗和拖垮俄罗斯的目标。乌克兰是美国低成本消耗对手的新代理人战争模式的试验场，援乌弱俄是美国两党的共同目标，冲突长期化符合美国利益。但政治内斗和控制烈度是影响美国立场的两大因素。拜登政府一直努力防止与俄罗斯直接冲突，包括迅速排除“波兰遭遇导弹误击”与俄有关、淡化处理“黑海撞机”事件等。2023 年 2 月，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提到，美国向乌克兰提供坦克的政策正在将自己引向核战争的边缘，必须“在这场荒谬的战争变得更糟之前结束它”。这些都可以看作是“控制烈度、避免卷入”思想的体现。当美国认为危机正变得不可控时，就会倾向于谈判。美国的国内政治和社会撕裂会影响援乌的力度。2024 年美国将举行总统大选，援乌问题将会越来越被摆到台面上“晾晒”，共和党议员要求对美援乌进行财务审计并导致泽连斯基开展“反腐行动”就是典型案例。随着选举临近，美国国内围绕援乌力度的博弈将增加。总体看，美欧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援乌疲劳症”。根据英国《经济学人》杂志与舆观（YouGov）的民调数据，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人赞成向乌克兰提供财政支持的比例从 2022 年 4 月的 82%和 67%降至 2023 年 2 月的 75%和 39%。^①欧洲情况类似，在支持对乌克兰提供武器和物资援助方面，英国从 2022 年夏天的 68%降至 2023 年 2 月的 65%，法国从 57%降至 48%，意大利从 39%降至 33%。^②“要谈判，要和平，不要武器”的反战社会抗议活动也不时发生。2023 年 2 月，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米利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表示，双方都不太可能在战场上实现各自的军事目标，只有通过谈判达成和平协议才能结束冲突。这说明美国精英知晓如何解决冲突。但美国关注的不是乌克兰的得失和援乌问题，而是综合考虑国内选举、军工集团利益、盟友体系打造、遏制俄罗斯和中国等因素，力求找到最佳平衡点。

欧洲期待和平，但又想借机彻底打垮俄罗斯，消除安全隐患，处于左右为难之境。原本欧洲认为，冷战胜利后俄走向衰落，欧洲安全问题得到基本

① See “Ukraine needs the West’s help. But our polling shows a worrying trend”, March 6, 2023, <https://www.economist.com/graphic-detail/2023/03/06/ukraine-needs-the-west-s-help-but-our-polling-shows-a-worrying-trend>

② See “One year on: European and American attitudes to the war in Ukraine”, February 24, 2023, <https://today.yougov.com/topics/international/articles-reports/2023/02/24/one-year-european-and-american-attitudes-war-ukrain>

解决，但特别军事行动及俄推动乌东四地“公投入俄”让欧洲惊怒交加。东欧国家担心，俄若在乌得手，下一步会侵害自己，因此不惜一切代价发起对俄制裁。但危机发生在欧洲，长期化对欧洲是一场灾难。与俄脱钩削弱了经济竞争力，欧洲经济经不起长期的折腾；社会反战抗议不时爆发，执政者持续承压；地缘安全包袱愈加沉重，越发受制于美国，战略自主无从谈起。欧洲的难点在于不能因乌克兰危机让东欧国家没有安全感，从而导致内部分裂。但谋求摆脱困境是欧洲的必然选项，而脱困之路只能是谈判。

乌克兰最不想以谈判方式结束战事。乌克兰损失巨大，但无论多难都必须咬牙顶住。国际层面，争取西方援助的气只可鼓不可泄，一旦谈判开启，西方援乌进度就会放缓；若达成停火协议，哪怕是临时的，都很难再让西方重新振作起来援乌。国内层面，若战场取得些许优势，就会产生彻底打败俄罗斯并夺回所有失地的期待，从而不需要谈判；若战场失利，就无法在谈判桌上争取利益，更难与俄达成妥协。但乌克兰已失去军工能力，枪弹都需外援，没有谈判的主导权，只能根据美国需要调整对谈判的态度，争取少损失。

俄罗斯希望通过谈判按下暂停键，但在积极做两手准备。一方面，俄罗斯已进入准战时经济状态，军工企业全负荷生产，做好长期消耗战的军事和心理准备。普京宣布暂停执行《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也旨在向美施压，促动美国“节制”援助乌克兰的度。另一方面，俄罗斯希望罢战和谈，以缓解经济和外交压力，若停战形成军事分界线，则更有利于民族韧性更强的俄罗斯，“集体西方”的利益诉求多元，更容易产生分歧。

国际社会普遍呼吁缓和紧张局势，期待政治谈判重启。除土耳其继续斡旋外，中国发表了《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中国立场》的外交文件，提出了一套标本兼治的解决方案。习近平主席在与普京总统会谈时强调，越是困难重重，越要为和平留下空间；越是矛盾尖锐，越不能放弃对话努力。沙特方面也表示，已为调解危机做好准备，愿为俄乌对话提供便利条件。

三、结语

谈判是解决危机的唯一途径。对此，各方心里都很清楚。战事胶着，烈

度不减，俄乌战损都很严重，离“都打不动了”并不遥远。国际社会“主张停火止战的和平、理性声音不断积聚”^①，更多国家加入了劝和促谈的行列。美国进入选举周期，欧洲面临更大的反战民意压力。谈判年内重启是可能的。可以从冲突降级区开始，如在联合国斡旋下设立扎波罗热核电站安全区，在重大节日实现临时停火，然后进行停战谈判。战争终会停止，但博弈不会结束。美国需要“敌人”以纾解内部撕裂，强化同盟体系，这是冲突之源。

^① “一次世界瞩目的友谊、合作、和平之旅”，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2023 年 3 月 2 日，https://www.mfa.gov.cn/web/wjzbz_673089/zyjh_673099/202303/t20230322_11047407.shtml

俄乌冲突下俄罗斯的国际秩序观

尚 月*

大国是塑造国际秩序的重要因素，俄罗斯则是世界历史进程中的关键角色。自 2022 年乌克兰危机升级以来，世界秩序和国际关系原则问题重新成为国际政治的争论焦点。作为这场冲突主要当事方的俄罗斯的国际秩序观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释其对内、对外决策逻辑，决定了国家战略发展态势，并在一定程度上塑造着未来的国际秩序。在全球形势变乱交织、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秩序变迁前景不明的重要关口，厘清俄罗斯的国际秩序观有重要意义。

一、国际秩序动荡变革

2023 年 3 月底，时隔七年更新的《俄罗斯联邦外交政策构想》开篇便指出，“人类正在经历革命性变革的时代”。^①实际上，早在 2014 年乌克兰危机发生以后，俄罗斯官方和学界就越来越确凿地认定，西方霸权正在走向衰落却心有不甘、垂死挣扎，是既有国际秩序动荡变革之根源。俄乌冲突后，普京总统多次提到，“单极世界”和西方主导地位已经彻底终结，但国际新秩序的诞生充满风险。

第一，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彻底崩塌。在俄罗斯看来，西方权力是“血腥的、危险的、肮脏的”；“西方全球化的本质是新殖民主义，旨在消除差异、实施金融和技术垄断、加强西方在世界经济和政治中的绝对主导地位”；“西方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已面目全非、荒谬至极”，且不接受任何挑战和反驳。^②最重要的是，西方文明自身创造潜力正在消失，并且抑制、阻止其他文明自由发展。总体看，俄罗斯认为冷战后形成的“单极世界”正在土崩瓦

* 尚月，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亚研究所副所长、副研究员。

① Указ об утверждении Концепции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31 марта 2023 г. <http://www.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70811>

② Заседание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дискуссионного клуба «Валдай». 27 октября 2022 г. <http://www.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69695>

解，二战以来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礼崩乐坏”，而西方 500 年来在国际事务中独领风骚的历史时期早已宣告终结。

第二，全球力量对比急剧变化。俄罗斯认为，美欧实力与信誉俱损。普京在讲话中指出，美国以“上帝大使”自居，只获利不担责；当“鸵鸟”，固执己见无视变化，把西方的主导地位视为“常量”；搞“例外”，强调自身优越感、蔑视发展中国家为“殖民地”；行霸权，将本国道德观、文化观和历史观强加于人，无视各国的独立性和独特性；在经济上惩罚不守规矩、不愿盲从者，对仍未驯服者则百般孤立。欧洲“闻他人之笛而起舞”，彻底沦丧政治主权。一面卑躬屈膝，看美国眼色行事，不惜杀敌一千、自损八百对俄制裁；一面“像十八世纪磨坊里的磨盘”一样，决策机械、迟钝，缺乏灵活性；政党轮流执政只是“掩人耳目的幌子”。未来，失去俄罗斯市场、经营成本上升将导致欧洲全球竞争力和经济增长率全面下降，进一步刺激民粹主义等社会深层矛盾。与此同时，冷战后 30 年来全球新的力量中心不断涌现、作用增强，利益不容忽视，多极化态势日益明显。

第三，国际法规则被恣意践踏。俄乌冲突爆发后，国际法成为俄罗斯与西方激烈斗争博弈的阵地。美欧强烈指责俄“入侵”破坏了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基本准则，国际刑事法院甚至以战争罪对普京发出逮捕令。而在俄罗斯看来，西方作为冷战的“胜利者”，其所谓的“规则”是“难以理解的黑洞”；它取代了国际法，可随意取消和改变。“西方规则”只是服务于“黄金十亿人”需求的“规则”。^①所谓“基于规则的世界秩序”中的“规则”实际是少数国家试图强加于人的规则、标准和规范。^②普京早就对西方肆意践踏国际法高度不满。他指出，美国和西方国家对南联盟空袭、入侵阿富汗、发动伊拉克战争、挑动“颜色革命”、推行北约东扩，都违反了国际法。他曾经质问道：“他们说我们违反了国际法，首先，他们至少还记得有国际法这样一种东西，……其次，最重要的是，我们违反了什么呢？……我们那些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伙伴，在他们的实际政策中，倾向于接受枪炮法则而非国际法指

① См. Заседание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дискуссионного клуба «Валдай». 27 октября 2022 г. <http://www.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69695>

② Указ об утверждении Концепции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31 марта 2023 г. <http://www.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70811>

导。”^①新版《外交政策构想》强调，确保国际关系中的法治是形成公正和可持续世界秩序的基础之一。^②

第四，全球失序罪不在俄。在西方国家，俄乌冲突被视为对国际秩序和西方民主、自由价值观的强烈冲击，俄罗斯则被塑造为引发全球政治经济失序的“罪魁祸首”。对此，普京公开反驳道，“无论俄罗斯干什么，都是克里姆林宫的‘阴谋’”^③。他进一步指出，西方为维系其主导地位不择手段地垂死挣扎才是全球失序的根源。在地缘政治方面，西方玩弄局势，制造紧张，在乌克兰煽动战争，在中国周边进行挑衅。在军事方面，北约试图将其活动范围拓至全球，渗透到亚太地区，欧亚空间被分裂成“排他性俱乐部”和军事集团网络。在经济方面，当前全球通胀高企、粮食危机和能源危机等的根源是美欧长期奉行不负责任的宏观经济政策、无节制排放、无担保债务，是西方“惯于用别人的钱解决自己的问题”的短视行为，是其“改头换面版的隐蔽殖民”。如今，“他们搞砸了一切，却甩锅给俄罗斯”。而“吹风机终将收获风暴”。

第五，秩序之变不可逆转。当前，全球地缘政治、经济、技术、国际关系体系已出现全球性、革命性、结构性、系统性变化，这些变化是根本性、转折性和不可阻挡的。新版《外交政策构想》确信，一个更加公正的多极世界在继续形成。但必须认识到，国际新秩序的孕育和诞生之路将布满荆棘，全球将面临难以预测的各类突发事件，风险和威胁不断上升。普京在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年会上的讲话指出，“全球性危机将影响到每个人，对此不要怀有任何幻想”。

二、国家主权至关重要

国家是国际政治的主体，国际形势的波谲云诡促使各国不断强化各自主

^① Обращение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18 марта 2014 г. <http://www.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20603>

^② Указ об утверждении Концепции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31 марта 2023 г. <http://www.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70811>

^③ Заседание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дискуссионного клуба «Валдай». 27 октября 2022 г. <http://www.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69695>

权。在日趋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下，愈发强烈的国家主权观不仅塑造着俄罗斯政治、经济、社会的方方面面，也深刻影响着俄罗斯与外部世界的互动关系。

主权的重要性前所未有的。普京表示，俄罗斯历史上曾经多次成功捍卫主权，当前正面临主权遭到威胁的挑战。他反复强调“俄罗斯的目标是建设和巩固一个强大的主权国家”^①。在 2023 年的新年致辞中，普京称过去一年是“做出艰难、必要决定的一年”，“是俄罗斯获得完全主权和有力巩固社会的最重要步骤”^②。他进一步指出，当今世界只有主权国家和“殖民地”之分，没有中间地带。在严峻的地缘政治斗争下，只有强大的主权国家才能对构建国际新秩序拥有发言权，否则就注定沦为“殖民地”，“殖民地没有前途，没有机会在这场艰难的地缘政治斗争中生存”^③。

主权的内涵不断扩大。现代意义上的主权包括军事、经济、社会、技术主权等。主权不是片面的、碎片化的，各个要素同等重要，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俄罗斯不仅要确保政治主权和民族身份，而且要巩固一切决定国家经济、金融、人才、技术独立的要素。面对前所未有的西方制裁和脱钩压力，普京认为，2022 年的重要成果是俄罗斯的“经济主权”倍增。俄罗斯高官也多次在不同场合强调“技术主权”的重要性，将掌握关键技术和实现重要经济部门进口替代视为捍卫经济主权的根本。

主权是各国平等合作的前提。在俄罗斯看来，只有真正的主权国家才能构建平等的伙伴关系。软弱、依赖性强的国家则会寻找“敌人”、散布仇外情绪、盲目追随“宗主国”决定。在就北溪-2 号天然气管道被炸接受俄罗斯电视台采访时，普京提到，“欧洲国家领导人受到了恐吓，并且丧失了对主权和独立的意识。德国对管道爆炸的反应，表明它仍然受到‘占领’”^④。普京称，全球有 2/3 的非西方人口，俄罗斯愿意根据平等、相互尊重的原则，

① Пленарное заседание Петербургского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форума. 17 июня 2022 г. <http://www.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68669>

② Новогоднее обращение к гражданам России. 31 декабря 2022 г. <http://www.kremlin.ru/events/president/transcripts/speeches/70315>

③ Пленарное заседание Петербургского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форума. 17 июня 2022 г. <http://www.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68669>

④ Путин рассказал о продолжающейся оккупации Германии США. 14 марта 2023 г. <https://lenta.ru/news/2023/03/14/deokupaciya/>

同一切有意扩大合作的伙伴国加强各领域合作。他重申“全球精英主导的新殖民主义模式已经结束”，“只有真正的主权国家才能确保高增长动力”。

主权根植于历史文化和价值观。在俄罗斯看来，其主权应基于对俄“千年悠久历史”的“不可分割性和完整性”以及俄东正教“强大的精神统一力量”的共同认识。普京曾指出，如果没有这种内在力量，俄将“瓦解得无影无踪，并失去我们的身份”。他在新年致辞中称，“我相信，俄罗斯的成功前进、其主权和国家安全直接取决于我们如何保存历史记忆、精神基础和道德价值观，以及对年轻人进行高标准爱国主义教育”。2023年1月，普京签署法令修订《俄罗斯联邦文化政策基础》，文化主权（культурный суверенитет）首次出现在该文件中。其中提到，“文化主权”是社会文化因素的结合，可以“避免依赖外部影响，免受破坏性的意识形态和信息影响”，并坚持传统的“精神和道德价值观”。^①

西方制裁将促使俄加强主权。俄罗斯认为，过去几十年来，俄主权面临的主要威胁来自美国及其盟友。美国不惜一切代价削弱俄主权，破坏俄政治制度，分裂俄社会，并试图将俄经济撕成“碎片”。俄乌冲突之初，美欧以为俄落后、脆弱，没有经济主权，在世界经济贸易中无足轻重；继而策划对俄发动“经济闪电战”，但俄实际上早有准备，显示出强大的韧性和潜力。当前美欧经济社会问题激化，商品、食品、能源成本飙升，企业竞争力降低。预计2023年欧盟因制裁俄造成的直接损失将超过4000亿美元。而俄罗斯则将通过强化主权变得更加强大。

三、身份角色关键特殊

俄罗斯认为，其历史文化独具特色，发展道路独一无二，注定要在国际秩序的动荡变革期扮演关键而特殊的角色。

当今的俄罗斯联邦是千年俄罗斯的“继承者”。尽管经历蒙古鞑靼入侵、苏联解体等历史断裂和不同国家形态阶段，普京强调，俄罗斯联邦是千年俄

^① Указ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от 25.01.2023 г. №35. 25 января 2023 г. <http://www.kremlin.ru/acts/bank/48855/page/2>

罗斯的唯一合法继承者。他对苏联解体倍感惋惜，称这是“‘历史一脉相承的俄罗斯的解体’。国家因此丧失了 40% 领土、生产力和人口，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一千年来为之奋斗的收获”^①。在俄罗斯精英看来，乌克兰对俄不只是一个邻国，而是俄罗斯历史、文化和精神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俄罗斯在与西方的关系中是“受害者”。俄罗斯在与西方的关系中总是“很受伤”，往往是被动的一方。俄罗斯独立后曾迫切希望融入西方，照搬西方模式重新改造国家。但美国习惯性地将俄视为“失败者”，不仅未在俄罗斯国家转型期施以援手，反而蔑视俄国家利益，趁俄之虚持续北约东扩，并在后苏联空间大搞“颜色革命”。在俄看来，俄美关系每况愈下，主要是美奉行遏俄、弱俄政策的结果。俄罗斯的反西方情绪在很大程度上是寄希望于美欧平等相待、却求而不得的怨恨与委屈。当前，乌克兰成为西方反俄桥头堡，这是事关俄生死存亡的“红线”。俄在寻求与西方进行安全保障谈判无果后，被逼无奈只能奋起反抗，以阻止“侵略”。鉴于此，普京在 2023 年的国情咨文中指责西方国家挑起并推波助澜乌克兰危机，称俄罗斯才是“受害者”。^②

俄罗斯将成为国际新秩序的重要“塑造者”。尽管俄声称仍坚持捍卫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但冷战结束后 30 多年来，其对美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越来越愤懑不满：一是难以忍受西方以冷战“胜利者”姿态自居，在单极霸权体系下奉行遏俄、弱俄政策，导致俄愈加难以与西方平等合作，无法成为世界重要“一极”。二是对美西方单方面定义、修改和使用国际法，挑起和发动多场战争，却采取“双重标准”百般阻挠俄维护国家利益越来越愤怒。三是认为未能深度参与经济全球化，反而逐渐沦为边缘化的“原料附庸”，面临商品竞争力匮乏、非法移民激增等问题。“消除美国和其他不友好国家在世界事务中的主导地位”是俄罗斯外交在塑造国际秩序方面的首要关注方向。对此，俄罗斯著名学者季莫菲耶夫形象地描述道：“2014 年俄罗斯将拳头砸在桌上，2022 年则彻底掀翻了桌

① Путин назвал распад СССР трагедией и «распадом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России». 12 декабря 2021 г. <https://www.rbc.ru/politics/12/12/2021/61b5e7b79a7947689a33f5fe>

② См. Послание Президента Федеральному Собранию. 21 февраля 2023 г. <http://www.kremlin.ru/events/president/transcripts/statements/70565>

子。”^①在俄罗斯看来，其发动的特别军事行动为国际秩序的质变提供了动力。俄外长拉夫罗夫曾直言：“俄罗斯在乌克兰的军事行动有助于将世界从西方的新殖民主义压迫中解放出来。”^②

俄乌冲突的长期化推动百年变局持续深入发展演变，俄罗斯对国际秩序的主张和观念也伴随着这一进程不断调整变化，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扬弃和重塑。在新版《外交政策构想》中，“塑造公正和可持续的国际秩序”是俄罗斯外交政策的首要方向。

首先，俄罗斯正积极塑造新的国际格局分野。俄乌冲突后，俄罗斯迅速以“二分法”看待世界，把全球分为“友好国家”和“非友好国家”；普京反复使用“集体西方”、“非西方”等名词；俄罗斯学界则创造出“集体东方”、“世界大多数”等概念，意在秩序变革期塑造新的国际格局分野。

其次，俄罗斯越来越不受国际组织和国际机制约束。在俄罗斯看来，当前国际组织运行不畅，全球机构退化、国际规则惨遭践踏、美元体系“风雨飘摇”、集体安全原则被恣意侵蚀。出于被迫或自愿，俄罗斯已暂停或终止其在欧洲理事会、波罗的海国家理事会、国际劳工组织、国际工会联合会、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美洲国家组织等一系列国际组织的成员资格。近期，普京主动叫停美俄之间仅存的军控核条约《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暗示“已做好最坏准备”。俄罗斯越来越消极地看待原有国际组织和国际条约的作用，转而更加重视欧亚经济联盟、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等区域性或新兴的国际组织。

再次，俄罗斯肩负着独特的历史使命。新版《外交政策构想》将俄罗斯定义为世界的“主权中心之一”，称它“肩负着确保世界和平发展，维护全球力量平衡和建设多极国际体系的独特历史使命”。与此同时，文件强调了俄罗斯作为“原始国家文明”的特殊地位。^③这意味着在“西方资本主义模式油尽灯枯、人类文明危机四伏”之际，俄罗斯希望作为世界上独树一帜、

① 2022: конец конца истории. 30 декабря 2022. <https://russiancouncil.ru/analytics-and-comments/analytics/2022-konets-kontsa-istorii/>

② Лавров: спецоперация на Украине вносит вклад в освобождение мира от гнета Запада. 30 апреля 2022 г. <https://www.kommersant.ru/doc/5338937>

③ Указ об утверждении Концепции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31 марта 2023 г. <http://www.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70811>

自给自足的文明,将以独特的自我意识,把俄罗斯人民和构成“俄罗斯世界”共同点的其他民族团结起来。

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影响未来国际秩序变革走向的主要力量,中国和俄罗斯在维护和塑造国际秩序方面存在诸多契合点。在 2023 年 3 月习近平主席访俄期间发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深化新时代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指出,“要捍卫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践行联合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发挥核心协调作用的真正的多边主义,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实现世界和平、稳定与可持续发展”^①。但也应认识到,俄罗斯的国际秩序观深受东正教-拜占庭传统、地缘政治考量以及欧亚文明等因素的强烈塑造,中俄由于资源禀赋、民族文化、历史经验和国际身份各异,对于国际秩序深刻变革下一些问题的认识和立场不尽相同。只有直面差异、求同存异、进一步加强协调沟通对表,中俄两国才能更深刻地理解彼此的核心关切,才能携手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公平、更公正和更合理的方向持续发展。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深化新时代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人民日报》,2023 年 3 月 22 日第 2 版。

俄乌冲突与危机中的欧亚地区秩序*

孙 超**

2022年俄乌冲突的爆发，给欧亚地区秩序演进带来了更大的不确定性。欧亚地区被成功“冻结”的军事冲突，未来很可能进入集中爆发期。俄乌冲突以来有关核武器扩散、百万难民迁徙、国际恐怖主义卷土重来、宗教极端主义肆虐等悲观预言，在苏联解体三十年后的今天再度广泛传播。关于欧亚地区未来的讨论异常热烈。尽管存在争议，学界普遍认为俄乌冲突耗尽了俄罗斯在欧亚地区的软实力资源，致使其对外政策从“积极主动”（proaction）不得不转变为“相机而动”（reaction）。一个重大的现实问题呼之欲出：随着俄乌冲突战事持续僵持，欧亚地区秩序会解体吗？

一、俄乌冲突与欧亚地区秩序的变革

俄乌冲突助长了世界的无序化，欧亚地区进入剧烈的动荡变革期。俄乌的持续对抗不仅关乎领土和国家认同等重要主权因素，更牵涉到西方与俄罗斯围绕欧亚地区复杂“棋局”的博弈。冷战后美国下了先手棋，很早就意识到“丢掉了乌克兰”的俄罗斯丧失了大国复兴的“政治和民族特质”，俄乌交恶将使俄罗斯地缘战略选择受到极大限制。俄罗斯国家精英也逐渐发现了这一问题。普京在21世纪初期频繁发起欧亚一体化倡议，期望通过区域一体化合作增强俄罗斯在欧亚地区的影响力，尝试将乌克兰拉回到俄罗斯主导的地区秩序。而美西方不遗余力发起的“颜色革命”攻势及其带来的外溢效应，使一些欧亚国家失去了对俄罗斯倡导的战略合作的兴趣。格鲁吉亚和乌克兰明确表达出脱离独联体、加入欧洲一体化的诉求。欧亚地区出现了两个没有俄罗斯参与的地区组织：古阿姆集团和中亚合作组织，一时形成了俄罗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冷战后欧亚地区民族分离运动比较研究”（项目批准号：19CGJ014）的阶段成果。

** 孙超，中共江苏省委党校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副教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青年研究员。

斯倡导的地区一体化组织和部分欧亚中小国家组建的地区组织并存的局面。

俄罗斯希望通过采用地区安全、经济一体化等模式来改变欧亚部分国家的制衡行为。但这种策略收效甚微，甚至起了反作用。随着俄罗斯周边大国力量的崛起，欧亚各国对地区和国际环境的战略反应更为积极。“颜色革命之后”，乌克兰和格鲁吉亚的国内政治推动精英形成对抗俄罗斯的战略联盟。中亚各国期待更多域外大国介入到地区治理实践，从“大博弈”中获得收益。随着亚美尼亚在第二次纳卡战争中失利，不少国家（甚至包括白俄罗斯）重新思考俄罗斯安全保证的可信度。这些战略偏好推动一些国家放弃跟随地区中心大国的想法，转而去跟随地区边缘势力（如印度、土耳其或欧盟）抑或是全球大国（美国），或利用域外大国进行软制衡。俄乌冲突的爆发进一步加剧了欧亚地区演变的不确定性。

二、俄罗斯重塑欧亚地区主导权：应对新现实

俄乌冲突以来，俄罗斯面临内外压力，尝试制定直面丢失周边的新型战略，设计出一系列新政策以重塑地区秩序。俄罗斯希望通过地区主导优势重建破碎的欧亚地区秩序——重塑以自身为核心的同心圆地区秩序。然而，在国家力量下降和战事久拖不决的现实背景下，这种地区秩序的生产带来的问题将进一步弱化俄罗斯对欧亚地区的影响力。

（一）小多边主义前景不明

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普京多次强调俄罗斯非常重视同邻国以及欧亚经济联盟发展关系。2022 年俄罗斯同欧亚各国经济数据也较为乐观，在农业和制造业领域甚至出现了较大幅度的增长。俄罗斯期待通过改革欧亚经济联盟的经济治理体系，成为世界多极化中的一极。欧亚一些国家与俄罗斯有着共同的苏联历史记忆，这使得它们非常熟识同俄罗斯的合作模式：与俄罗斯的合作并不在于要达成新的目标和标准，而在于恢复到以前的“状态”，即拥有高度经济合作和政治凝聚力的共同体联盟。^①俄罗斯塑造地区秩序的动力则在于获得对于自身大国地位的国际承认，或者说是恢复俄罗斯的国际声望。

^① See Alexander Libman, Evgeny Vinokurov, *Holding Together Regionalism: Twenty Years of Post-Soviet Integration*,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12, pp.12-13.

因此，相较于俄罗斯完全主导的安全联盟而言，俄罗斯倡导的小多边主义经济政治一体化合作更具有重要性。

尽管小多边主义推动了俄罗斯地区秩序的巩固，但问题在于，不论是欧亚经济联盟还是“大欧亚伙伴关系”的构建，有关国家对俄罗斯的诉求并不热心。这些国家更愿意采取“平衡外交”，在西方国家与俄罗斯之间取得平衡。这种态势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表现得更为明显。甚至有学者尖锐地指出，就连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与俄罗斯在经济和安全领域的合作也是“半推半就”，阻碍俄罗斯主导的一体化升级。^①反对俄罗斯主导的一体化的声音随着北约和欧盟加大对俄制裁而更加高涨，“小多边主义”难以发展成“大多边主义”，甚至欧亚地区的国家关系有恶化为“反美主义”和“反俄主义”对立的倾向。显然，仅靠“小多边主义”已经不能重塑俄罗斯所需的地区优势。俄罗斯在欧亚地区的主导地位无法在这种地区秩序产生模式中较为彻底地体现出来。

（二）俄乌冲突给俄罗斯体制优势带来一定冲击

苏联解体以后，俄罗斯的地区秩序生产的目标不仅在于护持地区权力，更在于维护自身威权政体的稳定和持续性。威权政体的护持被视为俄罗斯提升软权力、增强政治合法性和价值观优先地位的主要路径。对普京而言，俄罗斯面临的主要威胁并非来自美国，而是来自恐怖主义和周边各国由于经济发展缓慢引起的政权衰朽。^②俄罗斯通过三种类型的“联接方案”塑造了周边各国稳定的体制特征：通过俄罗斯人塑造以莫斯科为核心的“俄罗斯文明共同体”；通过贸易互惠与能源互动创造经济上紧密的“相互依赖”；通过建立地区一体化的安全和政治组织实现后苏联空间成员国的“认同一致”。随着俄罗斯对周边地区不断增强的“软实力”攻略，后苏联空间各国受俄罗斯的影响日益增强。普京的支持者们对西方国家的民主化侵袭的“胜利”不仅表现在国家建设上，还表现在俄罗斯成为周边国家抵御西方民主推进的堡垒。普京政权体制稳定的魅力吸引了中亚各国和白俄罗斯等强总统制国家。

^① See Thomas Ambrosio, “Belarus, Kazakhstan and Alliance Security Dilemmas in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Intra-Alliance Threat and Entrapment After the Ukraine Crisis”, *Europe-Asia Studies*, 2022, Vol.74, No.9, pp.1700-1728.

^② Andrei P. Tsygankov, “If not by tanks, then by banks? The Role of Soft Power in Putin’s Foreign Policy”, *Europe-Asia Studies*, 2006, Vol.58, No.7, p.1082.

这些国家希望能够在获得西方经济支持的同时排除“民主化”带来的困扰。俄罗斯将这些独联体国家视为天然盟友，也是其大国地位的源头。在地区政治的合作上，俄罗斯必需创设出一种区别于西方的“自由”。

运用反事实推理，若俄乌冲突在 2022 年快速结束，普京政权的稳定性和魅力将提升，对欧亚各国的政治吸引力也会大幅增强。而现实是，俄乌战事长期僵持，给普京政权带来一定的冲击。以军事强国闻名的俄罗斯没有尽快用军事手段解决国际冲突，却在乌克兰战场陷入了与美国和西方国家支持的乌克兰军队的“缠斗”之中。这不仅出乎普京政权的预料，也出乎俄罗斯社会的预期。当前，俄罗斯的体制安全遭遇到了国际冲突失利的挑战，俄罗斯维系欧亚地区的政治威望在一定程度上遭到流失，这影响到了俄罗斯的地区政治中心地位。

（三）俄罗斯陷入地位与身份焦虑困局

相较于注重国际关系等级制度、控制欧亚大棋局的美国而言，瓦兰德尔（Celeste Wallander）曾评价俄罗斯的地区大战略“既不宏观，也无战略，更不持续”^①。现实情形正如波波·罗（Bobo Lo）所言，现实需要与传统本能之间的张力，到如今仍影响着俄罗斯。^②俄罗斯战略思维正是在对近外地区的观察中逐渐成形的。2012 年普京重新入主克里姆林宫后，确定了国家对外政策的优先顺序和目标，确认了经营近外地区的优先性。^③2014 年乌克兰危机的爆发引发了俄罗斯国家精英的焦虑感。西方的战略挤压使得俄罗斯意识到自身被整合进西方体系的不可能，而这次危机则对俄罗斯重新思考整体国家战略、重塑对外政策的手段和工具起了加速作用。2015 年底批准通过的《俄罗斯联邦国家安全战略》，反映了俄罗斯内在的不安全感，特别是对周边地区以及独联体范围的战略控制力下降的理性观察。^④

① Celeste Wallander, “Domestic sources of Russia’s less-than-grand-strategy”, in Ashley Tellis, Michael Wills, eds, *Strategic Asia 2007–2008: domestic politics, change and grand strategy*, Washington DC: National Bureau of Asian Research, 2007, p.140.

② [英]波波·罗：“两种世界观与世界失序的回归——新霍布斯式想象与俄罗斯外交的功能性失调”，《俄罗斯研究》，2016 年第 2 期，第 63 页。

③ Расширенное заседание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31 января 2013 г. <http://www.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17396>

④ О Стратегии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Указ Президента РФ от 31 декабря 2015 года N 683// Российская Газета. 31 декабря 2015 г.

尽管俄罗斯对自由主义霸权秩序多有不满，但它依然是欧亚地区秩序的维护者。作为主导国，俄罗斯很享受与欧亚各中小行为体构建出来的“关系权威”（Relational Authority）秩序——向独联体国家提供经济与安全公共产品的同时，获得欧亚地区中小行为体对其地区首要大国地位的承认和服从。但其他大国无法体会到俄罗斯作为欧亚地区“主导国”的孤独，正是这种既要维持现状、又要求对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进行变革的诉求造就了俄罗斯的多重身份。^①俄罗斯希望成为西方现有秩序的维系者，谋求与西方大国的合作，乌克兰危机的爆发使其难以达成这一目标。俄罗斯要求地区中小国家尊重自己的主导国地位，这种地位焦虑却随着俄罗斯经济活力的下降而更为严重。俄乌冲突是俄罗斯试图使用武力方式解决欧亚地区主导国家身份危机的尝试，其结果没有达到预期，反而使俄罗斯陷入更大的身份焦虑。俄罗斯战略在“转向东方”和“直面西方”之间摇摆，地区战略调整一时难有结果。

三、欧亚地区的未来

俄乌冲突的爆发是俄罗斯地区秩序生产危机的体现。俄罗斯担心乌克兰急切寻求“身份退化”转而投入美西方的怀抱，担忧美西方利用此次冲突重塑欧亚地区秩序。从当前战事来看，俄罗斯陷入了一种“危机情势”——反美主义无法号召欧亚各国，却带来了欧亚地区的碎片化风险。俄罗斯当前迫切需要更新权力资源、开拓新的路径来重新获得欧亚各国的支持。

欧亚地区各国战略的多样性也为域外大国争取欧亚小国更多合作创造了机会。中国完全可以顺应这一形势推动与欧亚各国的双边和多边合作，提升包括同俄罗斯在内的欧亚各国的良性关系。例如“一带一路”倡议在欧亚地区的拓展，不仅扩大了中国与欧亚各国在政治、经济等多方面的联系，建立起多线条的互动。同时，这也有助于俄罗斯修复欧亚秩序，解决离心力和碎片化问题。从中长时段观察，俄乌冲突降低了俄罗斯欧亚地区权力投射能力，一些国家作为欧亚地区成员的身份存在退化的风险。除非俄罗斯快速采取行动，俄罗斯主导的欧亚地区秩序瓦解的可能性增加。

^① See Vladislav Surkov, “The Loneliness of the Half-Breed”, May 28, 2018, <https://eng.globalaffairs.ru/book/The-Loneliness-of-the-Half-Breed-19575>

乌克兰危机下俄罗斯对能源变局的评估与应对

万青松*

乌克兰危机引发的大国能源博弈，既对能源安全、粮食安全、全球经济复苏、国际金融体系稳定构成巨大冲击，也对能源转型、绿色议程产生消极影响。作为全球能源出口大国的俄罗斯（约占 20% 的份额），在评估全球能源变局的现实与潜在影响的基础上，也主动采取了一系列内外应对举措，以确保未来 15~20 年自己在世界能源市场的地位。

一、俄罗斯对能源变局的评估

第一，大国能源博弈更加激烈，以石油美元为基础的国际金融体系遭受冲击。俄乌冲突之前的世界石油市场，在供给端已基本形成美国、沙特和俄罗斯三强并立的格局。这三个国家各自的石油产量都超过 1000 万桶/日，因此，他们采取的产量策略及调整对市场的影响至关重要，从而博弈也异常激烈，其中又以美国政策的外溢效应最为显著。俄乌冲突爆发后，美欧就将制裁矛头对准俄罗斯能源。2022 年 3 月，美英率先对俄罗斯石油实施进口禁令，随后欧盟加入禁止进口、运输和保险俄石油及其产品的行列（西方企业占全球海运保险业 90% 以上的份额）。与此同时，为大幅减少俄罗斯能源收入，并以此影响俄罗斯继续展开军事行动的能力，七国集团（G7）、欧盟和澳大利亚为俄罗斯原油设置了每桶 60 美元的价格上限。此外，“北溪-1”号、“北溪-2”号天然气管道被炸也成为俄罗斯与西方不断升级能源博弈的新的引爆点。俄罗斯采取了一系列回应策略，包括将与“不友好国家”的石油天然气贸易转为用卢布结算、打“折扣牌”、主动降低产量、修改石油税收法案、强化与“欧佩克+”成员国协调等，普京总统还签署法令，禁止根据

* 万青松，华东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副研究员，上海市高校智库周边合作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科研主管、研究员。

包含价格上限固定机制的合同交付俄罗斯石油。

表面上看，美国成为“最大”赢家，2022年美国对欧洲能源出口增加了2.4倍，占据了40%以上的欧洲市场。^①美国能源公司准备以约0.38美元/立方米的价格与欧洲国家签署10~15年的天然气供应的长期合同，试图迫使俄罗斯“完全”退出欧洲天然气市场。但另一方面，这些对俄罗斯能源的禁运和价格限制措施加速了金融脱钩，为打造非美元金融生态系统提供了推动力。

第二，欧洲能源完全“去俄罗斯化”并不现实，能源危机将会持续。俄乌冲突导致欧洲被迫“切割”对俄能源依赖，承担了严重的损失和代价。虽然取代俄罗斯能源也不是完全不可行，但由于欧盟成员国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程度不同，完全将俄罗斯从欧盟能源贸易中挤出也将是一个长期过程。与此同时，欧洲国家在天然气和电力市场规划、能源转型进度方面存在的政策失误，以及欧盟和英国对俄罗斯能源的全面制裁与俄罗斯的反制裁，已经使欧洲多国陷入严重的能源危机。在此背景下，继续执行减少能源消费、改革电力市场（重点是电价与天然气价格脱钩）、创建氢燃料市场和加强家庭废物管理等，构成了欧盟缓解能源危机的政策选择。

第三，欧洲天然气市场供应紧张，俄罗斯管道天然气替代成本高昂，加速了欧洲“去工业化”。对欧盟而言，虽然取代俄罗斯天然气的选择很多，但实现将在2025年以后，甚至到2030年。国际能源署（IEA）预测，2023年欧盟将面临570亿立方米的天然气缺口。如果没有找到替代俄罗斯天然气供应的补充气源，2023—2024年和2024—2025年欧洲的秋冬季节将面临更多的困难。^②正是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欧盟在2022年12月正式引入天然气价格上限机制，将其限定在180欧元/兆瓦时，此举有助于保障欧洲能源市场的液化天然气供应。但如果欧盟天然气价格再次上升到210欧元/兆瓦时，欧洲将面临经济急剧下滑的危险。与此同时，根据俄罗斯科学院国民经济预测研究所（INP）的计算，在对欧洲能源供应方面，最可能的情况是，俄罗斯管道天然气供应从2021年的1670亿立方米下降到2025年的400亿立方米，相当于欧洲每年平均减少约4%的消费量，即约4180亿立方米的总

① См. Владислав Гринкевич. Сжиженный контракт// Профиль. 13 февраля 2023 г. №.5-6. С.36-39.

② См. Татьяна Дятел. Встречная мерзлота// Коммерсантъ. 13 декабря 2022 г. №.231. С.1.

量。如果以对德供气的 577 美元/立方米计算，俄罗斯将损失 2400 亿美元；如果以 2022 年管道天然气平均价格为基础计算，俄罗斯将损失 5400 亿美元。那么到 2025 年放弃俄罗斯天然气将使欧洲损失 1~1.7 万亿美元，^①至少是俄罗斯损失的四倍。^②这种损失的对比使人相信，欧洲的“去工业化”是美国在乌克兰危机中的重要政策目标。

第四，虽然气候议程仍是全球能源市场长期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但目前的能源转型陷入新困境。据预测，每年需要花费 3.5 万亿美元的投资，世界才有可能在 2050 年达到净零碳排放。^③2022 年 11 月在埃及召开的第 27 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7 气候峰会）的成果，反映了全球气候议程的重塑。发展中国家开始将重心转移到去碳化和去甲烷化的财力方面，使其气候政策直接依赖于发达国家的财政援助。但迄今发达国家未能兑现每年向发展中国家提供 1000 亿美元以支持其去碳化和去甲烷化努力的承诺。石油和天然气价格的上涨、偿还外债的需要、新冠肺炎疫情的应对等，使得财政空间收缩，迫使发展中国家依靠自己的煤炭储备发展燃煤发电。这使得全球范围内的能源转型所需的时间和成本将大大超出之前的预想。与此同时，欧盟为弥补禁止进口俄天然气、煤炭、石油、石油产品和其他原材料和中间产品的损失，不得不让停运的燃煤电厂重新投入运行，并延长核电站的寿命。2022 年 8 月美国通过的《减少通货膨胀法》，建议联邦政府将超过 3700 亿美元的税收减免和补贴用于支持脱碳和能源基础设施升级，但美国推进的能源转型更多是基于自身需求，同时破坏欧洲公司的竞争优势。即使美国大规模使用工业碳捕集与封存系统，天然气、煤炭和石油也构成开展工业碳捕集与封存系统运行的组成部分。这意味着全球能源转型依然任重道远。

第五，欧洲提出加速与俄罗斯能源“脱钩”，俄罗斯强力推进能源“东转”，欧亚大陆的能源格局正在被重塑。欧亚大陆的丰富资源，大部分位于

① 彭博新闻社的预测是损失约 1 万亿美元，参见“Europe’s \$1 Trillion Energy Bill Only Marks Start of the Crisis”，December 18, 2022, <https://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22-12-18/europe-s-1-trillion-energy-bill-only-marks-start-of-the-crisis>

② См. Анатолий Комраков. Газовый ущерб для Европы оказался в разы больше, чем для России// Независимая газета. 21 ноября 2022 г. №.255. С.4.

③ See Suryaputra Wijaksana. “Russian oil price cap accelerates global economic decoupling”, January 27, 2023, <https://www.eastasiaforum.org/2023/01/27/russian-oil-price-cap-accelerates-global-economic-decoupling/>

俄罗斯，或依赖其运输和物流能力，俄罗斯显然扮演着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乌克兰危机之前，欧盟已经宣布逐渐放弃石油、天然气等燃料进口，转向发展可再生、绿色清洁能源，甚至宣布对俄征收碳税来加快“去碳化”进程。乌克兰危机以来，即使面临能源危机加剧、能源市场波动，欧盟也不顾替代俄罗斯能源方案的可靠性、成本效益和额外风险，提出加速与俄罗斯能源“脱钩”的进程。此举也迫使俄罗斯将自己的能源供应转向东方，开拓亚洲市场，尤其是注重深化与中国、印度等国的能源合作。俄罗斯对能源“东转”力度的强化，不仅会打破自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建立在苏联和西欧国家之间日益广泛的石油和天然气合作基础上的欧亚能源格局，也将为中俄深化能源合作提供新机遇。^①

二、俄罗斯采取的应对举措

针对乌克兰危机导致的全球能源领域的上述短期与中长期变化及其产生的内外影响，依据能源出口的不同重点方向，俄罗斯有针对性地采取了一系列应对举措。

（一）欧洲方向，继续维持对欧能源供应

第一，维持对欧的液化天然气供应。欧盟并没有对俄罗斯的液化天然气禁运，在 2022 年欧洲购买的所有液化天然气中，俄罗斯的供应增加了近 20%，达到 1580 万吨（2021 年为 1320 万吨），成为继美国、卡塔尔之后的欧盟第三大液化天然气供应方。俄罗斯官方宣布，到 2030 年，液化天然气产量将从 2022 年的 3250 万吨提升到 1 亿吨，并打算将大部分液化天然气销往欧洲市场。

第二，通过管道石油供应维持对欧洲的石油出口。虽然美欧对俄罗斯石油实施禁运，但对管道石油供应则是网开一面的。保加利亚、匈牙利和斯洛伐克通过德鲁日巴输油管道接收原油，这些国家也被允许出口俄罗斯石油产品。据统计，2022 年，斯洛伐克从俄罗斯进口了超过 600 万吨的原油和石油

^① См. Федор Лукьянов. Эмбарго против глобализации// Российская газета. 1 июня 2022 г. №.116. С.1.

产品，匈牙利接近 450 万吨，保加利亚超过 300 万吨。在欧盟对俄石油禁运正式生效之前，欧洲国家进口俄罗斯石油同比增加了 7%，达到 3840 万吨。其中，德国进口 1510 万吨，波兰 890 万吨，捷克 420 万吨。2022 年 12 月，俄国家石油管道运输公司总裁托卡列夫表示，波兰和德国已经提交了 2023 年的购油标书。最新数据显示，仅 2023 年第一季度，欧盟国家从俄罗斯进口石油就达 485 万吨。^①

第三，打造对欧输气的“南方天然气走廊”。2022 年 9 月“北溪-1”号和“北溪-2”号天然气管道被破坏后，俄罗斯提议在土耳其建立新的天然气国际枢纽，通过扩建“土耳其流”分支、扩充“巴尔干流”等方式继续向欧洲“不友好”国家供应燃料。2022 年，价值 192 亿美元的 210 亿立方米俄罗斯燃料，通过乌克兰天然气传输系统输送到希腊、匈牙利、罗马尼亚、斯洛伐克、奥地利和意大利等国，乌克兰也获得了超过 13 亿美元的过境费收入。同时，俄罗斯也有意借助阿塞拜疆扩大对欧供气。2022 年 7 月，欧盟与阿塞拜疆签署能源合作备忘录，规定到 2027 年供应量增加到 200 亿立方米（2021 年阿塞拜疆对欧出口量为 82 亿立方米）。阿塞拜疆显然没有足够气量，可行的办法是通过进口俄罗斯天然气来补充。

（二）中东方向，重点拓展与能源大国的多样化合作

第一，通过与沙特开展双边和多边合作，联手稳住全球石油市场的供需平衡。双边层面，沙特扩大进口俄罗斯石油产品，同时腾出本国石油出口欧洲；多边层面，沙特顶住美国的强大压力，强化与俄罗斯在“欧佩克+”机制下的协调，保障全球能源市场的平稳。

第二，与伊朗签署能源合作备忘录，既缓解俄伊之间的能源竞争，应对反俄制裁导致的能源市场变化，同时将俄伊能源合作具体化，包括扩大对伊朗核心经济领域的投资，商定两国油气销售政策，帮助伊朗开发气田，在能源交易中使用本币结算等。2022 年 10 月，俄伊达成一项 440 亿美元的协议，涉及油气交换、气田开发、管道建设等。

第三，寻求阿联酋参与俄罗斯液化天然气项目。俄罗斯诺瓦泰克

^① См. Игорь Наумов. Что продолжают покупать у России недружественные страны. 17 мая 2023 г. <https://profile.ru/economy/neft-gaz-uran-udobreniya-chno-pokupajut-u-rossii-nedruzhes-tvennye-strany-1323719/>.

（Novatek）公司计划在北极建造三条液化天然气生产线，每条生产线的年产能可达 660 万吨，但执行合同的法国德希尼布（Technip）和意大利塞班（Saipem）（全球前二的海洋油气工程公司）因制裁风险暂停参与项目。俄方通过更换阿联酋承包商来寻求采购必要的设备，以减少反俄制裁对北极液化天然气项目的影响。

（三）亚洲方向，巩固能源出口的亚太传统市场，大力开辟新市场

第一，稳住与中国、印度的能源合作，并拓展新的供应增长空间。乌克兰危机以来，俄罗斯成功地将大部分对欧石油出口转向中印。2022 年，中印成为俄罗斯石油的前两大进口国，两国的购买量分别为 8625 万吨和 3340 万吨。俄罗斯还成为继土库曼斯坦、澳大利亚之后的中国第三大天然气供应商。近期，俄副总理诺瓦克表示，2023 年对华能源供应将增长 40%。俄方也从自己的东部港口向印度运输石油，并寻求通过参与土库曼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TAPI）管道的建设，实现对印输气。与此同时，扩大能源交易本币结算。诺瓦克表示，2022 年以来中俄以本币结算的能源比重增加了 64%；印度能源公司也尝试改用阿联酋迪拉姆支付购买俄罗斯石油的费用。

第二，多举措解决俄石油出口亚洲的物流问题。早在西方对俄石油制裁生效前 6 个月，俄罗斯就采取了应对措施，包括在俄罗斯管辖范围内重新登记油轮，并建立自己的保险和再保险公司。通过购买陈旧的运输船组建油轮“影子舰队”，主要通过购买和重新分配为伊朗和委内瑞拉服务的船只来增加 103 艘油轮，据英国《金融时报》的报道，俄罗斯可能已经通过与自己有联系的运营商购买了 29 艘超级油轮（每艘装载能力超过 200 万桶）。^①2023 年 2 月，俄罗斯石油海上出口量增长了 11.6%，达到 336 万桶/日。^②俄罗斯的长远目标是建立自己的保险和物流线路，拓展亚洲能源市场。

第三，打压不友好国家的能源投资商，邀请友好国家参与能源项目。俄政府决定改变“萨哈林 2 号”的运营商（英国、日本），将其纳入俄罗斯的管辖范围。俄罗斯国家杜马还通过一项法律，要求在俄罗斯拥有油田许可证

^① See “Russia assembles ‘shadow fleet’ of tankers to help blunt oil sanctions”, December 2, 2022, <https://www.ft.com/content/cdef936b-852e-43d8-ae55-33bcbbb82eb6>

^② См. Дарья Савенкова, Василий Милькин. Экспорт нефти по трубопроводу «Дружба» в феврале снизился втрое// Ведомости. 24 марта 2023 г. <https://www.vedomosti.ru/business/articles/2023/03/24/968071-eksport-nefti-po-truboprovodu>

的外国公司将其转让给俄罗斯的法律实体。法律规定，如果相关生产项目中拥有 25% 以上股份的俄股东提出要求，就可以强制执行转让。同时，俄罗斯面向中国、印度、越南等友好国家寻求合作伙伴，重点解决石油技术与融资问题。

第四，打造扩大对亚洲能源出口的基础设施。在西方制裁压力下，俄罗斯的迫切任务是加速发展远东能源基础设施，包括液化天然气工厂，并提高远东运输范围和边境口岸的能力。此外，俄政府计划延长从科维克塔油田到伊尔库茨克的 1400 公里长的管道和萨哈林-哈巴罗夫斯克-符拉迪沃斯托克的输送线。从克麦罗沃到伊尔库茨克的近 1500 公里的管道将作为“西伯利亚力量 2 号”干线管道建设的一部分。这些路线预计可以在五年内完成铺设，但这些项目面临资金短缺问题。

（四）欧亚方面，布局构建统一的欧亚能源空间，重点强化欧亚大陆东端、北部方向的能源合作与开发

第一，谋划构建统一的欧亚能源空间势在必行，其抓手将是“大欧亚能源伙伴关系”。全球能源转型正处在新的阶段，俄罗斯专家认为本国能源发展应该重点依靠三大市场：欧洲、亚洲和欧亚内陆，并将三个市场连接成统一的欧亚能源空间，再加上出口液化天然气，构成俄能源战略的新布局。^①在欧洲，俄罗斯作为欧盟初级能源资源的主要供应方，增加天然气出口到欧洲的技术能力仍然存在，因此需要寻求继续留在欧洲能源市场的新方式；在亚洲，“转向东方”将被视为加强东部能源布局的载体；在欧亚内陆，欧亚经济联盟将是俄罗斯打造欧亚能源空间的基础。这意味着，俄罗斯的对外能源布局正在从之前重点塑造作为欧洲能源供应大国的身份定位，转变为谋划与能源合作伙伴共同构建统一的欧亚能源空间。其中，“大欧亚能源伙伴关系”^②可以构成俄罗斯推进能源新布局的抓手。

第二，强化与中亚国家的天然气合作，倡议构建俄、哈、乌“天然气联盟”。2022 年底，哈萨克斯坦与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Gazprom）签署了

① См. Андрей Конопляник. Великий перелом в мировой энергетике// Эксперт. 23 января 2023. №4. С.54-57.

② Россия как цивилизация цивилизаций. Круглый стол СВОП// Совет по внешней и оборонной политике. 19 мая 2023 г. <https://svop.ru/meeting/47029/>

一份天然气工业合作路线图，重点在天然气运输系统的现代化、哈北部和东部地区的气化服务、增加俄罗斯对第三国的能源运输量以及在奥伦堡加工哈萨克斯坦天然气等方面开展合作。2023年1月，乌兹别克斯坦也与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签署了一份路线图协议，俄罗斯既向乌兹别克斯坦国内供气，也能助力乌国向中国出口更多天然气。俄罗斯还强化了与土库曼斯坦之间的天然气合作，并表示愿意参与TAPI管道建设。此外，俄罗斯还向乌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提议建立“天然气联盟”。土库曼斯坦也是“天然气联盟”的合作对象。但俄方提出，哈、乌的天然气运输系统需要移交给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管理，这构成了组建“天然气联盟”的现实障碍。

第三，强化北极运油线的开发，“北极航线”将成为俄罗斯出口原料的关键路线。未来两年俄罗斯政府将拨出约40亿卢布（约合5000万美元）用于发展北极航线，并计划将北极航线的货运量从目前的每年3200万吨增加到2024年的8000万吨。预计到2030年，经北极航线的石油转运量将增加到1亿吨。^①在叶尼塞河口规划建设“北部湾”港口（Порт бухта Север），处于北极航线的中间位置，既可以将石油运往亚太，也可以运往摩尔曼斯克、圣彼得堡和欧洲，该港口将成为俄罗斯接收和储存石油的最大码头。

【 Abstract 】 The ongoing Russia-Ukraine conflict has caused great uncertainty and had far-reaching impacts on Eurasia and the entire world order. After the outbreak of the conflict, Russia and Ukraine have held six rounds of negotiations, gaining results on technical issues but no substantive breakthroughs. More and more countries are committed to promoting peace talks, while the United States hopes to ease its own internal contradictions and strengthen its alliance system through this conflict, which is an important reason for the occurrence and continuation of this conflict.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has entered a period of turbulent changes, when Russia believes that sovereignty is crucial and it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trying to shape a new international pattern and to form a civilization

^① См. Анатолий Комраков.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 обновило свои планы в энергетике// Независимая газета. 17 января 2023 г. №.8. С.2.

and a “Russian world” with a unique sense of self. To a certain extent, Russia’s views of international order shape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against the Russia-Ukraine conflict. The conflict has also triggered an energy game among major countries, which has huge impacts on energy security, food security, global economic recovery, stability of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ystem, energy transition and green agenda. As a major global energy exporter, Russia, on the basis of assessing actual and potential impacts of global energy changes, has taken the initiative to take a series of internal and external countermeasures. In Europe, it continues to maintain energy supplies. In the Middle East, it focuses on expanding diversified cooperation with major energy exporters. In Asia, it consolidates the traditional Asia-Pacific market for energy exports and vigorously opens up new markets. In Eurasia, it aims to build a unified Eurasian energy space, focusing on strengthening energy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in the east and north of the Eurasian continent.

【Key Words】 Russia-Ukraine Conflict, Russia-Ukraine Negotiation, Views on International Order, Eurasian Regional Order, Energy Pattern

【Аннотация】 Продолжающийся конфликт между Россией и Украиной привнес большую неопределённость и далеко идущие последствия для евразийского региона и всего мирового порядка. После начала конфликта Россия и Украина провели шесть раундов переговоров и добились определённых результатов по техническим вопросам, но не смогли добиться существенных прорывов. Все больше и больше стран в мире выступают за мирные переговоры, но США надеются с помощью данного конфликта разрешить внутренние конфликты и укрепить систему альянсов, что является важной причиной возникновения и продолжения данного конфликта.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й порядок вступил в период потрясений и перемен. Россия считает, что суверенитет имеет решающее значение и играет важную роль в данный период, она пытается сформировать новый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й порядок, чтобы создать цивилизацию и «русский мир» с

уникальной самобытностью. В определённой степени эти российские взгляды на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й порядок формируют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й порядок в условиях конфликта между Россией и Украиной. Данный конфликт также спровоцировал энергетическую игру между крупными державами, оказывает огромное влияние на энергетическую и продовольственную безопасность, восстановление мировой экономики и стабильность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 финансовой системы, а также негативное влияние на энергетику и переход к зелёной экономике. Являясь крупным мировым экспортёром энергоносителей, Россия выступила с инициативой принять ряд внутренних и внешних контрмер на основе оценки фактического и потенциального воздействия глобальных энергетических изменений: в направлении Европы – продолжать поддерживать энергоснабжение Европе; в направлении Ближнего Востока – ориентироваться на расширение диверсифицированного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с крупнейшими энергетическими странами; в направлении Азии – укреплять традиционный Азиатско-Тихоокеанский рынок экспорта энергоносителей и активно открывать новые рынки; в отношении Евразии – строить единое евразийское энергетическое пространство, ориентируясь на укрепление энергетического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и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я на востоке и севере Евразийского континента.

【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 Российско-украинский конфликт, российско-украинские переговоры, концепция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порядка, евразийский региональный порядок, энергетическая модель

（责任编辑 宋羽竹）

俄乌冲突背景下英国对俄罗斯的外交政策新变化

李冠杰*

【内容提要】进入 21 世纪以来,英俄关系经历了从合作到对抗的巨大转变。俄乌冲突爆发前,英国已经把俄罗斯视为“最严重的直接威胁”。俄乌冲突爆发后,已经恶化的英俄关系彻底决裂,英国选择援乌抗俄,在战场之外深刻影响着俄乌冲突的发展。英国向乌克兰提供大量武器装备,采取多种方法鼓舞乌军士气,提供情报助乌克兰前线作战,在信息战和数字战中使俄罗斯付出代价。英国实施对俄经济制裁,冻结在英国的俄罗斯国有资产和个人财产,分阶段实施对俄经济全面脱钩,并设法运用被冻结的俄罗斯在英资产帮助乌克兰复苏。英国积极参与俄乌冲突旨在大力塑造其自身“正义”形象,依托联盟的力量,进一步提升全球影响力。

【关键词】俄乌冲突 英俄关系 对俄经济制裁 英国对乌援助

【中图分类号】D851.2**【文章标识】**A**【文章编号】**1009-721X(2023)03-0098(32)

2022 年 2 月 24 日,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特别军事行动。英国首相约翰逊即刻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并表示,希望乌克兰能够抵抗,英国不会袖手旁观。^①约翰逊随后向英国人民发表讲话称:“我们的使命非常清晰,即在外交、政治、经济以及最终在军事上,必须让普京这种可怕而野蛮的冒险行动以失败告终。”^②打败俄罗斯成为当前英国外交事务中的首要目标,

* 李冠杰,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英国研究中心智库研究员。感谢匿名审稿人的修改建议!

① See “PM call with President Zelenskyy of Ukraine: 24 February 2022”, February 24, 2022, <https://www.gov.uk/government/news/pm-call-with-president-zelenskyy-of-ukraine-24-february-2022>

② Boris Johnson, “Prime Minister’s address to the nation on the Russian invasion of Ukraine: 24 February 2022”, February 24, 2022, <https://www.gov.uk/government/speeches/prime-minister-address-to-the-nation-on-the-russian-invasion-of-ukraine-24-february-2022>

最直接有效的做法是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英国政府称，2022年英国援助乌克兰共花费了23亿英镑，是世界第二大、欧洲第一大捐助国。^①英国政府对俄乌冲突反应强烈，主动参与其中，但忌惮俄罗斯报复和战事扩大，不愿直接兵戎相见，坚持把冲突控制在乌克兰境内。

那么，英国政府的对俄政策和积极援乌抗俄的原因是什么？本文将阐释英俄关系变化的内在动因，分析俄乌冲突爆发后英国的对俄政策，纠正英国对外政策是美国政策副产品的错误观念，探究英国干涉俄乌冲突的真正目的。

一、从与俄合作到对俄斗争

（一）特工被杀成为英俄合作转折点

近代以来，英俄作为欧洲主要大国，双方的对外政策共同塑造着欧洲政治格局。1553年，俄国沙皇伊凡四世接见前来莫斯科的英国探险家钱塞勒。1556年，俄国向英国派遣第一任大使，两国正式建立关系。在过去近500年的交往中，英俄既有生死对抗，也有紧密合作。英国在19世纪初的拿破仑战争、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和21世纪的反恐战争中与俄并肩作战，但也在19世纪中叶的克里米亚战争、20世纪的冷战、当前的俄乌冲突中将俄罗斯视为敌人或对手。有学者指出，英俄合作是真实的，然而一旦共同危险消除，两国便格外关注各自利益。^②实际上，英国对自身安全的感知不断发生变化，致使其对俄罗斯的定位出现巨大差异，敌友划分是英俄互动的结果。

冷战结束后，美国、西方国家与俄罗斯之间的利益争夺有所缓解，经济全球化促使国家间加强合作。在此情形下，英俄之间的矛盾逐步缓解，双方开始尝试接触。

“9·11”事件发生之后，英俄之间出现了合作的机会。2002年，英国首相布莱尔推动建立北约-俄罗斯委员会（NRC），认为“俄罗斯、北美和欧洲面临着很多相同挑战并享有很多相同目标。英国人民不惧怕俄罗斯人民。

^① See Hansard, “Ukraine”, Vol.719, September 22, 2022, <https://hansard.parliament.uk/Commons/2022-09-22/debates/E6B13CEA-33FA-4760-B680-1CFDBA42FFB3/Ukraine>

^② See A. Lobanov-Rostovsky, “Anglo-Russian Relations through the Centuries”, *The Russian Review*, 1948, Vol.7, No.2, p.45.

但英俄人民都惧怕国际恐怖主义的残酷和恶行。……俄罗斯是平等伙伴，我们需要改变思维模式和制度安排”^①。2005 年 10 月，普京访英并参加“眼镜蛇”（COBRA）应急委员会会议，成为出席英国这一安全机制的首个外国领导人。至此，英俄间政治互信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英俄加强安全合作，共同打击恐怖主义，选择全面合作模式，力图使双方收益最大化。

若英俄双方都把国际恐怖主义作为主要威胁，它们之间的安全问题则变得次要。但英俄在加强合作的同时，信任赤字也在增大。2006 年 11 月，英籍前俄罗斯特工利特维年科在伦敦中毒身亡。首相布莱尔表示，对此事的调查“没有外交或政治障碍”^②。但调查并未升级到国家安全层面，而是针对某一涉事人员的调查。2007 年 6 月布莱尔刚一下台，英国政府便下令驱逐 4 名俄罗斯驻英外交官，以示对俄罗斯拒绝引渡“凶手”卢戈沃伊的不满。俄罗斯随后采取对等措施驱逐英国外交官。英国切断与俄罗斯安全机构的联系，双边关系虽是短期的“迷你危机”^③，但因双方未及时解决对方关切和出现严重信任问题，英俄关系模式开始从合作走向对抗。

矛盾在英俄之间形成并逐步升级。对英国来说，利特维年科是英国公民，在伦敦被外国特工“杀害”，不安全感迅速上升。更重要的是，利特维年科死于放射性元素“钋 210”中毒，英国政客和民众无法接受放射性物质在国内出现，社会恐惧陡然增强。英国政府的首要责任是加强安全，保护民众，因此必须对俄罗斯作出强烈回应。俄国政府无法满足英国的“引渡”要求，因为俄罗斯宪法禁止这样做，更何况这是英国单方面的指责。英国政府无法向民众交代，只能采取驱逐外交官的方式示强，而俄罗斯不得不对等反击。

2010 年保守党执政后，英国决策者感到俄罗斯严重影响到英国民众的人身和国家安全，英俄关系进一步从合作走向对抗，因为“追求安全的国家会发现，合作政策的危险要大于竞争的危险”^④。英国政府必须认识到对俄

① Tony Blair, “Speech at the Meeting of the NATO-Russia Council”, May 28, 2002, https://www.nato.int/cps/en/natolive/opinions_19840.htm

② “No barrier to Litvinenko investigation, says Blair”, *The Guardian*, November 28, 2006,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06/nov/28/russia.italy>

③ 潘兴明：“英俄纷争问题探因”，《俄罗斯研究》，2008 年第 2 期，第 88 页。

④ Charles L. Glaser, *The Logic of Competition and Coopera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0, p.56.

合作的危险，有责任制定一套有效对付俄罗斯的方案。

（二）俄罗斯公投逻辑破坏英式民主

全民公投是一种直接民主形式，虽然选民群体存在“没有批判精神、轻信、易怒并且头脑简单”^①等弊端，但21世纪初英国等欧洲国家都在广泛使用全民公投来提升民众的政治参与力度。冷战结束后，俄罗斯开始向西方体系和规则看齐，但英国对俄罗斯使用规则的手法不满意，认为俄罗斯是在破坏国际规则和惯例，威胁到了英国的国家安全。

2014年3月11日，克里米亚宣布独立，举行公投后于18日正式脱乌入俄。英国首相卡梅伦在克里米亚公投前就宣称它是“非法的”，在公投发生后表示它是在俄罗斯“枪炮威胁下的公投闹剧”^②。英国极力反对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其国内正在开展有关苏格兰是否独立的公投。英国政府担心事关国家安全的苏格兰公投有可能因此被搅乱。为避免人们把克里米亚公投和苏格兰独立公投视作同类，英国政府急速澄清，通过五个问题把二者区分开来。^③庆幸的是，当时距离苏格兰公投还有半年，英国政府有足够的时间消除克里米亚公投的负面影响。

英国首相卡梅伦在克里米亚公投当天发表声明说：“普京总统企图将克里米亚纳入俄罗斯版图的行为是对国际法的公然破坏，并且让整个欧洲大陆的人们不寒而栗。英国需要稳定安全的国际秩序。这种秩序依靠一套规章制度作为保障。”^④在英国看来，自己信赖的国际规则被俄罗斯破坏了，自身的不安全感增强，需要采取措施应对。2014年4月，英国外交大臣黑格在议会指出，“英国国家利益在于自主的民主乌克兰，在于基于规则的国际体系。出于这两点考虑，现在需要进一步采取措施，让俄罗斯为自己的行动付出代

① [法]勒庞著：《乌合之众》，冯克利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第131页。

② David Cameron, “PM statement on President Putin’s actions on Crimea”, March 18, 2014, <https://www.gov.uk/government/news/pm-statement-on-president-putins-actions-on-crimea>

③ 俄罗斯把克里米亚公投和苏格兰公投相提并论，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上院议长）马特维延科指出，克里米亚公投“完全符合国际惯例。看一下苏格兰就知道了，……没有人说苏格兰公投是非法的”。参见 Matt Ford, “U.K. to Russia: Crimea Isn’t Scotland”, March 18, 2014, <https://www.theatlantic.com/international/archive/2014/03/uk-to-russia-crim-ia-isnt-scotland/284455/>

④ David Cameron, “PM statement on President Putin’s actions on Crimea”, March 18, 2014, <https://www.gov.uk/government/news/pm-statement-on-president-putins-actions-on-crimea>

价”^①。英国对俄罗斯实施经济制裁和人员制裁，并把俄罗斯从 G8 中剔除。

俄罗斯在克里米亚的行动让英国重新审视过去及未来的对俄关系。利特维年科案再次成为焦点，内政大臣特蕾莎·梅于 2014 年 7 月宣布对其进行公开调查。2016 年 1 月发布的《利特维年科调查报告》指出，“卢戈沃伊毒杀利特维年科之时可能受俄罗斯联邦安全局（FSB）的指示，……俄罗斯联邦安全局杀害利特维年科的行动可能是经帕特鲁舍夫先生和普京总统批准的”^②。英国政府的调查结论直指俄罗斯总统普京。

英国还对来自俄罗斯的威胁进行全面审查，2020 年英国议会情报与安全委员会（ISC）发布的《俄罗斯报告》认为，“俄罗斯对 2014 年苏格兰独立公投开展了影响活动”^③。英国怀疑俄罗斯的行动动机，把俄罗斯看作英国内政的干涉者、制度的破坏者、安全的威胁者。《俄罗斯报告》还认为，“国外势力对我们民主进程的干涉，无论成功与否，都不能当儿戏，……任何对民主的威胁必须被视为严重的国家安全问题”^④。俄罗斯运用公投对乌克兰采取行动间接威胁到英国的国家安全，英俄关系自此深陷困境。

（三）英国国内对俄罗斯威胁的感知不断上升

2018 年发生的前俄罗斯间谍斯克里帕尔中毒案令英国最直接地感受到安全威胁。2018 年 3 月 4 日，斯克里帕尔和女儿在索尔兹伯里市的公共场所中毒昏迷，经及时救治幸免于难。2018 年 3 月 12 日，首相特蕾莎·梅向议会下院做口头陈述时表示，斯克里帕尔所中的毒是俄罗斯研制的“诺维乔克”军用级神经毒剂，若俄罗斯不作出合理的解释，英国政府便认定“这次行动是俄罗斯对英国非法使用武力”^⑤。俄罗斯态度强硬，英国政府认为，

① William Hague, “Foreign Secretary updates Parliament on the crisis in Ukraine”, April 28, 2014, <https://www.gov.uk/government/speeches/foreign-secretary-updates-parliament-on-the-crisis-in-ukraine>

② Sir Robert Owen, “The Litvinenko Inquiry: Report into the death of Alexander Litvinenko”, January 21, 2016, p.246, https://assets.publishing.service.gov.uk/government/uploads/system/uploads/attachment_data/file/493860/The-Litvinenko-Inquiry-H-C-695-web.pdf

③ *The Intelligence and Security Committee of Parliament, Russia*, 2020, p.13, https://isc.independent.gov.uk/wp-content/uploads/2021/03/CCS207_CCS0221966010-001_Russia-Report-v02-Web_Accessible.pdf

④ Ibid.

⑤ Theresa May, “PM Commons statement on Salisbury incident: 12 March 2018”, March 12, 2018, <https://www.gov.uk/government/speeches/pm-commons-statement-on-salisbury-incident-12-march-2018>

“俄罗斯极有可能对这次鲁莽卑鄙行动负责”，并采取措施应对“俄罗斯的侵略”。^①因利特维年科中毒案在英国人心中挥之不去，英国政府认为俄罗斯必须对此负责。

此后，英国政府下令驱逐 23 名俄罗斯外交官，中止英俄高层接触，要求禁止化学武器组织到英国调查，与美、法、德一起发表四国联合声明，联合七国集团外长发表声明，寻求北约和欧盟支持，紧急立法打击敌对国家在英国境内活动，冻结俄罗斯国有资产等，这些措施收到了效果。截至 2018 年 3 月 28 日，150 名俄罗斯外交官遭到英国以外的 27 个国家和北约的驱逐。

“俄罗斯对英国发动化学武器袭击”的论调已成定局，英国成功掀起了一波反俄浪潮，“很多国家已感到俄罗斯的恶意破坏行为”^②。俄罗斯强硬回击，关闭英国驻圣彼得堡领馆，禁止英国文化协会在俄活动，对等驱逐英国及其盟友的外交官。英俄在国际舞台针锋相对，双方没有降低冲突的意愿和决心。

在英国本土使用神经毒剂给民众带来严重不安全感，英国政府多次评估事发地的卫生安全状况，认为“持续存在公共卫生风险很低”^③，但事实并非如此。2018 年 6 月底，英国公民查理·萝莉和道恩·斯特奇斯身中诺维乔克神经毒剂，道恩·斯特奇斯不治身亡，英国政府认为她们是毒杀斯里帕尔的特工随意处置神经毒剂的意外受害者。^④2018 年 9 月，英国政府认为参与毒杀行动的是两名隶属于军事情报局(GRU)的俄罗斯公民。2021 年 9 月，英国政府又确认了第三名疑犯。2022 年 3 月，英国政府正式对道恩·斯特奇斯的死亡公开调查。

诺维乔克神经毒剂事件比利特维年科案对英国影响更大，性质更加严重。在英国政府看来，这次“袭击”是俄军事情报局指挥的，属于化学武器袭击，

① Theresa May, “PM Commons Statement on Salisbury incident response: 14 March 2018”, March 14, 2018, <https://www.gov.uk/government/speeches/pm-commons-statement-on-salisbury-incident-response-14-march-2018>

② Boris Johnson, “Foreign Secretary’s Mansion House speech at the Lord Mayor’s Easter Banquet 2018”, March 29, 2018, <https://www.gov.uk/government/speeches/foreign-secretarys-lord-mayors-easter-banquet-speech-at-mansion-house-wednesday-28-march>

③ Theresa May, “PM Commons Statement on Salisbury incident response: 14 March 2018”.

④ See Theresa May, “PM statement on the Salisbury investigation: 5 September 2018”, September 5, 2018, <https://www.gov.uk/government/speeches/pm-statement-on-the-salisbury-investigation-5-september-2018>

且导致英国平民死亡，这考验着英国国防情报体系和英国政府保卫人民的能力。英国必须把俄罗斯列为首要威胁，当作重点防范对象。

英国对与俄罗斯关系的定位发生了巨大变化。在 2010 年英国政府发布《确保英国在不确定时代的安全》报告时，英俄之间虽出现危机，但英国还“正在与俄罗斯建立政治和安全对话机制”^①。2015 年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与战略防御和安全评估》报告认为，“俄罗斯为了确保自认为的利益不惜到处破坏国际合作标准”，与英国存在差异，但英国试图站在俄罗斯的立场上去理解，依然愿意保持与俄罗斯的合作，“会在涉及全球安全议题上寻找与俄合作和接触的方法”^②。2021 年，英国政府发布《竞争时代的全球英国》，明确了对俄罗斯立场，将其看作英国“最严重的直接威胁”，并宣称“在两国关系改善前，英国会积极阻止和抵御来自俄罗斯的各种威胁”^③。

英俄合作不复存在，对抗成为主流。英国动用国家机器和利用国际机制全力抗击俄罗斯，目标是确保不在俄罗斯威胁面前失败。正当英俄加强对抗时，俄乌冲突爆发了，英国积极支持乌克兰，设法打击俄罗斯。

二、深度介入乌克兰军事行动

（一）改变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属性，试探俄罗斯底线

在 2014 年克里米亚脱乌入俄时，英国就开始把乌克兰作为其对外战略布局的重要棋子。英国政府不承认克里米亚公投结果，决定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外交大臣菲利普·哈蒙德表示，“是否向乌克兰提供致命性武器援

① HM Government, “Securing Britain in an Age of Uncertainty: The Strategic Defence and Security Review”, October 2010, p.61, https://assets.publishing.service.gov.uk/government/uploads/system/uploads/attachment_data/file/62482/strategic-defence-security-review.pdf

② HM Government,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and Strategic Defence and Security Review 2015: A Secure and Prosperous United Kingdom”, November 2015, p.18, https://assets.publishing.service.gov.uk/government/uploads/system/uploads/attachment_data/file/478936/52309_Cm_9161_NSS_SD_Review_PRINT_only.pdf

③ HM Government, “Global Britain in a competitive age: The Integrated Review of Security, Defence, Development and Foreign Policy”, March 2021, p.26, p.61, https://assets.publishing.service.gov.uk/government/uploads/system/uploads/attachment_data/file/975077/Global_Britain_in_a_Competitive_Age-the_Integrated_Review_of_Security_Defence_Development_and_Foreign_Policy.pdf

助是每个北约国家的自主决定。英国现在不打算这么做，但保留评估这一立场的权利。……我们的立场很明确，决不允许乌克兰武装力量崩溃”^①。此后，军事援助乌克兰成为英国的长期对外战略。至于是否提供进攻性或致命性武器，英国将视情况而定。

英国政府一开始向乌军提供的武器不多，且都是非致命性武器。截至2017年底，英国政府共向乌克兰提供了价值220万英镑的装备。^②但这只是战术试探性开始，英国正深度参与乌克兰的国防能力建设。

2016年3月，英乌两国签署了为期15年的防务合作备忘录，强调在军备上加强合作。2020年10月，在英国脱欧过渡期结束前，英乌签订了《政治、自由贸易和战略伙伴关系协定》，共同致力于基于共同价值的政治和经济合作、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对话框架、完全尊重乌克兰主权和领土完整并和平解决俄罗斯敌对行动造成的冲突、不承认俄罗斯兼并克里米亚、在安全防务领域进一步增进密切关系等12个目标。^③英国首相约翰逊表示，“英国是乌克兰最热情的支持者。无论在防务支持、努力维稳、人道援助还是政治问题上的密切合作，我们传递的信息都非常明确：完全致力于维护乌克兰主权和领土完整”^④。英乌战略伙伴关系协定是英国脱欧后积极发展对乌克兰关系的再定位，它使英国在政治、经贸、军事等领域全方位介入乌克兰国内发展进程，按照英国意志塑造着乌克兰各项改革的方向。

增强乌克兰的武装和防卫能力，使其能够抵御俄罗斯的进攻，这是英国政客们认为必须要做的事情，并进一步促使英国政府长期致力于发展乌克兰的陆军、海军、空军力量。除定期派员赴乌克兰为其训练陆军人员外，英国还有意扶持乌克兰的海军力量。尤其在2014年乌克兰海军遭受重创、克里

^① Hansard, “Ukraine”, Vol.592, February 10, 2015, <https://hansard.parliament.uk/commons/2015-02-10/debates/15021030000001/Ukraine>

^② See “Ukraine: Military Aid: Question for Ministry of Defence”, December 8, 2017, <https://questions-statements.parliament.uk/written-questions/detail/2017-11-29/116422>

^③ See “Political, Free Trade and Strateg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between the United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 and Northern Ireland and Ukraine”, January 25, 2022, pp.4-5, https://assets.publishing.service.gov.uk/government/uploads/system/uploads/attachment_data/file/1046491/TS_1.2022_UK_Ukraine_Political_Trade_Strategic_Partnership.pdf

^④ Boris Johnson, “PM reaffirms the UK’s staunch commitment to Ukraine’s sovereignty”, October 8, 2020, <https://www.gov.uk/government/news/pm-reaffirms-the-uks-staunch-commitment-to-ukraines-sovereignty>

米亚总部丢失、海上力量亟待重建之时，英国政府设法帮助乌重建海军。

2020 年 10 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到访英国朴次茅斯海军基地，并与英方签订了提升乌克兰海军能力的备忘录。英国有意为乌克兰建造船只。2021 年 6 月，英国国防部、乌克兰国防部和英国军工巨头巴布科克国际集团公司签署合同，致力于向乌克兰出售导弹并整合乌克兰海军巡航平台；研发并联合生产 8 艘快速导弹舰；在黑海建立乌克兰新的海军主基地，并在亚速海建立新基地；向乌方提供 1 艘护卫舰和 2 艘桑当级扫雷艇。^①英国还向乌克兰提供 17 亿英镑贷款，用于购买这些军事装备。出于战略考量，英国政府对乌克兰的海军援助以防守性武器装备为主。

2021 年 12 月，英国政客密切关注俄罗斯军队在乌克兰边境集结的情况，他们讨论局势变化，并考虑向乌提供防御性武器。2022 年 1 月 17 日，英国国防大臣华莱士在议会下院确认，英国正在向乌克兰提供轻型反装甲防御武器系统，这些武器是短程的、战术性的，而非战略性的，如果俄罗斯坦克入侵乌克兰，它会成为防御机制的一部分。^②1 月 30 日，英国政府承认已在月初向乌克兰提供了 2000 枚反坦克导弹并派遣了军事培训人员。此后英国政府开启武器援助乌克兰进程，不断升级武器种类和数量，从防御性武器到进攻性武器都源源不断送到乌克兰战场。

截至 2022 年 9 月，英国政府向乌克兰送去了 1 万余枚反坦克导弹、近 200 辆装甲车、2600 枚反结构弹药、10 万发火炮弹药、300 万发轻武器弹药、28 门自行榴弹炮、36 门轻型火炮等。^③

英国政府援助乌克兰军队的努力并未停止。2023 年 1 月 16 日，英国国防大臣华莱士在议会下院谈到乌克兰局势时指出，英国要帮助乌克兰在下一个阶段占据上风，必须在外交、经济和军事上加速对俄施压，下一步将向乌克兰提供一个挑战者 2 型坦克中队、AS90 榴弹炮、10 万发炮弹、数百枚精确

① See Ministry of Defence, “UK signs agreement to support enhancement of Ukrainian naval capabilities”, June 23, 2021, <https://www.gov.uk/government/news/uk-signs-agreement-to-support-enhancement-of-ukrainian-naval-capabilities>

② See Hansard, “Ukraine”, Vol.707, January 17, 2022, <https://hansard.parliament.uk/common/s/2022-01-17/debates/D2172B47-1A59-4F2B-9B1A-83779CBC84FE/Ukraine>

③ See Hansard, “Ukraine”, Vol.719, September 22, 2022, <https://hansard.parliament.uk/Commons/2022-09-22/debates/E6B13CEA-33FA-4760-B680-1CFDBA42FFB3/Ukraine>

打击的导弹等。^①英国不但自己积极向乌克兰提供进攻性武器，还拉动北约国家共同行动。2023年1月19日，英国、波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丹麦、捷克、荷兰和斯洛伐克9国在爱沙尼亚首都塔林发表联合声明，决定向乌克兰捐赠主战坦克、重炮、步兵战车等重型武器，支持乌克兰反守为攻，确保乌克兰取得战场胜利，^②各国分别列出武器捐赠清单。在战略战术配合下，英国对乌克兰武器援助成功实现了从防御性到进攻性的转变。

（二）通过多渠道、多方式鼓舞乌克兰战斗

英国极力避免自己的军队卷入俄乌冲突，不愿与俄军在战场上直接对抗，这一决策在冲突爆发前已经作出。2022年1月17日，英国国防大臣华莱士在议会下院表示，“实话实说，俄罗斯拥有欧洲最强大的武装力量，乌克兰并非北约成员国。在此情形下，让英国武装部队单独与乌克兰军队并肩作战，这不切实际”^③。英国不敢与俄罗斯兵戎相见，便于2月中旬撤出了所有在乌克兰进行军事培训的英国军人。

自2015年开始，英国便通过“轨道行动”（Operation Orbital）项目为乌克兰培训军事人员。这些项目起初主要集中在提升乌克兰陆军在医疗救治、后勤、军事行动规划、新兵训练等军事技能上，英国的核心战略是授之以渔，在乌克兰军队中“培训培训师”^④。截至2022年1月，首相约翰逊称英国已培训了2.1万名乌克兰军人。^⑤注重训练和提升乌克兰军人的素质，让其在战场上能抵抗俄罗斯的进攻，这是英国的既定策略。

据估计，俄乌冲突爆发前，乌克兰有现役军人19.66万人，预备役90万人，而俄罗斯现役军人90万，预备役200万人。^⑥起初在这场非对称性冲突

^① See Ben Wallace, “Defence Secretary oral statement on war in Ukraine”, January 16, 2023, <https://www.gov.uk/government/speeches/defence-secretary-oral-statement-on-war-in-ukraine-2>

^② See “Joint Statement – The Tallinn Pledge”, January 19, 2023, <https://www.gov.uk/government/news/joint-statement-the-tallinn-pledge>

^③ Hansard, “Ukraine”, Vol.707, January 17, 2022, <https://hansard.parliament.uk/commons/2022-01-17/debates/D2172B47-1A59-4F2B-9B1A-83779CBC84FE/Ukraine>

^④ Claire Mills, “Military assistance to Ukraine 2014-2021”, *Research Briefing*, House of Commons Library, March 4, 2022, p.3.

^⑤ See Boris Johnson, “PM statement on Ukraine: 25 January 2022”, January 25, 2022, <https://www.gov.uk/government/speeches/pm-statement-on-ukraine-25-january-2022>

^⑥ See IISS, *The Military Balance 2022*, London: Routledge, 2022, pp.211-212, p.193.

中，英国虽竭力武装乌克兰，但并不认为其能抵抗俄罗斯的进攻。英国首相约翰逊曾向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提供庇护，但泽连斯基不愿离境。从英国快速把自己国家的军事人员撤出乌克兰并为泽连斯基提供庇护的事实可见，英国起初认为俄罗斯可能占领基辅，乌克兰政府会垮台。后来形势出现变化，俄罗斯并未击败乌克兰。此刻，英国再次树立起鼓舞乌克兰人民战斗的决心。

2022 年 4 月 9 日，首相约翰逊访问基辅，除了给乌克兰送去援助以外，更重要的是表达“英国将在这场持续的斗争中坚定不移地与乌克兰人民站在一起，并将长期参与其中”^①的立场。在乌克兰看来，英国首相是俄乌冲突爆发后第一位访乌的 G7 领导人，这意味着“民主联盟”正在加强。2022 年 6 月 17 日，约翰逊再次到访基辅，表达英国对乌克兰的支持，赞扬乌克兰军队的勇气和英雄气概，承诺继续向乌提供武器。^②2022 年 8 月 24 日是乌克兰独立日，英国必须到场。约翰逊第三次访乌，带去了 2000 架价值 5400 万英镑的先进无人机和弹药，并表示，“过去 6 个月，英乌肩并肩作战，支持这个主权国家抵御野蛮和非法入侵者，……英国与乌克兰同在，你们能够获胜，也必将获胜”^③。

特拉斯担任首相后延续约翰逊政府的援乌抗俄路线，虽然在其短暂的首相生涯中未来得及访问乌克兰，但她是坚定的反俄者。苏纳克上任后继续支持乌克兰，他于 2022 年 11 月 19 日访问乌克兰，除带去 5000 万英镑的军事装备外，最主要的是传达英国新政府的立场。苏纳克承诺，“英国及其盟友会继续支持乌克兰进行战斗”^④。

英国首相的频繁访问鼓舞了乌克兰人的斗志，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深

① Boris Johnson, “Prime Minister pledges UK’s unwavering support to Ukraine on visit to Kyiv: 9 April 2022”, April 9, 2022, <https://www.gov.uk/government/news/prime-minister-pledges-uk-uk-unwavering-support-to-ukraine-on-visit-to-kyiv-9-april-2022>

② See Boris Johnson, “Prime Minister’s remarks at a press conference in Kyiv: 17 June 2022”, June 17, 2022, <https://www.gov.uk/government/speeches/prime-ministers-remarks-at-a-press-conference-in-kyiv-17-june-2022>

③ “Prime Minister tells Ukraine ‘they will win’ as he marks Independence Day: 24 August 2022”, August 24, 2022, <https://www.gov.uk/government/news/prime-minister-tells-ukraine-they-will-win-as-he-marks-independence-day-24-august-2022>

④ “PM announces new air defence for Ukraine on first visit to Kyiv”, November 19, 2022, <https://www.gov.uk/government/news/pm-announces-new-air-defence-for-ukraine-on-first-visit-to-kyiv>

刻体会到了英国政治家丘吉尔下达作战令时的感受，找到了“勇气如何引领你度过最难以想象的困难、并最终让你获胜的感觉”^①。

英国还关注乌克兰人道主义危机，接收并安置乌克兰难民。2022年3月以来，英国政府开通三种签证渠道让乌克兰人到英国避难，允许其在英居住3年。截至2023年3月7日，英国收到了27.52万乌克兰人的申请，其中16.57万人已抵英。^②通过人道主义救援，英乌人民之间的感情得到加强。

虽然英国军队并未直接参战，但英国政客们以各种形式鼓励乌克兰人抗击俄罗斯的进攻，乌克兰战场形势的变化经常成为英国议会讨论的主题。

（三）与乌克兰共享情报并公开披露，通过宣传打击俄罗斯

英国重视信息战，加强军事情报创新工作。英国国防部加大对俄乌战事的披露力度，使俄罗斯军事行动透明化，在情报和信息上大力支持乌克兰。

2016年3月，英国与乌克兰签署的防务合作备忘录中纳入了“在潜在威胁方面共享情报”^③的内容。这项军事情报合作表明，英国有意向乌克兰表达对抗俄罗斯的决心。

俄乌冲突爆发前一个月，英国就推算出俄罗斯有可能攻击乌克兰的结论，因此公开向乌克兰派送反坦克导弹。英国武装部队国务大臣詹姆斯·希佩于2022年2月17日指出，“开源情报”（Open Source Intelligence）显示俄罗斯“正在为入侵做最后准备”^④。英国能比欧陆国家提前感知俄罗斯的军事行动，这离不开与美国的情报共享，但也证明了英国情报部门的专业能力。

随着人工智能等技术不断创新，国际社会已进入情报革命新时代，“情

① Volodymyr Zelenskyy, “Combat aircrafts – for Ukraine, wings – for freedom – address by President Volodymyr Zelenskyy to both Houses of Parliament of the United Kingdom”, February 8, 2023, <https://www.president.gov.ua/en/news/bojovi-litaki-dlya-ukrayini-krila-dlya-svobodi-vistup-prezid-80857>

② See “Ukraine Family Scheme, Ukraine Sponsorship Scheme (Homes for Ukraine) and Ukraine Extension Scheme visa data”, March 9, 2023, <https://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ukraine-family-scheme-application-data/ukraine-family-scheme-and-ukraine-sponsorship-scheme-homes-for-ukraine-visa-data--2>

③ “UK relationship with Ukraine strengthened by Defence agreement”, March 18, 2016, <https://www.gov.uk/government/news/uk-relationship-with-ukraine-strengthened-by-defence-agreement>

④ Aubrey Allegretti, Julian Borger, Daniel Boffey, “Russian claim of Ukraine drawdown is disinformation, says UK minister”, February 17, 2022, <http://www.theguardian.com/world/2022/feb/17/russian-claim-of-ukraine-drawdown-is-disinformation-says-uk-minister>

报再也不只是政府间谍机构的专利”^①。俄乌冲突见证了英美等西方国家通过情报共享成功助乌抗俄。英国早在 2019 年就开始整合国防力量，把原来的联合部队司令部改组为战略司令部，统筹陆、海、空、网络、太空等 5 大领域综合作战。英国国防部下设国防情报局，该部门在俄乌冲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它在情报共享上作出的重大变革就是解密情报信息。

间谍机构和情报部门过去习惯隐藏和掩盖情报信息，但英国国防部一反常态，公开披露俄罗斯的军事动向，把俄军队及其战略部署向全球曝光。自 2022 年 2 月开始，英国国防情报局每日都在推特等社交媒体上发布乌克兰形势的最新情报，并公布俄军进攻和军队位置示意图。不仅如此，英国情报披露的内容还涉及俄军在乌克兰的大战小役、武器型号、伤亡情况、人员补给、战略方向、战场部署等，这些情报曾经都是秘密获取且绝对保密的。而在俄乌冲突的过程中，英国也和美国一样，选择公开披露情报，开启了情报革命。

英国智库皇家三军联合研究所的研究者结合俄乌冲突的实际情况深入研究了“开源情报”与英国国家安全的关系，认为“利用开源的视野来佐证秘密渠道的见解，这让国家安全的利益攸关方更愿意提供情报，从而缩短了他们与公众的距离。从根本上来讲，这增强了作为现代冲突核心领域的信息空间之重要性”^②。英国重视情报信息空间对于战争的重要作用，在不愿卷入战争的情况下，在情报信息空间战胜俄罗斯显得既可行又必要。这也增加了俄罗斯在冲突中获胜的难度。

俄罗斯也采取措施应对情报信息空间的困扰，故意泄露“机密”，目的是使英国披露的情报在俄罗斯“机密”的观照下成为虚假信息。因此，“虽然自由民主国家在公开场合使用情报因其更加透明而广受欢迎，但若这种做法继续下去，就必须小心风险管控”^③。事实上，英国非常注重情报披露技巧，如大量运用“可能”、“不清楚”等模糊性的表达，并积极利用任何可

① Amy Zegart, “Open Secrets: Ukraine and the Next Intelligence Revolution”, *Foreign Affairs*, 2023, Vol.102, No.1, p.54.

② Ardi Janjeva, Alexander Harris and Joe Byrne, “The Future of Open Source Intelligence for UK National Security”, *RUSI Occasional Paper*, June 2022, p.7.

③ Huw Dylan and Thomas J. Maguire, “Secret Intelligence and Public Diplomacy in the Ukraine War”, *Survival*, 2022, Vol.64, No.4, p.33.

能攻击俄罗斯的机会。例如，英国在 2023 年 3 月 12 日发布的情报称：“2023 年 2 月 21 日，在聆听普京总统国情咨文讲话的观众席上，前两排就座的是俄罗斯高级官员。他们的孩子都没有在军队服役。”^①虽然这条信息的真实性值得怀疑，但却起到了为俄罗斯制造矛盾与麻烦的宣传效果。

英国政府积极使用公开情报的方式打击俄罗斯，除了为乌克兰提供信息外，更重要的还包括“纠正”俄罗斯公布的“事实”，即推翻其有关战争的叙事，在英国、乌克兰、俄罗斯乃至国际社会的范围内争夺俄乌冲突叙事的话语权。“开源情报”已经构成一种庞大的信息空间，英国战略司令部司令吉姆·霍肯霍尔甚至以“社群”（Community）称之。^②这个社群有商业卫星、个体民众、聊天机器人、研究机构、政策分析师等各类角色的深度参与，情报制造的规模和速度呈指数级增长。但是，“开源情报”的利用也面临诸多挑战，其中最大的难题在于保证信息的准确性。一方面，敌对情报机构会提供虚假信息加以误导；另一方面，即便是上述所谓社群中出现的准确信息，情报部门跟踪调查的结果也往往是“没有利用价值的”、“不那么重要的”。

英国人把这场俄乌冲突视为人类社会“第一场数字战争”。虽然英国未派遣军队与俄罗斯直接对抗，但却在数字信息社群中发起了情报革新，通过及时公布俄军状况，把人道主义、公平正义、法治义理等元素掺杂其中，有效打击了俄罗斯，并在国际社会达到了英国政府想要的宣传效果。

三、内外联动加强对俄经济制裁

（一）借经济制裁清理俄罗斯在英资产

英国在 2014 年就曾对俄制裁，也颁布了各种法律处理俄罗斯的在英资产。俄乌冲突爆发前，英国议会已制定了《2018 年制裁与反洗钱法》《2019 年俄罗斯（制裁）（脱欧）条例》《2021 年全球反腐败制裁条例》《2022 年俄罗斯（制裁）（脱欧）（修订）条例》等法案，对俄实施制裁，涉及俄罗

^① Defence Intelligence, “Intelligence update on Ukraine”, March 12, 2023, <https://twitter.com/DefenceHQ/status/1634801422985314304>

^② See General Sir Jim Hockenfull, “How open-source intelligence has shaped the Russia-Ukraine war”, November 9, 2022, <https://www.gov.uk/government/speeches/how-open-source-intelligence-has-shaped-the-russia-ukraine-war>

斯 183 名个人和 53 个实体。^①2022 年 2 月 21 日,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命令,承认乌克兰东部的“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和“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独立。2022 年 2 月 22 日,英国首相约翰逊在下院宣布对俄制裁,其中包括俄罗斯 5 家银行和 3 个高净资产的俄罗斯人,并称:“这是第一波,若局势升级,我们准备好与美国和欧盟进一步实施制裁。”^②英国工党也全力支持对俄制裁,表示“会与首相和国际盟友一起努力确保出台更多制裁措施”^③。这些制裁措施随着英俄关系紧张而不断加剧,但仍有大量俄罗斯资金在英国境内流动。

英国对俄制裁的目标是把俄罗斯排除在英国这个欧洲最大的金融体系之外,进而“削弱俄罗斯的经济实力,并让普京的战争机器瘫痪”^④。英国议员曾言:“俄罗斯银行每年通过英国金融体系收支结算的金额不少于 1460 亿英镑。”^⑤为达到对俄全面制裁的目标,英国政府一方面构筑国内对俄制裁网络,另一方面也在积极推进国际对俄制裁合作。

英国通过修订制裁条例、强制实施登记制度、设立专门机构等措施对俄制裁,全面清理俄罗斯在英资产。《2022 年俄罗斯(制裁)(脱欧)(修订)条例》在 2022 年就经过了 17 次修订,每次修订后,对俄制裁的范围都会相应扩大。为查清俄罗斯人在英国的土地资产,英国政府于 2022 年 3 月 14 日快速通过《经济犯罪(透明与执行)法案》,旨在设立一项登记制度,要求在英国买卖或转让房地产的海外实体及受益人必须到公司注册处登记,严查来路不明的财富,违法者将面临制裁。^⑥该法案于 2022 年 8 月 1 日生效,溯

^① See Claire Mills, “Sanctions against Russia”, *Research Briefing*, House of Commons Library, March 22, 2022, p.5.

^② Hansard, “Ukraine”, Vol.709, February 22, 2022, <https://hansard.parliament.uk/commons/2022-02-22/debates/057FABBB-4F1C-4425-A304-4A168EC069EB/Ukraine>

^③ Ibid.

^④ Hansard, “Ukraine”, Vol.709, February 24, 2022, <https://hansard.parliament.uk/commons/2022-02-24/debates/A76282B2-C1F4-4D00-B5E8-A8A0F2476FBB/Ukraine>; FCDO, “Government announces sanctions against Russian oligarchs Alisher Usmanov and Igor Shuvalov”, March 3, 2022, <https://www.gov.uk/government/news/government-announces-sanctions-against-russian-oligarchs-alisher-usmanov-and-igor-shuvalov>

^⑤ Hansard, “Sanctions”, Vol.709, March 1, 2022, <https://hansard.parliament.uk/commons/2022-03-01/debates/6EF274E3-57A6-46ED-BFE2-348AEB926501/Sanctions>

^⑥ See “Economic Crime (Transparency and Enforcement) Act 2022”, 2022, Chapter 10, pp.1, 12-13, <https://www.legislation.gov.uk/ukpga/2022/10/enacted/data.pdf>

及既往，登记截止日期为 2023 年 1 月 31 日。此后，俄罗斯个人或机构在英国地产界无处遁形。

在政府层面，英国加大机构整合力度，全面限制俄罗斯金融寡头在英资金和筹资能力。2022 年 3 月，英国外交部牵头成立了“制裁寡头工作组”，协调其他部门制裁涉足英国金融、土地等行业的俄罗斯寡头。2022 年 7 月，英国在国家打击犯罪调查局成立专门机构，“调查腐败精英和政治公众人物在英的洗钱活动”^①，目标直指在英拥有资产的俄罗斯寡头。此外，在俄乌冲突爆发初期，英国政府就把俄罗斯人在英银行的存款额度限制在了 5 万英镑以下。

在国际上，英国与其他 G7 国家、欧盟成员国等合作，动用集体力量对俄制裁。2022 年 2 月 26 日，英国、欧洲委员会、法国、德国、意大利、加拿大、美国发表联合声明，决定把“俄罗斯银行剔除出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系统”^②，实际上，早在 2014 年英国就呼吁过类似措施。2022 年 3 月，英国又与澳大利亚、加拿大、欧洲委员会、德国、意大利、法国、日本、美国联合成立“俄罗斯精英、代理人及寡头制裁专班”，旨在调动国际资源，“采取一切法律手段发现、管制、冻结、扣押、（若可能）查抄或没收那些与俄罗斯对乌克兰有预谋的、非正义的和无端的入侵以及俄罗斯政权继续侵略相关的被制裁的个人和实体之财产”^③。英国自 2014 年发起对俄制裁以来，已经打造了一张国内国际联动网络，旨在削弱俄罗斯的经济实力。

英国对俄罗斯的制裁取得了明显成效。从国内层面来看，截至 2023 年 3 月，共有 1550 人被列入制裁名单，其中涉及全球净资产超过 1400 亿英镑的 130 余名俄罗斯寡头；超过 180 个相关实体遭到制裁，其中包括全球资产

① UK Government's Policy Paper, "Factsheet: economic crime in the UK", January 18, 2023, <https://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economic-crime-and-corporate-transparency-bill-2022-factsheets/fact-sheet-economic-crime-in-the-uk#:~:text=The%20NCA's%20Combatting%20Oligarchy%20Cell,their%20assets%20within%20the%20UK>

② Prime Minister's Office, "Joint Statement on Further Restrictive Economic Measures: 26 February 2022", February 26, 2022, <https://www.gov.uk/government/news/joint-statement-on-further-restrictive-economic-measures-26-february-2022>

③ UK Government, "Russian Elites, Proxies, and Oligarchs Task Force ministerial joint statement", March 17, 2022, <https://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russian-elites-proxies-and-oligarchs-task-force-ministerial-joint-statement/russian-elites-proxies-and-oligarchs-task-force-ministerial-joint-statement>

超过 9000 亿英镑的 20 余家银行。^①从国际层面来看，截至 2023 年 3 月，“俄罗斯精英、代理人及寡头制裁专班”共召开了 6 次多边会议，各国分享了相关制裁信息，在全球范围内对俄罗斯进行了追踪制裁，共冻结了价值超过 580 亿美元的俄罗斯资产，并严格限制俄罗斯人进入国际金融体系。^②经过内外联动，英国政府彻查并处理了俄罗斯在英财产。随着时间的推移，英国对俄制裁面越来越广，但凡给予俄罗斯帮助的国家、机构或人员都被列入制裁范围。

（二）以身示范对俄经济脱钩

英国政府非常警惕国民经济的对外依赖问题，因而采取措施避免受制于他国，以增强自身的经济韧性。欧盟是英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但英国在自己还是欧盟成员国时也在设法降低对欧盟经贸的依赖。英国从欧盟进口贸易的比重在 2003 年达到 58% 的峰值，对欧盟出口贸易的比重在 2006 年达到了 54% 的高点。^③此后，英国开始有意识地拓展与非欧盟国家的经贸关系。2021 年，英国对欧盟的进出口比重分别降至 44.7% 和 42%。^④

英国对俄罗斯产生贸易依赖的警惕性更高。2000 年以来，英俄贸易总额从 34 亿英镑上升至 2012 年的 161 亿英镑峰值（见图 1）。在整个欧盟 28 国对俄贸易中，英国的比重与其体量不匹配。2013 年，俄罗斯总出口额的 57% 流向欧盟国家，其中 4% 流向英国；俄罗斯总进口额的 46.5% 来自欧盟国家，其中 3% 来自英国。^⑤可见，英俄贸易相互依存度并不高，这为英国对俄经济脱钩提供了条件。

① See HM Government, “Integrated Review Refresh 2023: Responding to a more contested and volatile world”, March 2023, p.41, https://assets.publishing.service.gov.uk/government/uploads/system/uploads/attachment_data/file/1145586/11857435_NS_IR_Refresh_2023_Supply_AllPages_Revision_7_WEB_PDF.pdf; Claire Mills, “Sanctions against Russia”, p.11.

② See “Russian Elites, Proxies and Oligarchs Task Force joint statement”, March 9, 2023, <https://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russian-elites-proxies-and-oligarchs-taskforce-statement-and-advisory/russian-elites-proxies-and-oligarchs-taskforce-joint-statement>

③ See Matthew Ward, “Statistics on UK-EU trade”, December 21, 2022, p.4, <https://researchbriefings.files.parliament.uk/documents/CBP-7851/CBP-7851.pdf>

④ Ibid., p.5.

⑤ See The European Union Committee of House of Lords, *The 6th Report of Session 2014-15, The EU and Russia: before and beyond the crisis in Ukraine*, London: The Stationery Office, 2015, pp.12-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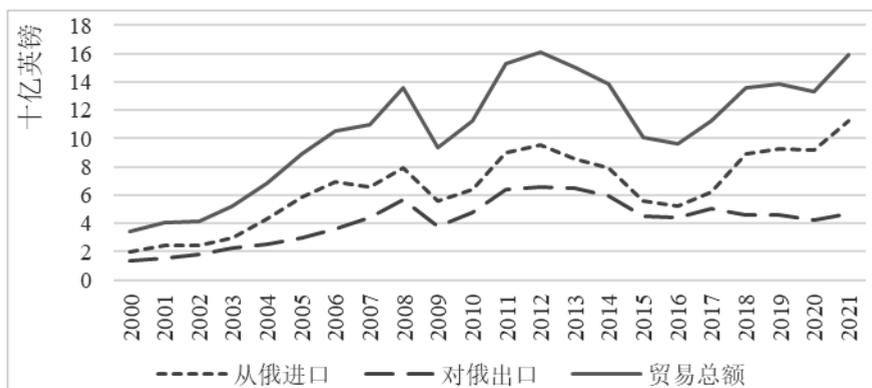


图 1 2000-2021 年英国对俄罗斯贸易状况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英国国家统计局（ONS）数据自制。^①

2014 年英国发起对俄经济制裁后，英俄贸易额快速下滑。如图 1 所示，2016 年英俄双边贸易额低于 100 亿英镑，此后虽有所上扬，但原因是英国从俄罗斯进口的力度增大，对俄出口一直萎靡不振。

表 1 2021 年英国对俄罗斯商品贸易状况

从俄进口商品		对俄出口商品	
商品	价值（单位：十亿英镑）	商品	价值（单位：十亿英镑）
精炼油	2.981	汽车	0.372
非特定商品	2.556	药品	0.302
有色金属	1.461	专业机械	0.234
原油	1.042	机械发电机	0.217
天然气	0.965	一般工业机械	0.142
其他	1.258	其他	1.692
总计	10.263	总计	2.959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英国国家统计局（ONS）数据自制。^②

^① See “UK total trade: all countries, non-seasonally adjusted”, April 27, 2023, <https://www.ons.gov.uk/businessindustryandtrade/internationaltrade/datasets/ukttotaltradeallcountriesnonseasonallyadjusted>

^② See “The impact of sanctions on UK trade with Russia: November 2022”, January 26, 2023, <https://www.ons.gov.uk/economy/nationalaccounts/balanceofpayments/articles/theimpactofsanctionsonuktradewithrussia/november2022>

从双边贸易结构看，英俄贸易主要集中在商品领域，服务贸易虽以英国出口为主，但比重不大。英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1 年英俄服务贸易额仅为 25 亿英镑，其中英国对俄出口 17 亿，从俄进口 8 亿。^①2021 年，英国从俄进口商品价值 102.63 亿英镑，对俄出口 29.59 亿英镑（见表 1）。

英国主要从俄罗斯进口能源，对俄出口汽车、医药等商品。2021 年，英国从俄罗斯进口的精炼油、原油、天然气和煤炭合计 51.67 亿英镑，占从俄罗斯进口商品总额的 50.3%。需要注意的是，英国自 1990 年以来从俄罗斯进口的化石燃料占英国国内消耗的化石燃料比重维持在较低水平，2016 年达到 11.5% 的峰值，后逐步下降，2021 年只占 4.8%。2021 年，德国、法国、意大利从俄罗斯进口的化石燃料占各自国内消耗的比重分别为 30.5%、6.3%、23.7%。^②相比之下，英国对俄罗斯的能源依赖度很低。

虽然，英国政客清晰地看到对俄经济制裁也会让英国付出代价，但英国下院财政委员会认为，“为帮助乌克兰抵抗俄罗斯的侵略，这绝对是值得付出的代价。然而这个代价加上当前英国的生活成本压力，会影响整个国家，对低收入家庭的影响尤为明显”^③。基于这样的认识，英国不顾一切地发起对俄制裁，开启全面脱钩。

2022 年 2 月 27 日和 28 日，英国石油公司（BP）和壳牌公司（Shell）相继宣布退出与俄罗斯石油公司（Rosneft）和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Gazprom）合作的有关项目，^④其在俄公司的人员辞职、股权变卖、资金撤离。英国能源企业对俄脱钩意味着英俄经济全面脱离接触。

① See Office for National Statistics, “UK trade with Russia: 2021”, March 22, 2022, <https://www.ons.gov.uk/economy/nationalaccounts/balanceofpayments/articles/uktradewithrussia/2021>

② See IEA, “National Reliance on Russian Fossil Fuel Imports”, December 2022, <https://www.iea.org/reports/national-reliance-on-russian-fossil-fuel-imports/which-countries-are-most-reliant-on-russian-energy>

③ The Treasury Committee, *Defeating Putin: the development, implementation and impact of economic sanctions on Russia*, March 23, 2022, p.26, <https://committees.parliament.uk/publications/9394/documents/161078/default/>

④ See “bp to exit Rosneft shareholding”, February 27, 2022, <https://www.bp.com/en/global/corporate/news-and-insights/press-releases/bp-to-exit-rosneft-shareholding.html>; “Shell intends to exit equity partnerships held with Gazprom entities”, February 28, 2022, <https://www.shell.com/media/news-and-media-releases/2022/shell-intends-to-exit-equity-partnerships-held-with-gazprom-entities.html>

为加速对俄经济的全面脱钩，英国政府颁布法案强化政策引导。2022年4月，英国政府决定，“为了减少对俄罗斯化石燃料的依赖，英国将在2022年底前分阶段停止使用俄罗斯石油和煤炭，尽快终止进口俄罗斯的液化天然气”^①。此后，英国通过立法逐步禁止进口俄罗斯能源。2022年8月10日对俄煤炭禁令生效，2022年12月31日对俄石油禁令生效，2023年1月1日对俄天然气禁令生效。除禁止英国人购买外，还禁止向涉俄能源提供技术、资金、金融服务，禁止充当中间商。^②此外，黄金珠宝、易损零部件等商品以及专业和商业服务等，也被列入禁止范围。

英国对俄经济制裁禁令促使英俄经济全面脱钩。与2021年2月至2022年1月相比，2022年2月至2023年1月英国对俄商品的进口额和出口额分别下降了70.8%和67.9%。^③从单月进口数据看，英国从俄罗斯进口的商品总价值已从2022年1月的18.14亿英镑下降至2023年1月的600万英镑（见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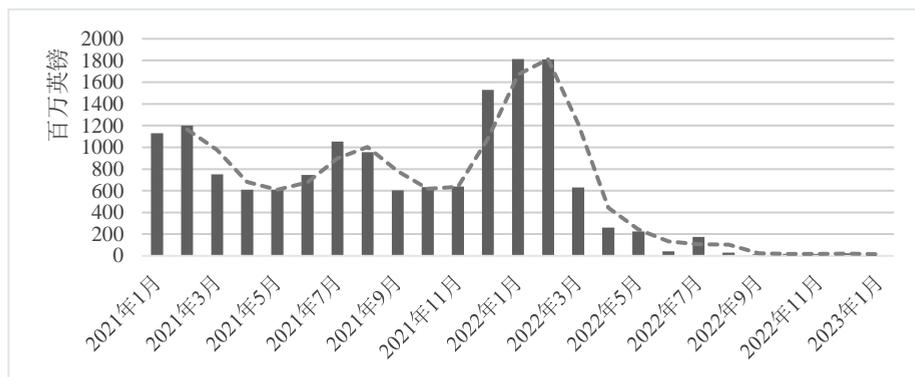


图2 2021年1月—2023年1月英国从俄罗斯进口商品趋势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英国国家统计局（ONS）数据自制。^④

① HM Government, “British Energy Security Strategy”, April 7, 2022, <https://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british-energy-security-strategy/british-energy-security-strategy>

② See “The Russia (Sanctions) (EU Exit) (Amendment) (No.15) Regulations 2022”, October 26, 2022, pp.6-7, <https://www.legislation.gov.uk/uksi/2022/1110/made/data.pdf>

③ See Freya Lawrence, Anthony Myers, “Trade and Investment Factsheets: Russia”, March 28, 2023, p.5, https://assets.publishing.service.gov.uk/government/uploads/system/uploads/attachment_data/file/1144251/russia-trade-and-investment-factsheet-2023-03-28.pdf

④ See “Trade in Goods: Russia: Total: Imports: BOP: CP: SA”, March 10, 2023, <https://www.ons.gov.uk/economy/nationalaccounts/balanceofpayments/timeseries/erec/mret>

英国在对俄全面脱钩的同时不断优化自身经济发展战略，着重考虑能源和经济安全问题。2022 年 4 月 7 日，英国政府出台《英国能源安全战略》，旨在改变对外能源依赖状况，推动英国实现低碳转型。2023 年 3 月的《综合评估》文件中，英国政府把经济安全列为第二优先考虑事项，仅次于能源安全。英国正在启动新的“经济威慑倡议”（EDI），设立基金应对敌对行为。^①在应对俄乌冲突之余，英国正在构建一种崭新的能源、经济安全体系，以实现其经济和发展模式转型。

（三）利用俄罗斯被冻结资金帮助乌克兰重建

为遏制俄罗斯在俄乌冲突中的作战能力，英国冻结了俄罗斯国家和政治精英的在英资产。截至 2022 年 10 月，已有价值 184 亿英镑的俄罗斯个人和实体的在英资产遭到冻结。^②按照英国议员克里斯·布赖恩特的描述，被冻结的俄罗斯央行储备金将近 3500 亿美元，仅英国就冻结了 260 亿英镑。^③英国冻结俄罗斯资金的目的是迫使俄罗斯结束冲突，这意味着被冻结的资金理应在俄乌冲突结束后归还俄罗斯。按照国际惯例，英国无权没收和挪用这些资金。但面对俄乌战事短期内无法结束和乌克兰亟待发展经济的事实，英国政府正设法改变制度规则，利用被冻结的俄罗斯资金支持乌克兰发展。

英国、美国和一些欧洲国家为重建乌克兰煞费苦心，并呼吁为乌克兰制定“马歇尔计划”。2014 年以来，英国试图干涉甚至主导乌克兰的政治经济进程，于 2017 年在伦敦召开了“乌克兰改革会议”，此后该会议成为西方国家关注乌克兰改革的机制性年度国际会议。2022 年 7 月，瑞士举办第五次“乌克兰改革会议”，因俄乌冲突爆发，这次会议改称为“乌克兰复苏会议”。英国外交大臣特拉斯表示：“我们在战争期间带头支持乌克兰，也会继续带头支持乌克兰政府的重建和发展规划。这需要为乌克兰制定新的‘马

① See HM Government, “Integrated Review Refresh 2023: Responding to a more contested and volatile world”, p.48.

② See HM Treasury, “United Kingdom helps freeze more than £48 billion in Russian assets”, March 9, 2023, <https://www.gov.uk/government/news/united-kingdom-helps-freeze-more-than-48-billion-in-russian-assets>

③ See Hansard, “Seizure of Russian State Assets and Support for Ukraine”, Vol.727, February 7, 2023, <https://hansard.parliament.uk/commons/2023-02-07/debates/2F26A58D-5247-4FB9-9EED-67FECB05B1AE/SeizureOfRussianStateAssetsAndSupportForUkraine>

歇尔计划’。”^①会议发布的《卢加诺宣言》指出，“欢迎创新复苏的方法，比如数字转型、绿色能源转型、国家和国际上创新且持续的融资措施，包括利用可能的赔款、私人捐赠者和私有部门的捐款”^②。“可能的赔款”，指的是俄罗斯对俄乌战事的赔款。

乌克兰复苏与重建需要巨额资金。据最新估计，重建乌克兰需要 7500 亿至 1 万亿美元，且该数字随着战事规模扩大仍在不断上升。^③英国政府曾多次表态，正考虑被冻结的俄资产是否能够或者怎样用于乌克兰重建。

把俄罗斯国家或个人的财产划拨给乌克兰进行国家建设的行为将使英国政府面临巨大的法律挑战。一方面，英国政府没收俄罗斯国家财产的行为将违反国际法对主权豁免的规定，如果英国政府这么做，它将背上践踏国际法的恶名，也会成为它一直宣传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破坏者。另一方面，英国政府若没收俄罗斯公民个人财产将违反《欧洲人权公约》关于“任何自然人或法人都有权和平享有其财产”的规定。面对这种两难困境，英国议员进行了激烈辩论，甚至有意推动改变现有的国际法和国内法。

2023 年 2 月 7 日，英国工党议员克里斯·布赖恩特提出一项名为“没收俄罗斯国有资产与支持乌克兰议案”的动议，敦促英国政府设立一名信托人管理俄罗斯在英国有资产，通过付款满足乌克兰政府和平民的诉求。^④但英国政府否决了这项议案。就现有的英国法律体系来看，英国议会无法改变主权豁免的规则，《1978 年英国国家豁免法》承认其他国家在英国法院享有豁免权，明确规定外国的“国家财产不得为执行法院判决或仲裁裁决而属于任何程序，也不得在对物权诉讼中为了逮捕、扣押或出售而隶属于任何程序”，外国的“国家央行或其他财政机构的财产不得被视为正在用于或打算用于商

① Liz Truss, “Ukraine Recovery Conference: Foreign Secretary's remarks, 4 July 2022”, July 4, 2022, <https://www.gov.uk/government/speeches/ukraine-recovery-conference-foreign-secretarys-remarks-4-july-2022>

② Ukraine Recovery Conference, “Lugano Declaration”, Lugano, Switzerland, 4-5 July 2022.

③ See Hansard, “Russian Assets: Seizure”, Vol.729, March 14, 2023, <https://hansard.parliament.uk/commons/2023-03-14/debates/39A33641-F699-4244-B437-C6A2447C68E2/RussianAssetsSeizure>

④ See the Authority of the House of Commons, “Seizure of Russian State Assets and Support for Ukraine Bill”, February 23, 2023, <https://publications.parliament.uk/pa/bills/cbill/58-03/0245/220245.pdf>

业目的”^①。如若英国政府没收或挪用被冻结的俄罗斯国有资产，这不仅触犯法律，还会破坏英国的法律体系。

不过保守党议员伊恩·邓肯·史密斯于 2023 年 3 月 14 日发起动议，呼吁英国政府向议会提出通过没收俄罗斯在英国的国有资产来支持乌克兰的提案，每隔半年汇报进展情况。其他一些议员也呼吁在国际和国内更改有关主权豁免的法律，至少可以单方面修改《1978 年英国国家豁免法》中赋予外国央行的豁免权。^②然而，如果英国创造没收他国财产的先例，将对现有国际法和英国国内法带来危险。并且即使英国冒险实施，也无法保证其他国家效仿，不仅如此，英国单方面的举动容易影响对俄制裁的效果，甚至有可能招来俄罗斯的报复行动。

因此，英国政府在 2023 年 2 月 8 日与乌克兰政府发表联合声明，保证在俄罗斯彻底结束对乌克兰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侵犯之前，俄罗斯无法获得或转移被英国冻结的资产。英国将根据国际法，诉诸一切合法途径，确保俄罗斯资产用于援助乌克兰重建。^③冻结俄罗斯国家或个人的在英资产可能是英国政府目前唯一能办到的事情。至于这批资金将如何用于乌克兰的重建，英国仍然需要与欧美等国协商行动。另外，俄罗斯早已对包括英国在内的欧美国家冻结俄罗斯资金援助乌克兰的行径提出了批评，认为这些西方国家“蔑视法治”，实际上用冻结的俄罗斯国家资产“填补他们向基辅提供武器所欠下的债务”^④。

英国政府努力为重建乌克兰谋划，主动接手召开 2023 年“乌克兰复苏会议”，目标是“动员国际社会支持乌克兰经济社会稳定和从战争影响中复苏，包括通过紧急援助解决燃眉之急，以及对私营部门参与重建提供资金支

① “State Immunity Act 1978”, 1978, Chapter 33, p.7, p.9, <https://www.legislation.gov.uk/ukpga/1978/33/data.pdf>

② See Hansard, “Russian Assets: Seizure”, Vol.729, March 14, 2023, <https://hansard.parliament.uk/commons/2023-03-14/debates/39A33641-F699-4244-B437-C6A2447C68E2/RussianAssetsSeizure>

③ See “Declaration between the government of the United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 and Northern Ireland and the government of Ukraine”, February 8, 2023, <https://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uk-ukraine-declaration-of-unity/declaration-between-the-government-of-the-united-kingdom-of-great-britain-and-northern-ireland-and-the-government-of-ukraine>

④ UN News, “General Assembly adopts resolution on Russian reparations for Ukraine”, November 14, 2022, <https://news.un.org/en/story/2022/11/1130587>

持”^①。乌克兰重建进程必将缓慢且存在变数，俄乌冲突将以何种方式结束，也是决定被冻结的俄罗斯资金去向的关键。

四、借助俄乌冲突塑造英国影响力

（一）充分利用国际规制树立英国“正义”形象

大国若欲在国际社会立于不败之地，除拥有强大的军事、经济等硬实力外，还须具备维护国际公平正义的形象和能力。虽然每个国家对国际公平正义的理解不同，但它必须向世界展现自身的立场和形象。俄乌冲突给英国创造了机会，让它找到了通过打击俄罗斯彰显自身价值的最佳平台。英国向乌克兰提供全方位支持，履行其作为核大国的对乌承诺，力图把自己打造成维护国际正义和秩序的良好力量。

维护正义必须要定义邪恶。英国把俄罗斯设定为威胁，就必须宣扬俄的诸多“邪恶行径”。除指责俄罗斯多次在英国国内实施投毒、危及后者国家安全外，英国政府抓住俄乌冲突提升其自身“维护国际正义”的形象。

英国 2015 年发布《国家安全战略与战略防御和安全评估》时，对国际秩序极为担忧，整篇报告曾 27 次提及“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当时的英国致力于捍卫这一国际秩序。2021 年，英国政府在《竞争时代的全球英国》政策文件中指出，国际秩序变得更加脆弱，未来十年维持现状已远远不够，必须积极开展“系统性竞争”以塑造未来国际秩序。^②英国不断开展外交行动，排斥俄罗斯，将其塑造成自己的对立面，并有意向国际社会展示它的“邪恶行径”。2014 年克里米亚脱乌入俄时，英国政府认为该公投是非法的。2022 年 9 月，俄罗斯再次借助公投推动顿涅茨克、卢甘斯克、扎波罗热和赫尔松入俄。英国政府认为这些公投“是虚假的”，“谴责俄罗斯政府的恶劣行径”，并宣布实施 92 项制裁。^③英国政府相信俄罗斯推动的公投不符合“真

^① “Ukraine Recovery Conference”, 21-22 June 2023, London, <https://www.urc-international.com/>

^② See HM Government, “Global Britain in a competitive age: The Integrated Review of Security, Defence, Development and Foreign Policy”, p.11, p.28.

^③ See “UK sanctions collaborators of Russia’s illegal sham referendums”, September 26, 2022, <https://www.gov.uk/government/news/uk-sanctions-collaborators-of-russias-illegal-sham-referendums>

正”公投的程序，不能反映当地人民意见。

英国将俄罗斯在乌克兰开展的特别军事行动视为“侵略”，但俄罗斯认为自己的特别军事行动是有国际法可依的。普京总统在 2022 年 2 月 24 日发表电视讲话时说：“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第五十一条，经俄罗斯联邦委员会批准，根据今年（2022 年）2 月 22 日俄罗斯联邦会议与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签署的友好互助条约，我决定进行一次特别军事行动。目的是保护八年来遭受基辅政权欺凌和种族灭绝的人们。为此，我们将努力实现乌克兰的非军事化和去纳粹化。”^①但是，这次特别军事行动在英国下院议员看来是“侵略战争”。英国首相约翰逊在 2022 年 2 月 24 日的下院辩论中表示：“我们当然会利用英国在每个国际论坛上的位置谴责（俄罗斯）对乌克兰的袭击，我们将通过讲述普京选择的战争和侵略战争的真相来反击克里姆林宫的谎言和虚假信息。”^②在俄乌冲突发生的叙事方面，英俄双方各执一词。但英国主动反对俄罗斯关于俄乌冲突的叙事，目的是将自己置于在国际社会伸张正义的地位，把俄罗斯发起特别军事行动的行为定性为不义的、邪恶的、野蛮的，是与英国追求的文明世界、道德法治、国际秩序等理念完全相反的。

英国认为，自己对俄乌冲突的积极干预是国际正义和国际责任的体现。英国是二战后国际秩序的主要创建者，也是冷战结束后国际秩序的主导者之一。在乌克兰独立问题上，英国深度参与。在 1994 年 12 月签署的《关于乌克兰加入不扩散条约的安全保证问题备忘录》中，英、美、俄“重申按照欧安会《最后文件》的原则对乌克兰所作的尊重乌克兰独立和主权以及现有边界的承诺”^③，对乌克兰作出安全保证，乌克兰也从一个有核国家变成了无核国家。事实证明，三个核大国的承诺最终没能制止俄乌冲突，也印证了美国学者米尔斯海默在 1993 年所下的结论，即“乌克兰的核武器是应对俄罗

① Путин В. Обращение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24 февраля 2022 г. <http://www.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67843>

② Hansard, “Ukraine”, Vol.709, February 24, 2022, <https://hansard.parliament.uk/commons/2022-03-01/debates/6EF274E3-57A6-46ED-BFE2-348AEB926501/Sanctions>

③ “Memorandum on Security Assurances in Connection with Ukraine’s Accession to the Non-Proliferation Treaty”, December 12, 1994, <https://documents-dds-ny.un.org/doc/UNDOC/GEN/G94/652/92/PDF/G9465292.pdf?OpenElement>

斯入侵的唯一可靠威慑”^①。鉴于俄罗斯对备忘录中所作承诺的“违背”，英国认为自己有责任和义务通过各种措施援乌抗俄。并且，按照上述逻辑，英国对这场俄乌冲突负有一定责任，因为英美在苏联解体时把重点放在了防止核不扩散方面，致使乌克兰放弃核武器，俄乌冲突在核威慑失效的情况下爆发。而美国和西方国家也基于这项战略“失误”的责任和由此引发的危机，带头援乌抗俄。

相对于英国而言，俄罗斯对国际道德和正义也有自己的理解和认知。普京总统曾提出，美国和西方国家违反国际关系原则，背离了公认的道义和道德准则，无视国际法，对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等主权国家发动侵略，导致了人道主义灾难，使正义和真理变成了谎言和虚伪，而俄罗斯发动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是出于“自卫”。^②并且，英美创造了无视国际法干涉他国的先例，也有不服从国际判决的事实，如英国对 2019 年联合国大会高票通过的要求英国 6 个月内无条件撤出查戈斯群岛的决议置之不理。

英国围绕俄乌冲突设法利用各种国际平台便利塑造自身正义形象。2023 年 3 月 17 日，国际刑事法院（ICC）对普京总统发出逮捕令，认为他在乌克兰犯下了“非法转移人口的战争罪”，英国认为这一行动“标志着向问责和国际正义迈出的重要一步”^③。然而实际上，这是英国在背后大力推动的结果。2023 年 3 月 20 日，英国政府召集 40 多个国家的司法部长在伦敦召开会议，英国副首相拉布表示，会“继续为国际刑事法院提供资金、人员和专家”等支持，以审判“战犯在乌克兰这场非正义的、无端的非法入侵过程中实施的暴行”^④。英国不仅向国际刑事法院提供了 100 万英镑资金，还搜集证据和分享信息，并培训乌克兰警察开展犯罪调查的技能。此外，英国最高法院在 2023 年 3 月 15 日对乌克兰拖欠俄罗斯 30 亿美元贷款这一案件作出

① John J. Mearsheimer, “The Case for a Ukrainian Nuclear Deterrent”, *Foreign Affairs*, 1993, Vol.72, No.3, p.51.

② См. Путин В. Обращение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24 февраля 2022 г. <http://www.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67843>

③ “London hosts major international war crimes meeting as UK boosts support for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March 20, 2023, <https://www.gov.uk/government/news/london-hosts-major-international-war-crimes-meeting-as-uk-boosts-support-for-international-criminal-court>

④ Ibid.

判决，驳回俄罗斯要求乌克兰在无需审判情况下偿还贷款的请求，允许乌克兰以被胁迫为由出庭申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即表示：“乌克兰今天获得了反对侵略者的又一决定性胜利，……正义必将属于我们。”^①显然，英国是在利用法律武器帮助乌克兰对抗俄罗斯。

可以说，英国不仅在国际社会塑造正义与邪恶的对决，还利用各种国际机制彰显自身正义形象，把俄罗斯打造成邪恶的化身。英国向人们传达出它认为的那种伸张正义、对抗邪恶、负责有为、桀骜不驯的英国精神，维护其作为欧洲大国和世界大国的国际形象。

（二）依托联盟力量提升英国全球影响力

英国当前的实力无法与其鼎盛时期相比，但它依然是个强国。英国仍能跻身大国行列的重要方法就是依靠联盟的力量，也即联合其他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在国际社会建立统一战线，维持自身影响力。

丘吉尔是英国联合思想的构建者，在 1948 年提出三环外交构想，为英国找到了连接“英联邦和帝国”、“英语国家”和“统一的欧洲国家”的“那个交汇点”，并认为英国“有机会把这些国家联结在一起”^②。此后，英国外交的核心便是如何以其独特的位置把美国、加拿大、欧洲大国、其他国家组建成大联盟，并通过联盟发挥英国的全球影响力。

时至今日，英国所处的独特圈子非常之多，比如北约、五眼联盟、七国集团、英联邦、联合远征军等。英美有很多共同朋友圈，英国政客并未把美国视为其外交政策的主导者，而是把它看作主要的盟友。2023 年 3 月，英国首相苏纳克向美国总统拜登介绍了英国最新的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战略，双方“承认在世界上的雄心和利益方面的一致性，赞同携手努力实现全球稳定的重要性”^③。可见，英美对外政策相似不过是双方观念和利益相同。

俄罗斯对英的外交政策的理解存在一定偏差。俄罗斯高层普遍认为英国

① “UK Supreme Court Backs Ukraine Over Russian ‘Duress’ Loan”, *Kyiv Post*, March 15, 2023, https://www.kyivpost.com/thread/14299#live_update_key_14329

② Winston Churchill, “Conservative Mass Meeting, A Speech at Llandudno, 9 October 1948”, in *Europe Unite Speeches 1947 and 1948 by Winston S. Churchill*, Randolph S. Churchill ed.,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50, pp.417-418.

③ “PM meeting with US President Joe Biden: 13 March 2023”, March 14, 2023, <https://www.gov.uk/government/news/pm-meeting-with-us-president-joe-biden-13-march-2023>

不是欧洲国家，而是与美国一起的盎格鲁-撒克逊国家，英国的对外战略只是美国战略的复制。^①事实上，英国的对外战略是根据实际情况自主制定的。

相比美国，英国的对外战略立足欧洲，对欧洲局势的判断更加准确。2021年3月，英美都推出了自己的安全战略，但对俄罗斯的定位完全不同。英国认为俄罗斯是英国国家安全“最严重的直接威胁”^②，美国对俄罗斯的评价则是“仍然决定提升其全球影响力，并在世界舞台上发挥破坏性作用”^③。俄乌冲突爆发后，美英分别于2022年10月和2023年3月发布新的国家安全战略。美国承认，“俄罗斯现在对国际和平与稳定构成直接、持久的威胁”，对俄采取遏制策略时还“将维持和发展对俄务实的互动模式”^④。但英国认为，俄罗斯必须失败，对话已经没有必要，对俄战略主要放在增加俄罗斯在冲突过程中的成本、对抗俄罗斯的全球影响力、削弱俄罗斯对英国威胁的能力等方面。^⑤英美对俄政策存在很大不同，这是双方自身实力、地缘政治和外交传统造成的结果。

利用联盟力量是英美对俄政策的共同点，并且，在这方面英国比美国的认识更加深刻。在特朗普时代，美国追求“美国优先”，减少对盟友的依赖。拜登政府及时修正美国外交政策，认为单靠美国无法实现战略目标，必须“重振美国在世界各地的联盟与伙伴关系”^⑥。对英国来说，充分利用联盟是其

① 英国前驻俄罗斯大使托尼·布伦顿（Tony Brenton）曾表示，英国采取的立场“在莫斯科看来是在美国阴影之下，因此，他们若想聆听西方强硬路线便会去华盛顿，而非来伦敦”。参见 The European Union Committee of House of Lords, “The 6th Report of Session 2014-15, The EU and Russia: before and beyond the crisis in Ukraine”, February 20, 2015, London: The Stationery Office, p.29. 俄罗斯在2023年3月31日发布的《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构想》中，把英国归属于“其他盎格鲁-撒克逊国家”而非“欧洲国家”。参见 Концепция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31 марта 2023 г. <http://www.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70811>

② HM Government, “Global Britain in a competitive age: The Integrated Review of Security, Defence, Development and Foreign Policy”, p.26.

③ President Joseph R. Biden, Jr., “Interim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ic Guidance”, March 2021, p.8,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1/03/NSC-1v2.pdf>

④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ctober 2022, pp.25-26,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2/10/Biden-Harris-Administrations-National-Security-Strategy-10.2022.pdf>

⑤ See HM Government, “Integrated Review Refresh 2023: Responding to a more contested and volatile world”, p.42.

⑥ President Joseph R. Biden, Jr., “Interim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ic Guidance”, p.10.

最基本的外交策略，即便脱欧后也在强化与欧洲国家的关系。

在认识到欧洲地缘政治回归后，英国推动外交观念变革，否定过去“以商促变”的假说，致力于“把硬安全与经济安全结合起来，建立更强大的全球联盟”^①的新方法。在应对俄乌冲突方面，英国巩固了其现有的联盟体系。北约永远是英国最为依赖的联盟，英国政府把国防开支从占 GDP 的 2% 提高到 2.5%，以提升军事力量。英国还打破北约、欧盟的圈子界线，拉拢一些欧洲国家组建自己的圈子。由英国主导组建的快速反应部队“联合远征军”便是例证。2022 年，联合远征军共召开了 3 次领导层会议，并举行了联合军演，目的是加强欧洲高北地区、北大西洋和波罗的海的安全。

英国加强欧洲大国协调，举办英法峰会，致力于欧洲政治共同体建设。英国和法国作为欧洲的主要军事大国，拥有独立的核威慑能力，具有单独或联合对所有兵种进行陆海空全方位部署和行动的能力，它们承诺进一步深化军事合作，“利用英法联合远征军（CJEF）的全部潜能”^②。英法联合将成为塑造欧洲格局的主要力量。如果说过去欧洲一体化的进程主要是由法德驱动的，那么今后的欧洲政治与安全议程或将由英法共同主导。

英国政客不得不承认，“英国的未来影响力将取决于说服和赢得更多的国家，包括英联邦国家、非盟国家、东盟国家以及其他国家”^③。为在全球范围内抗击俄罗斯，英国政府决定“加强与摩尔多瓦、南高加索、西巴尔干、中亚和蒙古的接触，以增进它们的繁荣、安全和抵御俄罗斯干涉的能力”^④。英国正推动欧洲大西洋地区与印太地区的联动与融合，认为这两大地区的“繁荣与安全密切相连”，英国及其“盟友和伙伴间的不断融合正在转化为

① Liz Truss, “The return of geopolitics: Foreign Secretary’s Mansion House speech at the Lord Mayor’s 2022 Easter Banquet”, April 27, 2022, <https://www.gov.uk/government/speeches/foreign-secretarys-mansion-house-speech-at-the-lord-mayors-easter-banquet-the-return-of-geopolitics>

② “UK-France Joint Leaders’ Declaration”, March 10, 2023, <https://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uk-france-joint-leaders-declaration/uk-france-joint-leaders-declaration>

③ James Cleverly, “British foreign policy and diplomacy: Foreign Secretary’s speech, 12 December 2022”, December 12, 2022, <https://www.gov.uk/government/speeches/foreign-secretarys-speech-12-december-2022>

④ HM Government, “Integrated Review Refresh 2023: Responding to a more contested and volatile world”, p.42.

一种新的‘大西洋-太平洋’伙伴关系网络”^①。与盟友、伙伴、志同道合的国家甚至那些不理解英国的国家加强联系，构筑从欧洲到印太再到全球的关系网络，英国正通过联盟的力量塑造自身的全球影响力。

五、结语

俄乌冲突正式爆发前，英国对俄罗斯政策已在悄然改变，从原有的对俄合作转向对俄斗争。俄乌冲突的爆发正好给英国提供了最佳的抗俄理由和平台，英国借机统一国内思想，执政的保守党和反对党工党达成基本共识，即寻找一切手段击败俄罗斯。

英国认识到，以英国现有的实力，无法派遣军队赴乌克兰与俄罗斯军队直接作战。因此，英国全力避免与俄直接对抗，但巧妙地通过军事援助乌克兰和发动对俄经济制裁打击俄罗斯。俄乌冲突走向长期化，英国是其背后的主要推手之一。

英国在重塑欧洲政治格局和全球秩序上煞费苦心，这不仅是因为英国身处欧洲，更重要的是英国代表着盎格鲁-撒克逊精神，必须捍卫英国人引以为傲的价值观和世界观。在英国看来，以经济发展推动政治变革这条改造他国的路径已然失效，其长期构筑的“自由民主”国际秩序或将崩溃，因此在俄乌冲突中必须把斗争前线设在乌克兰阵地上。

【Abstract】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21st century, the UK-Russian relations have undergone a great transformation from cooperation to confrontation. Before the outbreak of the Russia-Ukraine Conflict in 2022, Britain already regarded Russia as the “most acute direct threat to the UK”. After the outbreak of the Russia-Ukraine Conflict, UK-Russian relations, which had deteriorated, collapsed completely. The UK decided to stand with Ukraine and fight against Russia, which profoundly affecte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ussia-Ukraine Conflict

^① HM Government, “Integrated Review Refresh 2023: Responding to a more contested and volatile world”, p.9.

outside the battlefield. The UK supplied Ukraine with a large number of weapons and equipment, adopted various ways to boost the morale of the Ukrainian army, provided lots of military intelligence to help Ukraine in front-line operations, and made Russia pay the price in information and digital warfare. The UK has imposed economic sanctions on Russia, frozen Russian state-owned assets and personal properties in the UK, implemented the decoupling from Russia gradually, and tried to use the frozen Russian assets in the UK to help Ukraine recover. Britain's active participation in the Russia-Ukraine conflict aims to show its justice to the world and further promote its global influence with the help of the alliance.

【Key Words】 Russia-Ukraine Conflict, UK-Russia Relations, Economic Sanctions against Russia, the UK's Assistance for Ukraine

【 Аннотация 】 Со вступлением в XXI век британо-росси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претерпели колоссальную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ю от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к конфронтации. Ещё до начала российско-украинского конфликта Великобритания уже рассматривала Россию как «самую серьёзную непосредственную угрозу». После начала российско-украинского конфликта и без того ухудшившиеся британо-росси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полностью разрушились, Великобритания решила помочь Украине противостоять России, что глубоко повлияло на развитие российско-украинского конфликта за пределами поля боя. Великобритания предоставляет Украине большое количество оружия и техники, применяет различные методы для повышения морального духа украинской армии, предоставляет разведанные для помощи Украине в операциях на передовой и заставляет Россию расплачиваться за информационную и цифровую войну. Великобритания ввела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е санкции в отношении России, заморозила российские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е активы и личное имущество в Великобритании, поэтапно осуществила комплексное расцепление российской экономики и попыталась использовать замороженные российские активы в Великобритании для помощи Украине в восстановлении. Активное участие Великобритании в

российско-украинском конфликте направлено на активное формирование собственного образа «справедливости», опору на силу альянса и дальнейшее усиление своего глобального влияния.

【 关键词 】 Российско-украинский конфликт, отношения Великобритании и России,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е санкции против России, помощь Великобритании Украине

(责任编辑 宋羽竹)

俄乌冲突背景下波兰对俄外交战略溯源 ——“雅盖隆思想”的复兴与波兰东方政策*

宋黎磊**

【内容提要】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波兰采取强硬的对抗与遏制俄罗斯的外交战略。理解这一外交战略，需要回溯波兰政治文化遗产“雅盖隆思想”及其指引下的波兰东方政策。在战略文化的层面，雅盖隆思想是对作为波兰历史“黄金时期”雅盖隆王朝历史记忆的追溯和沿用；在地缘政治的层面，雅盖隆思想强调波兰东方政策的传统，主要战略意图是防范俄罗斯，限制俄罗斯在乌克兰、白俄罗斯以及立陶宛的影响，进而与东部邻国共同建立反俄联盟。19世纪以来，雅盖隆思想共经历了三次复兴。冷战结束后，雅盖隆思想指导下的波兰外交政策的最显著特征，是对欧盟和北约成员国身份的使用。波兰借助雅盖隆思想的文化基础与俄罗斯争夺对俄波中间地带国家的影响力。俄乌冲突以来，波兰已经成为塑造欧洲东部安全秩序的关键角色。雅盖隆思想指导下的波兰外交政策，继续强调波兰对欧洲东部安全秩序的构想和将这一思想变为现实的雄心。但是，雅盖隆思想的复兴无助于弥合目前波兰与俄罗斯分裂的地缘政治主张与利益分歧，甚至会加剧欧洲与俄罗斯意识形态的对抗与冲突。

【关键词】波兰外交战略 俄乌冲突 雅盖隆思想 波兰东方政策

【中图分类号】D851.2**【文章标识】**A**【文章编号】**1009-721X(2023)03-0130(22)

俄乌冲突持续期间，波兰成为欧盟内部的反俄急先锋，其政策目标是成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欧亚互联互通‘瓶颈地带’的机制博弈与中国应对研究”（项目批准号：19BGJ041）的阶段性成果。感谢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2020级本科生万志高同学为本文的材料收集作出的贡献。感谢匿名评审专家和编辑部的意见，本文错漏之处由作者负责。

** 宋黎磊，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外交学系教授。

为塑造欧洲安全的重要角色，进一步提升自己在欧盟外交事务中的话语权。主要政策手段包括：全力支持乌克兰，推动欧盟对俄罗斯进行严苛制裁，追随并紧密配合美国和北约。为何波兰在俄乌冲突中倡导强硬的对俄对抗与遏制政策？探寻其背后的深层次动因，需要追溯到作为波兰对俄外交历史源头的“雅盖隆思想”（the Jagiellonian Idea）。雅盖隆思想所包含的对俄外交立场，体现了波兰的历史记忆以及波兰的战略文化。依托这一思想的“波兰东方政策”（polska polityka wschodnia），主要战略意图就是防范俄罗斯对波兰的威胁。冷战结束后，波兰一直积极将欧盟和北约的东向政策“波兰化”。这一波兰政治思想遗产，随着俄乌冲突的加剧，得到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和讨论。

雅盖隆思想是波兰重要的政治文化遗产，可以追溯到波兰王国历史早期的雅盖隆王朝。从雅盖隆王朝建立起，波兰开始成为中东欧地区最强盛的国家。这一王朝在16世纪中叶通过卢布林联合（Union of Lublin）而演化为波兰-立陶宛联邦（Królestwo Polskie i Wielkie Księstwo Litewskie）。当时的版图包括今天的波兰、立陶宛、乌克兰、白俄罗斯，是欧洲仅次于俄国的第二大国家，国土面积达100万平方公里，人口近1100万。这一时期被称为波兰的黄金时代，其强盛体现在内部发展和对外关系两个方面。在内部发展方面，1505年，波兰的中等贵族通过了一项宪法性的决议。根据这一决议，波兰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两院贵族民主制（Aristocratic Democracy），这是近代欧洲最早的议会制度。在这一贵族民主制度下，由贵族控制的议会决定国家大事，国王并不拥有无限的权力，约有占全国10%人口的居民（全体贵族）参与国家政权。这一制度保障了对外关系作为内政的延伸。波兰和立陶宛1569年，波兰和立陶宛在卢布林签订了合并法令，共同组建了统一的波兰共和国，史称“波兰第一共和国”。

虽然波兰-立陶宛联邦时期从未用“雅盖隆思想”指代当时联盟的历史和政治愿景，但该政治联盟的合作从1569年一直延续到1795年。政治联盟显著推动了文化和政治发展。^①雅盖隆思想在后来的历史条件下被不断提及。

① See Kuczyński S. M., *Idea jagiellońska*, in *Pamiętnik VIII Powszechnego Zjazdu Historyków Polskich w Krakowie 14-17 września 1958 r. Referaty (part 2)*, Warszawa, 1958, pp.322-333.

一些学者认为，“雅盖隆思想意味着在外交政策中采取对进攻性的帝国主义政策的反对立场”^①。雅盖隆思想因此成为波兰历史思潮的核心组成之一，至少包含内部政治文化和对外政策偏好两重含义。在内部政治文化的层面，雅盖隆思想是对作为波兰历史上“黄金时期”雅盖隆王朝历史记忆的追溯和沿用；在对外政策偏好上，雅盖隆思想则强调波兰对其东部邻国的态度。^②

本文从外交思想史角度出发，对雅盖隆思想的历史和理论脉络进行梳理，通过回溯波兰依托雅盖隆思想塑造其外交战略的发展脉络与波兰东方政策的选择，探究当前俄乌冲突情境下，为何波兰对俄采取强硬对抗与遏制的外交战略。并通过研究波兰的个案，进而观察中东欧国家的历史思潮对自身外交战略选择的影响，展望俄乌冲突爆发后欧洲的政治与外交秩序。

一、关于雅盖隆思想的相关研究

国内学者对雅盖隆思想的研究多与波兰外交政策研究相关。从内容来看，这类研究成果主要聚焦三组关系：波兰与欧盟、北约的关系，波兰与俄罗斯的关系，波兰与周边国家、中东欧地区的合作关系。相关论文包括对波兰外交政策中的“海间联邦”构想的考察，对波兰参与的魏玛三角、维谢格拉德集团和卢布林三角三个区域合作机制的分析。^③对 21 世纪初波兰东方政策的考察主要分为三个方向：波兰对俄罗斯的政策，对乌克兰、白俄罗斯和南高加索等东欧中亚国家的政策，以及谋求成为地区内有影响的大国。^④此外，尽管并未明确使用“雅盖隆思想”一词，国内学者在讨论波兰的对外政策时已经广泛涉及了雅盖隆思想指引下的波兰外交行为的核心特征：一方面，波兰与俄罗斯争夺影响力，尤其是对于那些在俄波之间摇摆国家的影响力；另一方面，波兰想要将自身打造成中东欧的中心国家，以波兰为主导、

^① Hubert Królikowski, “Echoes of Jagiellonian Idea in the Present Polish Military Assistance Programs”, *Politeja*, 2017, Vol.51, No.6, pp.191-192.

^② Z. Norkus, *An Unproclaimed Empire. The Grand Duchy of Lithuania. From the Viewpoint of Comparative Historical Sociology of Empires*, Abingdon: Routledge, 2018, pp.264-265.

^③ 参见宋黎磊：“‘海间联邦’构想与波兰外交思想溯源”，《俄罗斯研究》，2022 年第 6 期，第 107-128 页。

^④ 参见赵艳霞、唐更田：“21 世纪初波兰的东方政策及其制约因素”，《俄罗斯学刊》，2013 年第 4 期，第 45-53 页。

中东欧国家为整体，进而形成对俄的制衡。

国外学者对雅盖隆思想的研究论述角度相对多样，但总体而言也与国内研究成果存在相似之处，即雅盖隆思想既单独构成讨论主题，又在区域国别研究的视角下作为讨论波兰内政外交时广泛参考的背景性材料。这种关联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主题的讨论中：第一，20世纪初波兰领导人毕苏斯基和德莫夫斯基对波兰前景的辩论，通常被认为是雅盖隆思想和皮亚斯特思想的一次重要交锋；^①第二，随着近年来波兰积极参与中东欧地区合作，一些关于波兰的中东欧地区合作政策，尤其是关于三海倡议的讨论，也会追溯其思想渊源及雅盖隆思想的影响。^②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雅盖隆思想的概念得到了广泛使用，但不同学者对雅盖隆思想的界定并不完全一致。就范围而论，一些学者认为，雅盖隆思想是一种外交风格或政体形式，而另有学者指出，雅盖隆思想是一种基于历史、想象、并贯穿波兰内政外交的政治和战略文化。从侧重点看，一些学者强调，雅盖隆思想表达了波兰国内政治的宽容，而另一些学者指出，雅盖隆思想显示了对俄罗斯的制衡和遏制。但共识是，学者们普遍承认，雅盖隆思想是对波兰历史上雅盖隆王朝历史记忆的沿用，包含了对波兰国家身份的理解和对外政策偏好。“统一东欧国家的想法起源于雅盖隆时期，后来被称为雅盖隆思想，是一种特殊政治文化的例子，这种政治文化是建立在各国和平合并，或者更确切地说，是统一为一个共同治理的政治实体基础之上的。”^③雅盖隆思想是一个政治系统，主要目的在于“吸引波兰自愿加入或与包括喀尔巴阡山脉和波罗的海之间地理区域的邻国结成联盟……雅盖隆思想一方面意味着在外交政策上反对外部大国的干涉，另一方面在国内政治的各个领域采

① 相关研究可参见邢媛媛：“波兰政治思想中的俄罗斯——毕苏茨基与德莫夫斯基思想的比较”，《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5年第2期，第54-61页；Waldemar Paruch, “Between Political Nation and Ethnic-Cultural Nation: Nations in Central Europe in the 20th Century”, *Politeja*, 2018, Vol.57, No.6, pp.108-110, p.117.

② See Andrea Schmidt, “From Intermarium to the Three Seas Initiative-Regional Integrations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and the Hungarian Foreign Policy”, *Politeja*, 2017, Vol.51, No.6, pp.165-190.

③ Monika Banaś, “The Jagiellonian Idea as Expression of Political Culture: Core Constitutive Values and Their Possible Contemporary Implementations”, *Politeja*, 2017, Vol.51, No.6, p.37.

取尽可能广泛的自治形式。”^①思想史视角的研究认为，雅盖隆文化是波兰重要的政治思想传统，雅盖隆文化特征包括两个核心组成部分，一是更愿意对人性作善而非恶的前提假设，二是意识到个体对国家的义务。^②

在历史取向的研究中，学者们试图从“一种建设一个国家联邦的战略”和“一种政治文化”两个角度对雅盖隆思想进行解释，认为前者是一段历史事实，以 1569 年的卢布林联合为顶点，后者则包括两项主要内容：一是对潜在合作伙伴的信任，二是人们宣扬雅盖隆思想的缘由。^③相关研究认为，雅盖隆思想经历了三次复兴，第一次复兴发生在 19 世纪下半叶，第二次复兴发生在一战结束后，第三次复兴发生在冷战结束后，三次复兴均支持波兰在中东欧具有独特使命的合法性。学者们认为，尽管人们对雅盖隆思想的理解并不一致，但雅盖隆思想本身的规范性潜力使得其一直延续并可能在 21 世纪继续发挥作用。^④1989 年以后的波兰东方政策来源于雅盖隆思想并包含着弥赛亚的色彩，强调波兰在东方独特的文明使命与对波兰-立陶宛联邦的认同。^⑤

政策取向的研究回顾了雅盖隆思想对波兰东方政策的影响，尤其着重讨论了雅盖隆思想在 1945 年后的变迁，还包括雅盖隆的历史遗产，以及对波兰、波兰与邻国关系的影响。从当下波兰对邻国的政策中可以看出与雅盖隆思想相关的文化使命，但是，这些国家之间不同的历史记忆也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他们与波兰关系的紧张。^⑥有学者认为，当前波兰的军事计划参考了雅盖隆思想，并以波兰地区安全援助计划（RESAP）、区域领土防御中心倡议、区域军事合作的专业化平台和与北约东翼内外的伙伴合作等为例进行了阐

① Hubert Królikowski, “Echoes of Jagiellonian Idea in the Present Polish Military Assistance Programs”, *Politeja*, 2017, Vol.51, No.6, pp.191-192.

② See Monika Banaś, “The Jagiellonian Idea as Expression of Political Culture: Core Constitutive Values and Their Possible Contemporary Implementations”, *Politeja*, 2017, Vol.51, No.6, pp.27-40.

③ Ibid.

④ See Dorota Pietrzyk-Reeves, “The Revivals of the Jagiellonian Idea: Political and Normative Contexts”, *Politeja*, 2017, Vol.51, No.6, pp.79-94.

⑤ M. Mróz, “Historyczne uwarunkowania polityki wschodniej III RP”, in A. Gil, T. Kapuśniak (eds.), *Polityka wschodnia Polski: uwarunkowania, koncepcje, realizacja*, Instytut Europy Środkowo-Wschodniej, 2009, p.17.

⑥ See Christopher Reeves, “The Jagiellonian Idea and Poland’s Eastern Policy: Historical Echoes in Today’s Approach”, *Politeja*, 2017, Vol.51, No.6, pp.141-164.

释。^①相关研究还讨论了雅盖隆思想对罗马教宗约翰-保罗二世的影响。约翰-保罗二世受到奥斯卡·哈莱茨基（Oskar Halecki）和瓦迪斯瓦夫·布科文斯基神父（Father Władysław Bukowiński）的影响，他在担任教宗期间宣扬雅盖隆思想，对 20 世纪后期波兰的现实政治产生了深刻影响。^②

在外交思想方面，一方面，学者们认为雅盖隆思想对现代波兰外交的影响要回溯到波兰-立陶宛联邦、俄罗斯帝国和苏联时代的波兰人对俄罗斯的刻板印象。这被一些学者总结为波兰的“恐俄症”。^③学者们回顾了 1989 年以后波兰东部的安全环境和波兰东方政策的演进态势，强调“恐俄症”在波兰东方政策中所扮演的非理性因素。这导致了波兰东方政策的目的就是确保可以抵御来自俄罗斯的安全威胁。^④另一方面，波兰外交强调这一历史观带来的独特信念和对其他中东欧国家所怀有的特殊使命感。波兰梦想成为中东欧地区的大国，立陶宛、白俄罗斯和乌克兰被波兰视为这一地缘抱负中的重要利益区和政治伙伴。波兰精英认为，这是对白俄罗斯、立陶宛和乌克兰国家的“道德义务”。^⑤

二、雅盖隆思想复兴溯源

（一）复国愿景：雅盖隆思想的第一次复兴

19 世纪下半叶，随着近代民族主义的传播，加上数次起义和抗争，波兰的社会思潮风起云涌，当时的历史学家将波兰-立陶宛联邦视为波兰历史上的黄金时代，这一愿景对大众意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一时期也被称为雅盖隆思想的第一次复兴。1795 年以后，波兰一度被从欧洲的地图上抹去，

^① See Hubert Królikowski, “Echoes of Jagiellonian Idea in the Present Polish Military Assistance Programs”, *Politeja*, 2017, Vol.51, No.6, pp.191-212.

^② See Paweł Kowal, John Czekalski, “The Last Jagiellonian: John Paul II and the Jagiellonian Idea”, *Politeja*, 2017, Vol.51, No.6, pp.117-140.

^③ [美]雷蒙德·塔拉斯：“波兰的长期恐俄症？精英和大众态度的比较”，《俄罗斯研究》，2014 年第 1 期，第 22 页。

^④ See Karol B. Janowski, “The dilemmas of the Eastern Policy of the Republic of Poland. From dynamic equilibrium to imbalance”, *Przegląd Politologiczny*, 2014, Vol.14, No.3 pp.119-134.

^⑤ See Agnieszka K. Cianciara, “‘Eastern Partnership’ – opening a new chapter of Polish Eastern policy and the European Neighbourhood Policy?” *Institute of Public Affairs Opinions*, 2008, Vol.73, No.4, pp.14-15.

直至 1918 年才重获新生。1859 年卢布林联盟成立 300 周年之际，当时就有学者提出，波兰与立陶宛的联合证明了波兰在东方的历史使命，即将西方基督教带到异教徒的土地上，波兰国王索别斯基曾在 1683 年率基督教联军驰援维也纳，击败奥斯曼军队，消除了奥斯曼帝国对基督教世界的威胁。因此波兰还作为“基督教堡垒”保卫欧洲大陆，抵御了“来自东方的入侵”。雅盖隆思想复兴的第一个动因是追求民族复兴，以动员波兰人对抗他们在普鲁士、奥地利或俄国统治下面临的各种威胁。“雅盖隆的历史可以和成功的反俄战略与文明使命联系在一起”^①。

1905 年革命爆发以后，波兰王国需要考虑如何应对德国支持的奥匈帝国与俄国之间日益加剧的可能的冲突，这对波兰政治思想家的思考方向产生了重要影响。当时学者们就在争论波兰共和国介入东方事务是否必要，因为介入东方事务会转移对欧洲西部更重要问题的注意力。^②作为两种主要思潮的代表性人物，波兰领导人毕苏斯基和德莫夫斯基的辩论成为这一时期的焦点。就两者的外交政策偏好而言，毕苏斯基对波兰-立陶宛联邦的传统推崇备至，将沙皇俄国视为波兰独立最大的障碍，提倡积极的东方政策，主张在俄占波兰发动武装起义以取得独立。与之相反，德莫夫斯基将现代民族主义引入波兰，认为德国帝国主义才是波兰民族生存的根本威胁，提倡俄波和解与新斯拉夫主义，主张以争取沙皇统治下的自治作为独立的第一步。^③

（二）故国重建：雅盖隆思想的第二次复兴

历史的进程无疑对思想的争辩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和毕苏斯基的掌权，雅盖隆思想成为波兰外交政策事实上的指导思想，这一时期的雅盖隆思想复兴发生在 1918 年波兰重获独立后不久，也被称为雅盖隆思想的第二次复兴。

几乎与一战结束同时，在协约国的支持下，波兰共和国在从德国、奥地利和苏俄收复的领土上重建。波兰人认为它是 1795 年被俄、普、奥三国瓜

^① Dorota Pietrzyk-Reeves, “The Revivals of The Jagiellonian Idea: Political and Normative Contexts”, *Politeja*, 2017, Vol.51, No.6, p.84.

^② See Maternicki J., “Stanisław Smolka i powrót historiografii polskiej do mitu jagiellońskiego”, *Przegląd Humanistyczny*, 1989, Vol.33, No.1, pp.83-101.

^③ Norman Davies, *Heart of Europe: The Past in Poland's Presen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120.

分的波兰共和国的继承者。波兰重建后，毕苏斯基利用复杂的大国关系，试图从德国和苏俄手中收复失地，确立波德边界和波苏边界。^①雅盖隆思想此时被视为一种新的政治秩序的愿景。在这种秩序中，该地区国家可以再次团结起来反对俄罗斯的专制统治。^②这个政治实体被设想以波兰为主导、中东欧国家作为一个整体以对俄国形成制衡。鉴于波兰-立陶宛联邦在历史上曾经对抗莫斯科和其他来自亚洲的民族对西方基督教的挑战，这一政治实体被称为基督之盾（*Antemurale Christianitas*）。^③为了恢复东部的“历史边界”，毕苏斯基拒绝了以民族原则为依据确定东部边界的建议，并且在 1920 年发动了大规模的对苏战争。

1945 年，波兰人民共和国建立，这一时期雅盖隆思想在波兰流亡者圈子中得到了继承和发展。尤利乌什·米罗茨维奇在 1973 年发表于《文化》（*Kultura*）月刊上的文章里，提出过一项“综合了毕苏斯基的联邦主义传统和德莫夫斯基的民族主义传统”的计划，政治家耶日·盖德罗埃茨（*Jerzy Giedroyc*）早在 1947 年也提出过类似的计划：这一计划假设苏联将会崩溃，并建议波兰应当永久承认目前的边界并支持立陶宛等国的民族独立。与此同时，加强和深化与立陶宛、白俄罗斯，尤其是与乌克兰的关系。欧洲和平只有在东西方中间地带的四个国家密切合作的情况下才能实现。^④设在伦敦的波兰流亡政府在 1989 年解散之前的官方立场，也一直是“波兰应该重新商榷东部边界”^⑤。不过，盖德罗埃茨等人的思想逐渐在波兰国内传播开来，在 20 世纪 80 年代对团结工会等产生了深刻的影响，^⑥并在冷战结束后成为波兰对外政策的重要思想资源。

① Adam Starzyk, Natalia Tomaszewska, “Conception of Intermarium in Polish Foreign Policy in XXI Century”, *Torun International Studies*, 2017, Vol.10, No.1, p.20.

② See Haskins C. H., Lord R. H., *Some Problems of the Peace Conferenc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20, pp.164-165.

③ See Dorota Pietrzyk-Reeves, “The Revivals of The Jagiellonian Idea: Political and Normative Contexts”, *Politeja*, 2017, Vol.51, No.6, pp.86-88.

④ J. Mieroszewski, *Listy z Wyspy. ABC polityki ‘Kultury’*, Paris-Kraków: Arkady, 2012, p.161.

⑤ [美]蒂莫西·斯奈德著：《民族的重建：波兰、乌克兰、立陶宛、白俄罗斯：1569-1999》，潘梦琦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20 年，第 293 页。

⑥ See Timothy Snyder, “Federalism and Nationalism in Polish Eastern Policy”, *Georgetow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2003, Vol.4, No.1, pp.115-116.

在意识形态层面，二战之后波兰虽然成为社会主义国家，但宗教的影响并未在这个国家消失，统一工人党领导着波兰的“世俗世界”，天主教会控制着波兰人的“精神世界”。^①1978 年 10 月 16 日，波兰人、克拉科夫都主教卡罗尔·沃伊蒂拉当选教皇，即约翰-保罗二世。教宗约翰-保罗二世在任期间，积极参与现实的政治活动，对 20 世纪 80 年代的波兰政局产生了重要影响。^②教宗版本的雅盖隆思想在实际上成为波兰的一个政治纲领——这一点可以在约翰-保罗二世就任之初的声明和行动中得到证实。1979 年 6 月，保罗二世访问祖国，告诫波兰人“接受以波兰名义所拥有的全部精神遗产”，“永远不要与自己的根源割裂”。^③1991 年之前，教皇的观点主要表现在他对苏联及其在东欧的统治的态度上。“从 1991 年起，约翰-保罗二世在关于独立波兰的政策、与邻国的关系、波兰人与少数民族和宗教少数群体的关系等方面的讲话中，使用了雅盖隆式的波兰思想”^④。

三、融入西方：雅盖隆思想的第三次复兴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东欧剧变，雅盖隆思想正式回到波兰外交政策辩论的舞台。在外交政策方面，雅盖隆思想不再是乌托邦理念，而是应对冷战后出现的地缘政治真空的一种现实解决方案。作为“皮亚斯特思想”和“雅盖隆思想”辩论在 20 世纪末的翻版，这一时期的波兰外交政策辩论通常被称为“极简主义（Minimalists）”和“浪漫主义（Romantics）”之争。浪漫主义思想与波兰-立陶宛联邦的历史遗产密切联系。浪漫主义强调波兰与过去曾是波兰-立陶宛联邦组成部分的国家的联系，表达了波兰作为向东方传输西方价值之纽带的使命感。极简主义则挑战了波兰-立陶宛联邦这一历史遗产。极简主义对波兰与乌克兰结盟是阻止俄罗斯重返帝国主义的唯一路径

① 孔田平：“波兰在乌克兰危机中的行为及其根源”，《俄罗斯学刊》，2018 年第 4 期，第 30-46 页。

② 参见刘义、任方圆：“‘宗教冷战’与美国-梵蒂冈的‘神圣同盟’”，《国际政治研究》，2022 年第 4 期，第 135-139 页。

③ Norman Davies, *Heart of Europe: The Past in Poland's Presen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286.

④ Paweł Kowal, John Czekalski, “The Last Jagiellonian: John Paul II and the Jagiellonian Idea”, *Politeja*, 2017, Vol.51, No.6, p.136.

提出质疑。冷战结束以来，尽管存在政党轮替和地缘环境变迁等因素，“浪漫主义”却始终为冷战后波兰东方政策的主基调，“卡钦斯基兄弟的时代”可以被视为波兰浪漫主义思想的顶点，但图斯克的行动也没有完全放弃浪漫主义战略，即使他在与俄罗斯交往时更务实，更少对抗”^①。

表 1 “雅盖隆思想”三次复兴的示意图

阶段	第一次复兴	第二次复兴	第三次复兴
时间	19 世纪后半期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	冷战结束以来
地缘特征	波兰被沙俄、普鲁士和奥地利分区占领	第一次世界大战，俄罗斯帝国时期结束，波兰与苏俄之间出现“中间地带”	冷战结束，苏联解体，苏东阵营瓦解
主要倡导者	卡罗尔-萨伊诺查（Karol Szajnoch）、亚当·密茨凯维奇等	毕苏斯基、约瑟夫·贝克、瓦茨米兹-瓦卡尔（Włodzimierz Wakar）等	以卡钦斯基兄弟和安杰伊·杜达为代表的法律与公正党（PiS）
主要观点	波兰在东方有着神圣的使命，要将西方的基督教带到异教徒的土地上；这一使命有着重要的经济和战略的内涵	建立独立的波兰国家，与俄国/苏联争夺对原波兰-立陶宛国家领土的影响力	与俄罗斯争夺对中东欧国家的影响力；成为欧盟和北约的东部桥头堡，并向东传播波兰化的“民主”思想
主要竞争对手	克拉科夫历史学派	以罗曼·德莫夫斯基为代表的国家民主党	以唐纳德·图斯克为代表的公民纲领党（PO）
对现实政治的主要影响	影响了 19 世纪后半期的波兰民族独立运动	“海间联邦”构想	波兰东方政策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雅盖隆思想的复兴在各个历史时期都至少包含内部政治文化和对外政策偏好双重意涵。首先，雅盖隆思想具有政治文化意涵，强调波兰-立陶宛联邦的政治实践及对西方文明的持久贡献。长久以来，雅盖隆思想为中东欧地区的政治组织形式提供了借鉴，在地方自治和文化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实现了宗教、民族和语言差异的和平共处。概言之，波兰-立陶宛联

^① Melchior Szczepanik, “Between a Romantic ‘Mission in the East’ and Minimalism: Polish Policy Towards the Eastern Neighborhood”, *Perspectives*, 2011, Vol.19, No.2, p.55.

邦留下的这些持久遗产或不断变化的历史地理环境中的政治愿景，是雅盖隆思想的第一重意涵。在这一思想的复兴中，它不仅指过去的历史现实，还关系到未来的波兰国家地位。雅盖隆思想存在于波兰人的历史记忆中，并在需要重新思考波兰民族或波兰国家未来政治发展的基本问题时，被重新发掘。在此基础上，雅盖隆思想无疑被赋予了意识形态的色彩，这种意识形态源自对波兰-立陶宛联邦历史的再阐释，宗教、政治哲学甚至更加抽象的“文明使命”都参与到这一阐释的过程中，从而塑造了雅盖隆思想在不同时期的不同侧重。^①

第二种含义是受历史经验启发的对外政策偏好。作为中东欧地区极为重要的国家，上千年来剧烈的领土和政权变迁对波兰的政治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从 17 世纪中叶起，在经历了俄波战争（1654-1667）、波瑞战争（1655-1660）和波土战争（1672-1699）之后，波兰开始走向衰落，在 18 世纪后期遭到俄、普、奥三次瓜分。波兰于 1918 年重获独立后不久，承担了重塑自己领土边界并在中欧界定自己空间的艰巨任务，雅盖隆思想在第二种含义上的复兴就发生了。维托尔德·卡米涅茨基（Witold Kamieniecki）在 1929 年将雅盖隆思想定义为一种合作制度，内容包括将位于波罗的海和喀尔巴阡山脉之间的邻近领土聚合到波兰。^②

四、雅盖隆思想对波兰东方政策的形塑

在受雅盖隆思想影响的波兰政治术语中，传统上的“东方”是指波兰的东部近邻，即“俄罗斯以及曾经属于波兰第一共和国和第二共和国版图的立陶宛、白俄罗斯、乌克兰等”^③。波兰的东方政策因此包括对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政策。冷战时期，苏联是波兰东方政策的核心。苏联解体后波兰东方政策的核心议题，过渡到波俄、波白、波乌关系。

① Jörg Hackmann, “The Historical Role of Central-Eastern Europe”,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1944, Vol.232, No.1, p.12.

② See O. Halecki, “Idea jagiellońska”, *Kwartalnik Historyczny*, 1937, Vol. 51, No.1-2, pp. 486-510.

③ 赵艳霞、唐更田：“21 世纪初波兰的东方政策及其制约因素”，《俄罗斯学刊》，2013 年第 3 期，第 46 页。

波兰的东方政策是与西欧的德国和法国截然不同的战略思想。与俄罗斯建立合作关系，是德法两国的政治目标。而对于波兰而言，主要的外交目标是保持东部邻国的主权独立，并拉拢他们与自己共同建立一个反俄联盟。

在 1999 年与 2004 年相继加入北约与欧盟之后，波兰获得了西部边界的“安全”，这时，来自俄罗斯方面的安全威胁成为首要关切。历史的记忆被当作现实的政治。于是，波兰将 2% 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用于国防开支（在俄乌冲突爆发前，只有少数国家达到这一北约标准）。波兰的国防开支一方面用于扩大军队人数，另一方面用于进行军队体系现代化改革，以进一步加强波兰保卫自己东部边境的能力。与此同时，波兰希望助推乌克兰、白俄罗斯的政治民主化进程，最终促使这些国家加入欧盟，那么波俄之间将重新出现一个战略缓冲地带。^①

波兰对雅盖隆思想的沿用还存在与俄罗斯开展意识形态竞争的动机。包括普京在内的俄罗斯部分政治精英长期秉承泛斯拉夫主义（Pan-Slavic ideology），这与波兰第三共和国所构建的波兰民族认同形成竞争。泛斯拉夫主义的核心观点是，同为东部斯拉夫人的俄罗斯人、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拥有共同的文明起源，俄罗斯国家（或者历史上的帝国）及其人民（拥有共同的斯拉夫血缘和东正教信仰的人）是有机统一的整体。这暗示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这些现代国家在今天和未来都应该共享政治命运。这个共同体以俄罗斯为核心，以“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这一东斯拉夫民族地区为基础。^②这一观点的推论是，独特的乌克兰和白俄罗斯身份是广义的“历史俄罗斯”的产物，他们各自的民族身份是人为的，因此是脆弱的。脱离“历史俄罗斯”的乌克兰和白俄罗斯身份是外国力量操纵的产物，这也构成了西方利用乌克兰（和白俄罗斯）推动反俄议程的一部分。

俄国、普鲁士和奥地利在 18 世纪对波兰领土进行了三次瓜分。在 1830 年、1864 年波兰人起义失败后，波兰王国被并入沙俄帝国，被称为“维斯瓦边区”，由沙皇任命的总督直接统治，波兰从而受到了东斯拉夫文明影响。

^① See Mirosław Habowski, “Polityka wschodnia rządu Donalda Tuska”, *Wschodnioznawstwo*, 2011, Vol.90, No.5, pp.89-91.

^② 冯绍雷：“当代俄罗斯外交研究的方法论刍议——基于主体、观念、结构与周期的考察”，《俄罗斯研究》，2021 年第 2 期，第 47-48 页。

雅盖隆的第三次复兴在某种意义上是波兰要对抗和消解俄罗斯的这些历史叙事，回到波兰-立陶宛联邦的雅盖隆思想传统中去。^①波兰虽然已经是欧盟与北约的正式成员，波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2021 年）已经达到 13580 欧元，经济总量列欧盟第 6 位，^②然而这些并没有动摇波兰人民的“苦难的例外主义”信仰。^③在波兰亡国的 123 年间，天主教会为延续波兰民族身份和文化发挥了重要作用。波兰人的宗教受难意识更是深入民族骨髓。1832 年波兰诗人密茨凯维奇在其剧作和诗作中，首次表达了波兰的“弥赛亚情结”（指基督教传教士向全世界推广自己信仰与价值观的强烈愿望），认为波兰就是“国家中的基督”（*Chrystus narodów*），波兰的受难将拯救整个欧洲。2019 年的一项调查显示，74% 的波兰人认为他们的国家在历史上遭受的苦难比其他任何国家都要多。在 18 岁至 29 岁的人群中，这一比例为 67%。这意味着，即使是除了加入欧盟以外从未亲身经历过此前任何重大事件的波兰人也相信，他们的国家因自己经历的艰辛而与众不同，高尚地输给了更强大的对手，并在失败中找到了道德上的胜利。^④和一百年前一样，这样的关于自我形象的定位在今天的波兰依然受欢迎。无论是繁荣、民主还是新的领导人，都没有让波兰自动治愈旧伤，也没有改变这个国家对自身和历史的看法。波兰认为自己在二战中扮演的角色是特殊的，且仍有资格获得世界上其他国家的特殊对待。波兰社会的很大一部分人仍然认为实用主义和妥协是卑微且有失尊严的，而对抗更强大对手的无望战役是一种荣誉，也是国家责任的彰显。

在政策层面，波兰主要通过三种方式推行东方政策：第一种是利用地区热点事件；第二种是争取欧盟和北约东方政策的“波兰化”；第三种是主导地区合作。突发事件往往会引发政治上的轰动，因此政治家经常选择这样的時候表达立场。冷战结束以来，在地区热点问题上，波兰极少缺席，热点冲

① Maternicki J., “Początki mitu jagiellońskiego w historiografii i publicystyce polskiej XIX wieku: Karol Szajnocha i Julian Klaczko”, *Przegląd Humanistyczny*, 1988, Vol.32, No.11-12, p.48.

② “波兰国家概况”，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2023 年 4 月，https://www.mfa.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oz_678770/1206_679012/1206x0_679014/

③ Alexander A. Nosovich, “Where Is Poland Heading? Warsaw’s Eastern Policy in the Context of ‘Polish-Polish War’”, *Russia in Global Affairs*, 2022, Vol.20, No.1, pp.167-168.

④ Maxim Samorukov, “Can Russia and Poland Ever Overcome Their Historical Differences?” *Carnegie Moscow Center*, June 8, 2021, <https://carnegiemoscow.org/commentary/85115>

突成为波兰表达自身立场和推进东方政策的重要资源。2004年乌克兰爆发“橙色革命”，波兰积极介入。“橙色革命”爆发后第一周，时任波兰总统克瓦希涅夫斯基率领的波兰代表团就来到基辅独立广场，表示对乌克兰反对派的支持。2008年，俄格战争期间，时任波兰总统卡钦斯基曾飞赴格鲁吉亚，表明对格鲁吉亚的支持。2014年乌克兰危机期间，应时任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的请求，波兰成为第一个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的国家。2020年波兰发布新版《国家安全战略》，该文件认为俄罗斯正在大力发展其进攻性军事能力，是波兰最大的安全威胁。^①

波兰积极将欧盟和北约的东方政策“波兰化”，努力希望成为这两个组织的“东部问题专家”，并借助欧盟和北约成员国的身份及有利的地理位置，来实现自身的地缘政治抱负。2008年5月，波兰与瑞典一起向欧盟理事会提出关于欧盟与东欧邻国建立“东部伙伴关系”的建议。2009年5月9日，在布拉格举行的欧盟峰会上，“东部伙伴关系”正式启动。2011年下半年，波兰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更加积极推动“东部伙伴关系”政策，并在华沙召开东部伙伴（关系）峰会。波兰还积极推进北约在波建设永久基地和反导系统，目的是确保自身的安全，同时对俄罗斯形成战略威慑。

在主导地区合作方面，作为中东欧地区除德国和俄罗斯之外综合国力最强的国家（显著领先于该地区的其他国家），波兰多次发起地区合作项目，力图引领中东欧地区的合作。2015年，波兰和罗马尼亚共同发起成立“布加勒斯特九国机制”（Bucharest Nine/B9），强化北约东翼的防务合作；2016年，波兰与克罗地亚共同发起“三海倡议”，力图加强中东欧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2020年，波兰与立陶宛、乌克兰发起成立“卢布林三角机制”，加强三国安全合作。这些项目大多以促进地区合作为主要特征。但对中东欧地区而言，地区合作涉及地区概念的界定，而这包含了区域合作背后隐含或明示的有关外交偏好的政治考虑。正如有评论所指出的，“所有关于波兰国际关系的辩论，都是被其不可更改的位于德国和俄国之间的位置决定的”^②。

^① Se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Republic of Poland 2020”, Poland National Security Bureau, May 12, 2020, https://www.bbn.gov.pl/ftp/dokumenty/National_Security_Strategy_of_the_Republic_of_Poland_2020.pdf

^② Norman Davies, *Heart of Europe: The Past in Poland's Presen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125.

五、俄乌冲突下波兰的外交选择：雅盖隆思想的再复兴

2022 年爆发的俄乌冲突对欧洲安全局势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武装冲突再次出现在欧洲东部地区。波兰东方政策的重要性也因此大幅提升。按照 2023 年初杜达总统向驻波兰的外交使团发表的讲话中的提法，“从去年（指 2022 年）年初开始，波兰已经成为全球事件的中心”^①。为了应对这一新形势，在东部面对、抵制俄罗斯成为波兰外交政策的偏好，再次体现出鲜明的雅盖隆思想影响。波兰在推动欧盟对俄制裁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自 2022 年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欧盟先后通过了 11 轮对俄制裁，而“波兰是对莫斯科实施严厉制裁的主要倡导者”^②。对俄罗斯的强硬和不妥协的姿态延续了波兰东方政策的传统。对抗和遏制俄罗斯贯穿了波兰外交战略的三个“基本面向”：第一，加强大西洋主义取向，波兰政府将自身定位为美国在欧洲最可信赖的盟友，充当北约东翼前沿的排头兵。第二，作为乌克兰事实上的盟友，波兰将支持乌克兰作为国家利益的一部分。波兰搁置了与乌克兰相互竞争的民族主义的历史叙事，支持乌克兰，将共同反俄作为优先事项。第三，波兰利用俄乌冲突，加强自身在欧盟内部的影响力。为此，波兰指责法德在对俄态度上的长期软弱和不作为。通过强调“反俄挺乌”的立场来加强波兰在欧盟的核心作用。

在具体外交政策中，波兰的外交战略偏好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支援乌克兰，加强与美国的战略合作，在多边机制中发挥影响力和增强分量。首先，在对乌克兰提供援助的态度方面，波兰的公开表态是继续尽一切努力确保乌克兰击败俄罗斯军队并重新获得对其所有国际公认领土的主权，支持乌克兰成为欧盟和北约成员。^③自 2022 年 2 月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波兰采取了多种途径支持乌克兰。在外交方面，波兰总统杜达先后多次访问乌克兰，成为访

① “Address by the President at Meeting with the Diplomatic Corps”, January 12, 2023, <https://www.president.pl/news/address-by-the-president-at-meeting-with-the-diplomatic-corps>, 63257

② “EU’s work on new sanctions too slow says Polish ambassador”, January 24, 2023, <https://www.pap.pl/en/news/news%2C1525183%2Ceus-work-new-sanctions-too-slow-says-polish-ambassador.html>

③ See “Polish foreign minister presents 2023 foreign policy priorities”, April 13, 2023, <https://tvppworld.com/69145287/polish-foreign-minister-presents-2023-foreign-policy-priorities>

问乌克兰次数最多的外国领导人，还多次与泽连斯基举行电话会晤或在多边平台上会晤以表达支持。^①总理莫拉维茨基和部长级官员也与乌克兰开展了密切的沟通与协调。2023年4月5日，泽连斯基在俄乌冲突爆发后首次访问华沙，波兰总统杜达向泽连斯基保证，波兰将继续支持乌克兰，并在2023年7月北约维尔纽斯峰会举行之前为乌克兰寻求额外的安全保障。杜达总统还重申波兰对乌克兰未来加入欧盟和北约的支持。两国总统还讨论了未来的经济合作和“棘手”的历史话题。双方强调要建立一种诚实、可靠的历史记忆。^②在援助方面，自俄乌冲突升级以来，波兰累计承诺了10亿欧元的金融援助、1.8亿欧元的人道主义援助和18.2亿欧元的军事援助，承诺的总额仅次于美国、英国和加拿大。^③波兰成为乌克兰难民重要的暂居国或过境国：根据联合国难民署数据，截至2023年3月，波兰累计为超过156万的乌克兰难民提供了临时性保护或类似国家保护（Temporary Protection or Similar National Protection）。^④波兰向乌克兰援助了主战坦克、自行榴弹炮以及其他各型轻重武器装备和弹药，还为乌克兰士兵提供培训。^⑤

波兰在北约安全框架下加强与美国的战略合作。波兰积极利用俄乌冲突带来的地缘政治机会，希望借此加强自身在北约东翼的分量。一方面，自俄乌冲突升级以来，作为与乌克兰接壤的欧盟和北约国家中综合国力相对突出者，波兰自然成了欧盟和北约援助乌克兰的“前线”，以热舒夫机场为代表的波兰基础设施得到了北约的重视，并成为物资转运的关键枢纽。另一方面，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波兰、波罗的海三国等欧盟国家和北约东翼国家的对俄强硬立场逐渐在欧盟和北约中占据了重要地位，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主导了

^① See “Joint declaration by Presidents of Ukraine, Poland and Lithuania”, January 12, 2023, <https://www.president.pl/news/joint-declaration-by-presidents-of-ukraine-poland-and-lithuania,63122>

^② See “Poland calls for NATO to give Ukraine security guarantees as Zelensky makes first Warsaw visit during war”, April 5, 2023, <http://notesfrompoland.com/2023/04/05/poland-calls-for-nato-to-give-ukraine-security-guarantees-as-zelensky-makes-first-warsaw-visit-during-war>

^③ See “Ukraine Support Tracker Data”, April 1, 2023, <https://www.ifw-kiel.de/publications/data-sets/ukraine-support-tracker-data-17410/>

^④ “Operational Data Portal: Ukraine Refugee Situation”, May 25, 2023, <https://data.unhcr.org/en/situations/ukraine>

^⑤ See “Poland and Germany to train Ukrainian troops in new EU mission”, November 15, 2022, <https://notesfrompoland.com/2022/11/15/poland-and-germany-to-train-ukrainian-troops-in-new-eu-mission/>

西方应对俄乌冲突的议程设置。波兰多次提出加强波兰境内的北约东翼力量的倡议并得到了响应。2022 年 4 月，拜登访问波兰。波兰的波兹南已经建立了美国在北约东翼的第一个永久基地。^①2023 年 2 月，波兰总统杜达与北约秘书长会晤，提出希望北约为该集团的东翼起草一份新的安全计划。^②同月，美国总统拜登在俄乌冲突爆发后第二次访问波兰，并与北约秘书长一道出席了布加勒斯特九国领导人会议。^③

波兰因为担心欧盟对战略自主的追求会影响跨大西洋关系，尤其会影响到美国对波兰的安全承诺，所以一直批评法国倡导欧盟需要建立自身安全防卫能力的言论和行动。波兰认为欧盟应该强调与美国的战略伙伴关系，而不是建立与美国想法相左的战略自主权。2023 年 4 月波兰总理莫拉维茨基访美，强调俄乌冲突对欧洲地缘安全形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希望美国在欧洲安全中发挥核心作用。他坚持波兰与美国建立防务和经济联盟的主张，强调 2023 年波兰将把 4% 的 GDP 用于国防预算开支。他还提出要欧盟在未来发展自主防卫力量时更多考虑北约和美国的反应。^④

与此同时，波兰积极利用自己在中东欧地区合作中的领导地位，帮助乌克兰加强与现有中东欧各合作机制的联系。这些合作机制包括三海倡议、布加勒斯特九国和卢布林三角峰会等。2022 年 2 月和 6 月先后两次召开的布加勒斯特九国（B9）峰会都对俄乌冲突给予了高度关注，联合声明中都使用了较大的篇幅进行阐述。波兰邀请乌克兰参与第七次三海倡议峰会，并将乌克兰列入合作伙伴之列。10 月，包括波兰在内的 9 个中东欧北约成员国的政府首脑发表《关于俄罗斯企图非法吞并乌克兰领土的联合声明》，^⑤强调了 2008 年北约布加勒斯特峰会对乌克兰未来成员资格的认定。2023 年 1 月，

① See “Biden announces permanent US military base in Poland, America’s first on NATO east flank”, June 29, 2022, <https://notesfrompoland.com/2022/06/29/biden-announces-permanent-us-military-base-in-poland-americas-first-on-nato-east-flank/>

② See “Poland expects stronger Nato presence on eastern flank”, February 15, 2023, <https://www.president.pl/news/poland-expects-stronger-nato-presence-on-eastern-flank,64676>

③ See “Joint statement by the leaders of Bucharest Nine”, February 22, 2023, <https://www.president.pl/news/joint-statement-by-the-leaders-of-bucharest-nine,65068>

④ See “Prime Minister Mateusz Morawiecki’s visit to the White House”, April 11, 2023, <https://www.gov.pl/web/primeminister/prime-minister-mateusz-morawieckis-visit-to-the-white-house>

⑤ See “Joint statement of Presidents of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October 2, 2022, <https://www.president.pl/news/joint-statement-of-presidents-of-central-and-eastern-europe,59400>

第二次卢布林三角峰会在乌克兰利沃夫举行，三国元首在联合声明的序言部分特别回顾了三个国家“反对暴政和压迫的一月起义 160 周年”的共同历史记忆，并提出了诸多支持乌克兰的措施。^①波兰努力通过将乌克兰纳入这些次区域合作机制，与中东欧国家共同建立新的反俄轴心，重新绘制了一幅包括乌克兰成为欧盟新成员的欧洲政治版图。

波兰希望利用俄乌冲突背景下波兰战略地位提升的契机，将自身的东部安全诉求转化为塑造自身加强在欧盟影响力的资源，进而提升塑造欧盟政策的能力。波兰政府希望借俄乌冲突之机，消解法德在欧洲安全议题上的影响力，塑造自身领导中东欧的合法性。波兰进而希望通过加强在中东欧次区域合作组织的影响力来制衡法国和德国，并通过加强与乌克兰的长期合作，促进欧盟的战略重心东移。2023 年 4 月，波兰外交部长兹比格涅夫·劳概述了支撑波兰外交政策的理念和原则，敦促法国继续参与北约威慑俄罗斯的政策，并对法国在俄罗斯与欧盟之间促成某种对话的举措表示怀疑。同时，他还批评德国在过去几十年将与俄罗斯的合作置于欧洲和平和盟友安全之上的行为。波兰前外交部长、现任欧洲议会议员拉多斯瓦夫·西科尔斯基（Radosław Sikorski）对西欧国家多年来“庇护”俄罗斯的行为表示失望，他指出，这些国家不理解“波兰作为安全世界边缘国家的痛苦”^②。

六、结语

回顾波兰东方政策的历史，波兰与俄罗斯的竞争和对抗源于双方对欧洲政治版图的不同要求，这种受历史经验启发的对外政策偏好，在现代民族国家体系下仍然没有改变。但是，与近代早期的竞争和对抗相比，现如今欧洲东部地区安全秩序重构更突出了意识形态的色彩。在近代早期，俄波关系遵循现实主义的基本框架，结盟与战争是两国在中东欧地区互动过程中常用的

^① “Joint declaration by Presidents of Ukraine, Poland and Lithuania”, January 11, 2023, https://www.president.pl/news/joint-declaration-by-presidents-of-ukraine-poland-and-lithuania_63122

^② “Ukraine: Poland reminds the EU how vulnerable its border nations really are”, March 17, 2022, <https://theconversation.com/ukraine-poland-reminds-the-eu-how-vulnerable-its-border-nations-really-are-179239>

手段与方式。而到了近代晚期，虽然地缘因素仍然塑造着双方互动的基本框架，但意识形态（包括政治的、宗教的、文明的）却日益成为外交中常见的表达，雅盖隆思想正是在这样一种对历史的复写和再阐释中发展起来的。

雅盖隆思想是对波兰历史上“黄金时期”的雅盖隆王朝的追溯和美化，尤其强调波兰在历史上对其东部邻国的影响。虽然三次复兴的演进过程存在差异，但第二次和第三次复兴过程中的雅盖隆思想在波兰外交政策中的体现有明显的共性。雅盖隆思想的第一次复兴发生在 19 世纪后期波兰复国之前，此时的雅盖隆思想被作为一种文化资源以唤起人们对旧日强盛的波兰-立陶宛联邦的回忆，并激起复国热情。雅盖隆思想的第二次复兴是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这时的雅盖隆思想强调和苏俄/苏联争夺两国“中间地带”国家。雅盖隆思想的第三次复兴发生在冷战后，波兰将自身外交政策的基调定位为“重返欧洲”，并在此基础上借助雅盖隆思想的文化基础与俄罗斯争夺对俄波中间地带国家的影响力。

在雅盖隆思想指引下的波兰东方政策始终具有三重理念：第一，波兰多次遭受邻国的瓜分，具有极强的地缘不安全感；东部的俄罗斯一直是波兰安全的梦魇。第二，波兰曾经作为欧洲大陆上最强盛的国家之一，历史上的大国荣光重新唤醒了其领导中东欧地区的大国雄心。第三，作为冷战时期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一员，波兰在东欧剧变后仍然与西欧国家心存芥蒂。为此，波兰除了同欧盟保持紧密的关系之外，还一直坚定支持跨大西洋同盟关系，在安全上追随美国的外交取向，这是其地缘不安全感的重要体现。在新时期，波兰先后成为北约和欧盟的成员，并部分实现了波兰东部政策的欧盟化和北约化。波兰塑造欧盟政策能力的提升，也提高了波兰在欧盟对外决策、特别是在处理对俄关系中的议价地位和谈判筹码。波兰政府希望借助俄乌冲突的契机，消解法德在欧洲安全议题上的影响力，塑造自身领导中东欧的合法性，并构造包括乌克兰成为欧盟成员在内的新的欧洲政治版图。

与 20 世纪相比，新时期波兰雅盖隆思想指导下的外交政策的突出特征，在于波兰对联盟尤其是欧盟和北约成员国身份的使用：一方面，波兰在经济和安全上分别有求于欧盟和北约；另一方面，客观的地理位置决定了波兰在这两个组织中会担任所谓“东部问题专家”的角色。波兰通过这种价值观的重建，加强了内部凝聚力和支持乌克兰的合法性。而从更长的时间段来看，

对俄波关系而言，经历了近代早期的势均力敌和近代中后期直到 20 世纪后期俄罗斯的压倒性优势之后，冷战结束以来的三十年似乎俄波力量对比的天平又在重新回调和波动。虽然波兰和俄罗斯也曾为和解进行过多轮努力，但历史恩怨并不容易克服。波兰与俄罗斯之间的恩怨不是暂时的误解，并且不是由某个政治领导人的个人观点决定的，而是因各自国家身份塑造的差异形成的。俄波关系走向何方，取决于俄乌冲突的结果，在更长的时间段内取决于北约与俄罗斯重构欧洲东部安全秩序的竞争。

俄乌冲突发生以来，波兰已成为塑造欧洲东部安全秩序的关键角色。波兰一直对西方邻国与俄罗斯可能达成的秘密协议感到担忧，希望尽快巩固西方军事同盟一体化结构，以追求在中东欧次区域的领导者地位，并尽其所能将乌克兰、白俄罗斯、摩尔多瓦纳入欧洲一体化来加强波兰在欧盟内部的地位。欧盟东部邻国的问题正迅速成为欧盟外交政策的优先事项，东部邻国成功融入欧洲一体化，将对未来整个欧洲秩序以及欧盟作为地缘政治行动者的新的自我认同至关重要。如果乌克兰在俄乌冲突结束后成为北约成员国和未来的欧盟成员，可能预示着在法德之外以波兰为核心的欧盟第三极的出现。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转轨已经充分证明了意识形态口号无助于解决国家间实质性的利益分歧和地区秩序安排。而随着以美国民粹主义盛行的国内政治乱象为代表、“美国第一”口号对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祛魅和大变革时代中以身份政治为代表的意识形态争鸣的返魅，传统安全问题经过“新华盛顿共识”这一意识形态话语巧妙包装后，重新回到了各国的政治议程。虽然俄罗斯与北约国家关系的主要斗争领域是传统的安全议题，但各行为体却纷纷用各种意识形态为自己的立场造势，而这又使本已高度复杂的欧洲东部地区局势进一步复杂化了。以波兰为典型，北约与欧盟成员的双重身份与原有的历史记忆结合，重新塑造了一种新的波兰身份的叙述，随着波兰国力上升，波兰希望有效实现欧洲东部地区团结和认同的愿望尤其强烈。雅盖隆思想及其对波兰东方政策的塑造，也同样应该被视为波兰和俄罗斯意识形态竞争的一部分。普京发起了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其思想基础是对乌克兰历史的泛俄式的理解。如今在波兰国内和国际话语中再次复兴的雅盖隆思想，则力图强调波兰的基本价值观。但波兰从自身历史中取材，为自己的政治主张

辩护，坚定的反俄态度对欧盟整体对俄立场的僵硬起到了促进作用，这不仅对于目前欧洲与俄罗斯分裂的地缘政治主张与利益分歧没有帮助，反而加剧了欧洲与俄罗斯意识形态的对抗与冲突。

【Abstract】 Since the outbreak of the Russia-Ukraine conflict, Poland has adopted a tough diplomatic strategy of confrontation and containment of Russia. It is necessary to date back to the “Jagiellonian idea”, Poland’s political heritage, and Poland’s Eastern policy to understand this diplomatic strategy. At the level of strategic culture, the Jagiellonian idea is a retrospective reference of the historical memory of the Jagiellonian dynasty, which is the “golden age” of Poland. At the geopolitical level, the Jagiellonian idea emphasizes the tradition of Poland’s Eastern policy, with the main strategic intention of guarding against Russia, limiting Russian influences in Ukraine, Belarus, and Lithuania, and building anti-Russian alliances with its eastern neighbors. Since the 19th century, the Jagiellonian idea has undergone three revivals. After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the most striking feature of Poland’s foreign policy guided by the Jagiellonian ideology is the employment of its memberships both in the European Union and the NATO. Based on cultural foundations of the Jagiellonian idea, Poland competed with Russia for influences over the middle zone between Russia and Poland. After the Russia-Ukraine conflict broke out, Poland has become a key player in shaping the security order in Eastern Europe. Poland’s foreign policy, guided by the Jagiellonian idea, continues to emphasize Poland’s vision for a security order in Eastern Europe and its ambition to translate it into reality. However, the revival of Jagiellonian idea will not help bridge the current geopolitical differences in opinions and interests between Poland and Russia, and will even exacerbate ideological confrontation and conflict between Europe and Russia.

【Key Words】 Poland’s Diplomatic Strategy, Russia-Ukraine Conflict, the Jagiellonian Idea, Poland’s Eastern Policy

【 Аннотация 】 С момента возникновения российско-украинского

конфликта Польша приняла жёсткую 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ую стратегию противостояния и сдерживания России. Для понимания данной 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ой стратегии необходимо вернуться к польскому политическому и культурному наследию «ягеллонской мысли» и польской восточной политике под её руководством. На уровне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ягеллонская мысль прослеживает и заимствует историческую память о династии Ягеллонов как о «золотом веке» польской истории; на уровне геополитики ягеллонская мысль подчёркивает традицию восточной политики Польши, основной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ий замысел которой состоял в том, чтобы помешать России, ограничить влияние России в Украине, Беларуси и Литве, а затем совместно установить антироссийский союз с восточными соседями. С 19 века ягеллонская мысль пережила три возрождения. После окончания холодной войны наиболее заметной чертой польской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основанной на ягеллонских идеях, было использование членства в ЕС и НАТО. С помощью культурной базы ягеллонской мысли Польша соперничала с Россией за влияние в странах средней полосы России и Польши. После начала российско-украинского конфликта Польша стала ключевым игроком в формировании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в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е. Польская 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под руководством ягеллонской мысли продолжала подчёркивать польскую концепцию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в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е и стремление воплотить эту идею в жизнь. Однако возрождение ягеллонской мысли не поможет преодолеть нынешние гео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положения и разногласия интересов между Польшей и Россией и даже усилит идеологическое противостояние и конфликт между Европой и Россией.

【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 Польская 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ая стратегия, российско-украинский конфликт, ягеллонская мысль, восточная политика Польши

(责任编辑 苟利武)

俄罗斯的国家构建

转型中的俄罗斯国家能力：政治制度与精英体制的分析（上）*

费海汀**

【内容提要】苏联的解体和 20 世纪 90 年代的动荡导致了俄罗斯国家权力的流失。在 30 年的转型进程中，俄罗斯始终在推行国家重构策略，追求建设一个“强国家”。俄罗斯国家的重构策略可以从政治制度与精英体制两个角度进行考察。在政治制度方面，俄罗斯国家主动塑造了一个以联邦主体首脑为绝对核心的地方政治体系。在当代俄罗斯地方政治中，“州长”合并了苏联时期多个政治机构的权力与职能，“州政府”则成为州长权力体系的延展和辅助。为避免对“州长”的过度依赖，俄罗斯国家进行了复杂的制度设计保证对“州长”的权力进行分化与制约。一方面，俄罗斯国家在联邦主体层面设计了一个多层次的竞争结构，使纵向从联邦到地方层级，横向从政治、经济到社会领域的众多精英都能参与对“州长”职位的竞争。另一方面，俄罗斯国家还通过上级与下属机关等正式机构，以及直管机构、派驻机构、社会组织、市场主体四类非正式机构实现了对“州长”权力的拆分。最终，俄罗斯国家塑造了一个治理者与治理工具相分离的治理模式。通过对治理工具的掌控，联邦政府就能灵活调整联邦主体首脑所拥有的权限和影响力，并对其长期持续性地施加压力。治理者与治理工具相分离的特征实际上正体现了俄罗斯地方政治制度的基本逻辑：稳定、控制而非发展和竞争。

【关键词】俄罗斯地方政治 俄罗斯国家建构 俄罗斯国家能力

【中图分类号】D751.2**【文章标识】**A**【文章编号】**1009-721X(2023)03-0152(24)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苏联-俄罗斯政治转型研究”（项目批准号：19CKS016）的阶段性成果。感谢匿名审稿人的修改建议！

** 费海汀，北京大学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助理教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兼职青年研究员。

苏联解体以来，俄罗斯开始了漫长的政治转型进程。这一“转型”不仅意味着体制变革，更意味着国家权力结构的深刻重塑。俄罗斯国家重新设计了联邦体制，同时积极推动各级政府变更其权力的合法性来源、组织模式、行使规则、内部结构和隶属关系。但是，各级政府的政治实践却与改革者最初的制度设计南辕北辙。“宪法危机”、机构竞争、精英派系、地方利益集团等多重因素的叠加，使得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的国家权力出现系统性地大规模流失，国家能力遭到严重削弱。国家不仅无法再将其意志传递给社会与地方，甚至连凝聚共识、制定政策等基本功能也难以执行。为解决自身的生存危机，俄罗斯开始采取各种方式推行国家重构（state rebuilding）的策略，试图回收流失的国家权力、强化虚弱的国家能力，重新建立国家的政治权威。由于这一策略主要表现为强化国家政权，恢复国家对社会群体与地方政权的控制，从赋权转向回收、从分权转向集中，因此俄罗斯的国家重构进程也曾被我国学界归纳为“重建国家的权威和垂直权力体系”^①、“巩固垂直领导体制”^②，或通过“建立垂直权力体系加强国家能力建设”^③。问题在于，这一系列的国家重构策略是否达成了既定目标？是否真正巩固了国家能力，使国家能够进行强有力的决策和政策执行？是否使俄罗斯国家摆脱了20世纪90年代的虚弱状态，重新成为一个“强国家”？强化后的国家是否有效地推进了俄罗斯政治现代化进程？基于上述问题，本文将从政治制度与精英体制两个方面，考察30年来俄联邦主体层面国家统治方式与权力结构的变化逻辑，并以此尝试对当前俄罗斯所面临的国家能力建设困境作一个探索性的解释。

一、联邦主体政治权力的变迁：作为政治机构的州长与州政府

（一）政治权力的形式分化与功能合并

苏联解体意味着政治结构的根本性变革。从政治权力的形式看，“议行

① 庞大鹏：“‘普京主义’析论”，《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6年第1期，第17-35页。

② 刘凌旗、关海庭：“再论俄罗斯国家转型中的‘普京主义’：基于国家治理的视角”，《东北亚论坛》，2014年第5期，第99-108页。

③ 杨成：“‘第二次转型’的理论向度与原社会主义国家转型的多样性——以普京时代的俄罗斯制度转型为例”，《俄罗斯研究》，2008年第4期，第12-26页。

合一”的政治体制比较清晰地转变为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但从政治权力的功能^①即政治和行政二分的角度看，俄罗斯最高权力机构之间却一直存在重大分歧和争议。如果进行类型学的简化概括，那么，从苏联到俄罗斯的体制变革，事实上就是从特殊的议会制向议会制、再（因向总统制转变不成功而妥协）塑造半总统制的过程。整个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三步：苏联时期的改革，主要是完成苏共与最高苏维埃从双重体制向单一体制、苏共中央第一书记与最高苏维埃主席职务从分立向兼任转变的任务；苏联解体前后的改革，主要是完成从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兼最高苏维埃主席向议会（最高苏维埃）选举国家元首（总统）转变的任务；苏联解体后的改革则主要是完成议会间接选举国家元首到直接选举国家元首的任务。从“议行合一”到“议行分置”，最重要也是最困难的问题，是如何处理国家元首、行政首脑与立法机关三者之间的关系。当国家元首与行政首脑合并，则体制会向总统制方向演变；当行政首脑由立法机关即议会及其多数党组阁，则体制会向议会制方向演变；而当直接选举的国家元首和间接选举的立法机关都无法单独掌握行政首脑这一职务，则行政权会由双方共同决定，此时体制会向半总统制演变，而其中行政首脑（政府主席、部长会议主席或总理等）由总统还是议会提名，则决定了本国半总统制的性质是由总统还是议会主导。

问题在于，三者之间的关系演变不仅涉及体制变革，还关系重新在国家权力机关中分配政治-行政功能的需要。在诸多后苏联地区的转型国家中，立法机关（最高苏维埃）与国家元首（总统）都认为自己应掌握更多的政治和行政权力，因此也就经常出现应该向议会制还是总统制转变的路线争论。结果是在许多国家的政治实践中，立法机关与国家元首都没有能力单独掌控局势。此外，许多国家的行政首脑也因苏联时期的“议行合一”制度而具有相当的话语权，因此也会参与博弈。如此一来，就会形成立法机关、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三方博弈的复杂局面。当三方甚至其中两方联合起来也无法完全掌握压倒性优势时，才会在妥协中逐渐形成总统-议会-总理的半总统制，即理论上由议会与总统共同负责实现国家意志的表达功能即掌握政治权力，

^① 古德诺将国家意志的表达和执行定义为权力的政治功能和行政功能，参见[美]弗兰克·古德诺著：《政治与行政：政府之研究》，丰俊功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

总理负责实现国家意志的执行功能即掌握行政权力。但在俄罗斯这一案例中，特别是宪法危机之后，由于总统权力大大加强，因此上述体制改革的预设又发生了变化：总统开始掌控更多的政治权力并大幅合并行政权力，除可以主导总理任免外，还逐渐掌握了对副总理及各部部长的主导权，甚至直接领导和改变联邦政府的部、局、署的设置。这样从“议行分置”向“总统主政”的演进，意味着俄罗斯的政治权力虽然从形式上分立了，但是在功能上却出现了一定的合并——总统需要在成为国家意志代表的同时也负责执行与实践国家意志。

而解体后俄罗斯各联邦主体的政治制度变革很大程度上就是对联邦的模仿。俄罗斯联邦主体政治权力的形式和功能改革，体现为“议行分置”向“州长统揽”的演变。苏联解体之前，地区一级是苏共-苏维埃双重权力体系。苏共通过苏维埃实施政治领导，行政事务则由苏共领导苏维埃特别是其执行委员会具体实践。地方元首、立法机关首脑和政府首脑主要体现为苏共地区委员会第一书记、地区苏维埃主席与苏维埃执委会主席三个职务。解体之后，地区权力格局开始发生分化，除苏维埃整体向地区议会演变外，元首与政府首脑间关系也开始出现三条演变路径：其一，只保留地区元首即州长，州长权力体系吸纳合并政府权力体系；^①其二，只保留政府首脑即行政长官，原苏共权力体系主要负责的政治领导功能逐渐转移至地方议会，地方与联邦之间主要体现为行政而非政治关系；其三，同时保留地区元首和政府首脑，即州长（总统、市长等）与政府主席（总理等）并立。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认为，各联邦主体政治制度之间的差异，主要看从“议会制”向“半总统制”甚至“完全总统制”的方向走了多远。在第一种情况下，地区政治结构接近联邦层面的总统制设计；在第二种情况下，地区政治结构接近议会制设计；第三种情况则接近某种半总统制设计。整体而言，三种情况正在逐渐向第一种情况归并。从这个意义上看，俄罗斯的地区政治不仅仅是国家政治的简化和复制，更可能是一种国家权力结构变革趋势的风向标。

^① 俄罗斯各联邦主体对地方首脑的称谓不同，有的称“州长”（губернатор），有的称“市长”（мэр），共和国多称“总统”（президент），但近年来改革后统称“元首”（глава），为方便读者理解，本文的“州长”为广义的州长，即代指俄罗斯联邦主体首脑（глава субъект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二）作为政治机构的“州长”与“州政府”

具体而言，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联邦主体政治制度的演变可以大致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地方元首、立法机关与政府首脑三方博弈，决定地方政府独立机构的存废及其隶属关系；第二阶段（多为州长体系与政府体系合并后）由州长自行调整重塑联邦主体权力结构。在第一阶段中，联邦主体政治制度之间的主要差别在于是否保持州长-政府双重权力体系的分置，也就是州长-州政府主席的双重职务设置；在第二阶段中，差异则主要体现为州长如何调整一把手与执行者，即州长与各职能部门负责人之间的关系。如前文所述，对俄罗斯大多数联邦主体而言，第一阶段的持续时间不会太长，通常在解体后数年内就会很快完成州长体系与州政府体系的合并，以州长即地方元首身份任州政府主席即行政首脑。少数地区博弈持续时间较长，但最终也会逐渐向合并、即接近总统制的制度设计过渡。典型案例如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Свердловская область），该州直到 2016 年才完成州政府的撤销过程，撤销总理（премьер）职务，将其职能移交给州长。

第二阶段的差异则主要体现为三种情况，如表 1 所示。第一，州长设一位第一副州长，由第一副州长协助州长领导多位副州长，每一位副州长再分管数个具体领域。这种情况下，州长通常直接管辖一州政务，第一副州长负责协助执行，其角色接近常务副州长或执行副州长的定位。第二，州长设两位第一副州长，之下再设多位副州长。两位第一副州长各自负责一类事务，各自分管多位副州长。每位副州长则同样会分管多个具体的职能部门。这种情况下，州长通常只是负责统揽一州事务，具体政务交由两位第一副州长管理。第三，州长不设或故意空缺第一副州长，直接领导多位分管具体职能部门副州长。这种情况下，州长通常需要亲力亲为，对本州政务负直接责任。这是地方元首与行政首脑合并程度最高的一种情况，也使州长权力中行政职能的占比最高。第一种情况的典型案例如秋明州（Тюменская область），州长之下设 1 位第一副州长和 9 位副州长，除 1 位兼任驻国家权力机构代表处负责人的副州长外，州长、第一副州长与其他州长都是州政府主席团成员。第二种情况的典型案例如诺夫哥罗德州（Новгородская область），州长之下设两位第一副州长和 7 位副州长，其中有一位副州长兼任州长办公厅主任。

第三种情况的典型案例如下诺夫哥罗德州（Нижегородская область），州长兼任州政府主席，之下第一副州长兼政府第一副主席职务暂时空缺，州长直接领导 6 位副州长，副州长各自兼任州政府副主席。

表 1 “州长”与“州政府”关系的演变路径

	州长	第一副州长	副州长	合并程度	州长职能偏向
情况 1	1	1	多位	较高	兼顾
情况 2	1	2	多位	一般	政治
情况 3	1	0	多位	高	行政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俄罗斯的联邦主体中，州长与州政府主席并不是“平级”。在州政府单列的联邦主体，州政府主席职务常和第一副州长合并，担任州政府主席者通常也会兼任第一副州长。例如阿尔泰边疆区（Алтайский край）现任领导人托缅科（Виктор Томенко），2010—2011 年曾同时担任边疆区副州长及区政府副主席。2011 年底，在接任政府主席时也被任命为代理第一副州长，2012 年正式转为第一副州长。而在州长体系与州政府体系合并的联邦主体，州政府主席的职能要么被完全移交给第一副州长，要么被分拆移交给两位第一副州长。只有在极少数地区，州政府主席的职能直接由州长完全接收，实现地区元首和地区政府首脑的合并。应当注意，第一副州长这一职务本身隶属于州长权力体系，是州长权力的衍生。换言之，第一副州长的权能极大程度上取决于州长的意志。例如在设置双第一副州长的联邦主体中，两位第一副州长通常各自分管一部分工作。一般而言一人主管经济、工业、农业、贸易、投资、企业、交通运输工作，另一人则主管建设、能源、住房、信息技术、社会政策、教育文化工作。但具体分管何种工作完全由州长决定。如果州政府主席职务与第一副州长职务绑定，那么在许多情况下，州政府主席甚至州政府的权能也就会完全取决于州长。州长可以任意赋予、收回、拆分、合并、设置和撤销州政府的权能。州政府就不是一个独立行使行政权的机构，而是

辅助行使行政权的机构。

这一特征从州政府与州长办公厅间的关系也能得到佐证。俄罗斯联邦主体的许多州长会与联邦总统一样，设州长办公厅或州政府办公厅，其负责人地位不一，但多取决于联邦主体中州长和州政府之间的关系及其职能偏向。如果按政治-行政功能两分，那么一些“政治化”程度高的联邦主体，甚至会让州长办公厅主任兼任政府首脑，其典型案例如萨哈（雅库特）共和国（Республика Саха (Якутия)）现任领导人尼古拉耶夫（Айсен Николаев），就曾在 2007—2011 年间同时兼任共和国总统办公厅主任及共和国政府主席。在一些州长“政治-行政”职能相对平衡或“行政化”程度比较高的联邦主体，则通常会令州长办公厅主任列入行政领导团队，但并不会由行政首脑兼任。如部分州长办公厅主任由副省长兼任（如诺夫哥罗德州）；部分州长办公厅主任列入州政府主席团序列，相当于州政府副主席或略低（如秋明州）；部分州则未单设州长办公厅，而是设政府办公厅，且其负责人不兼任政府副主席（如下诺夫哥罗德州）。州长权力中政治职能比重越高，则州长办公厅主任地位可能越高，由副省长甚至政府主席担任；而州长权力中行政职能比重越高，则州长办公厅主任地位可能越低，只相当于政府副主席甚至不再单列。但究竟如何定位州长办公厅的地位则几乎完全由州长本人决定。

（三）“州长”角色与功能变化

需要注意的是，不能简单将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联邦主体的州长权力直接等同于原苏共地区委员会第一书记，也不能以苏联时期苏共的地区委员会第一书记、苏维埃主席和苏维埃执委会主席间的领导关系来类比俄罗斯联邦主体州长、议长和政府主席之间的关系。首先，俄罗斯联邦主体的地区议会议长已对地区政府主席完全没有领导关系，议会整体也更多承担对政府首脑的批准而非提名和具体领导职能。其次，联邦主体内州长在地位、权力、职能上都远高于州政府主席。州长权力应相当于原苏共地区委员会第一书记与苏维埃执委会主席大部分职能的合并甚至加强。从政治权力的行政功能角度，州长理论上不仅能制定地区发展的大政方针，还能独自决定政府各部门首脑的任免、第一副州长设置的废除以及具体权能而不需经过委员会的协商讨论。这就保证了政治权力的行政功能完全由州长主导并负责实现。从政治权力的

政治功能角度，联邦主体中理论上应该是州长与议会共同负责地区发展战略的制定和通过，法院负责检验规则和政策是否符合既定规范。但实际上由于俄罗斯的法治建设滞后，并不能确保每一项规则和政策都完全按照立法进行，因此州长能实际占有大部分规则制定的权力。这就意味着，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州长们基本需要独自为地区政治负责，既负责地区民众意志的代表和表达，也负责其执行与落实。

在俄罗斯各联邦主体中，可以认为，州长是政治权力结构的核心。州长不仅能主导地区政治制度，特别是政府内的制度与机构变革；同时也能左右地区精英流动，特别是政府内的人事任免；还能自行调配一州治理的重点与重心。实际上，在许多联邦主体中，一州治理过程中许多与“政治职能”相关的工作并不归口于州政府，而是直接归口于州长管理。这里的州政府是指更加广义上的州政府，即政府内部的职能部门、副州长甚至于第一副州长。这些部门更多只能负责具体的、一般性的、与“行政职能”相关的发展事务。依然以秋明州为例，州政府内下设 20 个司、9 个局、4 个委员会和 1 个国家住房监察局，主要负责农工综合体、民防与消防、住房和公共服务、财政、卫生、教育、消费、社会发展等领域的工作。但在州长办公厅内下设的机构中，则包括腐败和其他违法活动预防处、公民上访处、政府活动监管和保障处、行政改革处、干部处、组织处等重要部门。^①这意味着，人事任免、监督监察、组织活动、行政改革甚至部分地区的反恐活动和秩序维护等职能，都直接由州长而非州政府负责，连州长委任的第一副州长或副州长都无权插手。

上述诸多现象从各个侧面证明，俄罗斯各联邦主体的州长（元首）权力，在经历了地方政治权力的形式分化与功能合并之后，表现出了高度的集中化趋势。原先归属于多个庞大体系（即苏共地区委员会、共青团地区委员会以及苏维埃执委会）的职能被浓缩集中到州长、副州长等少数人手中。这就使州长的权力大大加强。这实际上也意味着，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地方政治出现了显著的人格化现象——抽象的权力概念和具体的权力载体融合。“州长”不再是一个抽象的政治机构，而是表现为一个个具体的政治精英和政治领袖。

^① См. Структура аппарата губернатора Тюменской области. 31 мая 2023 г. <https://a.gto.admtumen.ru/OIGV/agto/about/structure.htm>

因而一州的治理绩效也就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州长个人的能力，而非治理机构的整体运转水平。

此外，作为国家行政层级的中间层次，州长通常兼有抗辩者（pleader）与分配者（distributor）双重身份。他需要向上从联邦政府争取资源，并抵制来自联邦的各种汲取要求；他也需要向下对地方政府分配资源，在瓦解下属抵制能力的同时汲取足够的资源并进行重新分配。州长权力的集中化，意味着其双重身份都得到了加强。一方面，州长身上集中了政治与行政职能，获得了对一州政府与精英行为的绝对控制权，不需与他人协商即可自主分配资源，因此对资源的掌控能力和分配能力大大加强。另一方面，苏联时期复杂的央地权力网络中的诸多节点集中到州长一人身上，“条”与“块”都在州长一个点上汇聚。这意味着，中央政府的大量政令都需要通过州长来执行，来自地方和基层的大多数信息都要经过州长向中央传递。因此，州长权力的集中，就意味着他对中央的抗辩能力和抵制能力都得到了加强。换言之，州长有足够的激励形成地方利益集团来对抗联邦政府，而联邦政府将会缺乏有效手段来对州长形成任何制约。这实际上也正是俄罗斯国家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面临的局面。

二、国家重构与央地关系的调整历程

（一）“州长”产生机制的变迁过程

从上述案例和证明中不难看出，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的地方首脑权力出现了显著的集中化倾向，具体表现为权力形式上的分立与功能上的合并，即形式上的“三权分立”向事实上的“州长统揽”演变。且这一倾向不是暂时性的，而是一直延续至今。但这一倾向中包含一个悖论：州长的权力越大，委托-代理的固有问题就会越明显，联邦政府就越难以节制州长的行动，更遑论对联邦主体实现事实管辖。那么，俄罗斯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就面临尖锐央地矛盾和强力地方利益集团挑战的情况下，为何会坐视、放任甚至主动促进州长的权力集中？而且与理论预测恰恰相反，转型 30 年来，俄罗斯地方利益集团逐渐消弭，即使依然存在地方精英把控政权的情况也无力再对联

邦政府构成任何挑战。俄罗斯国家在顺利推进其国家重构进程，联邦政府也基本能实现对联邦主体政务的事实管辖。那么，在“强力州长”和“联邦管辖”之间的张力是如何得到弥合的？有学者指出，俄罗斯的州长选择依赖于多种来源，包括政党、联邦政府、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且没有一种单一来源可以占主导地位。^①但这样一种解释并不能令人满意，恰恰需要追问的是，为什么没有一个稳定的精英群体能占据主导地位？这是一种各方博弈的无奈结果，还是一种国家意志的主动塑造？

事实上，30年来俄罗斯央地关系的调整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经历了数次策略变化。从任命节点的角度看，俄罗斯各联邦主体（通过选举或任命）产生首脑的时间并不一致。而从任期时长的角度看，最初许多联邦主体还存在4年任期制，后来则逐渐向5年任期制统一。此外，由于提前辞职离任和提前就任代理州长等现象的存在，使俄罗斯各联邦主体轮换首脑的节点在时间上存在很大差异。但从1991年开始，大致可以分为8个时间节点：1991年、1993年、1996年、1999—2001年、2005—2007年、2010—2012年、2015—2017年、2020—2022年。1991年，俄罗斯地方政治开始变革，但以联邦政府任命地方首脑为主。到了1993年，由于总统与最高苏维埃冲突造成宪法危机，从而使地方首脑的继任和轮换出现波折。1996年，俄罗斯第一次在联邦主体采取直接选举的方式产生地方首脑。1999—2001年，实现了第二次州长直选。2005—2007年，俄罗斯废除了州长直选，采取总统提名、联邦主体议会批准的方式间接产生地方首脑。2012年，俄罗斯恢复州长直选，已在任的州长待任期届满后重新选举。2015—2017年，俄罗斯举行了第三次州长直选，参选对象包括2010—2012年任命的届满州长。2020—2022年，俄罗斯举行了第四次州长直选，自此暂时形成惯例。

总体而言，俄罗斯国家重构与央地关系的调整历程可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包括第1个节点（1991年），第二阶段包括第2、3两个节点（1993年、1996年），第三阶段包括第4、5两个节点（1999—2001年、2005—2007年），第四阶段包括第6、7、8三个节点（2010—2012年、2015—2017年、

① S. Gulnaz, “Subnational Governance in Russia: How Putin Changed the Contract with His Agents and the Problems It Created for Medvedev”, *Publius*, 2010, Vol.40, No.4, pp.672-696.

2020—2022 年)。因此理论上,在无突然免职或调任、且不考虑未继任州长仅在过渡时期作为代理州长主持工作的情况下,一个俄罗斯的联邦主体在解体以来应该已产生过 7 位州长(元首)。但在实践中,大多数联邦主体产生了 4~6 位州长(元首),即有 1~2 位州长在任期内获得了连任。阿穆尔州产生州长(元首)的数量最多(11 位),其中近半数(5 位)产生于 1996 年节点,即第二阶段。鞑靼斯坦共和国与罗斯托夫州产生的州长(元首)数量最少(2 位),前后两任州长(元首)任职都超过 10 年(2 届),而新旧州长(元首)的交接时间都在 2010 年,即第四阶段开始时。第一阶段主要是指苏联解体前后到宪法危机之前,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是联邦政府对联邦主体的州长(元首或行政长官)实行任命制。第二阶段主要是指宪法危机之后至叶利钦任期结束,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是联邦政府主动介入地方选举,采取各种策略支持联邦推举的候选人。第三阶段主要是指普京执政后延续八年的两个任期,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为联邦政府不再直接介入地方选举,而是采取制度改革的方式塑造新的规则和约束体系,对州长实现分权制衡。第四阶段主要是指梅德韦杰夫任总统以及普京再次任总统之后,一直延续至今,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为联邦政府逐步掌握了对地方的实际控制权。

(二) 谁能成为“州长”? 地方政治中的多层次竞争结构

曾有学者将俄罗斯国家“驯服”州长的策略归因于话语权(discursive opportunity structure)的转变,即俄罗斯国家掌握了更具合法性的政治话语,使“州长”们原本用于动员的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话语失效,从而失去选民的支持。^①但本文认为,这一观点忽略了俄罗斯国家在制度上的巧妙设计。从俄罗斯的政治实践中可知,“强力州长”与“联邦管辖”之间的确存在着张力,但它不是必然与确定的,而是可以被缓解甚至一定程度上弥合的。

而弥合张力的关键,就在于州长职务的相对开放性和不稳定性。也就是说,让“谁能成为州长”成为一个问题而非确定的答案。开放性是指州长职位不会任由某一个人及其亲信把持,即维持一个开放的状态,任由挑战者角逐。但相对开放性则是强调州长职位只会向一个范围有限的精英群体开放,

^① S. Gulnaz, “Gestalt Switch in Russian Federalism: The Decline in Regional Power under Putin”, *Comparative Politics*, 2013, Vol.45, No.3, pp.357-376.

并不会真正从广泛动员的竞争性选举中产生。这样的相对开放性也就产生了州长职位的不稳定性，即是指州长权力虽然大且集中，但并不能被稳定地占据。小圈子内的精英都具备挑战者的资格，会自然而然地成为州长潜在的竞争对手。这样的状态，无论对联邦政府或地方精英来说都是有利的。联邦政府能借此在地方精英中划分不同派系，以此形成对地方的分化与制衡；地方精英可以有更多的渠道和可能去竞逐州长职位，而不只是加入现任州长精英团队这一条路径。

如此一来，州长与其他职位之间相差悬殊的权力和利益，以及州长职位本身的开放性，就会使在任州长及其团队更难向其他地方精英派系提供有诱惑力的筹码以换取他们的支持和忠诚。其他地方精英将会更愿意直接竞逐州长职位本身，而不是选择稍次一等的妥协和折中方案。因此，州长及其团队将很难再次吸引并凝聚起一个足以对抗联邦政府的地方精英联盟或地方利益集团。

小范围的竞争和协商是俄罗斯国家重新收回对地方政务管辖权的重要策略。而这一策略的重点和难点就在于竞争者范围的划定。这一范围首先必须确保候选人的性质，确保他们必须具备一定的稳定性，即不会在接任之后因立场转变或经验不足突然造成治理危机，使联邦政府、地方精英陷入被动。例如，将一些既不具备执政甚至管理经验、又不具备深厚地方关系网络或资源支持的个人魅力型挑战者排除在外。其次，这一范围必须具有一定的权威性，既纳入主要精英派系的代表，又必须保证他们具有各方都承认的、足够的影响力。最理想的情况是多位挑战者中无论哪一位当选，各利益相关方都大体能接受。再次，这一范围还需要具有可预测性和稳定性，要形成相对稳定的非正式规则，才能让竞争者具有稳定的预期，否则挑战者在比较风险与收益之后更可能选择放弃参与竞争。此外，长期性和可持续性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大致圈定有资格竞逐州长的挑战者范围及其职务而非作为个体的当期竞争者，实际上有利于降低联邦介入的成本，既不必承担大量倾注资源培养或支持某一个精英的不确定性，又能以更少的资源支持达到更多的目标。

基于上述因素考虑，俄罗斯国家在 30 年的政治实践中逐渐塑造出了一个同心圆状的多层次竞争结构。这一结构至少包括核心、中间、外部三个圈

层。三者之间关系如图 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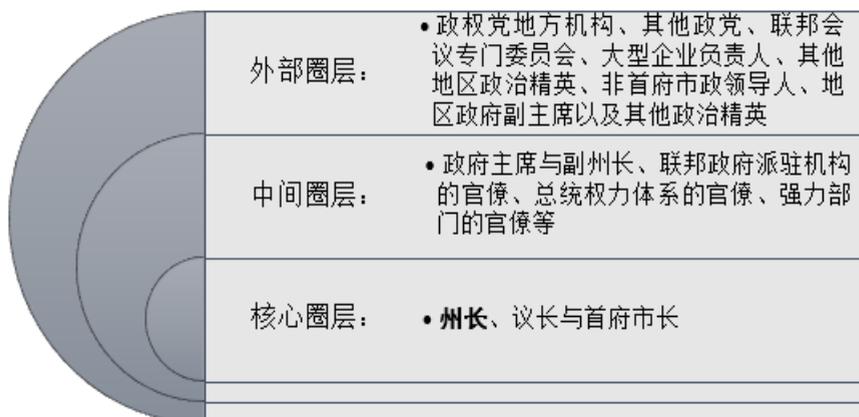


图 1 俄罗斯地方政治中的多层次竞争结构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其中，核心圈层人数有限，是州长职位最有力的竞争者。核心圈层基本只包括三个竞争者，即“三大长”：州长、议长与首府市长。州长即在任州长，由于俄罗斯政治精英的水平流动比例和频率远高于垂直流动，且联邦主体往往成为一个隐形的“天花板”，因此尽量谋取连任通常是在任州长的不二选择。州长掌握了地方的行政系统，有治理绩效能为自己背书，还能依靠行政系统的资源进行大量的交换，因此在竞争中通常具有最优势的地位。议长的优势首先在于对地方议会及其议程的影响力。议会是政党博弈与协商的最主要平台，而政党本身是地方实行政治动员、利益表达、政策推广的重要组织化力量，因此能获得议会内各个政党的支持，通常就意味着能在地方精英中达成共识，在选举中占据优势地位。而由于俄罗斯的经济特征，使得大城市特别是首府城市往往集中了本州内大比例的产业与人口。这就令首府市长也具有相当的权威和影响力，一定程度上可以将其视为权力稍小、地位稍低、影响范围更有限的另一个州长。“三大长”都有资格、资源和能力

对州长职位发起挑战。

中间圈层则人数更多，更重要的是扩大了竞争者的系统来源，使其能成为核心圈层的制约者与挑战者，甚至于逐渐取代核心圈层。中间圈层包括政府主席与副州长（包括第一副州长）、联邦政府派驻机构的官僚、总统权力体系的官僚、强力部门的官僚等。政府主席（或第一副州长）由于长期分管一州行政事务，同样对行政机关有着很大的影响力，同样也会掌握大量的政治与行政资源。但政府主席由于“州长统揽”现象的存在，权力受到许多的制约。通常政府主席或第一副州长都是作为前任州长的继任者而非挑战者参与角逐。副州长与政府主席同理，但有时副州长中也会出现异军突起政治精英，或特别受到联邦青睐，或特别受到地方利益集团支持，因此仍可能作为挑战者参与州长竞争。联邦政府派驻机构官僚一般是指如税务部、财政部、自然资源部等部委地方分局负责人。这些机构负责人虽不全面掌握联邦主体的各个系统，但常会握有重要甚至命脉资源，且深受联邦的支持和信任，因此会对州长职位构成挑战。总统权力体系的官僚是指联邦总统办公厅各司局负责人、总统驻联邦管区副代表及联邦总监察员（главный федеральный инспектор）等。他们属于州长的“上级机关”，自带联邦政府的资源与支持，常以直接委派的方式接任州长职位。强力体系官僚则包括军队、联邦内务部、安全局等总部各司局或地方分局负责人。他们有时会以解决处理专门问题（如系统性腐败）的名义接任州长。

外部圈层则是中间圈层的有力补充，防止中间圈层不能在合适的时机推选出合格的候选人，以便持续性地对核心圈层构成压力。外部圈层包括政权党（统俄党或全俄人民阵线等组织）地方机构负责人或核心人物、其他政党中央委员或核心人物、联邦会议（国家杜马及联邦委员会）专门委员会主席或副主席、大型企业负责人、其他联邦主体政治精英（州长、副州长、政府主席）、非首府市政领导人、地区政府副主席以及其他政治精英，如前任或地方精英集团指定的其他代理人。外部圈层的候选人与中间圈层相比，在人数上有所增加，领域和机构归属上则具有比较显著的同质性。如政党、议会中的候选人就可作为“体制外”的后备和补充力量。同样，大型企业负责人与其他地区政治精英的调动需要联邦总统办公厅的选拔、协调和促进，因此

实际上也是作为联邦政府和总统权力体系官僚的补充。而非首府市政领导人、地区政府副主席（部长）和其他政治精英则是对应州长与州政府系统，作为“州长”和“市长”的备选。换言之，外部圈层与中间和核心圈层中地方精英的部分其所属系统是一致的，但其中总统、联邦精英部分的系统归属则存在一定的差异化。例如，“三大长”是以更低级别候选人，如副州长、非首府市长、多数党核心人物等，进行递补。但总统和联邦的精英则是以立法、公司等其他系统与地区平级精英进行替代，而非直接以同一机构更低级别（如副司局长甚至处长）候选人进行递补。这证明，外部圈层不是为了向中间圈层施加压力，而是对中间圈层进行补充，与其共同对核心圈层构成压力而塑造的。

三、治理者与治理工具相分离：政治制度变迁的基本逻辑

（一）包围“州长”：地方政治中的正式与非正式机构

观察上述多层次竞争结构不难发现，苏联解体以后，俄罗斯联邦主体的州长（元首）权力虽然得到了集中和加强，州长也因合并权力的部分政治功能与行政功能而成为一州政治结构的核心，但这些特征也在地方精英之间催生了强烈的竞争动机。

州长（元首）的产生过程既不是完全遵循竞争性选举的原则，也不是直接由联邦政府选任委派，而是两种原则兼而有之。换言之，关于州长的政治竞争是一种“有限竞争”，一种对竞争者范围进行了精心设计和圈定的有限竞争。联邦主体内出现了众多有资格、同时也有能力竞逐州长职位的挑战者，这在一定程度上就逆转或者说至少缓和了俄罗斯地方政治的人格化特征：地方最大的政治权力虽然与政治精英个人高度绑定，但精英“个人”却不是恒定的，而是可以甚至会频繁替换的。州长大且集中的权力意味着，谁能成为州长，谁就会更容易成为地方精英集团的领导者，同时掌握更多的资源。于是，州长就被这样一个多层次竞争结构中各圈层的挑战者层层“包围”。实际上，潜在的州长挑战者构成了罗伯特·达尔所描述的“政治阶层”，即“一个由人数极少的个体构成的阶层要比其他人更多地参与政治思考过程、讨论

和行动”^①，而地方政治围绕着州长则构成了“以行政首长为中心的‘各种同盟的大联盟’（grand coalition of coalitions）”^②。

概括而言，这些挑战者大致来自三类系统，包括正式的上级和下属机关，以及非正式的调控机构。首先是上级机关，主要是指8个联邦管区。联邦管区不是宪法规定的行政层级，它本身属于联邦总统权力体系的延伸。联邦管区的负责人设总统全权代表1位，以及副代表、代表助理各3~8位，另设总监察员和监察员若干。除了正式规则中协调联邦与联邦主体之间的工作之外，联邦管区由于代表总统，能在很大程度上决定联邦对联邦主体的政策倾斜、资源调配、政党支持等行动，因此也能对州长施加相当的影响，进行一定的制约。除此之外，总统代表体系有时还会发挥政治吸纳的功能，将联邦主体内优秀的青年人才提前纳入总统权力体系，再由总统与联邦政府统一在全国的各条块进行调配。这就能从一定程度上削弱地方成体系、组织化的精英后备力量。其次则是下属机关，这主要是指联邦主体内各市政自治机关。从法律意义上看，作为一个联邦制国家，俄罗斯的联邦主体与市政自治机关不存在统属关系。在很长时间内，俄罗斯的市政机构甚至市长产生方式都由各市自行决定。无论直接还是间接选举，市长的产生大都需要经过竞争性选举的考验。虽然近年来俄罗斯通过一系列政策赋予了州长对市长的影响力，但这并不能彻底消除市长、特别是首府市长对州长的潜在挑战。

更重要的是非正式的调控机构。此类别大致包括四类机构：**直管机构、派驻机构、社会组织及市场主体**。首先，直管机构是指不接受地方领导、只接受垂直领导的机构，如军区、内务部地区总局、安全局地区总局，包括司法机关、检察机关的相关机构等等。此类机构承担了地方安全、秩序、打击违法犯罪活动等众多职能，这实际上就将州长权力中政治功能的很大一部分内容剥离了出来，交由联邦直接管辖。联邦主体的（特别是边疆地区）安全靠军区维护，违法犯罪活动的侦破、查处、打击与秩序维护靠内务部与安全局的地方机构（如联邦管区总局及各州分局）处置，案件的起诉交由司法机关负责，监督监察的职能则由检察机关承担。这就使得州长在处理一州政务

① [美]罗伯特·达尔著：《谁统治——一个美国城市的民主和权力》，范春辉、张宇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98页。

② 同上，第205-206页。

时，其“工具箱”中只有人事、政策、资金等“奖励工具”，而严重缺乏处置恶性情况和事件的“惩罚工具”。因此这样的制度设计就使州长权力只具激励性而缺乏威慑性，更多是只能为一般性的发展事务负责，而在发展偏离轨道或出现意外事件时很难作出及时应对。

其次，派驻机构是指受联邦政府管辖、与地区相关部门具有业务往来或直接接受双重管辖的机构。前者如前文所提到的财政部、自然资源部、税务总局等联邦政府部局署的地方分支机构，后者则包括一些类似经济特区管委会之类的机构。此类机构往往与联邦主体政府的某一部门具有职责同构的“对口关系”，相当于绕过州长，直接与州长权力中行政功能的很大一部分内容进行对接。但由于此类部门代表联邦政府，因此能从政策与资源上对地区政府的相应部门施加压力，形成制约。近年来，在特定情况下，联邦政府的地方分支机构甚至能影响地区政府对应部门的人事任免。这就使得州长在处理本州行政事务时，“工具”的数量和质量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联邦政府各部门的态度。由于俄罗斯联邦主体的税收大比例上交联邦政府，因此，如果能争取到政策和经费支持，则本州就能获得很好的发展；而如果不能处理好与联邦政府的关系，则本州发展就会捉襟见肘。这样的制度设计就使得州长必须依赖甚至向上竞逐联邦的资源倾斜，而不是依靠本地区固有资源促进发展。

此外，社会组织是指政权党与一些准政党、类政党组织以及温和反对党，即在重大议题上与政府与政权党保持一致、但在具体政策上可能提出反对意见的政党，如公正俄罗斯党、自由民主党等。此类组织由于覆盖社会各个领域，因此能掌握比州长与州政府更加广泛和强大的动员能力。在俄罗斯各联邦主体，州长常常也是政权党的党员，却并不一定是政权党地方机构的负责人。由于政党并不遵循行政体系的科层制规则，“议长”与“市长”同样有资格成为政党地方机构的领袖。那么政党是否支持、以多大的力度支持，不仅会影响州长政策推行，也会极大影响州长的连任目标。而这样的“支持”却是很难获得的。议长和市长完全有动机与激励直接取代州长，而非给予他竞选连任的必要支持。而至于反对党，其中央委员或核心人物同样可能被纳入行政体系。这虽然可以被视为一种行政资源的分享，但其更重要的目的是使

其活动场所从议会转向政府，一方面以行政科层对其进行规训，另一方面将其影响范围从联邦降至地方、从整体降至局部。政党精英特别是反对党精英在地方担任行政职务实际上存在一个“不可能三角”，即州长及其团队不可能都是反对党成员，州长与议长不可能都是反对党成员，州长与首府市长不可能都是反对党成员。^①这意味着，州长在很多情况下并不能完全自由地组建自己的团队，而是需要综合考虑各派系地方精英甚至竞争对手的利益，让渡一部分资源以求组成执政联盟或联合政府。

最后，市场主体是指能影响地方经济的大型与超大型企业，特别是能源、资源与基建企业，如石油、天然气、矿产、交通、造船、渔业企业等。这类企业大多数是国有企业或国家控股的合资企业。它们依地区经济结构的不同情况而发挥不同的作用；但相同点是，它们不仅管理着大量的劳动力与资本，同时也掌握着众多下游产业链。此类机构由于体量过大，业务和活动经常超出一个联邦主体所在范围。州长并不能完全制约企业，因此企业行为也并不总是会与州长的意志保持一致。这就使得州长无法以行政命令的方式完成资源调度，而是需要花费大量的精力与资源换取企业的配合。这些企业才是实质上的地方社会经济资源的控制者，甚至能左右一部分政治动员的结果。如果州长无法协调好与超大型企业及企业联盟的关系，那么企业就可能采取不配合的态度，甚至可能主动调动资源支持州长的竞争对手。这就使州长不仅无法通过促进经济发展、扩大经济活动的空间、增加手中的资源以增强自身实力，反而可能因对手实力增强而遭到削弱。

上述发挥非正式调控功能的四类机构都不受州长直接管辖，但都掌握特定的重要资源，熟悉地方情况，具有管理的经验和能力，且与联邦有着大量正式或非正式的联系渠道。这意味着来自“四类机构”（即中间和外部圈层的）“包围”州长的挑战者们具有更受中央青睐的优势。第一，“四类机构”候选人的流动与升降不受州长管辖和影响，因此不易与州长结成联盟，进而形成地方利益集团以对抗中央。第二，“四类机构”在地方具有一定的话语权，能迅速在某一个领域找到突破口进而控制整体局势，因此也具备一定的

^① “不可能三角”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成立的，即使存在某些极特殊的案例，也更多应视为暂时性或过渡性的情况，或是联邦管区与政权党的操作失误。这类特殊案例更多出现在 2000 年以前。2000 年以后已几乎不再可能发生。

对州长的挑战能力。第三，“四类机构”因为长期耕耘地方事务，与正式的上级和下属机关不同，更加熟悉当地事务，这便于他们寻找支持者以组建竞选联盟或治理团队，例如寻找对州长不满的企业进行游说。第四，“四类机构”都是高度组织化、系统化的机构，候选人具有一定的管理经验，能迅速适应新的角色。第五，“四类机构”相对受困于委托代理难题或由于折中方案选出的州长，更能获得中央的信任，因此也能更容易获得中央的支持和资源倾斜。如此一来，“四类机构”不仅在制度及权力的功能上拆分了州长权力，也对州长形成了一个若有似无的“包围圈”，能对州长行动构成长期性、持续性的压力。

（二）治理者与治理工具的分离

正式的上级和下属机关，以及非正式的“四类机构”对州长的“包围”，不仅意味着外部压力，实际上也意味着俄罗斯联邦主体一级的政治结构存在着内部问题——“州长”的权力虽然大且集中，但“州政”或“州务”却是存在显著缺陷的。一些重要的内容被剥离出来，一些重要的领域无法触及。而且更重要的是，州长缺乏统筹、整合、抵御来自这些重要领域压力和影响的机构与机制。例如，州长虽然模仿联邦总统塑造本州的政治结构，如设置州长办公厅，设置第一副州长与副州长代管州政府，设代表驻其他机构负责联络协调。但有几个关键机构出现了缺位，分别是安全会议、国务委员会和联邦委员会。首先是安全会议。如果从功能上看，类似安全会议的核心与决策精英协商机制或许是存在的，但这些核心精英对州务的协商决策却没有形成制度，也就是形式上不存在。因此地方精英更多只能通过非正式的私人渠道结成联盟，而非在正式会议机制上公开表达观点与倾向，这可能在精英团体内部形成分歧。其次是国务委员会。国务委员会的设立主要是为解决不同系统间精英的协调问题，如不同政党、不同层级、分属不同“条块”的精英。缺乏这一机制就意味着州长只能以代表或联络员的形式维持与各条块精英的联系，而无法在决策前制度化地与各方力量达成基本共识，同时也无法预测决策后各方的反应，容易在横向上造成分歧。最后是联邦委员会。俄罗斯联邦会议采取了两院制设计，其中议会上院即联邦委员会本身就是为地方精英实现国家层面上的政治参与而设计的制度。但在联邦主体层面，大多数地

区都采取了一院而非两院制的设计。缺乏这一机构，意味着州长（包括“议长”）与上级和下属之间都不存在机制性的协商机构，决策的落实就容易在纵向上出现阻滞。

但应该认识到，如此“内忧外患”并非偶然，而是符合俄罗斯地方政治发展逻辑的。甚至可以认为，这在一定程度上正是长时间制度塑造的结果。可以将这种现象描述为“治理者与治理工具相分离”的地方政治。如果将“四类机构”所掌握的政治权力都视为特定类型的治理工具，那么它们就分别可以被描述为秩序维护工具、政府治理工具、政治动员工具和资源控制工具。秩序维护工具多为暴力机构，负责规则的硬性实施与约束。如果有力量对机构或制度发起挑战，则可以采取强制性手段对其进行排斥。政府治理工具多为行政机构，负责制定规则并在规则框架内最大程度地对社会力量与社会资源进行合理化组织，促进其相互配合与协作，以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行政机构首先应制定规则以约束各社会力量的行动，如果有力量拒绝加入或不配合这一规则体系，则行政机构可以将社会资源抽离或对此种力量进行排除，以避免耗费本应投入发展的动力。政治动员工具多为政党或社会组织，承担国家与社会间桥梁的职责，既需对各社会群体的意愿与诉求进行综合表达，又需使自己政党纲领与施政方向覆盖尽可能广大的人群。政党与社会组织是一种竞争性的力量，也是排斥挑战者的重要工具，因为它需要直接与挑战者竞争以获取民众支持。特别是对于政权党而言，能将越多的精英与支持者吸纳到自身组织内加以消化，就意味着挑战者的力量越弱小，越难以成体系地或在重大议题与事件上发起挑战。资源控制工具多为市场主体即企业，负责产生社会财富，因此也能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社会资源的流向。与政党主要凝聚分散的个人利益不同，企业主要代表的是比较集中的群体利益。企业越大，群体利益所覆盖的范围往往也就越大。群体支持可能在绝对数量上不如个体，但其诉求更加明确和集中。秩序、治理、动员、资源四种工具并不总是掌握在州长手中，相反，很少有州长能完全掌握四种工具。一个最理想化的州长履历应该是：出身于地方支柱产业或巨型国企中高层，之后被调任州政府副主席/副州长，随后进入总统权力体系（总统办公厅或联邦管区总统代表办公室），或者也可以上调经济领域或资源领域联邦重要部委，加入政权党，

最后再下派原联邦主体成为州长。这样才可能在最大程度上争取“四类机构”的支持，获取必需的治理工具。

治理者与治理工具相分离的特征，实际上也体现了俄罗斯地方政治的基本逻辑：稳定、控制而非发展和竞争。州长最终成了一个强大但脆弱的机构。当州长服从国家意志和联邦指令时，国家就会选择性地将其秩序、治理、动员、资源四种工具交予他，使他能真正掌握一个大且集中的权力，补足并完善其权力结构和链条，使其成为一个“强州长”。但当州长不服从甚至想挑战俄罗斯国家时，当州长意图私下结成地方利益集团对抗联邦政策时，那么除了三个圈层的挑战者之外，国家还会通过上级机关对其进行约束，通过下属机关对其力量进行分化，同时还会剥离其治理工具，使州长权力结构出现残缺，无力形成任何实质性的威胁，最终成为一个各种机构与力量都不听其调遣的“弱州长”。换言之，州长这一职务在理论上具有大且集中的权力，但实践中权力的强度完全是由国家掌握的。这也能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俄罗斯地方首脑的“年轻化”现象。年轻化现象在 30 年内的两个时期特别突出，一是苏联刚解体时的 20 世纪 90 年代初，一是经历了 30 年发展之后的 21 世纪 20 年代前后，但两次现象原因不同。20 世纪 90 年代初主要是紧急提拔了一批支持激进民主化的年轻官僚。而 21 世纪 20 年代前后则主要是国家重构的结果——只要给年轻州长赋予“四类工具”，就不需要他在当地重新经营塑造治理所必需的社会网络。年轻的州长不需要考虑复杂的秩序维护等问题，只需要专注地区发展即可。因此忠诚可靠就远比经验和资历更加重要。这同样也能解释为什么近年来产生了越来越多的“空降州长”，但并没有产生严重的“水土不服”或遭遇地方精英集体抵制的现象。相反，许多“空降州长”都能顺利地以高支持率实现连任——州长本质上只需要负责实现权力政治与行政功能中的很小一部分，其他部分都由上下级机构与“四类机构”代行。因此就算是一个政治素人，只要获得中央的信任与支持，都能很快适应角色，成为一个“好州长”。

【Abstract】 The collapse of the USSR and the turmoil of the 1990s has led to the loss of Russia's state power. During the three decades of transition, Russia has always adhered to a strategy of national restructuring and pursued the construction of a "strong state". The restructuring strategy of the Russian state can be explored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political system and meritocracy. In terms of political system, the Russian state has taken the initiative to shape a local political system with the head of the federal subject as the absolute core. In contemporary Russian local politics, the "governor" integrates powers and functions of several political institutions during the Soviet era, and the "state government" has become an extension and supplement to the governor's power system. In order to avoid excessive dependence on "governors", the Russian state has carried out complex institutional design to ensure that the power of "governors" could be divided and restricted. On the one hand, the Russian state has designed a multi-level competition structure at the level of federal subjects, so that many elites vertically from the federal to the local level and horizontally from the political, economic and social fields can participate in the competition for the positions of "governors". On the other hand, the Russian state has also achieved the division of the power of "governors" through formal institutions such as higher and subordinate organs, as well as informal institutions such as directly managed institutions, resident agencies, social organizations, and market subjects. Ultimately, the Russian state has shaped a governance model in which the governor is separated from the tools of governance. By gaining control of governance tools, the federal government can flexibly adjust the authority and influences of the head of federal subjects and exert long-term and sustained pressure on them. The characteristic of separation between governor and governance tools actually reflects the basic logic of Russia's local political system: stability, control rather than development and competition.

【Key Words】 Russian Local Politics, Russian National Construction, Russian State Capacity

【Аннотация】 Распад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и потрясения 1990-х годов

привели к потере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власти в России. В течение 30-летнего процесса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и Россия проводила стратегию национального возрождения и построения «сильной страны». Стратегию перестройки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можно рассматривать с двух точек зрения: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системы и системы элит. С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системы, Российское государство выступило с инициативой формирования местной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системы с главой субъекта федерации как абсолютным ядром.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й российской местной политике «губернатор» объединил полномочия и функции нескольких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институтов советской эпохи, а «областное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 стало продолжением и вспомогательным средством системы власти губернатора. Во избежание чрезмерной зависимости от «губернатора» российское государство осуществило сложный системный проект, обеспечивающий разграничение и ограничение власти «губернатора». С одной стороны, российское государство разработало многоуровневую структуру конкуренции на уровне субъектов федерации, так что многие элиты от федерального до местного уровней по вертикали и из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х и социальных сфер по горизонтали могут участвовать в конкуренции на должность «губернатора». С другой стороны, российское государство также разделило власть «губернатора» через формальные институты, такие как вышестоящие и нижестоящие органы, а также четыре типа неформальных институтов: институты прямого управления, уполномоченные агентства, общественные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и рыночные субъекты. В конечном итоге российское государство сформировало модель управления, в которой правители отделены от инструментов управления. Благодаря контролю над инструментами управления федеральная власть может гибко регулировать полномочия и влияние глав субъектов федерации, оказывать на них долгосрочное и непрерывное давление. Разделение правителей и инструментов управления фактически отражает базовую

логику местной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системы России: стабильность и контроль, а не развитие и конкуренция.

【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 Российская местная политика, российское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о, возможности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责任编辑 宋羽竹）

俄罗斯国家认同建构的理论、效果与反思*

李旭**

【内容提要】建构国家认同是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政府亟待解决和谨慎处理的重大问题，其核心任务在于妥善处理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的关系，有效整合国家认同的内涵。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俄罗斯从理论和实践层面积极探索建构国家认同的可行路径，从建构“俄罗斯民族共同体”到“俄罗斯世界”的变迁，逐渐形成了以“千年俄罗斯”为核心的国家认同理念。在俄罗斯政府自上而下的努力下，俄罗斯全国各族，尤其是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感和公民认同感显著增强。俄罗斯挖掘国家认同的历史文化基因、更新国家认同的定义等做法，为多民族国家认同的建构提供了诸多经验和教训。

【关键词】俄罗斯国家建构 俄罗斯公民认同 俄罗斯民族共同体 俄罗斯世界 千年俄罗斯

【中图分类号】D751.2**【文章标识】**A**【文章编号】**1009-721X(2023)03-0176(17)

国家认同事关社会长治久安、国家安定团结。无论哪个国家、哪个民族，都将国家认同的建构视为增强凝聚力的关键之举。对于多民族国家而言，民族认同、文化认同在国家认同建构中显得尤为重要。自从苏联解体以来，俄罗斯自上而下积极探索建构以“国族共同体”、“传统历史文化”为核心内容的国家认同，随着俄罗斯国内外环境发生深刻变化，俄罗斯国家认同的实

* 本文系2020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新时代国家安全法治的体系建设与实施措施研究”（20&ZD191）的阶段性成果；2022年度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项目“加强教育系统党的政治建设研究：以高校为例”的阶段性成果；2018年华东政法大学科研项目“俄罗斯民众政治认同研究”的阶段性成果。感谢匿名审稿人的修改建议，本文错漏之处由作者负责！

** 李旭，华东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访问学者。

质、内涵及其政策实践也随之转变。深入探究和反思俄罗斯国家认同建构的历史经验、理论成果与政治实践，对于我国也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俄罗斯国家认同理论的变迁

就当今世界上绝大多数多民族国家而言，由于民族构成的复杂性、国民身份的多重性等特点，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差异、张力甚至是冲突。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围绕“公民身份”问题，持续努力寻求一种更具有包容力和凝聚力的认同纽带，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国家、民族认同的有效整合，在此过程中经历了从强调“国族认同”到凝聚“文明认同”的理论变迁。

（一）俄罗斯民族国家理论的探索

现代民族国家是“以国家为标识和认同核心的主权国家”^①。国家不仅意味着特定的疆域、领土，更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②：“想象的”政治共同体、民族共同体和历史文化共同体。^③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所谓的国家认同，既是一个国家的公民认同自己祖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国家主权、道德价值观、理想信念等，也可以成为国民认同。“认同在国家内部维系的是统一，是一个民族确认自己的国族身份；在外部世界参照下，则是一种将自己民族自觉归属于国家的意愿，形成捍卫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的主体意识”。^④

通常来说，国家认同的构成包括民族共同体的集体无意识，但并非一成不变。经过兼具持续性与稳定性的意识培育，国家认同会在历史和现实的语境中不断变迁，形成维系归属感的纽带。某种程度上而言，国家认同的建构是一个文化与政治双向互动的过程。因此，这就需要政治上的国家意识与文

① 俞可平等：《全球化与国家主权》，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55页。

② 参见参见[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著：《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叻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

③ 参见肖滨：“两种公民身份与国家认同的双元结构”，《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第77页。

④ 贺金瑞、燕继荣：“论从民族认同到国家认同”，《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第5页。

化上的思想根基共同发挥作用。^①国家不仅依靠政权、制度、国力等物质性因素树立认同，还需要用民族共同的历史文化记忆凝聚人心。^②

民族认同是国家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但长期以来，俄罗斯民众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表现出一种并列关系，甚至是一种相互冲突、彼此竞争、此消彼长的关系。因此，俄罗斯国家认同建构的首要任务是重新整合俄罗斯国家认同的定义，将民族认同统一到国家认同中，从而建构民族共同体。

20 世纪 90 年代初，俄罗斯民族学家们展开了一系列积极有效的探索。其中，俄罗斯民族学领域研究专家瓦列里·季什科夫就针对苏联时期的民族理论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并提出疑问：“‘多民族性’和‘各族人民友谊’虽然是苏联统一的两个最重要保障，但在大联邦制国家……怎样才能让俄罗斯人(россияне)成为统一和忠于自己国家的民族，让俄罗斯人(российский народ)像中国人、英国人、法国人等一样认为自己是一个民族呢？”^③因此，季什科夫提出建构“俄罗斯民族”(российская нация)的观点。这一全新的术语有别于俄罗斯以往任何历史时期的“俄罗斯族”(русская нация)。这里的“民族”是指“同一国籍的人”，即“公民民族”或“国家民族”、“政治民族”。季什科夫强调，“俄罗斯民族是指多民族人民团结起来的公民共同体，无论是奥塞梯人、俄罗斯族人，还是鞑靼人，俄罗斯首先应当是一个政治民族的国家，这一民族国家共同体是国家根基和国家合法化的重要依据”^④。“俄罗斯民族”(российская нация)成为自总统普京上台以来俄罗斯国家认同建构的重要理念。他多次使用这一概念，并且从多方面促进“全俄罗斯共同体”的生发。

但是，这种理念一直伴随着激烈的争论和质疑，其中不乏俄罗斯民族主义者的观点。他们坚持，俄罗斯认同应当是俄罗斯族的认同，俄罗斯不仅仅

① 黄岩、乌峰：“国家认同探析”，《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 年第 2 期，第 23 页。

② 参见[英]安东尼·吉登斯著：《全球化时代的民族与民族主义》，龚维斌、良警宇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 年，第 106 页。

③ 参见张建华：“‘民族认同’抑或‘公民认同’：苏联的教训与当代俄罗斯的经验”，《国外社会科学》，2018 年第 5 期，第 93 页。

④ Тишков В. Национальная идентичность (о смысле дебатов)// Вестник российской нации. 2009. №.1. С.107.

是公民国家，而是一个历史共同体，“其核心是俄罗斯族人”；俄罗斯民族运动思想家预言，俄罗斯当前正在转型为“俄罗斯族的民族国家”；^①俄罗斯学者埃米尔·帕因认为，俄罗斯认同反映着民族团结的趋势，但由于当前公民社会的脆弱性，是否能将其完全理解为公民认同，仍存有争论。^②

面对激烈的争论，俄总统普京反驳了基于种族文化认同的民族国家模式，并致力于推动“俄罗斯民族”建构。2012年1月23日，普京针对俄罗斯的民族问题发文指出：“俄罗斯经过几个世纪的发展，形成了今天这样一个多民族国家”。诚然，俄罗斯族的确在国家形成发展过程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这是历史事实，但今天我们更强调的是，如何使这样一个多民族国家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加强，必须通过民族融合来实现这一目标。^③

（二）俄罗斯国家认同的文化价值观重塑

从本质上看，国家认同由国家的民族认同、政治认同、文化认同以及国土认同组成。作为一个历史悠久、文明独特的民族国家，俄罗斯不仅需要建立对主权国家的法律和政治认同，长期历史传统积淀形成的文化归属是社会凝聚力的关键。自2007年起，“俄罗斯世界”这一思想观念开始成为俄罗斯国家政治话语体系的组成部分，普京总统以及俄罗斯精英试图建立一个超越民族国家边界的大文化共同体——基于东正教文化，拥有共同语言、历史文化和共同历史记忆的世界范围的共同体。

“俄罗斯世界”（Русский мир）的概念起源可以追溯到基辅罗斯时期。1833年，教育大臣乌瓦罗夫在呈给沙皇尼古拉一世的报告中提及“俄罗斯世界”，在此基础上形成“东正教”、“专制制度”和“人民性”三位一体纲领，这一政策后来被作为基本国策，并且一直沿用至20世纪初期。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俄罗斯世界”概念曾等同于“俄罗斯及海外俄罗斯人群体的世界”，即俄罗斯、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组成核心部分、基于共同历史记

^① See Ремизов М. Проект «Государство-цивилизация». 2 сентября 2005 г. <http://www.intelros.org/drevo/remizov1.htm>

^② Паин Э. А. Между империей и нацией. Модернистский проект и его традиционалистская альтернатива в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политике России. Москва: Нов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2004. С.47-78.

^③ Дробижева Л.М. Российская идентичность: поиски определения и динамика распространения// Социологически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2020. №.8. С.38.

忆的共同体。早期的欧亚主义学者们将“俄罗斯世界”定义为“俄罗斯-欧亚文化空间”。

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俄罗斯学者谢德罗维茨基、奥斯特洛夫斯基等将“俄罗斯世界”进一步阐释为一个思想观念体系，并开始探讨如何塑造新型民族国家认同、打造俄罗斯新型文明模式。他们十分重视俄语的意义，认为俄语是维持俄罗斯人共同的价值观、生活方式和精神文化空间的纽带，并且开始构建“俄罗斯世界”的理论范式。

进入 21 世纪，俄罗斯哲学家杜金、斯托利亚罗夫等认为，“俄罗斯世界”是覆盖俄罗斯、中亚、东欧和高加索等地区的“俄罗斯岛”，其意义在于承载新欧亚主义的“后苏联空间意识”，其目的在于确保俄罗斯在大欧亚空间下的独立自主和国家安全。杜金认为，俄罗斯是一个独立文明，其认同不是国家的，而是种族的，这是一种文化类型，是开放的认同。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个包含一切的帝国。俄罗斯的中心是俄罗斯人民，对那些将自己的命运与俄罗斯人民的命运结合在一起的民族来说，它是开放的，他们可以获得应有的、充分的机会融入我们的命运。^①季什科夫院士总结道：“‘俄罗斯世界’是一个涵盖了国际的、跨国的、跨洲的人类共同体的概念范畴，它包含了那些迄今为止仍然在使用俄罗斯语言，以及忠诚于或热衷于俄罗斯文化的人群。”^②

“俄罗斯世界”这一概念日益“政治化”，并从 2007 年开始被广泛使用，它是俄罗斯政府发挥国家“软实力”、实施地缘政治战略的文化路径。俄政府致力于将“俄罗斯世界”打造成一套专属于俄罗斯的文明系统，它不刻意模仿所谓西方的“现代化”模式，也不在意西方的评价和审视。普京在 2012 年重返克里姆林宫之后，进一步明确，“未来十年的俄罗斯必须依靠自身的文明、历史、地理以及文化基因来探索属于自己国家的发展模式”。在 2014 年的瓦尔代会议上，普京指出，“健康的保守主义主张，为了保障实现持续的发展，要运用一切优秀的传统，也要推动具有前瞻性的创新……为了

^① См. Интервью Александр Дугин: Солнечный путин победил лунного. 30 марта 2022 г. <https://izborsk-club.ru/22555?ysclid=17oj0btb1m896326425>

^② Тишков В. Русский язык и русскоязычное население в странах СНГ и Балтии// Блог В. Тишкова. 19 декабря 2007 г. http://valerytishkov.ru/cntnt/publikacii3/publikacii/russkij_yazyk_i_russkoyazychnoe_naselenie_v_stranah_sng_i_baltii.html

确保社会的存在，需要支持一些最基本的东西，而这是几个世纪以来的人类生活的结晶——这里指的是对母亲和儿童的保护，指的是对于自己历史的尊重，包括对自身历史所取得成就、我们的各种传统和传统宗教的尊重。俄罗斯法律规定有四种传统宗教，它们是非常不同的宗教。为此，我们要尽我们所能确立牢固的基础，使它们有助于形成俄罗斯的多民族国家、俄罗斯的多民族社会的认同”^①。2018年，普京在世界俄罗斯同胞代表大会上强调了俄罗斯世界的内涵，即俄罗斯世界代表着一个巨大的世界，它从未完全基于种族、民族和宗教原因而建立。这个“世界”团结了所有那些感到与俄罗斯有精神联系的人，他们是俄语、俄罗斯历史文化的缔造者。2022年2月，普京进一步强调，“整个俄罗斯世界，像俄罗斯一样，它是多教派、多民族的，是多方面的、巨大的。我们的使命是加强它、发展它，并使其对俄罗斯公民和整个世界具有吸引力。”^②

尽管俄罗斯一再强调这一理念仅存在于文明维度，但有不少学者认为，“俄罗斯世界”作为有关认同的理念缺乏必要的边界，甚至被认为存在某种帝国主义的复苏，抑或是重建“苏联世界”的导向。^③俄罗斯学者佩图霍夫和巴拉什认为，“俄罗斯世界”这种泛斯拉夫主义的提出，将在非斯拉夫民族地区以及中亚地区国家引发新孤立主义情绪的激增。佩图霍夫还特别指出，“俄罗斯世界的提出迎合了俄罗斯民众高涨的爱国主义情绪，但这只和一部分俄罗斯民众产生共鸣。对大多数民众而言，俄罗斯恢复大国荣光并没有那么重要，他们对俄罗斯国家未来的安危感到担忧”^④。尽管普京曾特别强调“俄罗斯世界”是建立在族群、宗教、文化层面之上的，除此之外并没有其他意图。但2022年俄乌冲突以来，“俄罗斯世界”以及持欧亚主义理念的俄罗斯哲学家杜金被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俄罗斯世界”的构建是否反映了普京时代的俄罗斯试图重建“超民族”帝

① Заседание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дискуссионного клуба «Валдай». 24 октября 2014 г. <http://www.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46860>

② Путин призвал развивать и укреплять русский мир. 2 февраля 2022 г. <https://ria.ru/20220202/mir-1770681278.html?ysclid=17o4i292om46351592>

③ 张严峻：“从概念变化的视角理解‘俄罗斯世界’”，《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20年第2期，第111页。

④ Петухов В. В., Бараш Р. Э. Русские и «Русский мир»: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контекст и современное прочтение// Полис. 2014. №.6. С.78.

国边界的政治野心，并以此凝聚境外俄罗斯人，达成一系列地缘政治目标，还有待进一步的观察和研究。

（三）俄罗斯国家认同理念变迁的深层动因

从 19 世纪的斯拉夫派和西方派，到苏联解体之后的自由主义、现实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国家主义，有关俄罗斯身份之争、发展道路之争，一刻都没有停止过。进入 21 世纪，随着俄罗斯国内外局势的复杂、严峻，俄政界学界人士深刻地认识到“拥抱西方”只是遥不可及的梦，“回归自我”才是俄罗斯的选择。国家的进步无法与自身精神、传统文化和民族认同相割裂，否则将无法抵御国内外挑战，无法在全球激烈的竞争中取得成功。俄罗斯国家认同理论的变迁既反映了俄罗斯对于自身定位的转变，同时也标志着俄罗斯治国理念和意识形态的重要转折——意识形态回归、对保守主义的强调，有俄学者称之为“保守的现实主义”。

冷战以后，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并没有因为俄罗斯采取一种“亲和”西方的立场，而改变对俄罗斯的战略敌视，并且近些年以来俄罗斯所面对的外部环境有不断恶化的趋势。正如普京所言：“苏联解体后，尽管新生的俄罗斯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开放性和同美西方合作意愿，并且几乎是单方面进行裁军，但美西方仍企图压榨，甚至彻底摧毁俄罗斯。20 世纪 90 年代及 21 世纪初的情况就是如此。当时，所谓的集体西方大肆支持俄南部的分裂主义和受雇佣匪徒……直至最近，还有国家不断企图利用俄服务自身利益，摧毁俄传统价值观并将自身虚假价值观强加于俄罗斯，以此从内部侵蚀我们和我们的人民。”^①

2008 年以来，俄罗斯经济在西方制裁和全球油价下跌的双重影响下，连续十余年低增长或负增长，GDP 年均增长率仅为 0.9%。^②俄罗斯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 1999 年为 1330.76 美元。2013 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了约 15974.64 美元，2016 年降至 8704.9 美元。^③民调结果显示，民众普遍感觉生

① Сoвещание с постоянными членами Совета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Президент России. 3 марта 2022 г. <http://www.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67903/videos>

② 陆南泉：“俄罗斯经济转型 30 年评析”，《探索与争鸣》，2021 年第 3 期，第 150 页。

③ 参见俄罗斯联邦国家统计局（<https://rosstat.gov.ru>）数据。

活水平有所下降，并出现恐慌、焦虑等负面情绪。俄罗斯多地频发大规模反对派游行、集会。反对派领导人纳瓦尔内利用网络社交平台，获得了一大批“互联网一代”俄年轻人的支持和拥护，其中不乏著名博主和记者。反对派的产生、动辄几十万人游行示威的原因是复杂的、多方面的：一方面，当前俄罗斯的腐败问题、民生问题、社会不平等现象确实是长期存在的社会矛盾，反映了俄罗斯社会深层次的政治经济结构性矛盾；但另一方面，看似民众自发的游行活动，实则是西方势力长期培养和扶植的结果。据调查，纳瓦尔内的基金会在 2015—2019 年间共计接受了来自境外约 10 亿卢布的资金。每逢大选前后，利用媒体推波助澜，煽动更多不明真相民众参与其中，从而引发大规模示威抗议集会，这显然就是西方国家勾结反对势力、里应外合在俄罗斯企图进行“颜色革命”的一贯剧本、套路。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帕特鲁舍夫曾公开表示，西方国家从未放弃过对俄罗斯的渗透，其目的是想和俄罗斯展开一场信息战，输出西方的思维和理念，操控主流意识形态，专门挑起俄罗斯的民族分裂。^①

俄罗斯当局认为，当前俄罗斯所有内忧外患的根源是地缘政治危机，缘起于同独联体国家的关系，因此，重整后苏联空间被放在了重中之重的位置。俄罗斯提出了“转向东方”的外交政策，对自身定义也从“欧洲国家”转为“欧亚国家”。

2015 年发布的《2020 年前俄罗斯国家安全战略》明确指出，俄罗斯优先发展与独联体和上合组织国家关系，将竭力保持与美国和北约的战略平衡。同时，在这一版《国家安全战略》中首次浓墨重彩、语言犀利地将美国和北约列为国家外部安全的最大威胁。不畏西方霸权、勇敢地维护俄罗斯主权、安全和利益是普京政治的最大特点，而这也是西方世界决定围剿普京的国际政治根源。这些年来，面对一些西方大国绕开联合国、践踏国际法、肆意武装干涉他国内政的行径，普京领导的俄罗斯善于依据国际准则，巧妙出击、勇敢回击，有效地维护了自身利益和国际公理，赢得了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

^① См. Патрушев заявил о попытках Запада раскачать ситуацию в России. 10 июня 2020 г. <https://ria.ru/20200610/1572721581.html?ysclid=17o1dpqwmr634406954>

赞誉。^①

俄罗斯国家认同理念的变迁，反映了曾经徘徊在十字路口的俄罗斯对于国家发展道路的选择。俄罗斯在政治上，选择了一条依靠自身力量谋求发展的国家主义发展道路；在思想和方向上，坚持国家主义或开明的保守主义，强调俄罗斯历史文化的“独特性”和连续性，宣扬爱国主义和强国思想；在外交战略上，强硬地反击西方，敢于说“不”，坚决维护国家利益，勇于挑战美国和与其对抗。

二、俄罗斯国家认同建构的政策实践

从俄罗斯国家认同建构的历史变迁看，在“千年俄罗斯”、“主权民主”思想指导下，围绕着建构“俄罗斯民族共同体”、“俄罗斯世界”付出了诸多的努力。一种根植于传统文化的国家价值体系开始逐渐清晰起来，保守主义作为主流意识形态逐步形成发展。

（一）强化俄罗斯民族国家认同的政策变迁

苏联解体之后的整个 20 世纪 90 年代，俄罗斯国家认同建构的核心是全盘接受以民主理念为核心的普世价值观，全盘否定苏联经验、苏联历史，尖锐批评苏联时期的政治经济秩序。问题在于，这种戕害自我认同的激进转向，并未被俄罗斯人民所接受，反而造成国家的思想混乱。

2000 年初普京出任总统，并提出“千年俄罗斯”的思想：“当代俄罗斯不仅是沙皇俄国的继承者，也是苏联的继承者”。在历史文化政策方面实施“全面继承学说”，融合了俄国沙皇时期、东正教、苏联和民主派的价值观。对于苏联的历史，将其定义为一种“光荣的过去”：强调苏联曾经是世界头号强国，带领苏联人民赢得了伟大卫国战争的胜利，苏联人民表现了强大的英雄主义气概和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新修订的《2020 年俄罗斯联邦宪法》第 67.1 条确立了“千年俄罗斯”的内涵：千年的俄罗斯联邦，将牢记那些传递给我们上帝的理念和信仰以及维系国家连续性发展的先辈，并尊崇历史悠

^① 参见张树华：《制度兴衰与道路成败：世界政治比较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2 年，第 211 页。

久的国家统一；俄罗斯联邦对祖国捍卫者表示敬意，重视对历史真相的保护，禁止贬损人民保卫祖国壮举的意义；儿童是俄罗斯国家政策最重要的优先方向。国家创造条件，促进儿童的道德、智力和身体的全面发展，培养青少年爱国主义精神、公民意识和尊敬长辈的观念意识。在确保家庭教育优先的同时，国家承担无监护儿童的父母责任。

为了摆脱长期以来历史虚无主义的消极影响，树立俄罗斯公民正确的历史观，从 2001 年开始，普京从历史教育和教材编写方面出台一系列具体举措，以整顿历史领域的乱象。2013 年，普京在民族关系委员会扩大会议上指出：俄罗斯政府要拨出巨额专项资金，大力推广和普及俄语，强化对青少年的历史传统教育，加强爱国主义教育，提升国民认同感。在保护俄罗斯的传统价值观方面，俄罗斯政府提出两种路径：一是高度重视青少年的爱国主义教育。从 2001 年起，俄罗斯每隔五年颁布一部《俄罗斯联邦公民爱国主义教育纲要》，为公民的爱国主义教育提供新内涵、新目标、形新式，鼓励更多的社会组织、青少年团体和非政府组织参与全民的爱国主义教育。2012 年 10 月 20 日，普京签署《关于完善国家爱国主义教育政策》，并提出“新爱国主义”的概念，强调包括沙俄时代在内的俄罗斯传统道德价值观、敦促学校加强对青少年历史、文化和道德教育。二是继续巩固并加强东正教的传统地位。普京在不同场合多次赞扬了东正教在实现俄罗斯复兴、维护俄罗斯传统文化中所起的巨大精神作用，大力支持东正教捍卫俄罗斯传统文化。

尽管构建“俄罗斯民族共同体”的理论探索始于 20 世纪 90 年代，但是真正推动将其写入法律的是一系列社会事件，尤其是 2011 年莫斯科马涅日广场民众游行集会活动。2012 年，“俄罗斯民族”这一政治民族表述首次正式写入国家纲领性文件《2025 年前国家民族政策战略》（下文简称《战略》）。

《战略》中指出俄罗斯由各族人民一起创立，历史上俄罗斯族人是各民族团结的核心。俄罗斯将保留并发展俄罗斯文化、语言以及各民族历史文化遗产，在此基础上，形成统一的文化（文明）渊源，集各民族之精髓，融合形成统一的俄罗斯文化。在国家民族政策的目标和任务中，重中之重是加强俄罗斯全民意识和俄联邦多民族人民精神共同体。《战略》中并没有特别强调俄罗斯族人作为国家创建者，旨在加强俄罗斯民族国家认同，消除少数民族被同

化的疑虑。

《战略》修订版于 2018 年 12 月 6 日被批准，在修订版的《战略》中对“俄罗斯公民的自觉意识”进行了专门的解释，即自觉认识到自己属于国家、人民、社会，对国家命运负责，需要遵守公民权利和义务，并忠于俄罗斯社会的基本价值观。同时为了避免被视为同化策略，《战略》第 11 条特别说明：俄罗斯全民的公民认同建立在保持俄联邦各民族固有的俄罗斯文化优势的基础上，统一文化（文明）包括俄联邦各民族的历史文化传承，各民族的优秀成果以及形成所有人应当遵守的原则，这三者的整合形成了统一的俄罗斯文化。2018 版《战略》作为各地方权力机关必须遵守和落实的指导方针，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教科书的编写和修改。2020 年俄罗斯联邦《宪法》修订期间不可避免地涉及俄语语言和文化统一的议题。在此期间，普京指出，“俄语是俄罗斯联邦全境的官方语言，也是俄罗斯联邦平等的多民族联盟的民族国家语言”，结合第 4 条“俄联邦境内应保持民族文化及语言的多样性”，也需要“非常正确认真地贯彻”，^①最终经过修订的俄联邦宪法第 68 条确立了“俄语是俄罗斯联邦全境的官方语言，也是俄罗斯联邦平等的多民族联盟的民族国家语言；共和国有权确定自己的国语”。新增补第 4 条：俄罗斯联邦的文化是其多民族独一无二的遗产。该文化受到国家支持和保护。

由此可见，围绕着是否突出“俄罗斯族”在多民族中的主体地位的争论仍然在博弈，立法者围绕着可能引起的争议，尽量做到平衡，既强调各族人民作为俄罗斯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同时又保护各民族文化融合发展。

（二）强化俄罗斯民族国家文化认同的政策落实

建构“俄罗斯世界”的首要任务是普及俄语，通过俄语在“俄罗斯世界”中的传播，让境内外的俄罗斯同胞感受到统一的文化根基，并发挥俄语的“桥梁”作用。与此同时，俄罗斯政府积极推动东正教会与境外教会之间恢复往来，促进“俄罗斯世界”的复兴，并赋予其具体的政治含义。

为了落实“俄罗斯世界”的理念，俄罗斯成立了“俄罗斯世界”基金会、国际人道主义合作事务署、侨居国外同胞、俄语国家基金（负责境内俄语发

^① Встреча с рабочей группой по подготовке предложений о внесении поправок в Конституцию// Президент России. 13 февраля 2020 г. <http://kremlin.ru/events/president/transcripts/62862>

展)、境外俄罗斯学校等官方或非官方机构。在制定相关政策方面,俄罗斯政府颁布了《国家扶持和推进境外俄语发展理念》《“俄语”纲要》《“新一代”总统纲要》《境外俄语研究纲要》等一系列政策文件,这些政策的制定旨在向全世界普及俄语、传播俄罗斯文学。成立于2007年6月21日的“俄罗斯世界”基金会是落实“俄罗斯世界”理念的重要组织之一,其宗旨是促进俄语在全世界的推广,以及为境内外俄语研究规划的实施提供必要的支持。

俄罗斯东正教会作为“俄罗斯世界”的精神纽带,积极推动俄罗斯东正教与俄罗斯政府的合作进程。自2003年起俄罗斯政教合作迈进新的阶段。时任加里宁格勒和斯摩棱斯克都主教基里尔积极推动,成立了俄罗斯外交部和东正教会工作组,通过了《俄罗斯东正教会和俄联邦外交部相互作用制度》,明确了未来俄罗斯政教合作的发展方向。2004年,东正教传统节日“喀山圣母节”正式确立为俄罗斯官方节日。2007年俄罗斯东正教会与海外的俄罗斯东正教会恢复了统一,从而为建立一个跨国界的精神文明空间奠定了基础。俄罗斯东正教会与“俄罗斯世界”基金会保持密切合作,共同主办论坛,加快推动与邻国东正教主教区的合并,致力于为海外东正教教徒提供宗教服务。

2009年全俄罗斯东正教大牧首基里尔重提“神圣罗斯”概念,他指出,“神圣罗斯”作为“俄罗斯世界”的核心,由东正教信仰、俄语和共同历史记忆所构成。2009—2013年,基里尔致力于俄罗斯东正教的海外发展,积极促成俄政府主导的区域一体化进程。他在与乌白等国领导人会晤中表示:“我们共同构成了东斯拉夫文明的根基。两个国家靠共同的宗教、历史和文化联系在一起……各国人民走向了国家的主权道路,教会尊重这一国家选择。但同时,我们努力保存源自共同历史的‘神圣罗斯’精神文化空间。”^①

(三) 俄罗斯国家认同建构的成效评估

俄罗斯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通过对俄罗斯各民族长达20年的跟踪实证调查研究,指出俄罗斯各民族的族群认同略高于国家认同感,但公民认同感、

^① 胡巍葳:“国家理念与教会构想——‘俄罗斯世界’双重维度探析”,《西伯利亚研究》,2021年第2期,第43页。

国家认同感明显增强。^①

2005—2018 年，俄罗斯民众在所有集体认同中，对族群认同和地区认同长期保持较高的水平，而成长最为明显的，是俄罗斯国家公民认同，由 65% 增长至 79%，增幅为 14 个百分点。根据这一研究所的调查结果，到 2018 年，认同俄罗斯身份的俄罗斯人所占比重更高，达到了 84%。在此过程中，2015 年是变化最明显的一年，俄罗斯民众的公民认同感明显增强，其变化的主要原因是 2014 年俄乌冲突所引发的俄罗斯国际关系的复杂变化，是克里米亚事件、叙利亚事件以及与美欧关系的恶化所激发的防御情绪。在此背景下，从在俄境内举办的国家体育赛事看，俄民众对于俄罗斯国家身份的认同愈加强烈。

根据以往的调查结果，俄罗斯族群认同和国家认同之间是相互冲突、彼此竞争的。但 2017—2019 年的调研数据却显示出一种新趋势：俄罗斯国家认同实际上与族群认同及地域认同相接近，区别仅在 4 个百分点范围内。俄罗斯各民族在各类集体认同中表现基本相近，非俄罗斯族公民同样表现出对国家较高的忠诚度，认为自己是俄罗斯人。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鞑靼斯坦共和国、楚瓦什共和国等联邦主体对国家认同程度并不低于俄罗斯其他地区。他们同样“常常”认为自己是俄罗斯人，达到 67.4%~67.6%。由此进一步证实了当前俄罗斯国家认同与族群认同开始相互兼容。

与此同时，2015—2018 年的调查数据表明：不同年龄段的俄罗斯人在俄罗斯国家认同方面的差距甚微，浮动范围在 91%~94% 之间：经历过苏联时期的老辈人比俄罗斯“00 后”对国家认同感更强；受教育程度不同的人对俄罗斯认同的差异同样不明显，例如，95% 受过高等教育的俄公民广泛认同俄罗斯身份，但这仅比普通工人高出 5 个百分点；此外，城市规模越大、城市化水平越高，对俄罗斯的认同程度也越高。

调查数据表明，俄罗斯国家认同在增强政治认同、公民认同、文化认同方面取得了积极的成效，尤其是自从 2014 年克里米亚危机发生以来，俄罗斯民众的国家认同感、公民认同感显著增强，也印证了共同历史文化积淀可

^① Дробижва Л. М. Российская идентичность: поиски определения и динамика распространения // Социологически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2020. №.8. С.40.

以作为重要纽带凝聚俄罗斯各族人民的作用。当前绝大多数俄罗斯人普遍认同自己是俄罗斯社会的一分子。民众的认同意识正在复苏，而凝聚俄罗斯民众的主要是俄罗斯各民族对共同的历史背景和文化相似性的认同，以及在危难时刻俄罗斯同甘共苦、团结一致的信念和意志。但官方所倡导的意识形态和民众实际观念之间仍存在一定差距，如何整合和丰富俄罗斯认同的内涵还有待进一步的探索。

三、俄罗斯国家认同建构的经验与反思

（一）俄罗斯国家认同从“自我否定”到“自我复归”

冷战结束后，俄罗斯自上而下对于“我是谁”、“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经历了由迷茫向清晰的转变过程。通过社会各界的努力，俄罗斯国家认同感、公民认同感明显增强，之前各个族群信仰缺失、精神涣散、文化迷失、责任和奉献意识薄弱等现象得到明显改观。俄罗斯政治精英不再迷信所谓的“西方经验”，回归到根植于“千年俄罗斯”的历史文化传统中，找到了凝聚俄罗斯多民族国家的精神文化内核。虽然建构“俄罗斯民族”这一公民民族共同体的理想尚未实现，但是在公民认同、政治认同、文化认同方面已经取得了积极进展。

纵观 21 世纪以来俄罗斯国家认同的构建，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议程”对话会致辞所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历史文化和社会制度。世界各国历史文化和制度各有千秋，没有高低优劣之分，关键在于是否符合本国的国情，能否获得人民拥护和支持，能否带来政治稳定、社会进步、民生改善，能否为人类进步事业作出贡献。^①每个民族国家应该扎根于自己的历史和文化，探索独具特色的文明模式。

（二）“历史迷茫”对俄罗斯构建国家认同的冲击

近年来，面对来自西方强大的思想和舆论压力，俄罗斯自上而下积极构

^① 习近平：“让多边主义的火炬照亮人类前行之路——在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议程’对话会上的特别致辞”，《人民日报》，2021年2月21日第6版。

建国家认同,加紧凝聚社会共识,努力找寻俄罗斯千年文化的历史文化基因。尽管普京十分重视青少年的历史教育、爱国主义教育,但在俄罗斯社会各界,思想政治分歧依然严重。受美国和西方意识形态影响的俄国学界和教育界,至今仍弥漫着浓厚的“崇洋媚外”氛围。严肃的史学被边缘化,伪科学和碎片化的“低俗史学”大行其道,媒体上不乏各种“戏说历史”、“歪曲历史”的现象,在一些西方反俄政治势力的支持下,抵制俄官方修史、反对修改教科书等现象时有发生。

在这种情况下,历史文化资源不仅未能成为俄罗斯民族前进的动力,反而成为撕裂社会团结的漩涡,是阻碍俄罗斯前进的沉重包袱。^①同时,俄罗斯高层如普京、梅德韦杰夫等领导人在事关重大历史问题和历史人物的评述中,出现左右摇摆、语焉不详、前后矛盾的现象。普京试图寻根的努力和回归“沙俄历史”的倾向,引发了境内外各界的警惕,担心普京的爱国主义和保守主义会演变成咄咄逼人的“沙文主义”和“大俄罗斯民族主义”。由此可见,未来俄罗斯社会历史思想领域的探索和斗争还将继续,国家认同构建仍然面临着极其复杂的风险和挑战,如何既能挖掘出俄罗斯千年历史文化资源,又能明确其内涵的边界意识,仍需要进一步观察和探索。

(三) 实现各民族真正融合是构建国家认同的“瓶颈”

民族问题一直是影响俄罗斯社会稳定、国家发展的关键。普京执政以来,十分重视增强国民凝聚力,少数民族公民的国家认同感、公民认同感明显增强。但仍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俄罗斯政府在构建“俄罗斯民族”共同体时尽量做到平衡,保护各民族的多元性,但在国家发展战略中又积极构建以东正教为基础、以斯拉夫文明为核心的文化共同体。一部分民族主义者仍不遗余力地强调“俄罗斯族”的重要性。俄罗斯政府塑造国民凝聚力,不可避免地强化了俄罗斯族人的民族主义。当前,在俄罗斯境内,强势民族对弱势民族或少数民族的歧视、不平等现象甚至仇视仍然时有发生。^②同时,在某些地区实行的本土化和民族特殊优待政策,又产生了俄罗斯族人被歧视的现象。

① 参见张树华:《制度兴衰与道路成败:世界政治比较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2年,第203页。

② 左凤荣:“俄罗斯增强多民族国家认同的主要举措”,《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5年第3期,第160页。

俄罗斯的探索再一次证明，构建多民族国家认同，首先需要立足本国国情，根植本土文化；既注重培养少数民族同胞的公民意识，又注重多元文化的保护；坚持民族平等原则，时刻防范“多数民族的民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的回潮。与此同时，需要进一步深化民族国家共同体的政治属性与政治内涵，不仅强化民族共同体的法律地位，同时注重完善各民族团结平等的法律法规。事实证明，构建民族共同体，真正实现各民族相互融合，构建国家认同感，必然是一个政治、经济、文化等多领域协调，多方积极努力的长期培育过程。国内外发展环境的安全稳定、民众生活收入水平的切实提高，依然是增强公民国家认同感的关键努力方向。

【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identity is a major issue that the Russian government needs to solve and handle carefully after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Its core task is to properly handl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ational identity and ethnic identity, and effectively integrate the connotation of national identity. Especially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21st century, Russia has actively explored a feasible path for constructing a national identity from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levels, gradually forming the concept of national identity with “Millennium Russia” as the core from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Russian Ethnic Community” to the “Russian World”. Due to the top-down efforts of the Russian government, the sense of national identity and civic identity of all ethnic groups in Russia, especially ethnic minorities, has been significantly enhanced. Russia’s practices such as excavating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genes of national identity and updating the definition of national identity have provided many experiences and lesson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multi-ethnic national identity.

【Key Words】 Russian State Construction, Russian Civic Identity, Russian National Community, Russian World, Millennium Russia

【 Аннотация 】 Построение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идентичности является серьёзной проблемой, которой российское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 в срочном порядке и тщательно занимается после распада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основная задача

состоит в том, чтобы должным образом урегулировать отношения между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идентичностью и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идентичностью и эффективно интегрировать содержание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идентичности. Со вступлением в XXI век, Россия стала активно искать возможные пути конструирования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идентичности на теоретическом и практическом уровнях от построения «русского национального сообщества» до «Русского мира» и постепенно сформировала «тысячелетнюю Россию» в качестве основной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идентичности. Благодаря усилиям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сверху вниз» значительно усилилось чувство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идентичности и гражданской идентичности всех этнических групп в России, особенно национальных меньшинств. Российская практика раскопок исторических и культурных генов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идентичности и обновления определения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идентичности предоставила много опыта и уроков для построения полиэтнической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идентичности.

【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 Российское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о, российская гражданская идентичность, русское национальное сообщество, русский мир, тысячелетняя Россия

(责任编辑 崔 珩)

《俄罗斯研究》来稿须知与注释示例

《俄罗斯研究》多年来形成了以扎实的俄罗斯欧亚国别与区域研究为依托，有效服务中国外交政策的办刊特色。旨在刊发各领域、各学科中外学者在俄罗斯及欧亚问题研究领域的前沿成果，尤其欢迎融经验性、理论性、时效性于一体的、有中国思想和中国关怀的研究俄罗斯及欧亚问题的论文，为推动国内外学界沟通，尤其是国内学界、青年学者的发展提供平台。常设议题主要包括俄罗斯及欧亚地区国家政治、经济、历史、文化、对外关系研究、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大国关系研究等。本刊议题不囿于上述方面，诚挚欢迎有创新性的高水平成果向本刊提供新的议题引领。

一、来稿须知

1. 请使用信箱投稿或在线投稿系统：

投稿信箱：russiastudies@163.net；在线投稿系统：<http://ru.ecnu.edu.cn>；

电话：021-62233816；传真：021-62238113。

2. 来稿字数 1.5 万-2 万字，需有 300-500 字的内容提要，3-5 个关键词。

3. 本刊不以任何形式收取版面费。稿件一经采用，会向作者支付稿酬，邮寄样刊。

4. 本刊已许可中国知网以数字化方式复制、汇编、发行、信息网络传播本刊全文。本刊支付的稿酬已包含中国知网著作权使用费。所有署名作者向本刊提交文章发表之行为视为同意上述声明。如有异议，请在投稿时说明，本刊将按作者说明处理。

二、注释示例

1. 中文文献

(1) 著作：冯绍雷：《制度变迁与对外关系：1992 年以来的俄罗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年，第 66 页。

(2) 期刊文章：杨洁勉：“疫情下国际格局和世界秩序变化趋势分析”，《俄罗斯研究》，2020 年第 5 期，第 18 页。

2. 英文文献

(1) 著作：R. Sakwa, *Russia against the Rest: The Post-Cold War Crisis of World Ord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7, p.20.

(2) 期刊文章：J. Mearsheimer, “Bound to Fail: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019, Vol.43, No.4, pp.7-8.

3. 俄文文献

(1) 著作：Замятин Д.Н. Культура и пространство: Моделирование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их образов. М.: Знак, 2006. С.86.

(2) 期刊文章：Лукьянов Ф. Украинский вопрос для будущего России// Россия в глобальной политике. 2018. Том 16. №.2-3. С.175.

完整版本请参阅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网站 <https://rus.ecnu.edu.cn/>

《俄罗斯研究》编辑部

俄罗斯研究 (双月刊)

ELUOSI YANJIU ИЗУЧЕНИЕ РОССИИ
RUSSIAN STUDIES

2023年第3期(总第241期)

主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主办：华东师范大学

主编：刘军

出版：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

编辑：《俄罗斯研究》编辑部

地址：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

华东师范大学理科大楼A403

邮编：200062

电话：021-62233816 021-62238113

传真：021-62232113

电子信箱：russiastudies@163.net

网址：<http://ru.ecnu.edu.cn/>

印刷：上海华教印务有限公司

发行：本刊编辑部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 31-1843/D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ISSN 1009-721X

网络电子版代理：中国知网

网址：www.cnki.net

ISSN 1009-721X



公开发行

定价：30.00元